

〔南〕 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著

熊家文 朱行巧 陈 森 文正林 译

# 七十年代的 南斯拉夫经济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99

2 017 5519 0

# 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

【南】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 著  
熊家文 朱行巧 译  
陈森 文正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

〔南〕贝里斯拉夫·舍费尔博士 著  
熊家文 朱行巧 陈 森 文正林 译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京安印刷厂印刷

\*

167×100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字数：250,000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4166·113 定价：1.10元

## 译 者 的 话

《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是前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贝里斯拉夫·舍费尔编著，于一九七六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全书共分四部分，对七十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情况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为了使读者了解南斯拉夫的经济情况，现根据塞尔维亚文版本把它翻译出来，供参考。此外，我们还将作者在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和趋势》译出，作为附录放在书后。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对书中某些文字上重复的地方以及某些注释作了删节。

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本书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 前 言

我的这本书中所包括的著作都是互相有联系的。这些著作涉及到南斯拉夫经济政策的一些迫切问题。其中一部分已经发表过，这次出版时作了修改和补充，但大部分都是没有发表过的。为了阐述和评价当前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形势，我把我在联邦议会和其它公开场合下的一些讲话加以修改后放进了这些著作。

本书的书名是《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书中的第一部分是叙述和分析自治条件下的南斯拉夫的经济的发展。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工作的结果，但是已经作了很大的充实、修改和补充。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迫切的经济问题的分析。这部分的重点是对长期以来就存在、并在当前的政策中仍然存在的三个因素的叙述。这就是：对已经发生变化和仍在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分析；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对经济上的可能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关系的分析。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叙述对主要经济部门所进行的有关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革。在这一部分，对基本问题和解决的方向进行了剖析，但是阐述得不够详尽，结构不够严谨，也缺少基本的分析、研究和论证。应当说，在出版本书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制定法令的工作正在进行，许多部门也都还不知道改革经济制度的措施。本书第四部分，也就是本书的最后部

分，是对不久前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的论述。

我认为就本书的内容而言，冠之以上述书名是恰当的。当前的经济情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迫切经济问题的特点，是存在着由于南斯拉夫经济、物质和社会长期发展而带来的许多矛盾。在当前的情况下，现行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全力以赴地找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以便通过不断的物质和社会发展使这些矛盾得到克服。但是，解决矛盾从而为南斯拉夫经济进一步发展开辟新途径的真正办法和措施，是在一九七四年宪法基础上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及作为共同协商出来的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政策的新的五年计划。这就是说，现行的经济政策、制度改革以及新的五年计划显然是南斯拉夫经济政策的最迫切问题。

虽然，我有意识地扩大了本书所阐述和评论的命题，但是这些命题确实是反映了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当前发展实践中是存在的，在本著作中甚至也是很难回避的。因此，在论述如此广泛的命题时，可能表达得不够完善和准确，分析得不够透彻，而且有些事实也不尽可靠，估计也不够确切。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带来许多矛盾，而我国的发展由于在物质和社会领域内发生迅速的革命变革，矛盾就更多了。对这些矛盾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进行大量的研究，这是我这本著作以及我个人的能力很难办得到的。另外，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本人还担负着其它任务，我能够用于撰写本书的时间是极有限的。因此，从研究的深度和引证文献资料的角度来看，本书各部分的论述也不尽相同。

但是，我相信，尽管本书受到这些限制，但仍能引起读

者的重视。从本书中可以看到，通过现行政策措施，特别是通过执行新的五年计划和经济制度的宪法改革，也就是通过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将会解决经济政策的迫切问题。

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合作者米·帕弗洛维奇博士、萨·纳德尔良斯基、留·亚雷迪奇和杜·丁基奇在我撰写这本书时给予我的合作与帮助，没有他们的合作与帮助，我是不能及时完成这本著作并交付刊印的。

**贝·舍费尔博士**

一九七六年八月于贝尔格莱德

# 目 录

## 前 言

第一章 南斯拉夫经济在自治时期的发展 .....	( 1 )
第一节 向自治制度过渡时期的物质和社会状况的 特点 .....	( 1 )
第二节 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方针 .....	( 22 )
第三节 发展的进程和结构的改革 .....	( 27 )
第四节 自治时期的主要社会变革 .....	( 42 )
第五节 生活水平和居民生活费用的分配情况 .....	( 57 )
第六节 科学和教育 .....	( 71 )
第七节 参加国际分工 .....	( 73 )
第八节 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 发展 .....	( 79 )
第九节 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发展 .....	( 84 )
第十节 七十年代中期某些矛盾的发展 .....	( 94 )
第二章 当前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迫切问题 .....	( 110 )
第一节 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征 .....	( 111 )
第二节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对南斯拉夫 经济的影响 .....	( 161 )
第三节 不稳定和通货膨胀 .....	( 188 )
第四节 经济的发达程度与社会需要 .....	( 229 )
第五节 现行经济政策同长期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 自治制度发展的联系 .....	( 241 )



<b>第三章</b>	<b>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制定整个经济制度</b> .....	( 246 )
第一节	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条件、思想政治基础和实质 .....	( 246 )
第二节	关于联合劳动法草案基本决议的意义和性质 .....	( 257 )
第三节	社会计划制度的基础 .....	( 263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下的价格 .....	( 273 )
第五节	根据宪法规定改革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的某些问题 .....	( 283 )
第六节	宪法修改中关于外贸和外汇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	( 291 )
<b>第四章</b>	<b>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b> .....	( 301 )
第一节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南斯拉夫社会计划的意义 .....	( 302 )
第二节	过去五年的发展以及当前这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	( 311 )
第三节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五年计划的目标、任务和发展的可能性 .....	( 320 )
第四节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 .....	( 340 )
<b>附录</b>	<b>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和趋势</b> .....	( 356 )

# 第一章 南斯拉夫经济在 自治时期的发展

## 第一节 向自治制度过渡时期的物质和 社会状况的特点

南斯拉夫自从走上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以来，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由于建立了这一制度，人民不仅支配着物质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成为这一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和创造者。这是一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就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这个社会的建立，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困难而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二十五年前，当通过建立自治制度这一历史性决定时，南斯拉夫经济是极不发达和极端落后的。正因为如此，由于实行自治制度而开始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必然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并不断地克服和解决因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的不够充分而产生的无数矛盾。

二十五年来，自治制度的成效如何受到了检验：即是否能在新的基础上，迅速地实现经济发展，不断地发动和指导着进步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解决经济和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现在，经过二十五年以后，可以说，自治制度已经成功地经受住了这一检验。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是

物质和社会发生迅速而重大的变革时期，是重大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是劳动人民通过各种自治形式的联合劳动日益努力的结果，并且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劳动人民利益的支配。

### 一、战前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南斯拉夫并没有很长的历史。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个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发展状况的差别也很大。甚至在联合成为统一的国家之后，各个地区的发展，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还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些发展不同的地区，在很大的程度上同各个民族区域是相一致的<sup>①</sup>。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这个新国家的发展，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是极其缓慢的。在这二十三年的时间里，首先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国家并没有发生足以摆脱极端落后状态的变化。有很多指标可以说明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多么缓慢，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她是一个多么不发达的和落后的国家。我们只引用其中的一部分指标。

在两次大战期间，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sup>②</sup>。临战前的国民毛收入平均每人是一百五十美元<sup>③</sup>，积累率

① 不发达的地区有：马其顿、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自治省（这里居住着阿尔巴尼亚族）；发达的地区有：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及隶属于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

② 根据伊·文斯基博士著《1909—1954年南斯拉夫地区国民收入和固定基金》，萨格勒布：经济研究所1963年版。

③ 按1967年美元价值计算。

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之间，这种情况说明，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还未能达到迅速发展的阶段。全国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地区差别是很大的，这种差别在两次战争期间甚至还在扩大。国家的工业化还只是开始。同时，由于外国资本影响很大，工业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收效甚微，主要是资源开发以及用于出口的原材料初步加工业有了一些发展<sup>①</sup>。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会变革是极其缓慢的。人口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一一点五，各个地区的差别很大。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率增长得很缓慢，这样慢的增长是不可能吸收不断增长的自立人口的。因此，农村人口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着统治地位。临战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sup>②</sup>。十岁以上的居民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在国内不发达地区，这一比重还要高。每千名出生的婴儿中，死亡数高达一百八十名。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和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居民之间的购买力悬殊很大，其中人口最多的两个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购买力，就整个来说，差不多是最低的。在居民个人消费品的购买力方面，其分配的不合理程度，用格利耶夫的系数来衡量是0.37。满足需要的程度和可能性都是很低的。例如，民用电力消费量每人每年只有五点

---

① 外国资本占工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五，占工业设备能力的百分之五十五点六。见《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48年版。

② 贝·舍费尔著《自治时期南斯拉夫经济》，贝尔格莱德，《经济评论》社1970年版。第285—318页。

一度，食糖——五点二公斤，食用油——二点五公斤，等等。城市住房问题十分紧张。工人们大多数居住在非常窄小而又不卫生的房子里，可是房租却十分昂贵，工人遭受了巨大的剥削，大量的利润和财富被搜刮而去。

社会经济关系是落后的：存在着具有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特征的私有制关系和剥削形式，以及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大地主对工人以及农村的贫民、小农和中农的剥削程度是很高的。外国资本对经济有着决定性影响，并从国内攫取大量利润。外国资本所占的比重：黑色和有色金属业为百分之九十，金属加工业为百分之五十六，化学工业为百分之七十三点六，等等，在整个工业中约占百分之五十。大量的利润因此而流往国外。

这样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不可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希望的，甚至连满足基本需要的希望也没有，这就为进行革命变革创造了一切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前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祖国占领者的斗争因此而转变为政治和社会革命。在战争时期，政权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战争一结束，这一过程也就完成了。一个新的全面而蓬勃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这一制度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并增加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同时，必须指出，由于巨大的战争破坏和损失，战后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是很差的，甚至比战前的经济基础还要差。从国民收入、居民的经济结构、积累的能力、文盲、婴儿死亡、平均寿命等等水平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在所有经济和社会指标方面都算是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完全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相似。

经过三十年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后，今天的南斯拉夫已经是一个发展水平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和社会结构有了革命变革的国家。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和社会进步十分迅速和非常全面。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它只比两次大战之间的时间略长一些，但是国家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已经摆脱了落后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她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按低水平要求）。

南斯拉夫所以能够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是由于：

——社会和政治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这就有可能为蓬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些最基本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前提

——发展了自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符合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民参加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工作中来；

——实行了工业化，这是加速和全面发展经济的基本有效方法，工业化对整个经济和社会过程都发挥了它的影响。

## **二、社会变革是工业化和加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还在战争期间就已经进行了，由于进行这种变革，战争一结束就有可能建立新的政权和新型的国家，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开始。作为政权变革的结果，在战后的最初年代里，对工矿业、建筑业、贸易、服务行业、银行、保险、教育和保健等所有社会领域实行国有化。实际上，除去农业（实行土地改革）和手工业外，国有化包括了所有经济领域和社会领

域。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以及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各种成分都被组织成国有成分的经济企业、工业、社会服务部门（教育、保健等等），这些国有成分在很短的时期内曾担当着发展的任务。实际上，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中形成的国有成分为迅速而全面地发展经济创造了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前提，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石。

这里略举经济和非经济领域里国有成分形成的过渡时期中我们所采取的某些措施。这就是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期间在二年到二年半的时间内（即在改变政权和革命胜利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发展规划的先声<sup>①</sup>。

由于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对收入进行阶级再分配便有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作出重大的改变，这是迅速发展经济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的先决条件。

国民总收入在居民和国家之间以及在各个阶级和居民各阶层之间进行了重大的再分配。

从下表可见，国民总收入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三进行了再分配。

<sup>①</sup> 国有经济企业、非经济机构迅速成为发展的承担者，就有可能在战后两年多的时间内通过一九四七——一九五一年第一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全面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的主要内容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规划。

表1

国民收入再分配

	1937年	1948年	增(+ )减(-) 百分比 (%)
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成分	46.18	11.72	- 34.88
其中：城市	29.64	1.55	- 28.05
农村	16.54	9.67	- 6.83
国家	15.90	38.33	+ 22.43
工人和职员	14.20	25.07	+ 10.87
小农和中农	19.12	23.55	+ 4.43
城市中产阶级	4.68	1.83	- 2.85
总计	100.00	100.00	± 37.73

其中：减少的部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34.88
城市中产阶级	2.85
合  计	37.73
增加部分：社会主义国家	22.43
工人和职员	10.87
小农和中农	4.43
合  计	37.73

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所取得的效果有：

1) 通过国家，提高了国家的积累能力，在国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积累率提高了两倍（约从百分之七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2) 提高了的国家购买力仍然被用来扩大教育、保健和居民的其它共同消费，这样，在最初的几年里，新政权很快



就使工人和劳动者阶层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

3) 随着国家对教育、保健等其它共同消费投资的增加，工人、职员、小农和中农的购买力和个人消费水平也有了提高，因此，绝大部分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从而使革命时期的一项重大社会要求得到了满足。

在对收入进行普遍再分配的基础上，在社会领域内，在工人、农民及劳动者阶层购买力的加强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变化大大改变了居民购买基金的阶级分配。

表2 居民购买基金按阶级分配的变化

	1939年	1952年	增(+ )减(-) 百分比 (%)
1. 城市			
工人和职员	28.3	60.0	+31.70
手工业者和中层市民	12.7	5.9	-6.8
资本主义成分	22.7	1.2	-21.5
总计	63.7	67.1	+3.4
2. 农村			
小农和中农	17.7	29.0	+11.3
资本主义成分	18.6	3.9	-14.7
总计	36.3	32.9	-3.4

这就是说，购买力所发生的巨大的再分配的变化有利于城市居民（即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变化特别明显的大：

减少部分	占居民总购买力的%
城市资本主义成分	21.5
农村资本主义成分	14.7
城市手工业者和中层市民	6.8
合 计	43.00
增加部分	
工人和职员	31.7
小农和中农	11.3
合 计	43.00

由此可见，经过居民总购买力的再分配，工人、职员、小农和中农从资本主义成分和资本家那里又得到购买力的百分之四十三。

由于对购买力进行了再分配（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实现了国有化、土改和整个收入的再分配），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满足工人以及劳动者阶层的需要方面，也发生了第二次重大的阶级变革。

国家用于教育和保健事业的资金有了很大的增加，残废军人、战时失去父母的孤儿以及许多其它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在战后也都得到了解决。

住房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住房的再分配是用行政的手段进行的，工人和工人的家庭得到了好处。诚然，尽管新建了许多住房，并分配给许多家庭，但是后来，住房仍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说，尽管用革命措施对住房进行再分配，尽管大量缺房现象有所缓和，但同时还存着工人家庭住房的严重困难现象。

有利于工人、职员、小农和中农的购买力再分配的变

化，有利于工人和工人家庭的住房再分配，为工人群众扩大了普及教育、保健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服务工作——这些都意味着工人和劳动者阶层的一些基本社会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些要求都是很重要的，它保证了工人和劳动人民在新的国家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因而大大提高了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关心，而且，这些措施还产生重大的经济效果。由于工人和劳动群众的购买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市场扩大了，这对迅速而全面地发展经济，特别是对工业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实行国有化和在农业中进行土地改革以后，首先在经济领域，然后是在非经济领域中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构，这对后来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工矿业中形成了十分强大而集中的国有成分。在这个第一阶段中，整个管理过程是由国家来组织的（通过各级政府），即由国家制定计划、规定价格、确定原材料消耗定额和劳动力人数以及对商品进行计划分配。积累是通过国家的渠道集中进行的。基本的原则是使整个社会获得赢利，而不在于使每一个企业或每一个产品都能得到赢利，因此，是通过国家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来影响生产结构的变化。计划工作由国家来集中和综合，它包括全部再生产部门和领域。预算制度和财政制度也都是集中的，预算是计划的一部分，不仅仅国家和非经济领域的费用通过预算拨放，而且，对经济部门的拨款，特别是投资款项也是通过预算取得的。

经过这样改组以后，经济，特别是工业能够很迅速地实现我国工业化这一极其复杂的任务。

前面已经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有可能使国民收入的分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收入进行按阶级的再分

配，使工人阶级和居民的劳动者阶层的基本社会要求得到了满足，同时使经济中的投资（积累）资金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加速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加速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前提之一。由于进行了再分配，国民收入中积累率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这是实现整个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过程的经济基础。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使少数高收入者享有的个人消费缩小了，制止了通过外国资本把利润流往国外，因此为经济发展，特别是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

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因此有可能通过税收政策、经济企业收入的取得和分配制度以及其它一些措施，使积累集中起来，这是使那些在工业化开始阶段具有极重要作用的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的投资合理化。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全部投资资金都集中在预算里（联邦、共和国和地方的各级预算）。预算中投资资金的应用要受计划的严格控制，也就是说，投资只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并且只能根据计划从预算中调拨投资资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方针主要是：

- （1）扩大能源基础；
- （2）扩大供国内消费和发展本国工业用的原料生产；
- （3）建立机器制造业和生产资料工业；
- （4）对消费品工业的设备进行改建并使其配套。

进出口政策是同这个投资政策相一致的。但出口政策没有能很快地相适应，因为国内的物质基础和结构还没有发生变革。这就是说，出口仍然具有出口原料、半制成品和农产品的特点。但是进口的结构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有利于对经济发展进行投资，而对个人

消费品，特别是对奢侈品起到限制作用，所以能够进口大量机器和生产资料，并同时限制消费品的进口。这就大大加强了迅速发展经济的物质基础。在这一发展时期中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还由于执行了这样的计划：（1）投资资金的集中和有计划地合理使用；（2）经济政策，特别是进口政策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就是说，这种政策为迅速发展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生产资料。

在发展的初期，这种方针不仅使战时遭到严重破坏和陷入绝境的我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而且还使生产设备能力能够较快地扩大，尤其是使生产设备能够更好地合理利用。一九四七年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七，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教育和人民的素质方面的落后状况，在迅速发展经济和加速工业化的最初几年，是很困难的。前面已经谈到，文盲率非常高，只有四年制的义务小学教育，而且这些小学还不能把全部儿童都吸收入学。

中等学校的情况从办学方针就可以看出来，它只是培养国家机关职员和到大学进一步深造的为数极少的青年。培养各种有技术专长的熟练工人和高度熟练工人的工作完全被忽视了。总之，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培养少数上流社会的青年，而出身于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儿童和青年则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如果我们看一看战前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落后状况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很高的文盲率，工业化和迅速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熟练干部数量很少。但是，教育水平低劣还有其它不利的经济效果，这里我们只略举两点：由于教育水平低，大多数居民的学习要求受到限制，

甚至在工业化初期，居民的学习要求也不能实现（包括广大的农民）；工业和其它生产经营领域中，非熟练工人占多数。

在工业化初期就立即制定教育方案，它的基本思想是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这是整个发展和工业化本身的重要前提。前几年是开展广泛的扫盲运动，开始取得了很大效果<sup>①</sup>。实行八年制基础义务教育。对中等教育进行了基本改革，其重点是培养熟练工人、技术员、经济工作者、专业医务人员等等。旧式中学的作用也大大受到限制。重要的是扩大了大学教育，其重点是培养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学家、医师等迅速发展所必需的专门人才。在中等教育和大学之间还实行一种高等专科学校制度，这里培养各种专业学生，这种学校为青年们提供了高等教育，这种教育介于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之间。新的教育制度通过实践废除了贵族教育制，成为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能参加的活动场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还在工业化的前几年就采取了措施，后来颇见成效，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是长期投资的结果。实际上，在工业化处于第三阶段末期的今天，正是由于过去所采取的措施和教育制度方面的改革，使八年制学校青年在校人数占全部青年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中等学校在校人数占百分之三十八，高等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在校人数占百分之十。还在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一九五七——一九六七年），整个来说，干部就不再是限制发展的因素，而在今天，这个因素根本就不存在了。通过工业化，工人阶级人数虽然有了增加，但是教育却能保证

---

① 后来，许多人丢掉了这些成果。相当多的人在各种训练班、学习班以及在夜校中进行了学习，那些没有参加劳动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人，又重新变为文盲。

他们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不断地提高，这对生产技能的发挥也有影响，特别是对工人在自治制度范围内参加管理工厂和社会活动的才能有影响。

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的条件下，妇女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在劳动过程、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生活方面，妇女都是受歧视的。但是解放战争和革命（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了这些斗争）改变了妇女的地位。战争刚结束，妇女在政治生活中就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受到特别的重视。她们的政治活动和所受的教育也大大限制了宗教对妇女的影响。

还在工业化初期，就考虑到妇女是自立人口的重要部分，如果把她们吸收到生产劳动中来，这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对工业化是很重要的。因此，目前的工业全部就业职工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正因为妇女地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从而使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

就业和劳动条例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是不相同的。

工业化初期的特点是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劳动力的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工业和其它非经济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却大量不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没有动员起来，其次是由于保持传统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水平的低下，使消费水平不高。为了把劳动力动员到工业和其它非农业部门中去，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使工业和非农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水平比农业部门高，虽然如此，但是为了提高积累，工业部门的工资也还是比较低的。对工业和社会经济部门的全部职工实行完全的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险（养老金和婴儿哺养费

等等)。就业和工资得到充分的保证。在工业化的最初几年，按照带薪年度休假制度，参加工业和其它社会经济部门劳动的工人，享受到各个疗养地进行年度休假的特殊待遇。在工业化初期，全国实行合理的供应制度。对工人发放配给证和购货单，因此，他们可以比其他公民获得较多的食物和商品。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刺激劳动力流入工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充分满足工业所必需的劳动力。因此，国家对劳动力实行计划管理，通过计划，动员工业所必需的劳动力。所有这些措施使就业人数还在工业化的最初几年就有了大量增加。工业和其它部门的就业率高于农业生产部门，这是工业化初期更好地利用设备能力，增加生产、收入和积累的基本方法。

同劳动条例有关的最重要的因素有：

——高度保证工人职业的可靠性。除非发生破坏劳动纪律，破坏劳动组织等等情况外，不得开除工人；

——保证实行同等的劳动贡献取得同等收入的原则。消除女劳力和男劳力之间奖励的任何歧视；

——社会保险（养老金、多子女补助费、健康保护、失业补助金）包括所有职工在内；

——保证工人每年带薪休假；

——每周工作时间由四十八小时缩短到四十二小时，多数劳动组织过渡到每周工作五天。

还在一九五〇年，即工业化刚刚开始时，经济企业就实行了工人自治。实行工人自治制度的基础，是工人自己必须管理社会性质的企业，而不是由国家管理，也不是由代表国家的有关专门机构来管理。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



(不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工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治权利,工人自治的思想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是一条保证工人同生产资料 and 他们的劳动成果互不分离的道路。由于工人管理生产资料 and 整个经济过程,他们就有决定分配和利 用收入的很大权利,所以,他们就能够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当然,在自治开始时期,出现了很多形式和形式主义,而不是实事求是。国家对经济企业工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自治的真正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在工业化早期,自治制度却为工人参加决定生产和一般的经营管理打开了大门。它逐步发展为真正的工人运动,这一运动使工人的自治权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并且通过实践,越来越证明工人是能够领导生产和经济过程的。还在工业化的开始几年,自治就大大地鼓舞了工人管理经济的首创精神,从而使自治越来越成为工业化本身和迅速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工人自治越来越发展成为统一完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地区间的发展问题还在工业化初期就已经提出来了。这首先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别,而这些差别只有通过计划和社会努力才能逐步克服。如果不对工业和其它经济部门新的设备能力进行适当的调配,地区间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达到平衡。因此,曾采取了一些直接的经济措施和社会措施,以便对新的设施,特别是对工业设施进行地区性的合理布局,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平衡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这也是避免把生产力以及人口片面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重要措施。

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国家直接管理经济是社会经 济

关系的主要特征，投资的分配工作是直接通过全国计划进行的。后来，由于对经济实行分散管理，大量的决定权就由中央政府下放到企业、银行以及区、自治省和共和国，这样，指导工作主要就由经济杠杆来进行。目前，联邦政府是通过特别基金来帮助和推进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发展的。其方针是：

1. 发展新的设备能力，特别是发展新的工业设备能力，扩大现有设备能力并使其现代化；

2. 帮助发展社会公用事业，即直接帮助发展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教育、保健等社会事业。

各共和国内部，通过其政府以类似的办法推动共和国内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由于新的工业设备能力这样布局，各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就缩小了，因而也缩小了受这些经济因素所制约的社会差别。

因此，战后初期所发生的大规模的和重要的变革，是经济迅速发展过程的实现和使国家摆脱经济和社会落后面貌的前提，它是以这一发展的基本道路即工业化为基础的。正是由于战后初期进行了社会改革，所以在工人自治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就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有这些社会改革是在不到五年的极短的时期内，是在对南斯拉夫特别困难和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对社会改革的毫不动摇与坚定的决心，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作出摒弃国家模式的决定，并坚决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自治形式。

在工业化开始时期，全国城市化的程度是很低的。由于工业化和迅速的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加快了。鉴于新兴

的工业等设备能力的发展是按地区分散进行的，这就使人口没有过分地集中在大城市中。在南斯拉夫，只有两座城市的人口显得增长快一些。这就是全国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及经过地震破坏后的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也可以说，人口迅速增长的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目前，全国约有三百五十个城市型的居民点，其中有些是由于开辟了新建工业区而形成的综合性的新的居民点。

由于分散进行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城市化，部分地避免了工业化对人类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是，自然环境仍然遭到破坏，因为在极端不发达的条件下，自然环境问题还没有作为社会问题提出来，当时首先提出来的是工业发展问题。现在这些都成为问题了（尽管同最发达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污染程度还不可比），就是说，在今天发展的成熟阶段，保护人类环境是一种职责，并在现行的宪法中已经作为条文固定下来。

### 三、五十年代的经济和社会情况

当一九五〇年作出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的决议时，全国的经济情况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这个决议是在战争结束刚五年后作出的。那时的经济情况还呈现出战前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以及遭受战争破坏和蹂躏的一副景象。虽然恢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战争破坏的许多痕迹还未消除<sup>①</sup>。在所

<sup>①</sup> 遭受战争的破坏是非常大的。例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业设施、二分之一以上的铁路遭到破坏，估计战时南斯拉夫全部损失为九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三八年汇率计算）或占同盟国总损失的百分之十七，其它许多国家都没有遭受到象南斯拉夫这样大的破坏，甚至有的国家在战时还扩大了自己的设备能力（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

有这些困难之外，还要加上情报局国家对南斯拉夫经济封锁所造成的恶果。

因此，必须简要地阐述一下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的经济情况，这对于评价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很重要的。这个时期的特点可以说是：落后、贫穷、战争所造成的痛苦以及由情报局引起的我国特殊国际环境所造成的恶果即新的经济困难。因此，当五十年代开始建立自治制度时，我们有长期形成的问题（经济落后）和当时特殊环境所造成的问题（我国遭受经济封锁）。自治制度在一开始时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改变经济管理方针，使经济发展政策适应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局面，为克服当时已经很明显的停滞倾向打开出路，同时在漫长的道路上，为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和使国家摆脱落后状态而寻找出路。

前面已经谈到，国家的恢复是完成得比较快的。一九四七年的工业生产水平就已经超过战前（约超过百分之二十）。就业人数也大大超过战前水平，通过收入的再分配，经济的积累能力比战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国有化企业的条件下，对经济进行了组织等等。在短时期内，作了许多工作，使经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得到了发展，为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并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个计划就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是极其令人向往的<sup>①</sup>。头三年（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所实现的速度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就在当时特别是一九四九年，由于情报局国

---

① 计划规定的任务是，消灭经济和技术的落后面貌，巩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实力，加强并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普遍提高劳动人民的财富。见《南斯拉夫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贝尔格莱德，1947年版。

家撕毁国际经济协定，已经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一九五〇年正是国际关系造成的困难、农业的严重困境和总收入下降等各种困难集中的一年。事实上，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出现明显的经济停滞，而在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开始建立自治制度的时期，经济基础是很差的。没有充分可靠而互相联系的资料可以说明当时的南斯拉夫经济情况。当时，全国总收入按人口平均为一九〇——二〇〇美元之间（按一九六七年外汇率计算）<sup>①</sup>，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收入约低百分之四十五，比当时情报局国家约低百分之三十五。当然，单纯从收入并不能看出南斯拉夫当时发展水平的全貌及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但是仍然可以对这个问题得出十分近似和非常概括的认识。各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别极大，但是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收入水平，事实上是在一百美元左右，这就是说，相当于亚洲和非洲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sup>②</sup>。

农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农业生产每年都有很大的波动，遇到正常的年景，产量就可以超过战前水

① 作者根据一九六七年美元价值折算的美元收入和一九五〇年到现在的增长资料计算的。用美元表示是为了便于同其它国家作比较。但这样计算只能得出近似的数字，因为用收入进行国际对比是非常困难的。

② 根据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美元收入以及各共和国和边区（按第纳尔计算）不同收入的资料，可以大致得出这一结论，如当时科索沃平均每人收入约为一〇〇美元，乌其顿和黑山则在一二〇——一五〇美元之间，而当时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人收入约为一一五美元。

平，可是遇到不好的年成时，产量就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小麦和玉米的产量一直是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工业生产（一九四九年以前生产发展是很快的）进入了三年停滞时期。因此，生活水平不仅是低下的，而且还逐年下降，生活条件也日益恶化。前面已经谈到的战后通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所取得的储备，由于用来大力改进工人和小农的生活水平，已经告罄。五十年代初期的收入未能进一步增长，必然要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

五十年代初期最沉重的打击是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封锁。在情报局决议之前，在南斯拉夫的国际商品交换总额中，有百分之五十一是依靠东欧国家。还在一九四九年，由于在经济交流方面制造障碍，这些国家商品交换所占比重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一左右，到了一九五〇年，这种交换就完全停止了，不仅如此，而且还废除了提供机器和设备的长期协定，并拒绝提供信贷。由于这个原因，必须对一九四七——一九五一年的五年计划进行重大的修改，因为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去同这些国家签订的协议为基础的。这就使出口暂时下降，并对进口造成极大困难，这种情况必然要影响到整个的经济发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人民国防的开支大量增加。据计算，一九四八——一九五二年期间，人民国防开支高达十一亿美元，比没有发生外交和军事形势变化以前的正常年代要高得多。对于如此不发达的经济来说，这是非常巨大的负担，在全国国民总收入中，国防开支有几年所占比重竟高达百分之二十。此外，农业还出现过相当干旱的年景。这些都是造成生产停滞或甚至下降的因素。还出现了巨额的亏损，这些亏损又不能通过国际援助和信贷而得到弥补。

这就是说，在开始贯彻自治制度的初期，全国的经济情况是很糟的。国际环境也很恶劣。对南斯拉夫来说，这些都是很坏的事情。南斯拉夫由于没有加入集团而遭受到两大集团的政治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还有经济和军事的压力。自从实行自治制度以来，已有二十五年了，但今天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情况。五十年代不发达的经济基础和特殊的情况，长期影响着南斯拉夫的经济的发展。事实上，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在一九五五年以后就被克服了。这一年也是我国迅速发展的开始。从此以后，南斯拉夫经济一直都是蓬勃发展的。总之，上述各种情况必然要影响到过去二十五年来年的发展，因此，在评价所走过的道路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

## 第二节 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方针

在南斯拉夫自治制度发展的二十五年中，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政策所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任务。虽然经济政策几经改革，但是，在整个过去的时期中，可以说，经济政策始终存在这样的问题，即既要为迅速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又不能经常靠限制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实现迅速发展。正是在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被克服以及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安排的基本建设任务以后，这个问题才暴露得十分清楚，这也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期间内，这样的问题在整个经济政策中是再清楚不过的。

经济政策中第二个经常碰到的问题，是为自治制度发挥职能创造条件。这就是为收入占有的社会化、为劳动组织尽

可能多地占有收入而进行斗争。

最后，经济政策中经常保持着一个重点是加速发展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政策。在整个二十五年内，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后十年内，制订的经济政策都明显地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以便保证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能迅速发展。

总之，迅速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以及加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主要体现者（自治劳动组织）的经济能力，是经济政策中经常存在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的轻重缓急则是各不相同的。这里所列举并阐述的经济政策的目标，表明它是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的。但这并不是说，在决定中期政策，特别是在决定短期政策时，没有摇摆过。事实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与整个经济政策相适应的。

一九五五年铁托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已经决定了经济发展政策方针的特点<sup>①</sup>。当时经济封锁造成的恶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已经完成，并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许多矛盾开始暴露的一个时期。首先，生活水平严重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第二，顺利发展的工业同落后的农业之间比例失调现象开始很明显地暴露出来；第三，当时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经济不可能在自给自足的基础

---

<sup>①</sup>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铁托同志主持下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具体规定编制新的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中期计划的政策。



上发展，最后，要求继续进行基本建设和投资的愿望同我国的实际能力不相协调。

因此，这次会议决定，经济政策必须遵循以下几点：

——在发展中，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同全国生产力的提高和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协调一致；

——投资水平要同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一致。投资结构必须保证克服日益增长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必须特别注意使投资保证迅速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是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条件；

——保证市场日益稳定；

——调动一切因素以推动农业的发展，因为农业已经开始取得初步的积极成果；

——继续帮助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是我国政策不可改变的原则。

就这样，通过这次会议，第一次表达了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事实上，这些目的意味着经济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意味着同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相协调，同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同建立自治的经济组织开始相联系起来。这次会议的意义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这就是说，在实行自治仅五年以后，在经过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而造成客观上是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时期以后，就确定了经济政策所要实现的新目标，这些目标是用新的方法，是站在新的立场上确定的，这种新的立场为发展政策和经济制度的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不管用什么方式，在所有后来的经济政策文件中，仍然阐明了这些目标并使之具体化了。

所有这些变革都最直接地反映在一九五七——一九六一

年间的五年计划中。事实上，这是在自治制度范围内所通过的第一个计划。因此，就所规定的目标及其实现的形式来看，这是一种新的计划。计划确定了目标的重点和优先发展的项目，这是根据上面提到的铁托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决议拟定的。至于这些目的的实现，则主要依靠间接的指导办法。就是说，建立新的计划制度的过程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规律还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新的计划制度是必要的。

五年计划中最主要的部分四年内即已实现。从发展的进程以及把经济结构改变为更加重视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这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比较顺利的时期，但是这又是发生新的结构失调和外贸交换中赤字增加等现象的时期。显然，在管理不仔细、生产率低、没有足够的参加国际分工等等基础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六十年代末期，与自治的经济基础有关的许多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根据自治制度在劳动组织收入的取得和分配问题上，通过了一系列基本决议，制度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不合理的经济因素（价格和价格关系、外汇制度和外贸制度、收入再分配的形式等等）开始拖住了自治制度的发展，对经济发展也同样起到不良作用（首先，不稳定是这个时期极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年计划完成后，马上就致力于系统地解决建立自治制度的目的，解决组织市场、广泛参加国际分工、强化经营管理以及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的方针。一九六一年在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针对着这些问题的。

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期间，又出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很不稳定的。这时正开始准备主要在七十年代实现的新的中期计划，但是，事实证明，不通过系统的基本决议，计划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一九六四年通过了一些最重要的决议，并且在一九六五年通过了下一个中期计划发展政策的方针。

一九六五年开始进行经济改革，随后一九六六年又通过了新的中期计划。这个计划重新强调指出提高生活水平、开发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以及稳定是主要的目的。但是计划还强调了两个新的综合性目标（这是这次计划第一次规定的）：为发展自治制度和加强自治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为大力提高经营效果，推行现代化的生产组织和采取新的工艺创造条件。

最后，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南斯拉夫社会计划是在宪法改革以后通过的。新宪法草案第二十二条到第四十二条特别规定了进一步发展自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整个发展的基本目的和条件。根据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和迄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倾向，考虑到我国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目标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因此，这一计划特别强调了已经强调过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建设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建立社会再生产过程并保持充分的稳定性，实现蓬勃的经济发展，并做到有效的经营管理。计划中还强调了具有长期性的目标：不断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特别是科索沃自治省，以及进一步提高就业率，改变居民的经济结构。

一九七四年初通过了新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宪法，在自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是以新的宪法为依据的。在新宪法中，参加联合劳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有中心地位，经济制度必须以新宪法为基础，并在新的宪法原则上得到完善，工人在自觉掌握整个劳动过程和各个劳动阶段中也占有中心的地位。因此，各种形式的联合劳动必须是制定和实现发展政策的基本因素。就这个意义来讲，新的社会计划制度正是在联合劳动组织的计划编制、在联合劳动组织中重视签订协议和协调计划这些方面获得了自己的立足点。根据一九七四年的宪法，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工作已经全面铺开，而且大部分的系统改革也必须在一九七六年进行，这肯定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形成以来新的更高的阶段。战后以来，通过我们的实践，在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多年工作以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第一次通过了到一九八五年的南斯拉夫长期发展的共同政策原则，同样，也是第一次通过新的中期计划——南斯拉夫发展的社会计划。

### 第三节 发展的进程和结构的改革

从对二十五年来发展的各种分析中，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和变化是异常迅速的。我还想提醒一下，这些变化是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即自治的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的物质基础非常差，还有上面提到的使初期的发展面临困难的特殊的外部环境。尽管存在着这些情况，但是，断言发展是蓬勃的这一结论仍然是可靠的，事实是，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一九五〇——一九七四年），

全国的社会生产实际上提高了百分之三百九十六，也就是说，在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内，社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九。这本身就说明南斯拉夫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但是，发展的进程不是很均衡的，还存在着明显的波动。

表3 社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年 份	增长百分比 (%)
1950—1956年	4.2
1957—1965年	9.0
1966—1974年	6.5
1950—1974年	6.9
1957—1974年	7.8

资料来源：《南斯拉夫社会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变化》，联邦统计局，《1954—1964年的南斯拉夫》，1965年贝尔格莱德出版的联邦统计公报，1975年联邦统计局统计年鉴。表中数字以一九五〇年为基期（以一九五〇年或以一九五二年为基期，差别很大，因为一九五二年的收入低于一九五〇年，所以，如以一九五〇年为基期，增长率就要低）。

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一九五六年以前的时期，这是停滞和逐步摆脱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时期；第二，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进行改革的时期；第三，从改革到现在。显然，第一个时期的发展最慢，第二个时期发展很快，最后一个时期，即目前，发展是比较慢的。另外，自治的最初几年，收入的亏损对整个二十四年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三年的停滞时期对这点影响很

大。如果那几年的发展速度是正常的（大约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因为那时具备了一切内部条件），那么，起初的基础就要好得多，积累率就会更高了，而整个时期的发展速度也就会更快些。如果在正常环境中，开始一个阶段时期的增长率是每年约为百分之八，那么，整个二十四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就会高出百分之零点七左右，也就是说，年平均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六点九，而是百分之七点七<sup>①</sup>。差别是显著的，这种差别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我国的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如果我们希望高度评价二十四年来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如果我们希望从国际观点来评价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情况无疑是重要的。

二十四年来，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社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三点三，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八<sup>②</sup>。

在上述时期内，发展有很大的波动。社会生产在有的年份增长很快（例如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四年），有的年份则有停滞的倾向（如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七年）。正因为如此，在这样迅速的发展中，指望增长的波动幅度不会太大就很困难了。但是，在我国，对于发展中的波动情况是很重视的，而且愈来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它在经济发展中很明显。在经济发展中，多年来农业一直是造成波动的重要因素。虽然，农业目前仍然是波动的因素，但是，它对发展进程的波动所产生的影响已从根本上减少了。当经营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制度有了改变的时候，巨大的波动就出现了。波动期主要是，

① 由于一九五二年收入约低百分之五，所以这个时期（1952年 = 100）的增长率也有差别。

② 以一九五二年为基期。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这两个时期。但还必须提一提外部条件的影响。以一九七五年为例，当时，主要由于西欧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其它困难，使国内生产的增长极为缓慢，因为南斯拉夫经济通过商品交换同这些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个时期内对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小改”和“大改”），其结果都有助于发展自治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这些改革本身始终既是在现实的可能范围内修改经济政策的因素，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已经采取的种种措施没有从整体上充分协调一致，在时间上也未配合好，所以，由于发展停滞不前，出现了不必要的损失。但是，考虑到发展速度往往超出了实际的经济能力，这就很难把周期性的发展缓慢全部解释为实际损失。无论怎样，波动说明了发展的不平衡，而且也说明了发展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很难说当时的速度应该是怎样的，但是如果在发展比较平衡和较少波动的条件下，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二十五年来所实现的发展速度的真正价值在何处<sup>①</sup>？我们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是评价一种制度效果如何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次，是如何对比的问题。下面是按全世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划分的年平均发展速度。

由于前面已经谈到的原因，真正能够对发展进行评价

---

<sup>①</sup> 一九七五年全部经济中社会生产的增长率估计比一九五〇——一九七四年期间的增长率低，前者约为百分之四，后者约为百分之六点九。

表4 全世界社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

南斯拉夫	1950—1974年	6.9%
全世界	1957—1974年	7.8%
发展中国家	1950—1973年	5.2%
发达国家	1950—1973年	4.4%
欧洲	1953—1973年	4.9%
南欧	1953—1973年	6.7%
欧洲发达国家	1953—1973年	3.4—5.1%
社会主义国家	1950—1974年	7.2%

的，应从一九五六年以后的时期开始（因为这是摆脱了国际政治环境所造成的困难以后的时期，也就是与加强发展自治制度相一致的时期）。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无疑，发展的进程是非常快的，而且是很顺利的。尽管在日常的实践中，有许多理由令人不满意，因为有很多能迅速发展经济的机会都没有加以利用，但事实说明，整个自治制度对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样的发展速度始终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当前的发展趋势相比，南斯拉夫所达到的长期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不仅使我国的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了，而且为将来更大和更快地缩小差距开辟了前景。

发展速度快也是现代世界所具有的特点，这是科学和技术成就的结果，也是社会和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在二十五



年前(战后初期也大致如此),从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南斯拉夫的发展水平与目前的发展中国家颇为相似。实际上,当时南斯拉夫正处于在现代工业基础上开始发展的阶段。这种具有工业化性质的开始发展阶段,在英国是一七七〇至一八二〇年,德国是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年,美国是一八二〇至一八五〇年,日本是一八七六至一九〇〇年。这就是说,在目前这些最发达的国家中,这样的发展和工业化时期,在一百年以前或更早的时间就已开始。那时,这些国家在其发展时期中,每年的平均发展速度是:英国为百分之二,德国为百分之二点七,美国和日本各为百分之四。目前,发展中

表5 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毛收入  
(不变价格,按1967年美元计算)

	1953年		1967年		1973年		1953—1973年	
	绝对数 (美元)	南斯拉夫为其它地区的%	绝对数 (美元)	南斯拉夫为其它地区的%	绝对数 (美元)	南斯拉夫为其它地区的%	绝对数 (美元)	南斯拉夫为其它地区的%
南斯拉夫	210	—	635	—	864	—	654	—
全世界	385	54	675	110	720	120	335	195
发展中国家	115	182	157	405	194	445	79	628
东欧	325	65	847	78	1,202	72	877	75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240	17	1,960	32	2,525	34	1,285	51

注:南斯拉夫为其它地区的百分比是,在以其它地区为100的条件下,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国民毛收入与其它地区的比。

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比这些国家当时的增长率要高得多（但是，这里不应忘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目前发达国家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增长率要高得多），同样也很清楚，我国的发展速度同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基础的发达国家当时的发展速度高得不可相比。

上表所表明的变化（这是在种种受限制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变化）是令人高兴的。显然，南斯拉夫的相对情况起了变化，并有了基本的改善。一九五三年，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毛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目前，显然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同整个世界相比，我国的绝对数已经超过了世界水平。同发达的国家和东欧国家相比，我国的相对数也大大提高了。但是绝对数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就经济意义而言，这二十五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是真正的新的质的变化，国家完全变了样。这样快的发展速度，首先是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结果，也是与此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也就有可能导致其它方面的变化，如生活水平、人口的变动等等。

整个发展中所取得的这些好的成果无疑大大地改善了南斯拉夫在世界发展水平方面的地位，但是，不能因此得出错误结论，认为南斯拉夫已经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面貌。首先应该指出，那些同我国地理上和经济上有着最广泛联系的国家是衡量我国的发展水平的标准。这就是欧洲的国家。尽管南斯拉夫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和取得了极大的成果，但是南斯拉夫同这些国家在国民收入方面的差距仍然是很大的（例

如，同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1：3）。因此，尽管我国实际收入增长率比这些国家要高一倍多，但是我国收入的绝对增加量则小于这些国家，收入的绝对数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这种情况自然要影响到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和积累的能力，因而也影响到就业的可能。人口中有很大部分生活在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居民最初的社会变化（由于农村人口流往城市而使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出现高速度的城市化等等）还在进行之中，虽然实际上，南斯拉夫已经取得了种种成果，但是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指标仍然说明它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这就是还有大量工人临时在国外工作（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展不够充分而使本国就业能力受到限制和国外工资水平高）。所有这些都表明，把国家从落后状态摆脱出来的过程是多么漫长而艰巨的道路。

工业生产的增长及其结构的变化对于迅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十四年来，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七百七十二点七，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四。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是不均衡的。下面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表6 1950—1974年期间各个时期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年 份	平 均 增 长 百 分 比
1950—1956	8.6%
1957—1965	12.2%
1966—1974	7.3%
1950—1974	9.4%
1957—1974	9.7%

资料来源：统计公报。一九七五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约为百分之六。

工业结构有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是很很不均衡的。二十五年来所达到的增长率，实际上意味着每七年工业生产翻两番。这是近二十五年中世界工业生产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和一九六五年以后时期发展缓慢的原因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一个时期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的外部原因造成的。后一个时期，为了发展国内外市场，必须对工业生产结构进行改革，因此在发展中重视了对工业产品的选择，结果使发展变缓慢了。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令人满意地快，甚至结构也不平衡，在这一基础上，设备能力就很难利用，这样一来，发展速度就受到了限制。

总的平衡既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动力和燃料部门同加工工业部门的比例关系就更是如此。但是，必须指出，由于有些产品要淘汰，而同时进行新产品的生产，所以进行了大量的选择工作。例如，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资料就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两年淘汰的工业产品有一万五千种，而新生产的品种有一万八千种（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我国过去没有生产过的）。在生产中进行重大改革的工业品种有九千多种，小改革的工业品种约有三万三千五百种<sup>①</sup>。如此大的结构改革过程不能不影响到近年来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但是，尽管在工业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发展及工业所达到的增长率相比较，即使是近几年内，南斯拉夫的增长率还是令人满意的。我国和其它国家工业增长资料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见表7）。

表 7 1960—1974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1966年 = 100)

奥地利	207	匈牙利	239
比利时	200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35
保加利亚	424	波 兰	236
捷克斯洛伐克	22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16
芬 兰	246	苏 联	304
法 国	209	英 国	134
荷 兰	246	美 国	181
意大利	235	南斯拉夫	311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月报》，1975年8月号，第22—23页。  
各国工业生产中包括手工业；南斯拉夫的生产指数（包括手工业）为296。

这就是说，即使在对工业生产结构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南斯拉夫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还是超过了大多数国家。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工业生产重新加强了；但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增长率则相当低（百分之七）；而一九七四年的增长率却高达百分之十一；可是一九七五年只增长百分之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生产结构，首先是动力、原料和成品方面的生产结构不能令人满意。在西欧国家深刻衰退的情况下，由于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下降，这种情况就很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国家的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十，而我国则仍然取得了增长率为百分之六这一比较高的水平。

表8

南斯拉夫经济工业化程度  
(工业化系数)

国 别	1958年	1965年
西 欧	1.00	1.00
南斯拉夫	0.21	0.53
西班牙	0.31	0.41
希 腊	0.13	0.14
欧洲共同市场国家	1.17	1.15
意大利	0.53	0.70
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	1.54	1.35
奥地利	0.70	1.03

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伴随着工业内部的发展不平衡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增长，不成比例地快于原材料、再生产材料和能源的增长。

表9

工业生产构成的变化  
(1950年 = 100)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4年
全部工业	260	433	578	806
生产资料	349	549	732	975
再生产材料	253	409	541	747
消费品	248	439	590	841

同发达的国家相比，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低，生产费用高，国外市场由于我国出口遇到种种壁垒而受到限制，工业生产内部结构不协调，在这些条件下，必然要出现外贸逆差<sup>①</sup>。事实上，这是出现外贸逆差的最重要根源之一。设备分散，与国内外市场相比，设备分布不均匀，设备能力未能很好利用，等等，这是造成生产费用相对昂贵以及种种困难的原因，工业就是要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因此，工业还必须进一步进行结构改革（改革在进行之中），但是它影响到工业生产周期性地缓慢增长的趋势。

农业生产的生长差不多在战后整整十年内都是极其缓慢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六七，就是说略快于同期人口的增长），这就在粮食方面引起了很大问题，在工业原料供应方面也是如此。农业生产增长得如此缓慢，对于同外国的经济关系也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出口的能力受到限制，并且大量进口主要食品）。这种状况要求对农业政策进行修改。一九六七年，联邦议会通过了农业和林业的远景发展决议。这一决议是从根本上研究国内外农业发展经验的结果，也是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的结果。一九七三年通过了所谓绿

<sup>①</sup> 整个来说，我国工业进口的原料和半成品的数量是很大的。因此，当工业生产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时，进口的增长就要大大快于生产和出口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贸逆差问题就尖锐起来。同时，近几年来，由于生产资料生产和从半成品制造出来的消费品生产之间不成比例地迅速发展而造成的不协调越来越尖锐，加工工业对进口的依赖性日益表现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增长率大大低于六十年代（甚至只有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衰退的情况下，工业品出口困难，但是，近几年来工业对进口的依赖也是增加的。

色计划的决议，即共和国和自治省关于发展农业综合体的协议。

表10 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

国 别	年 份	增长率	国 别	年 份	增长率
南斯拉夫	1950—1956	1.1	奥地利	1952/53—1963/64	3.5
	1957—1965	5.4		1961—1973	1.2
	1966—1974	3.6	希腊	1952/53—1963/64	5.7
	1950—1974	3.6		1961—1973	3.1
	1956—1974	4.5	意大利	1952/53—1963/64	2.1
				1961—1973	1.6
			印度	1952/53—1963/64	2.9
			土耳其	1952/53—1963/64	2.7
			保加利亚	1950—1963	4.8
				1966—1973	1.4
			捷克斯洛伐克	1950—1964	1.5
				1966—1973	3.6
			匈牙利	1950—1963	2.4
				1966—1973	4.1
			苏联	1950—1964	4.0
				1966—1973	3.0
			美国	1940—1960	1.8
				1961—1973	1.2
			日本	1952/53—1963/64	2.1
				1961—1973	1.8

资料来源：南斯拉夫的资料，见联邦统计局编《统计年鉴》。其它国家的资料，见弗·斯提帕提查博士，《南斯拉夫经济》第二部分，萨格勒布情报出版社1968年版，第37页；联合国编《粮农年鉴》，1971年和1973年。



实质上，所有农业政策的改变，都是为了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主要的办法是：加强社会成分，通过合作形式来加强个体农业生产者同社会成分的联系。采用新的现代化技术，改善农业的经济地位。这种设想在后来执行的政策中已经实现，而且也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成果是不容抹杀的。生产发展速度是很高的，大大地超过了其它国家长期的农业增长率。

可以说，在发展农业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展<sup>①</sup>。这种进展是在农村存在着大量个体农业生产者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技术方面来看，这是对发展起到限制作用的因素。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农业中的这种发展就特别重要了。以社会成分为基础的农业，已经拥有最现代化的生产资料，掌握了最现代化的工艺，它不再是主要的限制性因素。当前，主要的限制性因素首先是市场狭窄（国内市场购买力不足，国外市场受到限制）。社会农场虽然只拥有百分之十五的耕地面积，但是它在整个农产品流通量中却占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采用现代工艺的结果，特别是社会农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很高的程度，某些农作物的产量达到极高的水平。

---

① 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南斯拉夫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所取得的成就。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五年，粮农组织指出，南斯拉夫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指出研究她已经取得的经验和采用的方法是有益的。美国农业部指出，南斯拉夫是属于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使农作物生产增长最快的六个国家之列。

工农业如此快地发展，是过去这段时期整个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工业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刺激了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首先，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约修建了三万三千公里的现代化公路。可以说，除极少数外，国家所拥有的全部现代化公路，都是在自治时期中兴建的。其它交通运输事业也现代化了，海运船队和河运船队都有了很大的扩展。建筑业已经从手工业和半工业性质的行业发展为大型工业部门。目前，建筑业不仅承担着动力、经济设施以及生活设施等方面的建筑任务，而且日益成为出口的工业部门。最后，从利用自然条件来看，我还想指出旅游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寻常的经济部门。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外汇收入，特别是它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全面的根本的变化。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都能不断地取得成就（这个成就确实是显著的），这本身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些公认的成就是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显然不是一般发展的真实情况，更不是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

上面谈到的发展速度和某些发展因素的波动，实际上都说明发展中经常出现紧张状态。这些事实同时也证实经济政策不总是能够从已经拥有的潜力中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就是说，理想的效果是可能比已经取得的效果还要好。发展的效率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是过去这段时期中经常谈论的议题，而且也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之一。

有许多材料说明发展的可能性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例

如，一九五六——一九七三年期间，社会经济成分的国民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八点六（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这是非常好的成就。可是在同一期间内，社会经济成分的固定基金价值只增长百分之二百一十点四（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七，就是说资本的利用系数不大），教育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六（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六），科学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九），自立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了百分之百（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等等）。总之，发展速度大大低于理想水平，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二十五年来，自治制度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并表明它是能够实现迅速的发展，能够发动并指导不断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从南斯拉夫和其它国家现代发展的对比材料中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对南斯拉夫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改革考察中所得出的主要教益和结论。

#### 第四节 自治时期的主要社会变革

蓬勃的经济发展为在我国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创造了可能。诚然，这些改革有时被中断了，但是，整个来说，二十五年内改革的趋势基本上是上升的（目前也是这样）。事实上，在五十年代中期摆脱经济困难以后，客观上就为全国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重新制定整个发展政策创造了条件，原有的政策重点几乎都是为了摆脱经济的落后面貌和消除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经济带来的后果。五十年代后半期，

重新拟订了社会发展目标，强调了这一原则，即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通过合理的分工，把越来越多的人吸收到生产劳动过程中来；通过自治，使劳动人民参加作出决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面提到的曾经宣布新条件下的经济政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去有、现在仍然有重大的历史意义<sup>①</sup>。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把自治条件下的发展目标具体化，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体化；第一次绘出了发展政策的基本蓝图。由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已经表现出生活水平有了相当明显的提高，非常重视把社会目标看作是经济政策和促使进步的标准。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五十年代上半期，由于经济上的困难，社会发展明显地受到限制，一直到六十年代，自治制度才有了发展。六十年代的特点是：社会目标在发展中居于相当高的优先地位，社会改革在急剧进行，物质和文化福利迅速提高。为了提高居民的福利，通过普遍的就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参加到挖掘经济潜力的行列中去了。还由于社会服务行业的发展，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入了其它劳动部门。这一过程在七十年代前半期还在继续进行。

社会生产的迅速提高意味着社会改革的经济基础有了扩大。这些改革之所以能实现，首先是由于扩大和加强社会经济成分而取得了经济进步。

人口从农业转入非农业劳动部门，这是南斯拉夫过去一段发展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在工业化和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

<sup>①</sup> 这里所指的是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由铁托同志主持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下，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农业人口大量减少了，而非农业人口则增加了。人口从农业流入其它非农业部门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致对其它方面人口结构的社会改革都有影响。

表11 人口按主要社会结构的变化 (千人)。

	1961年	1971年	增 减 数
人 口 总 计	18,549	20,504	+1,955
农 业 人 口	9,197	7,897	-1,800
非 农 业 人 口	9,352	18,107	+3,755

• 根据1961年和197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如果考虑到以一九六一年普查的构成作为人口变化速度的标准，则可以看到，十年内从农业及其它部门中流出的人口有二百七十多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三，或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这样的变动确实是比较快的，因为农业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快于非农业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如果假定农业人口自然增殖率比非农业人口的自然增殖率只快百分之五，那么，十年内农业人口的实际变化是三百万人以上，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或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

与一九四八年相比，也就是与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一年及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年份相比，已从农村流出的人口总数在六百三十万到七百万人之间，也就是说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到百分之三十五，占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六十七。据计算，由于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

年和一九七四年的普遍就业，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减少到约百分之三十三。二十五年来，农业人口相对比重减少了将近一半。今天的工业发达国家在其所经历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时，需要四十到八十年的时间，即为我国二至三倍长的时间。同时，完全依靠农业生活的实际居民数也大大地减少了<sup>①</sup>，就是说，农业人口中有大量的人从事其它不同的补充性的劳动，并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收入。

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尤其是工业在国家的经济恢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使人口变动的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表12 人口自然增长指标

	1948年	1953年	1961年	1971年
每千名居民的自然增殖数	14.6	16.0	13.7	8.5
每千名居民的出生数	28.1	28.4	22.7	18.2
每千名居民的死亡数	13.5	12.4	9.0	8.7
平均寿命(男)	—	56.9	62.3	64.8
平均寿命(女)	—	59.3	65.4	69.2

人口的自然增长减慢了，而平均寿命则延长了。这种趋势是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结果，也是社会致力于人口有计划增长的结果。

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大量增加就业成为可能。五十年

① 最近一次（一九七三年进行的）关于家庭预算的民意测验表明，南斯拉夫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九的家庭完全依靠农业活动收入生活。

代社会成分和私营成分的就业人数为一百九十四万四千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九。但是到了一九七五年，就业人口就达到四百七十万人，为五十年代的二点四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

在二十五年内，就业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九。但是由于前面已经谈到的社会生产方面的变化，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不均衡的。一九五六年以前的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二，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五年为百分之五点八，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改革期间却又下降到只有百分之零点七。近几年来，即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就业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又上升到百分之四以上。

工业的发展对于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内就业人数的增加，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我们所研究的二十五年内，全部增加的就业人数中，工业就占了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因此，工业是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正是使经济基础日益扩大的工业化能够促使其它部门的发展，使其它劳动部门也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因此，值得指出的是，就业政策首先建立在经济部门就业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首先在直接扩大社会经济基础的部门就业。在这个时期内，非经济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重没有什么变化，但教育、文化、体育和社会机关的就业人数则有了很大的增加（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甚至比工业部门增加得还要快），而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就业人数的增长则相当缓慢（这首先是自治制度的发展使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保持极小的规模的结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业人数就可以随着生产和经济积累能力的增长而增加。但是，由于经济部门本

身（特别是工业部门）吸收了就业人员，就业也就直接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和整个经济积累率的提高。

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特别具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工业中社会产值按就业人数计算比私人农业成分中的社会产值要高六倍多。这就是说，在工业化开始时，农业成分中有大量的自立人口被吸收了。这样大的人口变化，只有工业中有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劳动，才能够逐步地解决象就业这样巨大的社会问题（说得确切些就是失业，即公开的或隐蔽的失业问题）。同时，就业人口如此迅速地增长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

国家的工业化和迅速的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使妇女在其传统的农业劳动以外的就业人数大量增加，而且也是工业化本身的前提，因为妇女大量地参加了工业劳动过程。在社会成分的全部就业人数中，妇女约占三分之一。这是就业构成的平均数，如果从城市和城市型居民点的就业构成来看，妇女所占的比重还要大。由于全国实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及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建立，这就为妇女取得同男子的同等权利而创造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前提，在这种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非农业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妇女得到了伟大的解放，她们通过自治机构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参与政治和一般的社会生活。所以，妇女参加企业工人委员会的占百分之十七，而在直接管理的那些劳动组织中，她们甚至占到百分之二十八。在农业合作社中，妇女参加管理机构的很少。在合作社委员会的全部成员中，妇女只占百分之五。在联合劳动组织代表团的全部代表中，妇女约占百分之三十。妇女特别出色地参加了教育、卫生等部门的自治机构。例如，在基础学校的管理机构中，妇女占百分之三十



七点六，在卫生机关的管理机构中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在社会机关的管理机构中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在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中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等等。因此，非常明显，在工业和包括政治及社会生活在内的其它非农业部门中就业的妇女，比农业中就业的妇女要多得多。在工业中就业的妇女，事实上占就业妇女中的大多数（约占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可以说，工业由于创造新的劳动岗位而在妇女的经济和社会解放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妇女就业使她们能受到教育，并在受教育过程中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地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女孩和女青年受教育的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她们受教育的范围在各个阶段都要比男孩和男青年小。

但是，过去这段时期正是在居民的就业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建设时期刚开始（战争刚结束）就同时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现象（这是经济长期停滞和农民沉睡的结果）。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内，劳动力“过剩”现象愈来愈暴露出来了。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家来说，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农业中有大量待招居民。经过工业化过程，农业生产的工艺发生了变化，居民购买力的普遍提高，生产性就业的可能越来越大，这也是对要求增加就业的压力。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就业人数猛增，吸收的量很大。虽然新工人在不成比例地增多，但是，自立人口的增加，最终失业现象还是存在。

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这种压力特别明显。因为增长显著地缓慢下来，而且，由于经济方针改为强化经营管理，所以有几年就业人数减少。其后果是，在这个时期内以及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国有大量的人去国外临时工作。但是，在就业

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甚至百分之七的年份里，失业的现象依然存在。近几年的增长率在百分之四以上，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清楚地说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农业人口的数量仍然很高，这本身就给整个就业造成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如果考虑到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则这种压力是同开辟新的劳动岗位的潜力和可能相互矛盾的。

这种现象是处于工业化和人口发生深刻变化时期的所有国家都有的，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就是说，这不是南斯拉夫特有的问题。由于新的劳动岗位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有许多人去国外临时工作。尽管这种作法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还会引起许多经济问题，但它比把居民保持在生产率很低的劳动领域，还是要好一些（虽然用某些行政办法可以做到这点，但不能持久这样做）。所以在西欧衰退的影响下，在国内具有增加就业可能性的条件下，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也开始出现在国外临时工作的工人大量回国的情况。

大量增加就业是形成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因素。在经济和非经济部门中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人数，一九七〇年有二百七十多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工人阶级不仅绝对地壮大了，而且日益成为就业的主要社会范畴。但是，在就业者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具有受过高等教育程度的干部大量涌现的情况下，这一点常常被忽略。鉴于在国外工作的工人高达一百万（通常他们肯定不会恢复其个体农业所有制），那么，他们就是这个时期内特殊成长起来的真正潜在的工人阶级了。

城市化过程也在迅速地发展。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

期间，城市化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九，一九六〇——一九七〇年是百分之四点八。同期内，欧洲国家城市化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三点二八和百分之二点二七，就是说，约低一半。同时，由于劳动和劳动条件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变革，劳动和生活场所的变化过程也出现了。一九六一——一九七一年期间，南斯拉夫约有三百五十万居民迁移，占全部居民的百分之十七。从农业居民点或混合居民点中走出或迁移出来的居民约有二百五十万人，占全部居民人数的百分之十三。这些情况很接近于过去发表过的农业人口变动的资料。这也表明，人口的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化，对于整个人口变动中的其它变化是有影响的。目前，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十八点六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一九四八年是百分之二十点八）。在同一期间内，非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增加了三十点八个点，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增加了十七点八个点。换句话说，大量的非农业人口仍然住在农村居民点，虽然他们从事于非农业部门的工作。这就产生了所谓混合式的家庭，这些家庭的部分成员从事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另一部分成员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尽管还有大约百分之三十三的农业人口，但是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居民户完全靠农业收入为生。全部居民户中，有百分之十四是混合式的农户（他们的收入既有来自农业的，也有来自非农业部门的）。全部居民户中，有百分之六十点四完全靠非农业收入为生。靠非农业劳动获取收入又不居住在城市和城市型居民点的居民户约占百分之三十。

从农业到非农业、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的居民变化过程，使居民户的平均人数显著减少。在工业化初期，一九五

三年每个居民户平均有四点二九名成员，一九六一年为三点九九名成员，一九七一年为三点八名成员。这种情况是同社会改革、特别是城市化的过程相适应的。但是，不管是城市住户还是农村住户的人数，都减少了。这对于住户的构成、住户的自立人口和留在家中人口的比例以及对住房需求的规模和结构等都有巨大的意义。事实上，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的居民户的数目增加得比居民人数增加得要快。这是社会政策中许多成分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时期内，特别是近十年来，居民的教育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居民的素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表13 居民教育构成的主要指标 (单位:千人)

	1953年	1961年	1971年
人口数	16,991	18,549	20,504
十岁以上的文盲率(%)	25.4	21.0	15.2
干部:			
熟练工人和高级熟练工人	531	877	1,506
具有中等普通教育的干部	154	176	335
具有中等专业教育的干部	191	312	721
大学和高等学校毕业的干部	81	1,562	3,043
干部占人口的%	5.6	8.4	14.3
干部增加指数(1953年=100)	100	163	318

\*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

教育构成也同经济社会构成一样，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上表很好地说明，全国人口中，干部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增加了。居民的生产创造能力，作为经济再生产的因素，显然有了很大提高。甚至再也不能把当前的居民构成视为“落后”的了，就是说不能把它当作拖延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一点是必须真正考虑到的。整个来看，干部不再是迅速地、有效地发展经济的障碍，而在十至十五年以前，情况就曾经是这样的。但是，教育构成本身同时也还存在矛盾的因素。例如，同全国人口相比，同改善居民的教育程度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相比，文盲率极高。有关材料也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在大约三百万受过教育的干部中，差不多有二百五十万人来自文盲（十岁以上的），这对于经济和社会来说，都是极沉重的负担。

自立人口的增长率近十年来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保持在百分之四十八点五到百分之四十九之间。但是，自立人口构成的变化则是很大的。最重大的变化表现在，工人数量（就业人数）增加了，能独立生活并拥有个人收入的人数增加了，在国外就业的人数增加了。不包括工人在内的独立劳动的自立人口数（这首先是指农业劳动者）以及身为自立人口的家庭辅助成员数减少了。还要考虑到，这仅仅是十年来的情况。从自立人口变化这方面来看，这不是一个长的时期。迅速的构成变化也是极其重要的。自立人口构成的变化，同样也表明居民某些收入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显然，依靠劳动的就业人员，其次是拥有个人收入的自立人口以及在国外就业人员所取得的收入的重要性在收入构成中明显地增长了。家庭辅助人员以及独立的个体生产者所取得的收入的

意义缩小了。

在整个自立人口增长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同自立人口构成的变化一样，闲住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工人家庭中的闲住人口数和靠个人收入的家庭的闲住人员数增加了，而农业中的闲住人口数则下降了。

自立人口以及就业人口同闲住人口的比例，表明自立人口，特别是就业人口的负担很重。因为儿童和青年的教育使他们担负了很高的直接和间接的费用(社会和家庭的开支)。关于就业人口以及自立人口同大学生人数(大学和高等学校)比例的材料表明，学生和大学生的结构变化有利于高等教育。但是，无论社会或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再生产费用都不成比例地增加了。因此，在客观上可以计算出，尽管自立人口(特别是就业人口)在维持学生和大学生的负担的变化比较小，但是，在过去的十年内，这方面的负担实际上增加很多。由于领养老金的人数有了增加，而养老金的费用是从现在的收入中拨出的，这就使部分自立人口，特别是职工的负担加重了。每一千名就业人口，大约要负担三百名领养老金者。由于残废军人的人数少了，依靠社会救济和领取残废金的人数减少了。同时，享受社会救济的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任何微小的放宽标准(事实上，全国许多部门都有这种要求)，就要使享有社会救济的人员迅猛增加。因此，总的说来，可以肯定：闲住人口(这里包括领养老金者和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员，因为他们是在现期内没有参加劳动而从现有收入中领取养老金的)与自立人口或与职工人数相比，人数越来越向增多的方向发展，需要为他们拨出更多的资金。只有享受儿童补助金的人数是大大地减少的。但是，这也是过

去这段时期内执行相对的限制政策的结果。同样，如果这方面政策稍加放宽，就会使享受儿童补助金的人数大大增加。

人口构成日益明显地表明，没有参加劳动但必须由当年收入来给予维持的人口数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费用高于普通闲住居民费用的平均数。这是指大中學生、领养老金者、因公残废者和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员等。

属于这类人员数约占整个人口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其整个增长趋势是很快的，这类人员的费用（社会和家庭负担的大中学生、领养老金者、残废人员和享受社会救济者）特别高。

近十年来（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间），人口社会构成变化是很快的。这种变化是这十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的，但是这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居民迅速地成为经营管理和劳动的生产要素、熟练构成（同时也是较好的生产构成）改善了、作为扩大市场因素的购买力扩大了（通过这一点生产增长的可能性也扩大了）等等。但是，这种情况要求进行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意味着要求相应地增加和不断扩大经济资源，以及要求在利用资源方面也进行相应的变革。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导致巨大的社会变革。离开或不依靠其它经济社会过程，工业是不可能发展的。因此，工业对劳动的现代化、对生活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都有影响。工业发展首先可以使其他所有经济成分现代化和近代化。在工业发展的影响下，农业现代化已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以致大型社会农场已采用工业生产

方式进行生产，因此在社会成分中工作的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而对个体农业生产者即小农和中农来说，差别仍然存在。因为私人财产所有权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享受到工业发展为农业现代化所提供的技术和工艺。在工业的影响下，建筑业也实现了现代化。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建筑业主要是手工式的。工业化要求（当然也有可能）发展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建筑工业。商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商业已经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发展成为与工业旗鼓相当的行业。在经济方面实行工业化的这些过程扩大了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险等的要求。这些机构的广泛设施网有了发展，其制度和组织也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这些机构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离开自己的家庭到外面去工作（在人口中大部分是农业人口、小农和中农个体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这曾经是传统的劳动组织的形式），整个的生活方式、人们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都改观了。总的来说，我国的工业发展及工业化的实现是快的。经济发展使居民的需要急剧地增长，这种需要本身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这些需要不仅仅限于满足某些物质要求，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这些需要已经远远地不能满足了。重要的是扩大了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文化等等的要求。现代化的劳动组织和分工越来越多的满足了这些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创造满足需要的条件，人们在这些组织和分工中越来越互相依存。以自然经济的方式来满足需要的越来越少，通过购买工业品来满足需要则日益增多。这就是说，靠家庭自己生产的产品来满足需要的日益减少，而靠购买工业品则日见增多。在新的



工业生产的影响下，家庭内部的生活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准备食物、打扫家庭卫生等工作是妇女的传统负担。但由于采用新的工业品，由于使用能够减轻或担负许多家务劳动的家用电器，这就使妇女的负担减轻了。因此，业余时间增加了。同时在购买力增加、交通运输能力提高和文化教育机关发展的条件下，总的说来，现代化的生活内容丰富了。

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形式，自治制度的发展对社会变化也有影响，这一制度的体现者及其主要支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为建设这样一个把人从各种剥削现象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而斗争，他们自己也在变化着，社会关系越来越摆脱了阶级对抗。因此，我们所说的社会是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是以人们自己管理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以及是以收入分配为基础，也是以劳动和互相帮助为基础的社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包括几次宪法改革。以自治形式出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使大量居民参加决定发展的过程。单是在经济自治机构中，就有大约二百六十万人参加工作。吸收到教育、保健机构和其他社会服务行业工作的就有大约二十三万五千人，参加地方共同体的约有十八万人。选进议会代表团的有八十四万人<sup>①</sup>，参加代表制议会的有五万三千人。单是选进自治机构工作的每年约有一百五十七万人。今后，代表

<sup>①</sup> 代表团制是南斯拉夫现行选举制度。先是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地方共同体中选出代表团，然后再从代表团中选出代表参加议会，所以，南斯拉夫的议会又称代表制议会。

——译者注

任期要受到限制，因为在二十年的自治发展期间，有数百万群众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也是使劳动人民能够直接参加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使其成为进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体现者。这样的制度也是重大的社会变革的重要而积极的因素。由于这些变革，工业化和迅速的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是真正地保证工业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它使工业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但是，在社会范围内，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利用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保证在居民中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并通过这一点，保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重大的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又直接地扩大了经济发展的可能。

### 第五节 生活水平和居民生活 费用的分配情况

极其迅速的经济发展为提高生活水平扩大了经济基础，但是同经济发展一样，这一过程发展得也不平衡。

一九五三年以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总收入分配中，生活水平受到限制，而且没有很大的提高。换句话说，发展停滞，为完成关键性的基本建设而作的巨大的努力以及国防费用的增加，影响了这个时期居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住宅、学校、保健机构以及其它社会设施项目的建设大量地缩减上。

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期间，随着经济发展的进展，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虽然还大大落后于全国整个经济能力的增长。在完成主要的基本建设和实行自治制度后的

战后十年，这种情况对经济发展本身，特别是对新的自治制度的发展开始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自治制度存在的条件下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对提高生活水平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为生产、出口和进口结构的相应变革采取了措施，以保证为迅速提高生活水平而提供物质基础。

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个人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整个来说，实际总消费（个人的和社会的）的增加比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得快。但个人消费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而广泛的社会消费则受到重视。这样就不能通过个人收入达到更好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果。另一方面，许多社会消费形式发展得不合理，超越了经济的实际可能，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十年，一直延续到通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五年计划以前。在这个五年计划中，规定了适当优先发展个人消费，迅速提高个人收入和有选择地发展社会消费的形式。在这个计划中，住房和公用事业被认为是重要的经济指标。在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期间，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又重新达到平衡，并向着有利于社会消费的方向发展。虽然，满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问题，在许多政策文件中都有详尽的说明，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扩大生活水平的经济基础，即从满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观点来看，在过去的十年间，国民收入的使用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表14

## 国民收入分配

〔按现行价格计算(%)〕

	1962年	1972年	1974年
国民收入	100.0	100.0	100.0
个人消费	51.7	54.0	53.3
社会消费 (社会生活水平和投资)	12.1	14.7	14.7
总计	63.8	68.7	68.0

- 国民收入的材料引自《1947—1972年南斯拉夫物质和社会发展》，载《1973年南斯拉夫统计年鉴》，第44页；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资料引自贝尔格莱德生活水平研究中心公布的材料。所以要引用这些资料，是因为它们适于研究生活水平、生活费用、国民收入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的现状。

二十年内，国民收入分配构成（按现行价格计算）朝着有利于消费方面变化的约有四个点。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之间比例是朝着有利于社会消费方面变化。社会生活水平方面的物质消耗和投资在整个消费基金中的比重，由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九提高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一。如果再考虑到从社会基金（赡养费用、给社会部门的总拨款、社会救济和儿童补助金）中支付的个人消费，那么，这样的比例关系是很有利于社会消费的。而且，由于作为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消费总额最终不能实现，社会消费变得越来越大。

近几年来，临时在国外就业工人的补充购买力是形成

购买力及居民购买力分配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补充购买力，其数额是很大的。根据普查资料，一九七一年在国外的自立人口共有五十七万六千人，占全国自立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五。他们寄回国内赡养家庭的费用占本国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点二。也就是说，占个人消费总额的百分之十点五。居民从国外寄回的这笔资金一年比一年增加，一九七三年竟占到个人消费基金总额的百分之十四点四五，一九七四年下降到百分之十三点三八。

经济发展提高了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也就是说提高了满足人们需要的资金总额。在实际总额中，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个人消费提高了大约百分之三百，社会消费提高了大约百分之六百二十五，整个来说，用于满足生活水平的消费金额提高了大约百分之三百五十。在这个时期内，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资金实际年平均增长率是：个人消费为百分之六点八，社会消费大约为百分之九点九，总的消费约为百分之七点五。这就是说，个人消费的增长略慢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社会消费增长则快得多。但是，要看到，整个消费的增长比国民收入增长快。同时，这里必须指出，个人消费，特别是社会消费，由于五十年代初期（即自治的初期）的外交和经济形势的缘故而极为低下，所以，在估计这种再分配时，必须考虑这种情况。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当前国民收入所达到的水平，整个消费率（特别是个人消费）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是低的。关于这一点，社会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当前的个人总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在国外工作的工人购买力（占私人总消费的百分之十以上）。在国民收入接近目前南斯拉夫水平的国家中，其个人消费在国民收

人所占的比重要比南斯拉夫多五个点以上<sup>①</sup>。同时，我国消费(总消费)和积累率仍然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总之，我国生活水平方面的消费率不是很高。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不平衡的中心问题，不是产生于消费率本身的高低，而是产生于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关系。上述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使得经济效果不能令人满意，由于进行了巨大的社会改革，消费方面的需要常常比经营效果的提高来得更快，以致在某些部门中日益增长的需要和经营效果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

谁来利用经济发展结果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研究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条件下，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首先影响到社会产品的利用情况。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社会生产之所以提高，首先是由于社会成分的经济迅速增长。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成为主要因素的条件下，经济才能迅速发展。也正是这样，才能够使全体居民更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这不仅能够普遍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还能使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更加平衡。这对于前一段时期由农业转入到非农业部门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为有利。在增加的个人消费资金中，事实上约有三分之二是用于提高从农业转入非农业部门的那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去了。同五十年

① 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个人消费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发达国家为百分之五十八点五。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占百分之六十四到百分之七十，南斯拉夫约为百分之五十五（在可比的基础上），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国家为百分之六十点二。

代初期比较，七十年代初期的实际个人消费总额提高了大约二倍半。从农业转入到非农业部门居民的总消费提高了大约五至六倍，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提高了大约四倍，而农业居民的消费约增长两倍。这些事实表明，所有居民都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对某个阶层有利。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内，在建立社会主义自治关系的条件下，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由于经济发展而缩小了。

但是，在满足需要的可能性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农业户和非农业户之间个人消费额（按人口平均）仍然有着很大差距。非农业户的个人消费总额比农业户高约一倍。在一九七二年，社会成分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点五的职工平均个人收入上下悬殊百分之三十。而在工矿企业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点七的职工平均个人收入上下悬殊百分之三十。

居民社会构成的变化和国民收入利用水平特别是国民收入利用构成的变化，都说明六十年代的十年是由于社会进步而得以发展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六十年代的特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齐头并进（而在五十年代的十年，经济发展明显地优先于社会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平衡。事实是，提高生活水平是使经济发展更加有效的一种特殊投资。更好地满足需要、熟练构成的变化以及生活水平的其它许多因素也是现代条件下经济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衡量某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极其复杂的，而且也是极不可靠的。但是，某些指标清楚地说明，经济发展依赖于某些因素提高，而且依赖程度还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因素本身的发展也必然是比较快的。

表15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些指标

	1961年	1971年	1974年
国民收入	100	193	231
固定基金中用于投资的拨款(%)	31.7	30.2	29.3
干部:			
熟练工人和高度熟练工人	100	172	
中级干部和专门干部	100	232	
中学毕业干部	100	195	
大学和高等学校毕业的干部	100	245	
全体干部	100	195	
社会服务部门(教育、科学、保健) 的投资——占国民收入%	9.3	12.3	11.9

这里只列举决定社会再生产效率最重要的几种指标。但是，社会再生产效率最终必须通过国民收入增长率反映出来。从上表可以看出，固定基金中投资水平是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高度。对物质领域内再生产有重要意义的三个方面（即教育、科学和保健）的拨款占百分之十二。对固定基金、经济的总投资以及对教育、科学和保健事业的投资的增长都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整个干部数量的增长同收入的增长同样快，文化程度最高的干部的增长甚至更快得多。高等文化水平的干部数量占目前社会成分全部职工的百分之十二以上，这显然已经不少了。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觉得前一个时期的国民收入应该增长得更迅速些。在这段时期内，收效较好的投资率保证每年至少增长百分之一。这种情况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尽管已经很平衡，但并没有



给经济增长带来同样的结果。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拨款经常保持很高的数额，教育、科学和保健事业的拨款日益增加，但对于提高经营效果和增加收入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消费拨款日益增加的同时，高额的投资拨款就使矛盾越来越多。如果再加上私人收入也是增长的，加上经济发展不能起到直接效果的社会发展的其它领域（如养老金、社会救济等等）的收入也有迅速增长的趋势，那么，就很清楚看到，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效果下，社会领域的总消费和总需要就会日益同经济发展发生冲突。鉴于社会领域需要的增长或多或少是社会通过自己规定的途径来实现的，而这样做是不能提高经营效果的，那么，造成不稳定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之间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经营效果不佳。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开始着手缩小从事同类活动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低悬殊的过程。由于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这一过程的进展比预料的要快。这也是改革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结果。

最后，必须指出，在发展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中，生活费用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自治制度的发展和经营的非国家主义化，生活费用的经济意义愈来愈大了。它已成为最重要的杠杆——关心有效发展经济的推动者。劳动人民越来越能够不经过国家之手掌握自己的劳动成果，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并能独立地确定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目前的生活水平和将来的生活水平之间的比例关系。

有很多材料可以用来说明在过去二十年内生活水平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也就意味着生活水平

的大大改善和提高。这就是说，是生产劳动保证了生活，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还要补充指出的是，其它收入来源也很重要。五十年代初期，领养老金者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并不大，约占百分之一·六。一九七五年，领养老金的绝对人数增加了四倍多，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二·三。如果再加上农业生产的增长，以及一九五二到一九七四年间从劳动中获得的私人实际平均收入增长约百分之一百九十六·九（年平均增长约为百分之五·一），那么就可以得出真正的结论：居民的生活来源和急剧增长的购买力还在不断增加。

所有这些变化，对于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有影响。人的寿命延长了。五十年代初期，平均寿命：男人是五十六·九岁，女人是五十九·三岁。一九七二年平均寿命增加到：男人是六十五·四岁，女人是七十·二岁。总之，目前的年龄是高得多了<sup>①</sup>。婴儿的死亡率减少一半以上。一九五三年出生的一千名婴儿中，有一百一十六名死亡，而一九七一年下降到四十九·五名。全体人民以不同的形式或多或少地参加了卫生保健。目前，全体人民中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受教育。由于食品的构成有了明显的改善，每天食品的热能约为三千二百卡路里。在二十四年内，共计建筑了二百二十多万套住宅。每年用于教育和保健方面的经费约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

购买力的提高使居民的需要许多方面得到了满足。个人消费构成中，食品消费的比重减少了，而工业品和服务费用所占比重则日益增加。工业发展对于居民购买力的提高起

<sup>①</sup> 战前的平均寿命（一九三一年人口普查材料），男人是四十五岁，女人是四十六岁。

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由于安排了新的劳动岗位，职工人数有了增加，还由于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果的提高而使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增加。

但是，要指出的是，工业生产结构不仅仅在于为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同时还要更好地和多方面地满足居民对工业消费品的需要。一九五二到一九七二年期间，工业消费品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二，而整个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四。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六，而再生产材料则为百分之九点九。从满足居民对工业品需要的观点来看，工业的这种生产方针具有重大的意义，尽管近年来，由于动力部门以及再生产材料生产的落后而出现不少问题。

因此，满足居民对工业消费品需要的可能性大大地提高了。提供某些工业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也是这些可能性日益增长的表现之一。

表16 社会成分中工人提供工业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

	单位	1956年	1972年
食 糖	公斤	2小时47分	0时28分
食用油	公斤	6小时28分	0时56分
男服呢，纯毛	米	93小时15分	16小时35分
女服呢	米	28小时51分	10小时19分
电 灶	个	290小时	101小时
收音机	个	701小时	93小时
电视机	台	1,757小时	332小时
电冰箱	个	2,307小时	170小时
电	每度	0小时14分	0小时2分

由于购买力的提高，而且工业对此又保证了物质基础，满足工业消费品需要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迅速的经济的发展，其中主要是迅速的工业发展，使住宅建筑、医院和其它保健机构、学校和教育机构等等的投资有了很大的增加。在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中，对这些部门给予了优先地位。因为这些部门对于生活条件具有巨大的意义，它们的急剧发展也有助于工业化的实现。

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有很好的效果。首先，由于工业发展，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提高了。同样，工业对农业原料的需要也增加了。但是，这些效果对于农业中的社会成分（大型的社会农场和联合体）和私营成分（小农、中农和个体农业生产者）的反映是不同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社会成分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百分之五百三十九，即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九，这样的增长率和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是一致的。在同一时期内，私人农业生产只提高百分之六十七（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点九），整个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显然，大规模的社会农场是能够满足由于经济发展而对食品和工业用农业原料的需求的。而工业也同样保证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对于小农、中农和个体农业生产者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工业没有为他们提供可以利用的同等有利条件。工业工人和社会经济成分的农业工人的个人收入的悬殊不大。一九七五年工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三千零一十第纳尔，农业中社会成分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二千九百一十第纳尔，只低百分之三点五。但是，如果考虑到工业和农业技术熟练构成的差别（工业的熟

练构成要高些)，那么，工资实际上是相等的。而且，按每个工人创造的社会产值也大致是近似的。事实上，社会成分的农业已经工业化了。但是，同个体农业生产者相比较，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的生产率低。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虽然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实际个人生活水平比工业工人还是低得多。生活水平的这种差距，也是导致大规模的丢弃农家私人财产到非农业部门中去寻找工作，以及甚至流往国外去临时工作的主要原因。

可见，工业化的效果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很大的。居民之间比较均匀地分享了这些效果，这些效果不仅能普遍地提高生活水平，而且分配得还很合理。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工业化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分配效果才有可能取得。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工人从劳动中获得的收入和个体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成为居民购买力的主要来源。一九七二年居民的总收入中，在社会成分中就业的居民个人收入占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三十九），而个体农业生产者的个人收入（包括实物消费）占百分之十八点五（一九五六年为百分之四十九）。各种社会保证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就是说，居民绝大部分的货币收入是来自劳动和社会保证。这就能够使居民的货币收入较为公平，并最终缩小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战前分配中的差距。这里，工人自治制度的实现对于收入分配的模式有着重要影响，毫无疑问，这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样，基本居民群众是工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受益者。如果没有政策方面的改革，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是不能取得的。同

时，由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所产生的这种分配收入的模式，刺激着工人努力迅速发展经济，这也是整个经济能够蓬勃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能够迅速提高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在工人自治的条件下，为了更好地满足工人的消费而对日益增长的收入进行比较公平的分配，也是使工人努力取得更好的经营效果的刺激因素。同时，这种对日益增长的收入所进行的分配对于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居民群众购买力的提高意味着市场的扩大，进而需要工业部门生产大量商品，从而为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经济前提。

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还使各个居民阶层的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差距有了缩小。前面已经谈到，对这方面起作用的首先是就业能力的增长以及居民经济社会构成的变化。因此，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在于有限的就业可能性。这种就业可能性在目前还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同过去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增加。另一个影响差距缩小的重要因素是极大地扩大了学校和教育，受教育的可能性增加了，提高了一般的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居民的普遍保健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因此，我要再重复一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真正受益者是全体居民。有关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产品的消费资料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享有这些产品的人数很多，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殊享受<sup>①</sup>。更不应该忘记有关住房建筑的资料，

---

① 目前，使用的电冰箱有四百万台，电视机三百一十万台，收音机四百五十万台，等等。我国居民户是五百三十万户到五百五十万户之间，如果从这点来考虑，那么，这些就是大众的消费品了。

尽管这一事实常常被人忘掉，甚至还有人认为住房仅仅是为特权者建筑的。最后，从上面已经谈到的有关个人收入中总的不平衡资料来看，也说明差距是相对均衡的。

在为所有的人创建平等的生活条件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对过去二十五年的自治发展情况加以分析，就可以断言，迄今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创了缩小差距的途径，而且进展十分迅速。这一点之所以必须提到，是因为过去，甚至在现在还有人企图否定重大的成就和胜利。消除生活水平的差距是长期目标。迄今所取得的成就说明自治制度的优点，并表明，由于自治制度的活力和作用，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能利用日益扩大的经济资源来缓和和缩小历史遗留下来的差距。

最后，我还想指出，过去时期生活水平的一切变化越来越直接受到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公社和各种社会团体内的劳动人民的影响。虽然国家对这个时期的发展仍然起着很大的调节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治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了。这样的过程已经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劳动成果，劳动人民作为自由生产者和创造者提高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水平的条件越来越多地创造出来了，从而发扬了在解决共同问题时的相互帮助的精神。这样，生活水平成了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它激励着人们为了更好地多方面地满足需要去提高经济基础。

## 第六节 科学和教育

过去二十五年内，教育（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有了极迅速的发展。前面已经引用过有关全体居民受教育的相对人数增长资料作了说明。如果引用居民按年龄分的受教育资料，那就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例如一九五三年，在七至十四岁的儿童中，受基础教育的有百分之六十，目前，这个比重已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一九五三年，在十五到十九岁的青年中，受中等学校教育占百分之十四点一，目前大约为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五三年，在十九至二十三岁的青年中，受高等学校教育的（高等学校和系）占百分之一点六，而现在约占百分之七点四。

尽管居民教育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应当说还是低的。例如，经济部门中平均的受教育水平大约在八年左右，显然是不能满足于不断变化的现代技术发展需要的。大量职工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这种状况不可能解决目前由于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出现的问题。

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得特别快。据计算，从一九五〇年以来（包括一九七六年），从大学和高等学校毕业的各行各业内专家有五十万人。就是说，这个时期内，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毕业生每年有二万五千人，而近年来的毕业生每年约有三万五千人，差不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毕业生人数的十七点五倍。据统计，目前工程师、工艺师、农艺师、林业专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十五万名，而在战前，只有大约五千人，甚至比这还要少些。这种



情况清楚地说明，目前，居民特别是职工的整个教育和专业队伍中已经形成了基本干部队伍，由于全体职工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知识普遍地提高，这个基本干部队伍对迅速的和更有效的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之过去是大大地增加了。

教育经费在整个国民收入使用构成中占很高的地位。目前，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以上，而在五十年代初期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二点五左右。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学生人数的增长，收入中用于教育部门的那部分开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虽然有其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网和教育制度不合理的结果。

同战前旨在培养官员的学校和极其落后的教育制度相比，现今教育制度有了巨大的改进。但是，教育制度仍是按古典教育制度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它脱离了其它的社会劳动领域。因此，就形式和内容来看，同当前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从费用的观点看，是昂贵的，无效的。由于没有及时地完成教学改革和普及教育，损失是很大的，等等。因此，教育制度同其它的发展发生了矛盾。发展要求大量的干部，但是，这同过去教育所输送的干部很不成比例。同样，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在整个劳动过程中适应经济、技术进步带来变化的干部，而现在的教育制度日益跟不上社会的要求。因此，按照需要对教育进行根本的改革，是极迫切的任务。改革应当是意味着教育过程的改变、教学的改革和现代化。

至于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在建立基本科研干部网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事实是，任何一个南斯拉夫的民族在科研工作中都没有任何基本传统。但是，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有了极大的进步。主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网已经形成，基本的研

究力量已经培养出来。目前，在研究机构中工作的约有一万二千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科研干部是兼负研究任务的技术干部。

战后时期，约有六千八百五十名科学博士成长起来（战前约有七百名），这本身就说明在培养科学干部中所取得的成就。科学研究经费约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也可以说科研活动同教育活动一样，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在这方面必须进行巨大的改革，以便使科学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进步。

## 第七节 参加国际分工

一个国家参加国际分工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无论如何必须有三种因素：国家的大小、它的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结构。这里还必须补充指出的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政策措施，这些能够促使它参加或不参加国际分工。

广泛地参加国际经济活动始终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因为南斯拉夫的人口较少（因此，市场就受到限制）以及自然资源的数量和构成受到相当的限制，只有更多地参加国际分工才能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得到理想的发展。在同外国的经济关系方面始终存在着许多限制和困难。过去遗留下来的经济上的不发达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令人不能满意的竞争能力，成为这条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且在一个时期内经济制度本身也成了障碍，因为经济制度在这方面长期地保持着行政保护的因素（这种保护作为相应的措施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做

得过份，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无效的发展）。废除旧的做法的坚决措施是在一九六一年采取的。当时经济制度的改革决定必须广泛地参加国际交换，特别是这个政策成为一九六五年以来改革的中心。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衰退时期，即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特别的困难。南斯拉夫向这个地区出口的商品下降了，因而就更加重了我国支付平衡的困难。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联系到现实的经济形势再谈。

如果以出口的商品和劳务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计算，则参加国际交换的水平，一九五〇年约占百分之十，一九六〇年为百分之十三点六，一九六九年为百分之二十点四，目前，估计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无论如何，这是很重要的成就，但是这还是很不够的，因为我国是小国，国内市场不大，在经济上有必要这样做。当然，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必须保证很合理地参加国际分工。考虑到出口困难，某些市场对南斯拉夫商品不予开放，因此，要用国内的原料、燃料和设备来合理地、恰当地代替进口，以便使我们不致于由于有限的出口能力而使发展受到限制。同样，还必须使我国参加国际分工有一个合理而有利的地区性的方针。

在过去这段时期内，随着商品交换构成的变化，同外国商品交换有了迅速的增长。南斯拉夫由出口大量非加工产品的国家，变成出口大量高级加工产品的国家，在进口方面，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和变化。

表17 南斯拉夫进口和出口构成（百分比）

	出 口					进 口				
	1939年	1950年	1964年	1968年	1974年	1939年	1950年	1964年	1968年	1974年
非加工产品	55	43	17	14	8	20	31	24	15	24
加工产品	39	50	39	32	37	26	25	24	24	25
高级加工品	6	7	44	54	55	54	44	52	51	51

尽管出口增长非常快，但是整个时期的特点是同外国商品交换逆差很高。出口增长的确是很快。二十四年内，出口（按价值计算）增长了二十四到二十五倍，就是说，在二十五年时期内，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四点三。但是，进口随着出口也在迅速增长，因此，出口只能弥补进口的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同外国商品交换出现逆差是有其原因的。在自治的前十年，这些原因是：进口的粮食、机器、设备和再生产材料多。在农业发生重大的变化以后，情况就大大改变了，进口的粮食不再是逆差的因素，或者至少不再是象前十年那样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它两个因素，即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进口仍然未变。必须着重指出，工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大的，那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于是，同外国的商品交换开始出现不成比例地增长。出口是增长了，但是却保持着不合比例的进口比重。这样一来，外汇的净效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同时，由于生产不成比例地发展，生产的迅速发展越来越依靠大量地扩大进口，但是进口的扩大又不能同时充分地增

加出口，近两年的情况更是如此。至于进口设备和机器，这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的重要前提，是它们现代化、引进现代技术和工艺、提高其再生产能力的重要前提。虽然，我国目前是设备和机器的出口者，但是仍然是这些产品的进口者。这是一条渠道，通过它可以把外国的积累转移过来（购买设备时主要是通过信贷）。

事实上，外贸交换的长期逆差是经济更进一步迅速发展受到限制的最重要因素，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增加出口。增加出口之受到限制，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内部原因。这就是生产成本仍然非常高，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很差。另一个是外部原因。由于关税和外国市场的其它壁垒，甚至很有竞争能力的部门，有时也不能提高甚至不能保持相应的出口水平。这方面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不久前向欧洲共同市场国家出口肉遇到了困难。发达国家暂时出现了衰退，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起，这些国家的衰退表现得特别明显和深刻，它们严格地限制我国向这个地区出口。同时，外贸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进口价格上涨高于出口价格。我国在外贸交换中的价格剪刀差不能不使我国蒙受损失。因此，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我国同外国的外贸逆差即支付差额是增加的。

这里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心问题是增加出口创造条件。但是，这样又要大量增加进口。这当然不是放弃自由化方针。南斯拉夫经济是规模不大的经济，它必须是开放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市场的容量，并利用市场的优越性使其经济得到发展。无论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本质，还是我国外贸政策本身的性质，都需要这样的开放性。但是在进口

方面,这种开放性显然不是自发的,不会只是根据联合劳动的局部利益,甚至不会根据外贸系统的局部利益或某些劳动组织的利益而自发地形成这种关系。根本没有努力做到合理的利用所拥有的进口资财,因此,大量的进口不是真正的生产所需或生活的重要需要,没有努力去作代替进口的工作,继续存在着我国的进口能力毫不受限制的幻想。这样也就造成一种很少讲究节约、合理开支和合理进口的有害气氛。与消费相联系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消费)作风还没有改变,虽然,世界乃至我国的国际经济形势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需要在我国内部发展中反映这种情况。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九七五年第一次采取了措施并取得了成果,在一九七六年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近十五年来,同外国的整个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换句话说,非贸易外汇收入(劳务、旅游、侨汇和到国外去临时工作的工人的外汇收入)有了很大的增加。由于这方面的收入大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商品交换所造成的逆差,它们已成为整个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从国际经济观点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还是不完善的,专供出口的经济部门还没有牢固形成。这是当前发展方针的弱点。这种方针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视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其它有价值的部门和成就,这就是对于主要是依靠少数部门就能取得稳定的和有效的出口的这种认识还没有占上风,例如,在发达的国家中,只有三至五个部门就保证了百分之七十的出口。

一九七五年支付逆差占当年外汇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十六。每年偿还外国的贷款占当年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十八到百

分之十九(如果不包括短期信贷则占百分之十四)。一九七四年年底外债约占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尽管一九七五年支付平衡的情况不好,但是还没有发生偿还的信贷超越了经济允许范围的情形。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借来的,因此,它们的债务问题和经济负担问题就成为目前头等重要的世界性问题。所有发展中国家每年偿还的贷款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七,一九六五到一九六七年间,偿还的借款总额占国际上发放的贷款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三。如果这种倾向继续下去的话,一九七七年发展中国家所支付的贷款要超过当年信贷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一,这就意味着资本将从发展中国家流往发达的国家中去。我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同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分不开的,它限制了我国发展的可能。因此尽管对外经济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等到将来才能长期地圆满地解决。

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全世界出口商品总额中,南斯拉夫出口商品所占比重明显地下降,这是不合理的,这就要求在这方面要作出很大的转变。相反,所谓无形输出,特别是在旅游业和建筑业方面,南斯拉夫的处境却在不断地改善,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下去。

显然,必须把改变了的价格关系作为长期倾向来考虑。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复苏也同样是缓慢的,不平衡的。所以,不能指望将有长期的和稳定的行情上涨。从国外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也要求新的五年计划注意研究发展政策,要把这些条件作为制定我国发展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因为现在国内产品有四分之一依赖

出口，约有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因此，同外部的经济关系对国内的整个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 第八节 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发展

在过去二十五年内，在地区性经济发展的政策方面，共同努力的重点是为迅速发展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创造条件。南斯拉夫在实行自治制度的初期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全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毛收入在二百美元以下。最发达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可能在三百美元左右，而最不发达的自治省——科索沃——则在一百一十美元以下。

虽然这是按美元换算的收入材料，但是这些材料还是有用的，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南斯拉夫的发展程度，说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的极端落后性。如果把这样的国民收入数字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收入资料相比较，那么，整个南斯拉夫落后程度、南斯拉夫战后初期的地区性差别的面貌也就很清楚了。

还可以引用许多其它材料(例如积累能力、居民的教育水平、居民的健康状况等等)来说明地区性的差别。但这些差别基本上是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般的经济能力有关，并受其制约的。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收入如此低微，以致在为其工业化创造条件时需要施加一系列影响。诚然，这是全国工业化开始时期的问题，但在这些地方尤为尖锐。几乎可以说，这些地方当时没有走上进步和发展的道路。一切必须从



头做起——从建立主要的经济机构和非经济机构开始，一直到提高积累能力、刺激居民为争取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教育水平等等。整个共同体在帮助和影响迅速发展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形式各不相同，一般都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最近一个时期，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基金，这项基金具有稳定的财政来源；此外，还通过预算拨款来帮助这些共和国和自治省，以便提高其生活水平以及保证迅速发展教育、保健以及其它重要部门的基本条件。

所有这些措施已取得了很大成果，对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述材料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很有意义的材料。如果就社会总生产而言，则只有马其顿的增长超过南斯拉夫的平均水平，黑山相当于南斯拉夫平均水平，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科索沃在平均水平以下。总生产增长较快的是伏伊伏丁那和斯洛文尼亚。增长率最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最快(伏伊伏丁那)之间相差百分之二十四。但是，如果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生产来看，则情况根本不同了(这是真正的反映了经济形势一般的改善情况)。所有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增长都比南斯拉夫平均增长水平缓慢(不包括马其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最低增长率和最高增长率的差距竟达到百分之五十八。在我们考察的整个时期内都存在着这种情况。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期间，开始有所变化。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以前的五年计划和当前新的五年计划时期执行情况

时再谈。这一切都说明，迅速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问题是复杂的，也是长期性的。

表18 1952—1973年社会主义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社会生产  
(按1966年不变价格计算)

	总 计			按 人 口 计 算		
	指 数 (1973年: 1952年)	1953— 1973年 平均增 长速度	各共和 国和自 治省增 长速度 为联邦 的%	指 数 (1973年: 1952年)	1953— 1973年 平均增 长速度	各共和 国和自 治省增 长速度 为联邦 的%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 邦共和国	461.2	7.6	100	369.7	6.4	10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	387.9	6.7	88	279.6	5.0	78
黑 山	469.9	7.6	100	358.7	6.3	98
克罗地亚	441.9	7.3	96	387.0	6.7	105
马其顿	532.1	8.3	109	399.5	6.8	106
斯洛文尼亚	496.6	7.9	104	424.4	7.1	111
塞尔维亚	478.4	7.7	101	383.3	6.6	103
塞尔维亚除自治省以 外的地区	459.3	7.5	99	380.4	6.6	103
科索沃	444.5	7.4	97	265.4	4.8	75
伏伊伏丁那	535.8	8.3	109	463.8	7.6	119

而且，由于不发达，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相当高。例如，在整个这一时期内，科索沃的人口增长率高于百分之二点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约为百分之一点六，黑山约为百分之一点二，马其顿约为百分之一点五，而整个南斯拉夫约为百分之一点一，但是在最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则约为百

分之零点八。个别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并不比世界上一般不发达国家平均人口增长率低很多，有些地方甚至完全相同（如科索沃）。这样的人口增长情况有许多原因，但是经济不发达无论如何是这种人口增长的基础。因为，科索沃有些地方每人收入目前还只有三百五十美元左右，当然，这既会影响整个的发展，也会影响人口的增长。

正因为如此，过去二十五年内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一种胜利。在这些地区，人口的增长趋势几乎和不发达的国家相同，但是，按人口平均收入的增长却要比这些国家快一点八倍。这样的增长能使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达到一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就意味着新的质变：较高积累能力、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大力提高干部能力，从而迅速地克服了落后状况，提高了购买力；在工作中积累了重要经验，进行大量的社会动员等等。但是，最尖锐的仍然是科索沃的问题。南共联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把迅速发展这个地区作为一项特殊的任务，并且，第十次代表大会对此再一次给予确认。

毫无疑问，我国的制度在这方面表现了充分的优越性：没有阻碍最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发展，同时又推动并使经济落后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不仅仅是必须而且在经济上有必要使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得到发展。这样就可以迅速缩小国内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

在实现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的五年计划方面，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发展也是很快的，社会生产名义增长约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的百分之五，工业实际总产值

约超过百分之六，经济部门的固定资金投资约超过百分之七，社会成分的就业约超过百分之二十五。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基础经济设施、教育、保健、文化以及其它方面也取得了成就。

除黑山以外，在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期间，所有地区社会生产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的增长速度。科索沃的社会生产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十点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超过百分之五点九，马其顿超过百分之八点五，而黑山则低百分之十三点六。

在这个时期内，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一点四个百分点（预计是提高约两个百分点）。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生产的相对差距也缩小了。但是，这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实现计划规定的基本指标，由于通货膨胀，动力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业、流通部门的设施现代化以及现有设备的改建都推迟了，因此，这些设备在增加生产中都没有收到效果。经济投资的预期水平没有达到，经营的质量效果也没有能实现。

迅速而全面地发展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正是我国自治共同体发展的人道主义政治的目的。但是，在今天，这也是整个南斯拉夫发展及其一体化利益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只有迅速地扩大市场和购买力才能充分做到这一点，只有为南斯拉夫经济迅速一体化创造条件才能实现这一点。南斯拉夫经济的有效性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等等，完全取决于经济一体化。

对于进一步改进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的统一，对于各族人民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平等，以及对于迅速而

协调地发展整个南斯拉夫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来说，迅速地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政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迅速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同时也是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克服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比例失调现象创造条件，而这种比例失调从各个方面限制着整个物质和社会的发展。

### 第九节 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发展

战后以来，南斯拉夫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三十年，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也意味着社会关系有了改变。

对于我国经济制度发展的分析表明，我国的经济制度和劳动人民的地位不断地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客观原因，我国经济制度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是随着集中管理经济的发展而开始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国家机器作为社会的代表，它是社会主义生产最初组织形式的组织者，并逐步地把直接生产者吸收到经济管理过程中来。在发展我国制度、保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的行政管理时期，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采取集中分配资金、实行行政命令的计划制度、用行政措施规定价格和调节市场以及分配劳动成果的形式。劳动人民对这些做法都不能施加影响。

但是，在这个时候也早有了这样的看法，即作为社会改革的主要支柱和首倡者的国家机关的行政命令在经济中造成

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不尊重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基本动机，在再生产过程中忽视和压制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使满足劳动人民基本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片面地表现为为生产而生产，即为积累而积累。一句话，集中管理经济制度阻碍着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进行真正的结合，并不断地为劳动集体完全脱离自己的劳动成果，提供物质基础。由于经济实力和社会实力大量集中在国家机关手中，这就加强了官僚主义，并迅速导致政权和管理的严重变形，使主观意识在管理工作中占统治地位。这在实质上就是使处在开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退化变质。作为长期经济组织形式，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具有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新的官僚主义政权的危险，具有在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之间建立国家形式的（即国家机构形式的）新的媒介的危险。虽然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客观上形成的，并且时间较短，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实践却无可辩驳地表现出这种危险。就是说，经验清楚地表明，这样的经济制度所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概念和现实，同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直接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发展还会蒙受巨大的牺牲，其表现是：积累不能有效而合理地得到充分利用，这种经济对于技术改革的适应是缓慢的，因为改革要等到中央领导人作出指示才能进行；政权集中并落入中央少数几个人的手中，他们把自己发号施令的职能委托给许许多多小单位和具有企业性（地方性）的行政中心；生活水平被忽略了，它主要成为一种社会概念，在国家主义的精神影响下，提高生活水平不再是使工人有效地从事于经营等活动的基本的最有力的因素和动机。

必须注意的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开始以来就清楚地

表明，如果不用更进步的和更完善的阶段来代替，那么，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因此，一切进步力量都把我国社会发展的行政阶段理解为不断革命变革所不可分割的但又仅仅是过渡性的阶段。上面谈到的我国社会发展行政阶段中经济制度职能的缺点，也更进一步地说明必须克服当时的状况，实行工人自治制度。

事实是，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具备了社会意义。在国营成分即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刚刚建立的时期，我们就进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说明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于所有意味着革命不断变革的卓见，说明了共产党的组织性及其对社会变革影响的程度，也说明共产党有能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sup>①</sup>。

因此，一九五〇年通过的把企业转交给工人管理的决定，对我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来说，是历史性的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个经过一九四九年在经济部门中对工人委

---

① 关于这个问题，铁托同志曾经谈到，“但是，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不应该去抄袭过去的样板，而是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遵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思想来走自己的道路。我们通过本国的实践，深信马克思主义对于最复杂的问题也能很好地加以阐明。谁希望能够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精神，那么，谁就不应该指望什么马克思的科学权威、监护人和代理人，这些只不过是把人从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引向修正主义道路去罢了！”（见铁托同志在通过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经济联合体的基本法令条例时的讲话。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50年版，第4页。）

员会进行试验以后通过的决定，也是对于改正我国社会组织概念的确证。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其它进步力量认为，只有对生产关系的性质作重大的修改，只有迅速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和整个社会进步不断地稳步发展创造条件。这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 展客观规律认识基础上的方针，是解决经济不发达问题和克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中矛盾的前提。

新的自治制度的建立过程是缓慢的，也是极其复杂的，甚至在目前，在其继续前进的进程中，这一过程还在不停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糊涂认识，甚至还有反对者。前者是企图保持现状的反映，后者则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理解的结果。这也是直到一九五八年以前国家所有制对于在再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几乎所有人 与人关系方面还保持重要影响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也是在作为工资和收益分配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分配领域中保持一定的雇佣—利润关系因素的原因。

在自治制度建立的时期（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七年），企业成为业务上自治的有组织的劳动共同体，它独立地决定生产各因素和实现所有产品的问题。企业是作为商品生产者而组织起来，它通过市场的作用同经济整体发生联系，而市场的作用——尽管确定了价格制度（一九五二年），即确定了自由市场，仍然受到行政调节的强烈影响。

企业作为合法的商品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劳动集体，必须掌握并决定用于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资金。但是，工资和收益制度（由行政规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清楚地表明，必须考虑并实现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



展。首先是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进一步发展，以便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这样的物质基础能使直接生产者处于管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地位，也就是使直接生产者在再生产过程中建立使国家迄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不必要或者不那么重要的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在联合劳动各部门之间向收入制度的过渡以及作为主要经济关系的收入关系的建立，是在五十年代后期进行的<sup>①</sup>。在自治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这样做已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收入制度经历了许多变革，但是，它越来越发展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主要形式。

① 大家知道，第一个论述把收入作为业务的主要内容以及论述收入关系的人是波·基德里奇（见“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任务”，载《共产党人》，1950年第6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载《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文化出版社1952年版。后来，米·波波维奇、雅·达维契形成了这些思想和观点，见“论国家资本主义”，载《我们的实况》，1953年第2期；“新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措施”，载《我们的实况》，1953年第3期。但是在六十年代，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学派，在理论上制定和完善了收入的概念，他们同意根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收入关系的认识来解决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所有问题。关于资金和劳动的联合、关于收入的取得、占有和分配关系确立的决议就是根据从事于收入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小组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制定的。在南斯拉夫的经济实践中，收入作为社会关系和业务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就已经实行了（见“经济组织总收入分配条例”，载《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57年第51期；“经济组织收入上缴法令”，载《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57年第52期；“经济组织的资金法令”，载《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57年第54期）。

从完善以收入为基础的分配制度的观点来看，一九六五年以前是我国经济制度发展的特别重要时期。雇佣—利润关系的残余被废弃了，放弃了工资和利润。出现了表现为劳动人民自治所特有的范畴和关系。按照社会所有制的经济性质和作用，对再生产的关系作了调整。而在收入的占有中，劳动集体越来越被确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尽管它们自治的物质基础（首先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当时国家机关仍然占有大量的社会资金，同时还保持着第二次分配收入的制度，这种制度阻碍着经济的自主性，并阻碍着去创造在没有国家机干预的情况下得以发展的条件。所以说，这个时期对收入制度进行改革，实质上是要对这种制度加以改进，以便国家能继续发挥作用。显然，必须大量减少由于第二次分配而给劳动组织带来的负担，因为这些负担是同自治地决定经济收入的制度相矛盾的。但是，这样做就是要预先克服由于行政制定和控制价格所造成的价格相对比例的不协调现象所造成的困难。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经济所特有的内在经济规律的作用调整价格水平和价格的相对比例。为了使社会共同体执行统一的价格政策，显然还必须对经济规律的作用和按经济规律所建立起来的价格关系的性质进行科学研究。

一九六五年以前，经济制度中能使有关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治决定得以确立的某些因素（即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调整经济关系的某些因素），其发展是缓慢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价格形成和积累占有的过程（即通过投资决定的过程），是在国家机关强有力的影响下进行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必须对我国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

基本目的之一，是要在劳动集体决定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即在劳动集体占有整个收入的基础上，解决现代化和一体化的问题。

还在一九六五年的改革中，就已提出要解决我国经济制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经济集团在初次收入分配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在收入制度基础上的经济收入、经济组织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一体化及计划工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折衷办法解决的。通常，这种折衷办法或者是将已被克服的国家主义做法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思想残余（这种做法曾经占主导地位，但在目前还存在着这些残余），或者是在“资本价格”即“劳动价格”基础上关于建立雇佣—利润关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看法的残余，或者是对待我国经济的国家主义态度和雇佣利润态度的一种复杂的混合物。

此外，自治发展导致了要对社会进行改革。这种情况表明，自治制度已经大大地压倒国家主义；表明日益发展起来的、并有能力决定承担责任和推动再生产过程的自治同由国家调节再生产之间存在着日益尖锐的矛盾；表明工人本能地要求在联合劳动中用各种自治形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自治尚不具备发达的物质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有所发展（例如，初次分配过程经行政调节后，国家就间接地再分配了大量的收入；绝大部分积累以税收的形式被囊括而去，并由国家机关所占有，国家成了主要的所有主，它通过集中的措施调节了整个非生产领域的消费等等）。事实上，国家仍然是通过联邦、共和国和区的各级机构对再生产过程起着决定作用的承担者。废除侵占经济收入的

过程进展得很缓慢，而且这种情况日益成为冲突和矛盾的温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现不良倾向。投资过分紧张和没有成效，支付平衡中不断地出现很多的赤字，普遍的经济不稳定等现象有增无已。这些现象使自治本身变形，使要求通过国家来组织经济和领导经济的现存势力更强烈地表现出来。

由于在加强自治物质基础方面的令人不满的倾向同整个社会自治方针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决定了一九六五年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方面（即在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方面）要使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化，即在农业和工业产品、原料产品和再加工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关系中建立完全新的比价。已经建立起来的价格关系在任何时候都将遵循经济上合理的和适当的（获得）收入的原则。也就是说，这方面的目标是要为“自由”地形成价格（即为价格的自由化）创造条件。

2. 第二个目标（这是由第一个目标产生的）是关于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之间收入分配的比例。到一九七〇年，由于自治的物质基础加强了，经济部门占有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其余百分之三十由非经济部门占有。在实现这一目标时，必然要减少或废除某些法定的收入税，首先是取消劳动组织的收入税，取消营业基金利息，取消或减少某些形式的税收和私人收入所得税。

3. 由于采取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措施，必然加强了经济部门的再生产能力。到一九七〇年，经济部门在固定基金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一，即经济部门自己的拨款

已成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拨款形式。

4.大力改变国际商品交换关系。所以必须这样做，是由于经济制度中上述几个方面以及外汇和外贸制度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经济制度的改革带来一些什么变化？就是说，上述目标实现了没有？我国自治的经济制度如何发展下去？

无疑，这一次进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无论就其广度而言，还是就其深度而言，都将是我国自治社会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社会改革。

但是，许多情况使得不能很好地去认识和实现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战略目标还没有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表明，这次改革的设想以及经济制度所有其它的变革都没有注意到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重要特征。正因为如此，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设想还没有认识到（因为这种认识还不存在），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自治社会必须建设成为劳动的联合和结合过程的可靠制度，必须建设成为“直接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制度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设想没有在质的方面给社会经济制度改革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而是从量的方面用自治同国家主义相结合的办法来调整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巴卡里奇同志所说的，自治仍然只起着“配角”的作用。

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把自治解释为是对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就是说，把自治与片面地分散决定及分散管理等同起来。这就为专家治国论的抬头及其同各级官僚主义制度互

相结合铺设了温床。显然，这样一来，劳动者的利益就被忽略，并把地方利益或共和国的利益强调为优先的占主导地位的利益。而且也必然会出现反对由国家（首先是由联邦）调节市场，并坚持在我们的企业之间建立那种在所有其它“发达的”即“现代”市场经济中所特有的联系和关系。在这方面，还有人主张在我国条件下坚持所谓无所不包的市场，就是说，在建立商品和劳务市场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把它们作为我国“新型的”新国家主义生产关系组成部分。

这些现象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其明显的表现是民族主义），就是要建立私营工厂，要求发行和买卖股票，要求取消土地的最高限额，要求加强企业所有制的倾向，发展私有化，对于私有制成分和社会所有制成分中发财致富的现象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等等。我国社会生活现实以及“思想意识”中的这种种现象，甚至使共产主义者联盟也发生一定的动摇，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一九六五年开始的改革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的原因，就是这次改革的某些重要的社会目标至今没有实现的原因。没有做到大力加强自治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使联合劳动成为占有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成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而这些都是这次改革的重要社会目标。流通领域（商业和银行）几乎完全独立，并进一步加强了其对生产的特权地位。这次改革不仅未触及到流通领域，而且还使这些现象表现得更强烈了。因此，在我国制度的形成中，至今还存在着诸如通货膨胀、亏损、不公平（即在各个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部门中取得收入的条件还不相同）、生产结构不协调、国家行政干预有增无已等等。就是说，甚

至在现在，这些现象有许多还存在。这些现象以及其它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没有能够在我国为实现劳动的联合和结合过程而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而且已经开始进行改革的原因。

正是从上述种种原因中可以看出采取各种行动的意义。这些行动导致了通过有关劳动和资金联合的社会决定。劳动和资金的联合是现阶段自治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原则。从这些原因中也可以看出第二次自治者代表大会一九七四年通过的新宪法以及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关于在联合劳动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社会经济自治制度改革的问题，将在本书的第三章中谈到。

## 第十节 七十年代中期某些矛盾的发展

实行自治以来的二十五年，是南斯拉夫在物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时期。我们不妨很概括地列举已经提到的成就。在二十五年内（一九五〇到一九七五年），我国的社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以上。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四，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六。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部类的作用缩小了，第二部类成为经济活动的基础，第三部类有着迅速发展的趋势<sup>①</sup>。缩小各个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别始终是政策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下，经济上不够

① 本书此处第一部类指农业，第二部类指工业，第三部类指消费品工业。——译者注

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个人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劳动条件，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扩大了居民的受教育人数。全体居民或多或少地享受着不同形式的卫生保健和保险，总的就业人数增加了，住房面积扩大了。

居民的构成发生了极迅速的变化。居民的教育构成大大地改善了。

确立和建立自治制度的整个时期还意味着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化过程。劳动组织内部的自治已经确立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包括经济和非经济部门）。公用制度发展起来了，为了大量的需要和共同消费，成立了相应的自治利益共同体。改变了国家代表机关的结构，促进了自治的发展。最后，还制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新宪法，以及在对新宪法、中期和长期的发展政策认识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在建设经济制度方面展开了巨大的活动。南共联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越来越发展成为在工人阶级内部发挥作用的先锋队的政治组织。其它政治组织，首先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劳动人民联盟和南斯拉夫工会的政治活动的构成、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

南斯拉夫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二十五年前，南斯拉夫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约为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现在，南斯拉夫的国民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我国参加世界经济交流、世界金融活动和科学技术合作等活动都大大地增多了。南斯拉夫的



国际政治榜样及其对世界政治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加。特别是南斯拉夫在不结盟国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指出上面这些事实，目的就是要说明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基本特征，说明这些变革的进展情况。显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自治时期的二十五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我国已从非常落后、不发达和经济上依附外国的地位走上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在社会方面，大大地缩小了社会差别，社会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这些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将仍然是存在的。

上面是一个概括的评价。正是因为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物质变化和社会政治变化，在过去这段时间内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分析时必须指出，无论在物质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政治发展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应当指出，在过去二十五年的长时期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所有重大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已经作为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提到了日程。由于取得了普遍的进步，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由于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靠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正是引起许多新的复杂问题的原因，社会必须在现在和将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现在有许多社会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甚至表现为复杂的形式。但是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就已存在，因为这些问题没有由于取得主要进步而最终解决。事实上，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暴露了更多的问题。物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越来越受社会发展的

影响，日益需要使社会政策（在广泛的意义上说，与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相适应的政策）成为整个社会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最后，扼要地谈谈长期的发展问题，谈一谈过去发展时期中所带来的某些问题、困难和矛盾。

首先，经济发展、经济积累能力已达到的水平同社会需要以及社会目标很不适应，即不适应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权利和发展规划。同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的投资增长相比，同对有效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干部和其它社会结构相比，经济实力的增长（按国民收入的增长计算）就过于缓慢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目标尽管是正常的、合理的、宏伟的，但是，在短期内常常是不能实现的。这些目标有：保证职工实际个人收入的增长和实际收入的增长相一致，非经济收入同经济收入相一致，大力扩大青年受教育范围的可能性，改善卫生保健，增加住房建筑，为了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发展公用设施（这是代价极高的），对工资保持刺激性的差距，大力改善公民特别是低收入工人的状况，就业增长率每年至少保持百分之三点五等等。显然，所有这些社会目标既不能通过已经达到的收入的进一步增长来实现，也不能超越目前经营效果所允许的收入增长的实际可能性来实现。但是，上述社会目标本身却是一种力量，并对决策者的行为发生影响，而且也是衡量政策执行结果的尺度。将来，所有目标都不会象原来所设想的和已经宣布的那样去实现，因此，在宣布的目标和它的实现之间的距离往往是很大的。当时，由于某些逻辑，总是掩盖现实，而不是对目标本身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去进行研究。在解决这些目标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

的措施方面，力量过于分散（即由各级进行），因此，不仅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令人满意的切实可行的关系，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更不能保证相互之间能有令人满意的稳定政策。由于社会目标在规模、结构和范围方面的不协调，所以，在当前的经营效率水平上，客观有限的经济可能性与社会目标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用压缩非经济性开支来减轻经济负担，仍然是经常的公开的要求。但是，这一点实际是很少能够做得到的。在广泛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社会发展本身也变得没有效率，因为它没有掌握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便合理地建立有关部门的组织。例如，我们有着发达的教育制度，但又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力损失<sup>①</sup>。保健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组织得不合理，亏损很大。还可以从社会发展方面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社会一般用限制消费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现象，但在解决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出现的这种重大矛盾时，这个办法很快就显得没有什么成效了。由于建立了利益共同体，经济能力同已经确立的社会权利和各种纲领之间的不协调现象变得明显了，显然有必要根据自由交换劳动的原则，使教育、保健和其它领域方面的权利、目标和发展规划限制在经济部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而且直接交换劳动应该鼓励经济部门进行更

<sup>①</sup> 例如，从一九七〇到一九七四年，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从二十六万一千人增加到三十六万人，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而教员人数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这种情况在一九七〇年就已经很不合理。因此，据计算，正常完成学业学生人数比规定的人数要少百分之十一点五，这就是巨大的财政损失和人力损失。

合理、更有效的活动，而不是仅仅鼓励非经济部门去这样做。

经济效率低，而社会发展目标却雄心勃勃，这是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不稳定加深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加深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陷于限制非经济消费的困境已有好几年，但是成效甚微。相反，在提高收入，特别是在提高经营效果方面的努力不能使人满意，关于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未得到充分地估计。

本书不打算分析经济效果不好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是明显地存在的。增长率虽然不算低，但是考虑到我国的优越条件，考虑到对有关生产的重大因素，首先是对经济部门的固定基金和培养干部的投资所做的努力，这种增长率就不能令人满意，何况这种增长率是非常摇摆不定的。许多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自治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的循环性”。但是，行政决定的实际程度（价格、扩大再生产、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行政干预），以及国家通过上缴收益、税收、海关政策等等影响收入的再分配，表明实际上是“行政循环”，是无数个执行者（他们常常是不协调的）的循环活动。事实上，初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始终带有高度行政影响的特点。以有关方面共同规划为基础的市场、社会契约以及自治协议始终没有起到基本的协调作用。国家在这方面的作用（从区、自治省一直到共和国和联邦）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重大而直接的调节（就是说它不仅对物质再生产过程起调节的作用）。因此，经营效率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首先是由于没有彻底的建立起自治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部门，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尊重商品经济规律和计划工作。在这种条件下，经济标准无论是在经济部门还是在非经济

部门都被忽略了，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宣布要加强自治，但国家作为经济和社会部门的保护者的作用还是表现出来了。虽然重视商品的经营管理原则，虽然在理解自治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再生产规律的基础上来认识发展并指导发展，但是没有用自治的方式掌握整个再生产过程，这是经济资源耗费得不合理和发展效果不好的基本原因。有很多发展效果不好的例子。例如，与国内外销售的可能性相比，一些设备能力太大了，另一些设备能力利用不足；设备能力构成不协调，投资建设期限长和造价昂贵，等等。这都影响到产品成本高。在国外市场上竞争能力低，必须大力保护经营不合理的国内产品，最后，影响到收入和个人收入水平低和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要。

可以简单地把这种状况归咎为只是一个因素的影响，即主观因素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营管理的条件，甚至主宰着经济决议执行者的行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以致需要对它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需要把技术和组织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整个经济现代化不是作为每一个工厂现代化这样一个机械过程来进行的，而是根据协调的和社会商定的发展政策来进行。在技术现代化的条件下，这种发展政策将保证新的社会分工，使每一种设备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并保证生产结构能更好地平衡。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设备能力还是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来，作为结构平衡条件的新的劳动分工也未建立起来。因此，新的技术就不会取得充分的经济效果。但是，新技术是昂贵的，而且很快地就变得陈旧，这本身就使

生产费用抬高了。如果考虑到因此而使社会再生产费用越来越增加，再加上客观上抚养费和青年教育费用的日益增加，那么就可以看到情况的复杂性，可以看到动荡、通货膨胀和不稳定的原因。不稳定不只是表现在价格的上涨上，虽然它是影响到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价格上涨使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业务活动困难，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遭到破坏等等。这就要引起行政机关的反映，而这种反映所经常维护和依靠的是已被破坏了的关系。这种情况也反映在不久前出现的缺乏清偿能力上。缺乏清偿能力的初步原因首先是预先消费和财政制度上的缺陷，因为这种财政制度规定可以把同样一笔收入的钱作几种用途。因此，多年来就要用发行货币来弥补不足。如果说，劳动组织方面有不合理现象，那么这种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了一个可以使它们合法开支的制度造成的。但是这种行为只是表面上合法，实际上并不合法。在这方面，近年来已采取了许多措施，使消费限制在已实现的收入范围内，但是这样大的经济制度问题，只有在一九七四年宪法基础上确立了整个经济制度后才能解决。

在这样不稳定的条件下，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满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就打了折扣。生产者以及公民们感到的是个人和家庭的收入不能保证，而不是感到满足需要的程度有了真正的提高。尽管某些部门满足需要的程度甚至大大高于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实际购买力的可能性。但是，满足需要并不能同时保证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不能保证维持已经达到的满足需要的水平。因为许多部门的消费水平已超过了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再具有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了。生活水平越来越置于国家的保护作用之下。生活水平日益成为社会标准，而作经济的标准则受到忽视。在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多数市民必然要设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水平，因为他们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只相当于平均生活水平，或在平均生活水平之下。因而，一系列矛盾在扩大，国家干预经济过程的范围越来越大，而市场和社会自治的调节作用就被取而代之。

虽然，自治实际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但是，同经济基础比较起来，则是有了很大的进展。自治制度本质上是要求更好地和更全面地满足需要，要求尽可能平衡地发展。正是通过自治本身的实践，对自治社会这些目标的认识很快地有了提高，而且大大超过了经济实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目标同相应的时期内所能达到的现实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就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想象中的和谋求实现的社会模式同实践、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差别。这一思想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很多人产生这样的意见：不仅仅社会模式和现实互相背离，而且社会发展在重大问题上违背基本目标的。例如，许多人感觉社会差别在普遍增加。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有意识地采取使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平衡大大加快这一方针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也确实发展了，现在普遍地要求更高程度的物质发展和满足需要，但这不是在一个有限短的时间内所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在国家工业化开始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是进行社会改革，这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必须使农

村人口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很低的农业中转移到其它劳动生产部门中去，要进行广泛的普及教育和社会改革。在这方面，行政强制在这里就变成无可指责的了。现在，这种类似的过程还在进一步发展，例如，强制进行大量的社会改革，目的是要发掘在现时尚未掌握的大量经济资源。从经济观点来看，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的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不再是人口大规模的变迁，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而是提高人的素质，并通过这一点直接促使人们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其结果就是为教育拨出更多的资金，迅速提高个人收入，大力关心个人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经济积累的能力就明显地下降了。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如果人的素质得不到提高，经济就不能进一步发展，那就将使经济积累能力的降低现象以另一种特殊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长期的后果，因为它不能为发展和加强积累能力开辟前景。

社会差别和社会保证也是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温床之一。人与人之间在满足需要的能力方面所形成的许多差别并不取决于劳动成果如何。某些经济行业的垄断地位，某些人在知识、情报、财产所有权的垄断地位等因素给现有的差别打上很明显的烙印（对分配也是如此）。估计还会继续出现巨大的差别。由于对当前产生差别的原因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解决这种差别的政策归根结底常常是直接缩小取决于劳动的个人收入的差别。在这个基础上，按劳动获取个人收入的刺激作用和推动作用就降低了，因而这个推动和鼓励整个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作用也就削弱了。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的人希望从劳动中得到更多的收入，但是，由于



任何一个靠劳动得来的个人收入都不能充分满足需要，于是个人劳动收入低的人就忧心忡忡。这种现象是下列情况的具体矛盾的反映，即感到通过劳动并不能充分地满足需要，限制性的和不容选择的税收政策；平均主义的倾向等等。

为在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创造条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解决这些条件，实际上也就是意味着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整个自治的经济制度的作用问题。但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这一目标，而是越来越远了。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缺少一个消除不断地破坏按劳分配的具体原因的坚定方针。

社会保证越来越成为冲突的一个方面。由于社会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劳动的影响，而是劳动以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因而使社会保证减少了。但是与经济不稳定有关的其它因素对此也有关系，现在，社会机制没有可靠的条件来充分地迅速地提高社会保证，就是说，社会保证是建立在能够预见到的并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指导的变革的基础上的。正因为社会自治机构没有能力指导变革，而变革又势在必行，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思想，即认为变革是得不到社会保证的根源，少搞变革就是可以增加保证。也就是说，以静止的观点对待社会保证，使改革进展缓慢，甚至限制改革。当然，这关系到整个发展，因为发展的内容也就是涉及到改革。社会保证的减少开始成为保持现状和反对改革的根据。因此，不久以前在改革中对于社会保证问题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因此，目前要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以便把社会保证的重要成分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制度的一个完整部分。

当前的制度以及当前教育领域中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冲

突越来越激化的根源。有许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只想指出几点。在我看来，这几点是极其重要的。首先，目前的教育制度不能充分合理地实现教育权利。从享受教育的广泛性来说，教育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事实是，最大的进步是在短时期内使所有的儿童享受了八年制教育。但是，中等教育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享受到，高等教育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能享受到。受教育培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才能决定的，而是受家庭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这就造成当前教育状况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之一，这种不平等是当前教育制度发展中的矛盾的一个方面。其次是，几代人之间的教育鸿沟扩大了。因为广泛的经济基础使青年一代受教育的可能性比现在年纪大的一代人受教育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目前一代的劳动人民在年青时代所受的教育很差，而且目前他们所受的补充教育也很差，条件也不一样。无论在教育经费，还是在学习的时间方面，目前一代的劳动人民和受到系统教育的年青一代人的情况都不同。事实上，这种状况使青年一代参加生活和劳动过程困难了，因为许多人不愿放弃工作岗位，尽管他们没有必要的技能。所有这些都使成年人和青年一代之间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最后，教育过程是脱离劳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劳动过程之外，或很少同劳动过程相联系，可是，人们在教育中要求首先做好劳动准备。因此，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不能令人满意，可是教育经费却在不断地增长。这就使整个发展造成不稳定。

领养老金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上面已经谈过了。按照实际收入，他们很难摆脱通货膨胀的处境。大多数人的养

养老金水平很低，从而使领养老金人的生活水平处于最低的边缘。因此，领养老金者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了改善领养老金者的经济地位的要求。与此同时，还提出缩短领养老金者的工龄的要求。这两种倾向意味着要求用补充财源来增加养老金的费用。归根结底是要求资金和物资的再分配有利于领养老金者。于是，劳动者和领养老金者之间的实际利益冲突就出现了。劳动者一代人（特别是年龄较大的人）对于缩短工龄感兴趣，但是同样又不准备为领养老金者保证拨出更多的费用，至于养老金和个人劳动之间的关系、养老金和过去的个人劳动收入没有联系，但和过去的个人劳动有联系，这些都是当前个人收入增长的刺激因素（因为这不仅仅是改善当前的生活，而且也为老年时的生活打下很好的经济基础）。由于生活费用增加而增加养老金，使领养老金者有了保障，而就业者并未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就在经济上产生不可接受的情况，这就是这几年来实际养老金的增长快于个人收入的增长的原因。

对于劳动者一代内部所存在的矛盾的各个因素就不去分析了。但是，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上述情况表明，一方面是劳动者一代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强了，另一方面是青年一代（正在受教育的一代）和老年的一代（他们已经不工作了）的利益矛盾也增加了。显然，目前已经确立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没有能力解决这一冲突，而这种冲突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都是存在的。

采用新技术是当前整个经济所必需的，而不只是个别的劳动组织和企业所必需的。但是，新技术的采用，绝不是意味着每个企业的现代化。从经济上合理地利用新工艺的前提

是，按照新工艺的要求进行新的生产（劳动）分工。同时也要求经济要有组织性和实现一体化（不是行政的一体化，而是经济技术和自治的一体化）。可是，在当前，这些都做得不够。它还要求重新组织生产过程和其它经济过程。因此，目前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革某些生产组织（企业）的生产方式，而是必须改变生产结构和生产分工，改变生产组织。这样大胆的设想要在长期内才能形成和实现。至于说到重大的改革，则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去实现。这样做的重要条件是制定一体化的发展方案，这个方案将在漫长的道路上为所有联合劳动组织经营结果合理化开辟前景。由于这样的方案还未制定出来，特别是由于还未制定出在联合劳动利益基础上的以协议为前提的发展方案，所以，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些联合劳动集团的迫切利益（短期利益）就占了统治地位，而这些集团的经济利益在关键时刻是各不相同的。事实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即经社会协商一致的长期发展计划，不仅能为劳动组织按照有关的决议和措施来努力预测未来的局势并在未来的社会劳动分配中占优势创造气氛，而且还提高其积极性。问题在于市场的正常活动。但是，如果这种方式长期内占统治地位的话，就要出现严重的亏损和造成许多问题：设备能力超过市场的需求能力、某些设备利用得不好、不能令人满意的工艺、投资期限长而昂贵等等。这些事实本身就排除了迅速而有效地采用最现代化工艺的可能性。由于南斯拉夫没有长期发展政策，结果，这几年来，这些问题都极明显地表现出来，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干预的范围扩大了，而自治的范围则缩小了。因此，为了把制定具有短期特点的发展

规划的政策同长期政策相结合，也就是说，把短期问题的解决同长期方针和长期的合理发展互相联系在一起，近两、三年来，各级组织在社会上做了巨大的努力。经过专门机关和科研机构的多年工作以后，在我国的发展中第一次通过了“一九八五年以前南斯拉夫长期发展统一政策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就能协调对发展的看法，对长期目标和完整的长期发展计划协商一致。

一九七四年初通过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新宪法。根据新宪法，我国的生产力将在自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方面，无论在建设方面，还是在自觉地掌握劳动过程和劳动过程的所有阶段中，联合劳动都占有中心的地位。因此，实际上就是为社会和经济进行重要的改革而创造了社会条件，通过这次改革将克服许多困难、问题和矛盾。

联系到经济中所出现的矛盾，我还想强调下列两个因素：

第一、在其它的劳动领域中没有充分地包括科学。关于科学，口头上谈论得很多（作为发展的因素来谈的），但是科学是完整的東西，在再生产过程中有它自己的地位，这是在今天已经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因素。

第二、劳动组织的情报水平和参予自治协议的人的情报水平，在当前的情况下是非常低的，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认为，前面所谈的某些问题是七十年代中期的发展所引起的矛盾的要点。而且这些矛盾对于当前经济和社会情况起着决定性作用。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任何拖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出路的。两年来，实际是两年多以来，在答

级社会范围内进行了统一的公开讨论。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各方面研究分析的对象，以便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开始解决这些矛盾。一九七六到一九八〇年的南斯拉夫社会计划就是这些矛盾解决过程的开端。但是，不应该产生错觉，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并很快就能解决的问题。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是发展本身带来的许多矛盾。因此，必须考虑到，随着一些矛盾的解决，又可能由于发展而产生新的矛盾。政策的任务应该是及时地采取措施以减少这些矛盾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良影响。

我认为在叙述现状时，无须列举全部因素。所以，这里不包括已经谈过的某些对当前发展处于优先地位和已经发生重大影响的某些因素。但是，这些已经谈到的因素，已经充分地指出了当前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因。如果对某些重点问题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重点问题的存在标志着我们已经走向“未来”（如新技术问题、经济的结构改革问题等）。但是，同样，我们还未脱离“过去”（例如，农业人口外流、文盲、地区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同一切现代社会的命运一样的，是同已经开始的未来所带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同过去的问题（不仅仅是不久前的问题，而且很多是老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经济、技术和社会观点来看，这也是当前十分复杂的因素之一。

## 第二章 当前经济和社会政策 方面的迫切问题

上面谈的意见为南斯拉夫经济非常成功地长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根据，但是，也指出了发展中的毛病。多年来这些毛病已经成堆。同样，长期来，在物质领域和社会关系中，在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之间，产生了许多客观矛盾，甚至在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情况下，这一切对当前的生活 and 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并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困难。近年来，可以说在执行最近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年）的整个阶段中，尽管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这些困难还是严重地存在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经济已经发展到成熟的经济阶段，当国家摆脱了历史上的经济和社会落后状态后，它本身就要寻求另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另外，自治制度也成熟了，它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即要求采取新的决定性步骤，以便进一步加强发展自治，把社会关系加强和提高到新的高质量的水平。所以，无论在经济或社会方面，在客观上，都面临着需要对社会关系作进一步深思熟虑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法。一九七四年的宪法提出了在自治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设想，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则在社会改革活动和发展政策方面，从政治上把这一设想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宪法提出了改革设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

大会则从政治上为进一步改革社会、改革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上层建筑铺平了道路，并将它具体化了。

下面我们将集中分析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看一看上述这些客观矛盾和主观上的缺点是如何影响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实质上就是根据一九七四年的宪法谈谈建设自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和新的五年计划的政策（同时谈谈上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也就是具体地谈谈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改革，谈谈根据宪法和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所提出的发展政策的变化。

### 第一节 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征

如上所述，上一个五年计划整个时期的特点是，明显地存在着不断增长的发展中的矛盾和社会矛盾。在前一章末尾谈到新的中期计划的目标和战略时，实质上就是讲有关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从目前的形势看，应该指出，即使在这个期间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发展中的困难还是存在的，它在整个时期都有所表现，特别是在近两、三年内，表现出急剧的通货膨胀，支付平衡中的赤字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增长趋势变化无常等等。因此，下面主要是讲上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两年（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的经济形势，以及当前（即新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情况。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显著变化，导致了这些年来矛盾成堆。也就是说，内部困难同外部困难缠在一起了。所以，对最近两、三年的分析，就要剖析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内部的矛盾和发展中的弱点是如何出现的。特别是因为这几年正在加紧



准备根据宪法和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进行的改革，从这个意义来说，对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经济发展情况的分析，就是剖析当前的经济因素。这几年是处在根据一九七四年的宪法由一个五年计划向另一个五年计划过渡，由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阶段。虽然，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但从发展的基本特征来看，这个时期却是与以前很不相同的时期。尽管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可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很大。

下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阶段的迫切的经济问题，并对近几个月和下一年南斯拉夫经济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作出估计。其次，还要谈几个特殊问题，即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目前对南斯拉夫经济发展的影响和长远影响。这就是稳定性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发展社会需要与经济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再谈谈现行的经济政策与长期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些问题，以及在自治基础上对经济制度的改革。

### 一、一九七四年：发展、逆差、很不稳定

一九七四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国内外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通过关于一九七四年政策原则的决议时考虑到了这些复杂情况。但应当指出的是，在通过上述决议时，无论在世界行情的变化方面，还是在价格变化方面，都只是部分地预感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一九七四年政策的目标无所不包——既包括在自治的基础上改革社会经济关系，也包括物质和社会发展，提高经营质量和克服物质结构的失调现象。在发展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目的是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的再生产能力。

实质上，目的是使进行再生产的联合劳动组织之间（尤其是生产领域内，还有生产、贸易、银行部门之间以及经济部门与社会部门之间）的劳动加速联合（在此基础上还要加速资金的联合）。在确定政策的其余任务时的出发点是：劳动联合的过程将进行得很快，而且通过这个过程，联合劳动将能更快地成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和发展政策的体现者，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方法、政策和政策体制的体现者。实际上，这个过程确实是按照这个方向进行的，并且在这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和完成并没有象一九七四年发展目标所设想的那样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指出，这些改革的速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还指出，作为一个目标，联合劳动组织这样的发展速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大部分政策目标赖以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被削弱了。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以及在物质基础的长期发展方面，成功的经营和困难的克服正是同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关系密切相关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国家的现行政策的影响在调节当前再生产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从整个经济和社会范围来看，联合劳动没有有组织地参加实现一九七四年政策的共同目标。在这样的国内条件下，为实现许多政策目标的斗争就大大削弱了。

决议确定的任务是，在稳定市场方面收到好的效果，并制止物价的飞速上涨。为此目的，制定了反通货膨胀的规划，这个规划要求采取适当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按照宪法所提出的改革来调整经济制度，使经济免受世界市场物价巨大变化的影响。这是使经济蓬勃发展的前提。

决议还提出了一些目标：提高经营效率，完善投资结构，更好和更有效地利用设备能力，大大增加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促进实现按劳分配原则，更快地发展不够发达的共和国（特别是科索沃自治省），从而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

由于从现行经济政策着想，所以，一九七四年决议所提出的目标是非常复杂和重要的。现行政策实现这些目标——本质上代表着我国发展的长期目标——的可能性显然要受到相对的限制。今天必须指出，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有些目标和任务都搞乱了，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发生了问题。国家支付平衡在恶化，物价出乎意料地飞速上涨，这些都迫切要求修改一些任务和平衡，并要求采取补充措施。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措施往往很晚才制定出来。

这样的政策必须在非常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情况下实现，而这种经济形势对国内情况又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的爆炸性增长，发达国家的形势恶化，造成在国际经济交流过程中加强对贸易的保护和限制。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同外国的现行经济关系，而且对我国内部情况也不可能没有影响。

一九七四年是在一九七三年取得良好成绩的情况下来到的，这首先是指由于解决了多年来加重经济负担的许多问题而使经济有了发展的趋势。一九七三年年底，解决了缺乏清偿能力的问题，通过扩大货币信贷政策来影响生产，转由共和国和自治省及联合劳动来调节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分配，鼓励加强投资活动，取得收支顺差等其它许多措施和因素，在经济和所有非经济部门的决策者中造成了乐观的气氛。但这种

气氛并没有能保证动员一切社会因素(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对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结果没有引起足够的和及时的注意,因此必须改变国内政策以便限制它的不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了一九七三年和前些年联邦在分配和消费领域中进行的调节和限制作用,但没有及时用新的社会调节的形式来代替它,甚至很晚才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而且这些协议既不迅速又不彻底。所有这些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因此,必须用所规定的目标来衡量一九七四年经济政策的业绩和错误,但又必须注意到造成这些业绩和错误的环境。

一九七四年生产取得了预期的和比较大的发展。社会实际总产品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九,而社会成分的经济甚至达到百分之九点六。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三,农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七点七,这些都大大高于一九七四年的预计数。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其它经济部门也或多或少地有所发展。在生产结构中,一个最积极的因素是农业产量的增加出乎意料之外,而且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整个食品生产。小麦收购量达到最高纪录,这就使得一九七四经济年度不必进口小麦,而且还建立了相当的储备。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工业中没有进行预期的结构改革,而且出现了一些不利的情况,如原定增加主要原料(尤其是主要金属)的产量未能实现;动力停留在一九七三年的水平等。

一九七四年的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增加了约百分之七点八,同时有集体消费稍快于个人消费的趋势。个人消费的增加是由于社会成分中的就业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就业者个人的

实际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五点六——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高百分之四点四。一九七四年兴建了十四万套住宅，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了约百分之四。总的来看，尽管存在困难和限制，这些成果都是按照一九七四年政策的目标实现的。

按实物量计算的出口增长约百分之五，按现行价格计算则增长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按实物量计算的进口增长为百分之十三左右，按现行价格计算则增长百分之十二。从生产的实际增长高于原计划这一点来看，进口的减少还不太多，但出口却是大大减少了。在对外贸易价格关系不断变化的情况下，随着进出口的变化，收支差额中出现了高达约十亿美元的逆差，而一九七四年所规定的政策只允许有适度的逆差。这样，一九七四年政策所规定的范围和目标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并未实现，不仅如此，这一年的形势还急剧恶化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至九月的定期统计资料表明，经济的再生产能力是加强的。但是根据同样的资料，尽管共和国和自治省在下半年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由于承担了法定的义务，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并未解决。

总的看来，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社会产品的增长约为百分之十一，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这是很好的。但不好的情况是，在这些地区的投资的增长却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些投资在全国经济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这说明在一九七四年就预示着 一九七五年可能的不祥之兆。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国一九七四年发展的主要的和全面的指标。已取得的成果肯定是重要的，尽管不是所有领域都达到预期

的结果。这些成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在对国内许多发展有不利影响的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取得的。对取得的成绩不应高估，也不应低估。但必须指出，在这种迅速发展和许多积极成果的后面掩盖着许多不良的物质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这些限制了成果的作用，并说明这些成果是不稳定的，而且在社会经济环境和物质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是不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特别注意这些成果得以实现的条件和环境，而且对出现的问题必须加以分析和评价。

必须指出，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趋势是一九七四年的头号问题，但制止物价飞涨趋势的任务未能完成。不仅如此，一九七四年物价飞速上涨仍然十分明显。

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一个内部的问题，因为甚至在爆发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之前，我国的通货膨胀（以零售价格的上涨来计算）就高于欧洲其它国家：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一年期间高三倍，一九七二年高二点六倍，而一九七三年高二点三倍。在制定反通货膨胀规划时也是从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国内问题这一点出发的。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大量侵吞剩余劳动的社会关系的特殊反映，也是整个收入和收入开支尚未置于联合劳动监督之下的这种情况的反映。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来把过多的拨款用于消费；资金利用不合理（不仅在非经济领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预支；生产力的发展不符合在联合劳动的利益和协议基础上商定的发展政策；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合理，从而物力和人力资源利用得也不合理。生产成本很高，经济对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而生产力的不合理发展并不能满足出口竞争的需要。这样，问

题不仅在于经济对进口的依赖很大，而且在于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构和效能在世界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既不能使经济适应国外市场的竞争，也不能保证必需的外汇。我国与欧洲发达国家之间通货膨胀差距缩小的趋势，部分原因是近年来国内努力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现行政策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通货膨胀的一些根源受到了限制。差距的缩小也是欧洲国家通货膨胀加快的结果。当一九七四年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加剧时，国内的这些弱点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国内的这种弱点削弱了经济对世界上产生的动荡的抵抗力，而外部的动荡在一九七四年是特别大的。一九七四年进口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出口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二。研究的资料说明，在一九七四年生产结构的情况下，进口价格每上涨百分之一，就促使本国物价上涨百分之零点三。因此很明显，只要比较多地参加国际商品交换，国内物价就有上涨的趋势（进口物价或出口物价）。这些价格的上涨影响着本国价格的变化。

鉴于进出口价格关系中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本国的部分收入通过外贸流到国外，进出口价格的重大变化要求国内再生产过程有效地适应这种情况，首先是要求消费适应这种情况。但是，国内消费并没有及时地适应这些变化，这部分是因为对快速反应不够敏锐，部分也是由于没有及时地实现所商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在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各种形式的消费的增加大大超过了应有的收入和资金的增加，直到下半年才开始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商品货币平衡已经受到破坏，只能部分地防止国外价格的上涨对生产成本和物价的打击。流通税、关税和经济政策的其它手段也没有满意地

被用来缓冲这些打击，因为用这些工具来缓冲国外价格的影响，必然意味着放弃各级水平的消费。而对放弃（消费）显然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充分地了解到国际贸易中的新关系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它要求国内对变化着的国际经济环境能够适应。在这些条件下，在拥有收入范围内的国内各种消费形式的出现，胡乱地从收入中消耗资金，再加上外部的刺激，最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速上涨。一九七四年的消费，首先是非生产性消费有超过经济效率所能达到的水平的趋势。但是，没有充分地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消费上（这是物质消费领域和积累消耗领域创造收入的因素）。消费的不合理性在各个领域内，即无论在非生产领域，还是在生产领域内都是存在的（现在还存在）。人们往往知道非生产领域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教育和卫生保健中的不合理制度和消费等。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由于设备利用不合理和利用不高及原材料昂贵和消耗高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过高，以及把大量积累储备起来或投到经济上不合算的设备上等等积累使用不合理的情况。此外，还存在有通货膨胀。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原则上所有人都反对通货膨胀，但实际上经受通货膨胀可能比作出具体决定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些决定要改变人们的计划和志向，要求更高的劳动效率和更好的组织工作等等。因此，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就必然导致支付平衡中赤字增加。

虽然，由于现在南斯拉夫参加国际分工的水平和性质，国外价格这样迅速的变化使它不能有充分喘息的机会，不过，要是能及时地把各级消费限制在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形势所要求的范围内，至少还是可以稍微缓缓气的。这就要求具



体地和有选择地限制消费，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了这种限制，因为当时物价的影响已经表现出来了。

一九七四年（以及后来的）反通货膨胀规划中未完成的绝大多数任务，都与对整个发展十分重要的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协议有关系。这就要求把恰当的积累转而用于发展能够加速改变经济结构进程的那些部门，这也就能更好地防止外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农业和电力以外，其它部门都未能就发展政策达成协议，这是有各种不同原因的，虽然每一个部门都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基本问题还是出在有关分工的协议上，特别是在为发展这些部门而保证必需的资金这个问题上。即使在已签订协议的那些地方，在实现资金方面也会出现严重困难。这种局面产生于经济的客观状况，但也是由于业务银行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共同体机构对扩大再生产过程仍然有着过分的影响；由于现在的生产力结构使许多部门和联合劳动组织在再生产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竞争而不是协作（特别是在加工部门）；由于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相脱离；由于贸易和银行的独立性等等原因。改变经济结构，就要求对动力、原料和粮食生产以及交通干线大大增加投资，为此就需要庞大的资金，但这些部门却没有这些资金。整个经济的积累率比较低，尤其是经济部门的积累在整个积累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因此，积累的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不成比例的。这样一来，在各部门协商提供发展资金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困难。这也是造成各行业几乎毫无例外地努力通过提高物价来保证资金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制度本身（过分受国家控制）更多

地是支持物价上涨，而不是限制上涨。价格制度过去没有，现在也不符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要求：价格政策的体现者将是联合劳动，价格是按照商定的发展政策制定出来的，而这种政策的依据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和协议。诚然，在一九七四年，有关价格的调节职能的大部分工作已转给南斯拉夫经济协会所属的生产者联合会，但由于没有共同的发展规划，没有真正的劳动联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资金联合，因此它们不仅不可能自治地确定价格，就连有效地独立地确定价格也不可能。价格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是不能同整个扩大再生产制度和发展政策分开的，但是当时的情况却是孤立地自作主张地确定价格，这就必然导致价格制度本身也成了通货膨胀的因素。

必须指出，价格变化的本身不仅包含着国外价格的上涨自发地转嫁到国内价格上来，而且也包括有意识地改变价格以利于动力、原料和食品生产，这是改变国家生产结构的重大前提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提高就其效果来说不同于那种由于承认市场的自发性而提高价格。价格仍然在作为实现改变物质结构的条件的工具之一使用，这在一些部门（例如农业）已取得成果或将取得成果，但是，如果这个工具被利用得过分了，那么，这个改变价格关系的自觉政策就有被价格普遍上涨的自发势力破坏的危险。

这里不能详细谈高度通货膨胀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联系。通货膨胀是生产力结构、自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之间矛盾的表现，外部影响只不过是使通货膨胀更严重和更快地发展罢了。通货膨胀破坏按劳分配，助长平均主义，缩小经济决定的实际作用，使劳动联合

和资金联合的速度放慢，使得就发展政策达成协议更加困难，削弱经济和社会保险，加深物质生产与其它社会部门之间的对立，加重经济关系的困难等等。尽管出现这些不良情况，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可能还有另外的一方面。下面将多谈谈这一方面。

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实现的蓬勃发展，毫无疑问是积极的。但如果不加选择，不提高经营效率，降低各种成本和节约，发展本身就不可能自动地收到缓和物价上涨的良好效果。一九七四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年已达成协议的那部分发展政策目标没有实现，当然这里指的是发展的战略目标。因为在降低成本和节约方面作得不够，也没有创造条件使联合劳动成为现行政策的体现者。简言之，在特别复杂的情况下，无论是用于经济部门的积累资金的投放，还是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都没有很大变化。为了真正做到改变这种关系，真正认识到必须使关系发生变化的现实情况，就必须动员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以及我国社会中作决定的一切因素和体现者。这样的气氛没有造成，或者充其量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才形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价格关系波动和出口条件不佳，一九七四年必然会出现巨额的收支逆差。我认为，出现如此规模的逆差首先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由于外贸价格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损失。仅仅石油价格的差额所造成的损失就达六亿美元。

第二，由于进口国（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国家）限制进口而减少了一些大宗商品的出口。

第三，由于把外汇储备部分地转换为商品储备，这大约

有三亿美元。

这个逆差是用减少可兑换的外汇储备和增加清算外汇的债务来弥补（约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用增加对外的债务来弥补。一九七四年年底所欠外国的债务比一九七三年年底增加了约百分之八（一九七四年年底的外汇储备约十二亿美元，保证了国家的对外清偿能力）。

应该指出，一九七四年，除了有巨大的收支逆差以外，更令人不安的是进出口变化的趋势。一九七四年全年出口的商品只能弥补全部进口商品的百分之五十三。出口萎缩不振，下半年更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外市场的行情越来越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本国较高的消费和本国的物价高昂，因而刺激了在本国市场而不是在国外市场的销售量。同时，与出口相比，进口则有缓慢下降的趋势，同出口很不协调。在同国外商品交换的价格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加强了收支逆差的趋势。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用外国的补充资金就不能补偿了，因为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有导致国家丧失对外清偿能力的危险。因此，七月份联邦执行委员会进行了干预，以便采取措施刺激出口并对进口作某些限制。由人民银行执行的这种干预就是使第纳尔以百分之五的幅度实行浮动，到十月底，还把第纳尔浮动的最大幅度提高到百分之七，这样就从经济上进一步加强了出口能力，使进口价格提高，同时也使那种想通过收入再分配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这种干预的要求不再有所发展。此外，还采取了一系列补充措施，以减慢进口，把进口同外汇收入协调起来，并鼓励出口。还在经济政策的其它方面确定行动方向，以便使建立起来的全国货币平衡得到保证。十分明显，中心问题是为增加

出口创造条件，同时分别轻重缓急地进口。当然从南斯拉夫经济的开放性这个意义来说，这样做过去和现在都并不是意味着放弃放宽限制的方针，而是只有在收支逆差所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实现这种开放性。

南斯拉夫的经济规模是比较小的。它在经济上必须是开放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扩大市场的可能性并利用市场带来的好处来发展经济。我国自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对外政策的性质本身也要求这样的开放性。但这显然不能同出口的自发性，同已经形成的只对一部分联合劳动组织，甚至只对一部分外贸网或个别劳动组织有利的关系相提并论。没有及时地就如何合理使用所拥有的进口资金问题达成协议，进口了许多实际上不是生产或生活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尽管有出口能力，但努力弥补进口的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认为国家能无限制进口的想法还继续存在。这就滋长了那种认为在节约、合理消费和合理进口方面无所作为的气氛。虽然世界的现实情况和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有了重大变化（实际上是恶化了），这要求把它反映在国家的内部发展中，但在（生产和非生产的）消费中作法并没有改变。

在用这个方法评价一九七四年发展的不良情况时，也不能低估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在谈到上述物质和社会的不良情况时，必须考虑到现实的情况。联合劳动能够彻底地和成功地制止这些不利趋势，特别是制止通货膨胀。联合劳动虽然是按照宪法修正案开始建立的，但实际上是通过新宪法和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才开始加紧组织的。但联合劳动的建立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展开的，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某些生产部门相互联系不够，表现在生产力结构方面，一部分联

合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关系而不是协作关系，因此现阶段出现了利益上的很大分歧和客观上的很大矛盾。联合劳动是在缺乏协商一致的长期发展的政策条件下，是在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宪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体现者，联合劳动的彻底实现（劳动与资金的联合过程）是一个在许多细节上还未被认识的新东西。当然，在这些情况中必须考虑到循序渐进，还要考虑到困难。这里还必须补充的，就是国际形势恶化了，而这种恶化了的国际形势又使内部问题复杂化。因此，在对现状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表示不满时，不能对发生这一切变化的复杂情况，对利益上存在的重大矛盾和分歧，对这条道路上许多陌生的东西不闻不问。

最后，联系到实现一九七四年政策的情况，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国内形势尤其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这些成绩并不稳定，因为无论在根据新宪法发展生产关系方面，还是在生产力结构方面都没有达到决定性的转折。这样，由此出现的矛盾就依然存在。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是长期的事情，但必须指出，一九七四年并没有向改变社会经济关系和改变生产力结构的方向迈出令人满意的步伐。

因此，一九七四年向一九七五年过渡时的发展条件比一九七三年向一九七四年过渡时的条件更不利，也复杂得多。也就是说，一九七三年年底国内外的形势曾经还是令人满意的，但一九七四年有增无减的通货膨胀使本国的形势恶化，它不可能象一九七三年和向一九七四年过渡时那样蓬勃发展。同时，同我国有许多经济联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形势看来也很糟糕，这就必然影响到我国对这些国家扩大出口的可

能性。在对外贸易中，尽管考虑了进出口价格的平稳和均衡增长，但是一九七四年因价格变化而出现的逆差仍然存在，同样也加重了一九七五年的困难。因此，收支平衡也成了决定一九七五年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可能的重要因素。一九七四年的部分收支逆差是用减少外汇储备来弥补的，而一九七五年再也不能指望这种办法了。一九七五年的逆差只能用借债的办法来弥补，当然借债的数量必须保持在严格控制的范围内。总的来看，世界的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这就不仅要求要谨慎小心，而且在制定发展政策时要考虑这个国际因素。一九七四年的通货膨胀对一九七五年物价的影响比一九七四年物价的影响大。最后还有，由于电力相应不足而产生了限制，这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一些地区表现得尤其严重。

因此，一九七五年政策的重点必须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新宪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决议，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彻底的自治改造，不要期望自治经济制度的各种因素以及共同的长期和中期发展政策会在新的基础上自己形成；

第二，制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保证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不超过一九七四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缓和了一九七五年的物价上涨；

第三，保证维持现在的对外清偿能力，减少收支逆差，加强出口，并实行这样的向外借债政策，即保证使借来的资金首先用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变南斯拉夫经济结构。

这就是说，任务同一九七四年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必须在更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实现。

这就需要继续促进发展，但要选择能保证实现上述目标的物质前提的结构，这也需要为物质生产部门实行更多的劳动鼓励，为更好地节约劳动和资金，为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全面节约和合理消费创造条件。需要使国家收支保持平衡；要通过总的发展政策，而尤其是要通过对外经济关系的措施来影响迅速增加出口、外汇收入和非贸易收入；而且要把进口有选择地缩减到收支平衡状况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后，这些任务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有社会因素是否赞成使联合劳动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其它复合劳动联合会、利益共同体和整个经济中以各种形式直接参加争取经济和社会重大改革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也还需要寻求过渡性的办法。

## 二、一九七五年：经济中不良倾向的制止

上面我们说明了一九七五年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基本特征、一九七五年完成任务的情况和当时对一九七六年发展的可能性所作的估计。我想指出，如果想了解所分析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动态所处的情况，就应当重新研究和评价经济和社会中的一切现象。这样，在生产力结构中、生产关系制度——经济制度中以及在我国和世界目前的经济变化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既解决了目前经济政策的课题，也解决了只能在较长时期内解决的长期性问题。

应该指出，一九七五年对解决所有的长期问题都作出了很大努力。这样，一九七五年年底才可能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一九八五年前南斯拉夫长期发展政策的原则。同时，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联邦共和国议会还对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南斯拉夫发展的社会计划的协议草案进行了审议。同样，按照新宪法协调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法令也大部分处于紧张的制订阶段，或者在议会和其它机构进行讨论。这期间还在着手准备总的稳定性纲领这一非常重要的工作，以后无论在一九七六年的经济政策中，还是在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南斯拉夫社会计划的发展政策中都采用了稳定性纲领所规定的准则和解决办法。稳定性纲领在制定经济制度的工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一九七六年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发展目标，前面已经谈过。

现在可以说，在确定一九七五年的发展目标时所依据的许多推测并不是很现实的。这同样涉及到对进行必要的国内改革准则和对世界的经济动态的推测。对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的发展可能性所作的估计实际上是不够现实的（前些年用这种推测方法是有效的，用同样的方法来推测一九七六年就不行了），应该从这个事实中吸取相应的教训。问题在于对形势估计错误，而且在于对社会关系和物质结构改革的速度作了不令人满意的估计，因为这样估计出来的速度是脱离社会关系和物质结构的变革的。何况总是用这些估计来检验短期计划的情报基础和办法，而且同样还用来作为协商和作出决定的方法。

在自治的基础上，对经济的组织工作进行得比预计的缓慢。因而对再生产整体的统一计划工作进行得也比较缓慢，至于真正的社会改革则刚刚开始。

生产结构和投资结构中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变革。一些指标和资料说明，在那些没有条件进一步扩充并使经济更加

依赖进口的加工部门中还在继续兴建新的工厂和车间，但却忽视发展能代替进口或加强出口能力的原料和其它部门。例如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的现象就是如此。这一年对纺织工业的投资只比对黑色冶金工业的投资略少一点，但却几乎比对石油工业的投资多百分之九十或比对煤炭工业的投资多将近二点五倍。这说明在共同制定的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劳动和资金联合的体制还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许多障碍克服得很慢，首先是使社会积累日益地区化，从而使再生产过程中在收入上联系在一起联合劳动组织的相互联系很难进行。提高经营效率的最佳成果不能只是通过提高某些联合劳动组织的生产率和经营效率来实现（尽管这特别重要），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利用整个经济的能力去创造总的经济条件来实现的。因此值得指出的是，必须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自治的基础上进行这场改变生产结构的斗争。当然，必须现实地对待这个过程的发展速度，因为问题在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物质变革显然既不能毫不费力地、也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根据我的判断，关于短期发展预测的这个现实性，没有充分地估计到。

一九七五年的国际形势实际上也恶化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在缓慢上升。就整个来说，这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显著缩减，大量限制进口和压低南斯拉夫传统出口的一些原料和半成品的价格。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社会产品没有按预期的规模增加，相反却大大缩小了生产的实际规模，而进口的规模甚至缩减了百分之十三。这样一来，在南斯拉夫多年来把进出口高度集中在西欧国家的这种经济结构条件下，我国内部的发展不能不受到打

击。

一九七五年初，经济还在继续增长，这主要是一九七四年的趋势影响所致。但是不出所料，后来就出现了生产发展的下降。实际上，对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延缓作用的因素在一九七四年，特别是在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起作用。出口减少和本国通货膨胀率特别高，是限制销售能力从而限制生产能力的两个重要因素。工业生产对国内外市场上销售情况的变化适应得比较慢，因此出现了工业产品的库存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后来开始影响到工业生产速度减慢，并导致一些停滞趋势的出现。这样，一九七五年的工业生产只增长了百分之六。

农业生产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秋季的气候情况很糟，春季、播种期以及小麦收割期的气候情况也不怎么好，而且畜牧业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因此一九七五年的产量比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约百分之三。由于畜产品在出口和国内销售方面都有困难，畜牧业生产中的问题尤为突出。生产成本很高，因而物价水平也很高，肉类在本国市场上没有满意的销路，而出口市场（至少是西欧）仍然是关闭的。

其它部门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一九七五年实际社会产值只增长了大约百分之三。

一九七五年的就业人数增加得特别快。尽管生产增长有减低的迹象，尤其是后几个月，在一些部门还有停滞的趋势，但就业人数的增长却高达百分之五。从就业来说，这是好的趋势，但它也有其另外的一面——不利的一面。问题就在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大，经营涣散，对劳动时间和整个人因素利用不合理。一九七五年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百分之

一,而且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还有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的经营效率降低了,而经营效率应当说是经济的再生生产能力的基础,这就使增加个人实际收入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没有掌握很多能评价就业结构的资料。但是有一些指标说明,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不良倾向的,如非熟练干部大量就业,各行政部门、经济和非经济组织的非生产人员就业过多等。这样的就业规模和结构将来可能为经济收入及其再生产能力造成困难。

一九七五年就业者的个人实际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略有减少,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就业者尤其是这样。原因还是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大,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扩大就业;拨出大量收入用于非经济部门的费用;生活费用增长得非常快;许多经济部门的收入跟不上生活费用的增长等。

在对外贸易方面,必须指出一九七五年的出口条件特别困难。一九七四年出口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一九七五年这一趋势显然仍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对进口的放任制度造成一九七四年进口日益剧增。一九七五年最初几个月还在继续扩大,结果使外贸逆差增加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外贸逆差比一九七四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在通过经济内部达成协议来保证进出口之间关系平衡的尝试失败以后,这就需要在这方面进行干预,把一部分商品用于弥补进口并使进口政策服从于扩大出口的任务。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从而大大减少一九七五年下半年的外贸逆差。

出口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同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出口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七五年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急剧减少。这

首先是由于这些国家因经济衰退而减少进口的结果，而特别是由于南斯拉夫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中所处的地位不利。但是，这种不利形势是我们没有把进口活动同出口能力很好地协调起来的结果。

与此相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却大量增加。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南斯拉夫对外贸易的地区结构就是以这种方式改变着。这里必须指出，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实际经济能力还未被完全利用。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成了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国商品的越来越大的购买者，但我们没有保证对这些国家的满意出口，尽管它们的进口潜力有了很大的增加。在一九七五年石油出口国组织国家的全部进口中，南斯拉夫只占约百分之零点八。我们相信，通过更有组织的行动肯定能在这些市场上取得更多的成果。

因此，中心问题是为增加出口创造条件。这首先就需要不断加强南斯拉夫经济的竞争能力，而这是同缓和和降低一些经济部门的价格上涨，解除经济负担，加强经济的再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以及同改革经济结构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经济结构是为了适应新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又要求相应的产品和更有组织的行动。当然，除了出口者努力占据新的市场和增加出口以外，这还要求不仅是联邦而且是一切社会共同体给以推动和帮助。

由于采取了措施，一九七五年最后几个月的实际进口减少了，同时出口更加协调了。总的来说，一九七五年年底原料进口占支配地位，并不是生产缓慢的原因。那些最不依赖进口的行业的生产大大下降了。一九七五年年底进口的原料

仍然高于通常的水平，它所造成的库存的原料够工业生产用一点八个月。

基本上可以说，下半年制止了收支逆差的增长并使收支状况开始大大好转。

关于价格的变化，应该指出，与签订一九七五年价格政策的契约时相比，在条件上和时间上，国内外形势都有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重大特点是出口和国内需求萎缩不振，它再也不能采取提高大量商品价格的办法了。实际上，一九七五年价格政策的社会契约为提高价格（这是附加收入的来源）大开了绿灯，许多经济组织和非经济组织都利用它来满足各自的需要。当这种价格显然维持不住的时候，在一切政治因素的充分支持下，所有政治共同体（包括联邦），与一部分联合劳动组织合作和协商，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缓和并制止价格的上升趋势。尽管这些措施中有些在实行方法是行政措施，实际上它们有许多经济的合理性，因为价格政策必须适应变化了的发展趋势。

一九七五年工业品的生产者价格的增长比前一年缓慢了。一九七五年内工业品的生产者价格比原计划增长约低四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这一年工业品价格的增长率比一九七四年低百分之六十。

零售价格和生活费用的增长也低于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的价格增长比一九七四年缓慢，这是一个重要的积极成果，也是一九七六年进一步减缓价格增长的重要因素。农产品和食品部门用补贴和跌价的办法缓和了零售价格的~~增长~~，这样就避免或减少了某些产品的提价，如面包、面

粉、糖、肉、食油等，这对扩大食品的销售也有良好的影响。

在工业品的价格方面，通过降低一些销售困难产品的流通税来进行适当的干预，这样就降低了价格。从而也使一九七五年后几个月的库存积压减少了，销路改善了，同时也为增加生产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但是，另一方面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却上涨得特别快，这就使前面所说的一些产品的积极效果化为乌有，从而使花在食品方面的生活费用大大提高了。价格比原计划大大提高的另一个部门是服务行业。这些价格的增长与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不协调的现象表明，那些决定价格的人并没有采用令人满意的手段，仍然很少去努力改变这种倾向。

大家已经看到，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价格增长的减缓并不是建立在十分牢固和稳定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价格的降低并不是通过大大改变生产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经营效率（这些才是长期稳定的办法）所达到的。但更重要的是，一切结构和经济本身都已认识到，无论是本国市场还是国外市场不是任何一种价格、任何一种生产消耗、任何一种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都承认的，也认识到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从而从整体上改变对经营效率的态度。凡是经营不善、因而商品在国内和出口中销售不出去，或者使国家的支付平衡发生困难、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不能满足需要的生产，是不能靠价格政策和其它措施来维持下去的。按以前的价格不能推销自己产品的生产者因此而大量增加库存，并保存着这些经济上完全不可接受的库存量，它们指望继续提高物价来解决财政困难，或打算通过市场把自己的问题转嫁

于整个南斯拉夫经济，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

当然现在还要进一步提出减轻经济负担的问题。根据多年的经验，从讨论一九七五年政策一开始就要求保证一般消费和共同消费的增长比社会产品的增长低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实际上这也就是要求在经济处于很复杂的情况下减轻其经济负担，从而为改变经济结构和协调价格等开辟了广阔的经济前景。因此，这种要求的目的并不是借此限制那些客观上适应目前生产率和经营效率水平的需要和可能的社会消费。十分清楚，社会消费领域对人们的生活，对满足他们的需要和经济本身的发展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即在南斯拉夫经济结构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对经济与社会部门间的关系作重大改革初期，应该用适当的形式为减轻经济负担保证留有余地，以便能使这一任务得以完成。但是应当说，关于减轻一九七五年经济负担的契约没有得到实现。

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的清偿能力和经济的财政状况问题。一九七五年的结算资料说明，在过去一年里，南斯拉夫经济的财政状况是不好的。无论是在支配部分国民收入方面，还是在清偿能力和增加亏损方面，由于承担法律的和协议的义务而使困难增加了，财政状况也恶化了。一九七五年最后几个月清偿能力的情况稍许有所好转，但是这个短时间的好转首先是由于扩大了某些财政贷款的结果。

经济中的亏损很多。不过，一九七五年的亏损比一九七四年缓和一些，因为财政状况的明显好转影响到收入的变化，而联合劳动组织出现了亏损。

关于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发展问题，应该说一九七五年搞得不怎么好，这一点根据一九七四



年投资的情况就已预料到了。经济上不够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率低于发达的共和国和自治省。具体来说，主要是黑山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比较落后；但科索沃自治省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生产增长率却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就业人数的增长几乎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四分之一。对经济不够发达地区的投资比对发达地区的投资增加得慢，这种倾向还在继续。

一九七五年内出现的国内消费的严重问题，不仅属于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而且也是生产不断发展的重要前提。个人的实际收入比一九七四年约下降百分之一，实际上一九七五年整个个人消费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大了就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方面的不良情况。扩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加共同消费来实现的。这可能被认为是积极的因素，因为这种方法不会使经济、首先不会使利益共同体所承担的各种负担增加。增加国内消费的问题肯定是生活水平和生产的重要问题。凡是建立在实际收入的基础上和符合社会上商定的收入政策的消费，必须得到积极的支持。然而，对大部分就业者来说，目前的物价水平与他们通过自己的生产和市场所承认的收入的购买力是不相称的。

因此，一九七五年我们是处在一个转折点，把争取更多收入的努力同争取缓和和降低物价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通过这个基本途径解决增加生产、增加国内外销售以及卓有成效地经营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现在一九七六年的迫切问题。通过提高名义收入，并且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提高物价暂时解决在这方面出现的矛盾，这个事实和打算是不能容忍的。用这种方法也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因为导致这些矛盾

的基本问题——生产率很低、生产中亏损很多、收入支配不适当、生产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投资决议和方法不恰当——用这种方法也解决不了。如果采取坚定的立场，即通过提高生产率、提高效率、改变生产结构等来解决提高各级消费水平的问题，那么，只有在物价平稳、物价水平切合实际和提高第纳尔的购买力的情况下，上述矛盾才可能解决。这也是在实际经营效果的基础上而不是通过提高物价来提高对生产的关心和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前提。

必须坚定地执行这一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在这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为稳定地和持久地提高生活水平创造条件。这种有目的的努力还必须同适当的劳动纪律、合理的和有组织的活动等密切结合起来。

当对保健和其它重要部门的劳动条件花去大量资金的时候，在利用人力方面却出现了巨大的和不能允许的损失。生病的总人数超出了所允许的范围，由于疾病造成的损失也超出了允许的范围。这样，我们就处于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保健费用很大，而另一方面，由于疾病和缺勤造成大量亏损和需要大量开支。

我们必须指出，劳动纪律松弛了，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把所有这些问题公开列入议事日程并寻求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经营效率、提高生活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使生产健康地发展的重要经济前提。

尽管在某些部门有一些不良情况，但从全面来看，特别在考虑到整个国际经济状况时，可以说一九七五年还是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成功的一年。这一年实现了决议所提出的两项

重要任务：（1）缓和物价的上涨，（2）收支逆差比一九七四年减少。任何时候都保证了国家的对外清偿能力。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基本上得到了保证，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大量增加就业实现的。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同时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对生产力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产生的矛盾在一九七五年最后几个月导致了不良倾向的加强，这些不良倾向对生产增长缓慢影响最大，在一些行业出现了停滞的趋势，缺乏清偿能力的因素也加强了等等。

生产力结构中多年来存在的矛盾，在高度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长期保持经济发展，以及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不够理想，这一切在一九七五年——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的一年——必然导致经营效果的质量降低，这也是一九七五年经济形势的最大弱点。

因此，一九七五年年底和向一九七六年过渡时的形势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在从一九七五年向一九七六年过渡的那几个月里，经济发展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在制定一九七六年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首先，应该看到有利的情况：一九七五年下半年物价的上涨缓慢了，而且转嫁到一九七六年来的提高物价水平的恶果比一九七四年要小得多。尽管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出现了各种困难，进入一九七六年时经济的对外清偿能力还是比较好，原料和半成品的储备，以及其它潜在因素都比较令人满意，这些保证能得到适当的发展。不利的情况是：一九七五年年底出口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而且某些工业部门生产的不良倾向也在继续。必须把国际经济形势考虑到一九七六年每一个发展方案中去，

因为南斯拉夫经济高度地参加了国际分工，不可能免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当然，我国发展的情况如何还取决于下面这些政策的成果与否，这就是：稳定政策；保持国内平衡；从经济上健康地刺激国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上有力地推动生产，尤其是推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简言之，向一九七六年过渡时的形势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非常矛盾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相应地扩大出口，以便保证为发展生产所必需的进口的外汇资金，那么，我国现行的经济结构就会阻碍发展。这样，就必须为一九七六年的发展创造最好的条件。

在一九七五年的基础上，根据一九七五年向一九七六年过渡时的形势和条件，首要的任务是努力稳定经济，加强本国货币的价值，有力地加强本国需求以及为加强南斯拉夫经济在出口中的竞争能力而斗争，而且要通过这些来建立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因素的本国需求和出口需求。必须保证适当的经济发展，以便能满意地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实行经济稳定政策，适当地发展和进行结构改革（这些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达到），才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其它目标，首先是保证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尤其是保证就业者的个人收入），比一九七五年更成功地发展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从广义上讲，稳定是整个经济全面发展的前提，但是，它同样也是为实施新的经济制度和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南斯拉夫社会计划协议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的前提，这个计划应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制定出来。经济本身也有理由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经营条件。但是应该指出，经营条件的稳定性如何不仅仅是主观问题，而且也是国内外客观形势问题。保持经营条件的稳定性不能只依靠国家的活动，因为创造

稳定的经营条件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本身。例如，通过更好地组织经济和要求经济为相互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承担直接的责任，就能够而且必将大大减少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内部发展的影响，为经济的稳定和经济的质变而创造有效的和稳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进程的速度快慢。

### **三、一九七六年：在更加稳定和减少收支逆差的同时，生产逐步复苏**

一九七五年年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及时地通过了关于一九七六年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政策决议，使经济政策的所有体现者在一九七六年年初把自己的活动方针放在实现决议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上。

一九七六年共同商定的发展目标对于所有的经济政策的体现者来说，任务是非常繁重的。这些任务首先是实现经济稳定政策，进而能更快地和适当地发展生产力和加强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这也意味着保证继续加强一九七五年物价变化中的积极趋势，减慢生产者价格和零售价格的上涨，从而也减慢生活费用的上涨。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结构，决议规定的目标是：增长的情况如何是由改变经营工作的质量和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改革的质量决定的。

现行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的任务，实质上是保证国家的对外清偿能力并防止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因此，决议明确强调了这样的政策，即在实行谨慎的消费和进口政策（目的在于满足有组织的经济需要）的同时，采取措施以便为取得最好效果创造条件，用这样的措施来支持发展

生产和出口。决议要求建立能保证加强经济的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收入及其分配政策、税收政策、物价政策、货币信贷政策、满足一般和共同需要的政策——其方针都必须是能够而且促进缓和通货膨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经营效率。

决议还为一九七六年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更快地发展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尤其是科索沃自治省，以及继续为缩小它们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创造条件。最后，决议提出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立法活动和基本上完成社会经济制度同宪法的协调工作，并订出新的五年计划。

显然，一九七六年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都面临着大量的和复杂的任务。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趋势都反映了整个经济和社会进行的深刻社会改革。

众所周知，一九七五年年中在实现物价政策、对外经济关系政策方面和在其经济领域内，采取了许多旨在制止或大大限制不良的发展倾向的措施，总的来说，这些不良倾向反映在消费高于实际可能、通货膨胀很高和日益扩大的巨额收支逆差。如上所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这些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然，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联合劳动组织或整个经济都为经济状况好转作出了努力。如果没有整个代表制度以及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支持，尤其是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者联盟、社会主义联盟和工会联盟的积极作用和支持，就不可能出现这一年下半年的积极变化。由于共同参加制止了不良倾向，从而出现物价明显的平稳，而一九七五年年底出口增加，进口与国家的支付能力相比更加协调，贸易逆差和收支逆差大大减少。

现在还在实施的一九七五年所采取的措施，有时在执行

方式上表现为行政性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和伟大的社会意义。这里所指出的就是必须把消费限制在可能的范围内，把进口限制在国家的支付能力范围内，减少对提高物价的不正当压力，加强南斯拉夫的竞争能力和国际经济地位，以便加强它的出口，从而就加强了进口能力。这是正常进行再生产的重要前提，也是为越来越全面地掌握全部收入和再生产的联合劳动创造条件的重要前提。如果在这些对经济和社会都非常重要的领域内让自发势力横行无阻，这不仅意味着可能恶化目前的经济局势，而且缩小了按照宪法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范围。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这些措施的积极效果表现得更加显著，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详细谈。但在这个总结性的分析中应该指出，物价上涨很平稳，出口尤其是对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出口大大增加，进口更加适应整个经济的支付能力，这样，用出口商品的收入补偿进口的程度就提高了，顺差代替了逆差，还有经济投资的结构逐步有了改进，投资越来越同实际可能结合起来。

一九七六年实行两个重要法令：关于总收入和收入结算法和关于保障支付法。这两个法令不是技术性的法令，而是意味着重大改革，即从按发货单结算总收入和收入的制度过渡到按实际付款结算的制度，并且保证在经济上正常的期限内还清相互的债务。这样，在经营方式上就作出了重大改革，可以说，这两个法令连同一九七五年颁布的关于保证偿还投资的资金法，都是在经济制度与宪法相协调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经济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这里所谈的也是财务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

但是，在当前的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的发展中又出现了不良倾向，问题首先集中在生产增长趋向缓慢，生产不适应新的经营条件，也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新情况，经济的再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和经营效率进一步降低。这些不良倾向说明，必须在现行经济政策的范围内采取补充措施并注意目前发展中所出现的新情况，但这些不良倾向也证明了迄今所有议会文件以及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文件中所持的看法是继续有效的。这些文件的基础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看法和任务：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改变制定经济决议的作法，以及对经济结构作重大变革，才能够在有力的和平衡发展的同时实现长期的稳定。一九七五年年中采取的现行政策措施，一九七六年在许多重要的发展部门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这些措施过去未能、现在也不能长期解决，因为自治的生产关系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解决由于经济结构不完善和南斯拉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利所引起的种种矛盾。这是长期发展的问题，即长期计划和改革生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消除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的重要根源问题。

然而，在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时，应该指出，要在宪法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重大变革和发展自治的重要活动，因为通过这种活动也就为长期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良倾向创造了前提。这个活动在一九七六年年初是在相互联系的两条轨道上进行的：拟定五年计划即有关共同发展政策的协议，和使经济制度适应宪法，在此基础上直接根据宪法规定的办法进行适当的真正的改革。

一九七六年年初，我国社会各级组织的一切社会因素，从



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及其各种联合形式、地方共同体、区、自治利益共同体、共和国和自治省，直到联邦都积极参加了关于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五年计划的协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一九七六年七月间南斯拉夫或共和国议会通过这个计划，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通过深刻的和重大的社会改革使自治的过程得到加强和进一步发展，真正实现了宪法所规定的联合劳动的工人和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即决定对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全部收入。这样，国家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范围客观上就被缩小了，因为在实际中这种干预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按宪法来协调经济制度的紧张活动也在进行中。各种法令的准备状况不尽相同，这取决于在某些领域中能否迅速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将适应宪法规定的我国新的自治社会经济关系。要找到这些办法既不容易也不简单，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到目前为止已经制定了计划法、新结算制度和支付制度法以及关税法，而联合劳动法尚在公开讨论中。

因此，目前经济状况的特点是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好的动向，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经济的增长缓慢。同时，时刻在进行着比以往更为紧张的社会关系的改革和社会的根本变革，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和彻底地建立自治的生产关系。正是由于目前经济状况具有这种特征，必须在各级经济决定中继续鼓励发展中的积极改革，而限制或尽可能地消除消极的动向。这不仅对当前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也是鼓励社会变革和物质变革的前提，通过贯彻一系列新法令和

五年计划将会实现这些变革。

一九七六年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许多特殊意义。很多非常重要的措施在现行经济政策的范围内施行。首先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向按实际付款来结算收入的制度和新的支付制度的过渡。上面谈到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的一九七六年的决议和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的政策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些措施的依据是，“进口总额和结构将由出口结果所取得的支付能力来决定”，为此，还必须“这样确定进口政策，即不是预先确定而是在年内根据出口的可能性来确定进口对出口的关系”。这就必须在议会的决议——“进一步缓和物价上涨是优先的任务”——中提出新的任务，还必须“制止任何不合理的物价上涨，同时在那些问题最多的地方使物价的平衡完善起来，以便保证获取收入的平等条件。”

这是把消费压缩到现有的收入范围和把进口压缩到现有的外汇支付手段范围之内的一些措施和政治立场，是重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改革。这些措施是进一步反对通过预支和不履行支付义务来转移和侵吞收入的步骤，同样也是反对通过毫无经济根据的提高物价以谋取非法收入的步骤。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近两年来改变经济物质结构的过程加紧了，看一看一九七六年年底进行的关税保护政策的改革对这种发展方向有着重大影响，那么，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一九七六年整个的经营条件有了重大改变。这些经营条件引导经济决定的体现者尊重正当业务行为的准则并按照一系列基本决定去做，而这些决定必须把法律同宪法协调起来，并把中期计划确定的发展政策的方向协调起来。当然，这样做必将改变一切经济决定的体现者的活动，这就要求他们坚决适应这种新

的经营条件，而这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尽管上述措施的出现和执行都不是突然的，因为早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南共联盟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就对此作出决议，只不过大多数经济决定的体现者对此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些措施的产生意味着，要求使经济和其它社会部门更加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还要求把消费和发展的欲望限制在所拥有的收入范围之内，把进口限制在所拥有的外汇支付手段的范围之内。但是，无论在经济部门还是在其它社会部门，大多数劳动组织、大多数自治利益共同体和许多社会政治共同体都没有及时地适应这一点。整个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领域、相当一部分商业和银行业，没有准备及时地去争取更好的交换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收入和进行支出。由于经济部门对这些措施没有足够的准备，同时，由于生活费用还一直在提高，总的消费和集体消费也在大幅度增加并超出了商定的范围，所以经济的再生产能力水平就大大降低了。尽管早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就从政治上确立了经济政策措施的方向，但是全面执行这些措施是在一九七六年，发展计划——生产、投资和进口等——没有及时得到纠正，也就是没有在各方面及时地和全面地采取有关预防性措施，使得更有准备地接受这些新的、机动灵活的经营条件，这样就能缩短经济在这些变革中的适应期。将来，特别是一九七七年，必须从这里吸取教训，那时一系列新的系统的法律就该生效了。目前必须根据众所周知的法律决定在联合劳动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中进行准备，以便使经济部门和其它社会部门及时地和尽可能更好地适应一九七七年即将生效的新决定。

随着有效而蓬勃的发展，稳定是一九七六年经济政策的

一项基本任务，所有其它发展任务的顺利完成也取决于这项基本任务成功地执行。

物价的变化说明，物价平稳上升的过程在整个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内还在继续，这就使得这一年六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以零售价格的年增长率来表示）比一年以前差不多低三分之二。

前一时期物价的缓慢上升是国内市场上商品货币关系平衡的结果。世界原料和半成品价格的缓慢变化，对国内物价也减少了压力，而在前几年，这些价格的上涨是加速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由于采取了经济政策措施，由于联合劳动组织和社会政治共同体努力执行这些措施，使得某些行业和集团在分配关系中的重新组合过程得到制止，而在前几年，特别是一九七四年，这种组合过程是整个生产者价格上涨的活跃因素。

鉴于前几年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经济不稳定的一个最突出点，前一时期物价上涨缓和的意义尤其应该强调。从这方面来说，通货膨胀——这是同工人阶级的切身相对立的——削弱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整体来说，它影响到周期性发展。

尽管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物价方面基本上是平稳的，但是有迹象表明，由于业务经费的增加和经济再生产能力的恶化，在将来一个时期内可能会重新出现提高物价的压力。尽管与世界物价相比，我国的物价水平在许多商品上一直是比较高的，可是由于世界原料价格的变化（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是提高的），还可能会出现和决定提高价格的要求。

也就是说，对提高物价可能施加压力或已经施加压力的

因素不是产生于目前的市场关系。况且，目前的市场关系要求降低一些部门的物价，因为国内外需求连生产的缓慢增长都跟不上。但是，上述其它因素，尤其是很低的经济再生产能力，是产生这种压力——通过提高物价来暂时改善经济部门在支配收入中的地位——的经常潜在而又活跃的根源。

因此，一九七五年在缓和物价上涨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仍然还不十分稳定。当收入上有联系的联合劳动集团之间相互协商的大部分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显然需要高度动员社会来防止提高物价，在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提高物价是毫无理由的。但是如果社会不进行适当的动员和干预，提高物价的企图还有可能得逞。

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应复苏，国内市场物价上涨的缓和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整顿是加强南斯拉夫出口的重要因素。决定物价的所有体现者都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个别生产者通过提高物价来改善地位只能是短时间的，因为经济改善的效能将由于物价的普遍提高而很快失去作用。

一九七六年价格政策的契约推迟签署是因为未能就动力和服务行业价格政策达成协议。在通过价格来改善动力和服务行业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的时候，应该指出，决定的所有体现者都必须考虑到，在经济再生产能力被削弱的情况下，动力的任何重大提价客观上都可能迫使物价普遍上涨。关于服务行业，在这里也存在着大量问题，所以还必须指出，服务业价格的任何过分提高都意味着对生活费用、物质生产的收入和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压力，这样又将进一步对物价上涨增加了新的压力。

这就是说，尽管在价格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但是

首先必须指出有许多潜在的因素在竭力破坏已取得的成果。物价上涨的缓和只是标志着稳定进程中的初步成果。所有再生产执行者的全部政策必须对自发的因素起到限制的作用，这些自发因素是（不考虑市场的实际关系如何）物价上涨的潜在根源。所以，反对价格变化中的自发势力仍然是迫切的事情。显然，仅仅通过对价格的监督是不能解决稳定问题的，何况在价格方面不能消除各种压力的自发发现象，不能消除常常是狭隘的有限利益和利用垄断等地位的各种自发势力。

一九七六年前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与一九七五年同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并有很大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倾向（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全部的商品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同期内商品进口减少了百分之十二）。可见，出口有了特别大的增长，现在进口政策也同日益增长的出口相适应了。这是决议所曾预料的。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进口的减少只是部分地由于采取了使进口适应于出口的可能性这一措施的结果。根据进口制度，进口是可以高于实际进口的。但是，国内经营条件的改变使得一般商品和整个物资的补给变得合理了。限制国内市场上商品的销售和增加储备使得进口原料和半成品大大减少，而用本国的原料和材料代替进口的过程也同样在努力进行。进口原料的库存达到了约两个月消费的水平。因此，总的不能说原料的减少是限制增产的因素，虽然这样的例子可能是有的。

通过这一年的改革，再没有人指责进口中的复杂程序了，因为程序变得简单而分散了。但同时必须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把经济充分组织起来，也没有在自治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任何新的具体办法，一般来说，如果保证整个经济处

于商定的收支平衡的政策范围之间，自治协议是可以减少行政对进口制度的调节作用的。总之，必须指出，在这方面还存在非常矛盾的建议和要求。在不改变联邦预算所支配的资金的情况下，普遍地要求减少关税和运价，而对出口则要求对税收方面增加优惠和其它优惠。那些搞出口的人和搞进口的人的要求是完全对立的，因为除了通过市场以外，他们目前一般还没有通过任何纽带联系起来。在普遍要求对进口更加放宽限制的时候，某些生产者集团在发动一场禁止进口他们能生产的一切东西的运动，他们不承担有关出口、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义务。它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年来对现行的进出口制度有许多批评，这些批评往往是同批评人的部分利益有关。我们对影响到进出口的现行措施中任何个别决定决不作辩护，但应该说这些措施是符合现行法律的，也是符合未来对外经济关系制度的精神的，也就是说，迄今在运用这些措施方面已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从而使一九七六年商定的政策得以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比决议所预料的更有利的发展趋势，略微扩大了目前的进口可能性。此外，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一些出口单位承担了有关自己挣取外汇资金的义务和责任，还由于出口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关于工业生产的发展，目前的特征是增长缓慢。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一二。这是很低的增长率，但五月份较有好转，尤其是六月份出现了再次增长的明显迹象（六月份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四点六）。这也是前一个阶段大部分时间（除了八月到十一月期间）的倾向，这是长期因素和前一个阶段出现的那些因素的影响所造成的。这些长期因素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和毫

无疑的，但是我们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些因素上。简言之，问题在于目前的结构失调从两方面限制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甚至也限制着工业生产的增长。一方面，鉴于参加国际分工的体制和形式，南斯拉夫经济对其它国家的停滞趋势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再不敏感（同规模小的经济一样，南斯拉夫经济对这一趋势的反应是迟钝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内部结构本身在慢慢适应正在变化的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同时，成了使发展速度缓慢下来的因素，这样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波动。

工业生产增长之所以缓慢，首先是国内需求，特别是个人需求减少以及一九七六年投资缩减影响所致，这种情况是由过去物价大幅度提高从而购买力枯竭的影响而出现的。另一方面，经济政策中所规定的措施使为增加储备而进行的长期性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由于向实际付款结算制度的过渡和偿还相互债务的苛刻条件的影响，在经常缺乏流动资金的情况下，暂时削弱了经济主体参加业务协商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除了得到恢复外，也没有在改变工业生产缓慢倾向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

对整个经济活动和生产的增长有着不良影响的因素，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对一些部门却在经济上不合理地限制着消费和生产。只要谈到下面这些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例如，住宅建设基金中存在大量积压资金；通过信贷来销售本国设备和船舶的合同很迟才能实现，从而使规定用于这方面的资金也成了积压资金。

但是，现在出现了加速发展的一些因素：首先，出口需求在增长，这不仅是指迄今所取得的出口成绩而言（出口以非常高的比率增长，从而重新成为工业生产增长的推动因



素），而且也是指已订立的出口业务和出口定货。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出口的成绩证明，一九七六年全年的出口成绩必然比决议规定的更好，就是说，在此基础上也为发展生产提供了机会。

物价的缓和对个人消费的实际增长是重要的，但是它本身并未充分表明使个人消费成为增加生产的推动因素。同时需要把投资更多地转用于本国供给，因为一九七六年投资不能以一九七五年的速度增长。生产性需求的关键问题是提高生产率和经营效率对生产发展的相互影响的问题，反之，也就是通过这种途径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

不利的因素是：近来经济发展越来越不精打细算，粗放的发展代替了精细的发展。这种情况首先表现在发展的质量下降了，经营或就业不求质量，社会劳动生产率、投资和固定资金效率提高缓慢，不适当地把大量资金储存起来，因此流动资金的系数很低，经济的积累率相对恶化，消费不合理和社会管理经费庞大等等。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的经济发展尤其呈现出粗而不精的特点。对经济活动成果的分析表明，一九七五年质量因素对已经取得的业务成就的积极贡献是很差的：一九七五年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而在整个前五年中比原计划提高了将近一半）；劳动的节约已经第三年下降了，因为资金的耗费比总收入增加得快；几年来库存的大量增加已经把大约百分之十的社会产品价值变成无用的东西；一九七五年流动资金系数明显地恶化了；经济的再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从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九点三下降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七点三，同时经济的负债率从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

点四左右，近几年内按就业者的个人实际收入的发展不够满意，这反过来又对生产率和经营效率起消极作用。

特别是一九七五年的就业表现了多而不精的特点。也就是说，就业人数的增加超过百分之五，而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营效率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提高。就业的结构也不是令人满意的。有充分迹象表明，经济部门的职工就业构成中出现了不断增加管理人员的趋势（在一些工业集团中这部分人员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在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状况下，加速经济增长及其集约化的问题就变得特别尖锐。对于提高生活水平和个人实际收入来说，特别在我国工人从国外回来的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对于继续扩大增加就业的条件、进行巨额投资、改变经济结构、特别是对于尽可能成功地实现经济稳定政策来说，已经实现的收入的增长是很不够的。众所周知，不太稳定的经营条件使一些组织、集团或部门在提高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积极效果化为乌有。必须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并实现有关该五年发展政策的契约才能对提高经营效率的条件进行重大改革。但是，在现行经济政策范围内必须在各级水平上尽可能地消除或者至少限制不利因素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一九七六年经济收入中用于总消费和公共消费的负担，同经济增长率和经济的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超过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在决议中的规定，也超过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自治省特别契约的规定。实际上，许多年以前曾出现的倾向现在还在继续。这些倾向肯定是客观情况造成的，首先是由于某些社会部门

的发展超过经济的可能性，而有的地方超过经济需要，甚至与这种发展相比，它所拥有的资金太少。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这样的因素：在总价格中，社会部门的劳务高于活劳动的平均水平，因此，在生活费用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他们的全部收入比物质经济部门贬值得快。对此有影响的还有这些部门的消费不合理性。这些倾向在利益共同体范围内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交换劳动的原则没有在此基础上得到彻底实行。适应这些社会部门的经济需要和可能性进行的认真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

关于个人收入，情况也不够满意。由于发展不够迅速以及由于大量增加就业，而生产发展缓慢，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的下降，个人的实际收入停止不前，而且在许多部门里还降低了。支付现有就业人数的个人收入还有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些困难并没有由于采取新的收入结算制度和新的支付形式而扩大。众所周知，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没有充分地联系个人的劳动和贡献，因而也就没有促使人们去争取更好的经济效果和增加收入。所以，重要的是精打细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也就是减缓生活费用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把按劳分配的条件改变得更均衡些，可能比较有利，所以为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而斗争是同按劳动贡献的原则大大改进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是分不开的。

一九七六年与一九七五年不同，一九七五年的投资是生产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一九七六年的投资需求增长缓慢下来了，对生产的发展没有收到一九七五年那样的效果。原因就在于一九七五年的经济再生产能力下降和用于业务基金拨款

的可能性不大；同样还在于必须如期清偿大大增加的投资，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投资现金被用来偿还该付的债务；还在于协商并适当地联合资金对共同关心的项目进行投资的工作进展得很慢，以及一些部门的改革搞得很慢。这种情况在住宅建设方面表现得尤其不好，那里的决定和行动远远落后于财政和物质的可能性。当然，投资活动的减少是不好的。但这只能通过实际加强经济的再生产能力来克服，或者通过合理使用投资资金和通过消除联合资金道路上的障碍来克服，以便改善劳动者的劳动和生活的物质条件。

由于实行新的结算收入制度和新的保障支付制度，已经取得了初步积极成果。大部分困难是在执行新的非常庞大的财政措施中出现的，也是由于不习惯于用有价证券来控制的结果。通常，期票由联邦簿记机构保存，它被用作支付手段，这也是期票积聚、被排斥在流通之外和用大量的现金作它的抵押金的原因之一。这种不协调是暂时地和不合理地限制需求以及在对新的事业投资时过分谨慎的根源之一。在已执行的货币信贷政策范围内，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把期票从人民银行分出来将促使有价证券的流通，可以预料，作为支付手段的期票今后几个月将逐步走入正常的流通方向。

在解决借贷双方的关系方面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用作支付不定期债券的期票完全可以连续偿还，这就不会使期票集中于付款的最后期限——九月份。需要在一年之内支付的债券，用现金或期票就可以非常顺利地偿清了。可以说财政纪律特别加强了，以致尚未偿还的债券总额并不是很大的，整个经济的清偿能力是令人满意的。因此，现在的中心

问题是使作为支付手段的有价证券的流通活跃起来，进而在这个意义上采取具体措施。

一九七六年采取的所有经济政策措施的目的，在于按照经济上合理的和健康的经济行为，改变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表现在迄今为止通货膨胀率减慢、收支平衡的改善和国内财政关系的调整等等。虽然如此，但是，现行经济政策的这些措施并未能消除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和经营弱点，这些根源是产生于多年来的经营条件，其特点是预先消费、用不偿还债务的手段来侵吞收入，以及不问经济的出口能力如何而增加进口。这一切的后果是，物质结构变化了，资金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经济在自治的基础上被慢慢地束缚住了，没有共同的计划等。现行政策的措施未能消除经济生活中这些不良现象的长期根源，但是在执行新的措施和在经营中建立新的关系以后，这些长期弱点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这一点在当前工业和建筑业经济活动缓慢这一情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采取措施的目的并不是使增长的速度放慢，而是相反——调整经营中的关系，使其有明确的方向。由于执行一系列新法令和通过新的五年计划而商定的发展政策，这些措施应该保证经济的蓬勃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于象我们这样大规模全面发展的国家来说是很需要的。但是，这一发展必须有健全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无论从社会内容还是从物质内容来看，还必须改变我们发展的形式和方法。必须使经济适应这种情况，甚至在发展过程中暂时出现停顿也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所进行的有关经济改革必然要影响生产暂时停滞，这里，限制需求表现为主要的限制因素。现在，如果预支

的可能性受到高度抑制，由此引起了对增加物质生产鼓励的忽视。同时，由于库存增加，维持生产的可能性也就减小了。十分明显，从国内市场的实际吸收能力来看（这是经济效率和生产率水平引起的结果），经济的物质结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不改变经营效率、生产率和物质结构，这样的经济物质结构就不能为这样的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式的迅速发展提供基础。因此，经济活动下降的基本原因是上述这些重要问题，而不是如人们所常想象的，甚至是经常强调的减少进口的问题。

这本书写于一九七六年年中，那时还很难估计年底以前的经济动态，也就是说，很难估计一九七六年总的经济成绩和缺点，因为经济动态很矛盾。但是可以断言，首先是在出口、支付平衡（即收支逆差）、国内物价上涨和缺乏清偿能力等方面，不仅制止了而且克服了许多不良倾向。通过实行新的结算收入制度和新的偿还相互债务的制度，财政业务的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清偿能力提高了，财政纪律也加强了。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其它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后面再详细介绍。不过，这些新的财政措施的实行已被证明是合理的，经济上也是健康的。在以往一个长时期内，不适当的财政活动曾经是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特别薄弱的环节，它所引起的深远的不良后果至今还有影响。由于协调了进出口关系，顺利地发展了经济，出口有了急剧增加，同时出口的地区结构大大平衡了。暂时的收支顺差不仅是减少进口的结果，而且也是大大增加出口的结果，同时，减少进口首先是国内发展的结果，而且是进口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包括设备）的结果。年中，生产开始上升。据各方面判断，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上升的趋势将加强。也就是说，首先要指出的是，进入一九七六年下半年

时，经济动态的趋势将转向积极的方向。因此可以预料到，下半年工业生产将出现较快的（但不是急剧的）增长，在今年农业生产取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这给全部社会产品比较满意的增长带来了希望。出口的增长将继续，但不会有以前那样高的增长率。在年中采取了使进口同增加出口的可能性相适应的措施以后，进口将开始增加。估计下半年的收支逆差将是适中的，这也是一九七六年的经济政策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因此应该指出，重要的是分别去决定关于进口（特别是）设备的问题，而涉及到其它商品（特别是半成品）的问题都很简单（所有问题都在银行解决，通常不需要特别的进口许可）。

定期检查劳动组织的财务能够使不良的结果反映出来，这要从三方面说明。第一，反映出大量亏损。这些亏损是由于使用不同于以往的结算收入的方法所引起的，其中一部分不是实际的亏损，由于正处在向新的结算制度过渡的时期，这些亏损不是长期的而是暂时的现象，在经济较好地适应收入所认可的新的支付工具时，这种现象将不断减少。第二，将说明经济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恶化情况。与经济部门的收入相比，经济部门为非经济部门的消费所拨出的费用和资金增加得太多了。第三，将反映出剩余的收入不多了，收入分配中有利于个人收入而不利于积累的内部调拨倾向将继续下去，因为生活费用超过了生产者价格的增长，而在生产增长不大的情况下就业增加却很多。由此可见，定期清帐将发现非常复杂的新问题。必须分析导致经济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它是近几年内经济部门形势的反映，但是新的财政关系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定期清帐和一九七六年的年终总结将尖锐地提出经营效率、非生

产费用、需要在广泛的经济范围内共同计划联合劳动，以便更好地利用设备能力等问题。不是用改变财政过程的方法，而是把形成这种不利经济地位及很低的再生产能力的原由找出来，这样才能摆脱经济部门所处的不利局面，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还应该看到，物价平稳的时期对我们来说已成为过去。按工业品生产者价格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年中约为百分之三。鉴于占有的收入和结构深刻不平衡的实际关系（从广义上说），同时由于大部分现有设备的建设使非经济的需求和义务大大加重了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价格的上升率很低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当零售价格以及生活费用还一直在显著上升的时候更是如此，生活费用通过个人收入更恶化了物质经济部门的地位。因而对物价上涨的压力将会增加，物价也将比前一时期上涨得更快。实际上，上半年物价的上涨率大大低于今年所预计的水平。现行经济政策及其措施的任务是保证物价的上涨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有选择的和缓慢的。

因为，下半年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将是经济部门的经济地位和价格方面的问题。这并不是毫无所料的。尽管经济发展趋势转向积极方向，但这些趋势还不够稳定。所有长期存在的基本问题（这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和收支逆差的问题，既未解决也未得到克服。在采取这些措施以前，联合劳动还没有自己组织起来，没有实行广泛的经济计划，以致联合劳动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和努力以及通过有意义的行动，可以在整个发展战线上为消除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斗争。但与以往相比，形势有了很大不同。现在已经有条件达到这样的组织性并制订了五年计划，它也必然会通过商定的发展政策和



这一政策的实现对影响到物质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革。然而，工作最终还是根据新的系统的法律来进行的，这些法律使联合劳动有可能并必须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现行政策的措施应该使现在的形势在总的（物质的社会的）范畴内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政策不能解决和消除发展中的不稳定和困难的重要根源。即使在今后，显然有必要通过现行政策的各种措施对发展进行多种干预，以便为组织其它的经济主体时在时间上和经济上有充分的准备，因为这些经济主体应该而且只有争取（物质的和社会的）重大改革才能持久地消除我国经济困难的根源。社会和经济的现实情况、新的法令和五年计划都开辟了十分明确的前景：在一切社会因素都参加的情况下，使长期改善经济形势和利用颇大的潜在能力有了保障，以便更快地、更平衡地和更稳定地发展，以便从经济上更有利地参加国际分工等。

因此，尽管目前存在有利倾向，但是今后我们仍然要遇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保证加强我国发展中的稳定因素（从广义上说），在保持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可能和需要相适应的收支平衡的同时，改善我国在世界交流中的地位，在健康的经济基础上加强发展等等。这一切必将成为今年下半年现行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但同样也是一九七七年实现五年计划的政策。联合劳动组织的加强可以在广泛的社会计划中担负起执行经济政策的职责，也为执行新的法律（通过这些法律确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作了思想准备。特别是联合劳动的加强，这必将成为今后吸引各个社会因素的组织。

稳定、国际经济形势和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问题，以及正在增长的社会需要与经济潜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是

后几年经济所要遇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在下面多谈谈这些问题。

## 第二节 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 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影响

### 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生产下降、失业、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收支逆差等问题。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关系（尽管正在变革）中，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工业发达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况，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比发展中国家强大得不可比拟，发达国家的这种地位使得它们能通过“价格剪刀差”、输出昂贵的资本、（由于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从高利息中获取利润、技术和干部的依赖等使收入的分配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也就是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还继续统治着世界。

然而，近些年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也经常面临生产增长缓慢和经济衰退的问题。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衰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衰退）后的时期不同，在此之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曾经历了数年的繁荣（但有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短时中断期），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的衰退后，只有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短时期的经济繁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这次的经济衰退，从所有迹象来看，与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经济危机相似。根据持续时间的

长短，根据生产劳动、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的紧张程度等特点来看，这次经济衰退清楚地说明了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全部问题的份量。不能说这次衰退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周期中一般的衰退阶段，应当说是“危机状态”，或者说得轻一些是“接近危机状态”。

七十年代以来经济衰退现象所带来的结果是，对外贸易中出现了“强制性的干预”和“扩张性的干预”。在这方面，欧洲共同市场和日本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破坏国际分工，对许多国家来说，最后的结果是，它们被排挤出某些种类商品的国际市场之外。不仅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是如此，象肉类和其它畜产品的大量生产国，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也是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阿根廷、乌拉圭等）的经济发生深刻萧条，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由于它们主要的出口商品的需求出现变化而受到打击。

上面所说的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深刻程度，正好说明，世界经济的失调现象是非常严重的。鉴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量早在一九七〇年年初就已经很大<sup>①</sup>，所以它们利用同样处于危机状态的“赤字预算”也不可能调节好失调。

① 近两次衰退期中货币总量（广义上）的增长说明，1975年的发行量比1970—1972年间稍少一点（1970—1972年，日本的增长率为24.3%，而1975年第一季度为11.1%；法国1970—1972年为18.1%，1975年为17.4%；西德1970—1972年为13.6%，1975年8月为1.3%；英国1970—1972年为12.6%，1975年8月为9.8%；意大利1970—1972年为17.2%，1975年6月为17.6%。资料来源：《经济展望》杂志，1975年第18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

这一切说明我们处于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广泛地采取措施，来改变国际分工和收入，这是重建世界经济平衡和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可分割的长远利益，实际上也是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大型的世界会议，特别是两次联合国特别会议都原则上承认这一点。但是，它距离一致要求改变世界经济关系（即实际改革）的道路还很遥远。文件上的一致还不等于实际行动上的一致。

今天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实际问题的了解，迫切要求以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注意这一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迫切的、极为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也不能指望货币危机或目前的经济衰退能够被克服。实际上，不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逐步的重大改革，就没有希望长期摆脱停滞、衰退、货币危机等现象。如果充分保障初级原料的重大问题不解决，那么，可以预料还会出现新的和更深的经济衰退和明显的危机。

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要想解决生产和支配原料这样的综合性问题，必须真正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对其自然资源拥有充分的主权。否则，就有使经济停滞和衰退变得更经常和更长的危险。因此，虽然出现各种变化，世界收入再分配的进程（开始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以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形式出现）将能够解决原料价格和对原料生产长期投资的问题。当然，可以预料到这将遭到各个方面和所有发达国家的反对，但反对最强烈的将是那些垄断者、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统治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最强的国家。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协调行动，同时加强工业发达国家的民主力量，这

是使世界经济更加平衡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活动。

应该看到，世界经济关系中的一切革命变革都遇到了反对和困难，要真正确立一个新的关系是需要时间的。战后殖民主义崩溃时期曾经遇到而现在也还遇到许多困难和反对。但这正是以所有国家，首先是最发达的、许多前殖民地宗主国经济和技术特别繁荣为特征的时期。向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继续迈进是历史的必然，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通过稳定而迅速的发展，最终都能从这里得到好处。这样的革命变革是当今世界的需要。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它（除了发生严重的世界冲突），因为它只会使世界走向新的进步，减少当今世界如此为之烦恼的社会矛盾和紧张程度。

到目前为止，根据“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思想，许多国家的革命创造精神已经把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政党和团体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团结将来会有更重大的意义。

## 二、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的状况、 原因、趋势和方向的看法

尽管我们把一九七三年年底以来的世界经济状况说成“衰退”，但实际上它是“危机状态”或者是“接近危机状态”。这个状态是两个因素的反映：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危机的反映（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内部的干涉主义再不能使经济保持在平衡的状态）；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这种内部危机引起的国际危机

的反映。

西方长时间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实行干涉主义的特点和局限性。国家大量卷入经济过程，同时都集中到对外贸易方面，这就开始超出了保持国内经济平衡的范畴。许多对干涉主义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特别焦虑不安，因为几年来用“赤字预算”已经不能长期摆脱经济衰退，反而产生和平时所空前的通货膨胀和国际货币危机。用他们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来客观分析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理论又一次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理论再次使人们失望，因为它的蓝图并未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繁荣和稳定。发达国家的干涉主义理论和实践是非常狭隘的国家和地区动机造成的，它把剧烈的动荡带进了国际分工和世界收入的分配中。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工业发达国家对这些组织的依靠仍然比对世界的依靠程度还要大）是没有能力制止这些组织的各成员国在指导国内和外贸发展中的干涉主义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高度的科学技术成就被用来为侵略性的经济渗透和垄断统治服务而不管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如何——已经走到死胡同，必须加以改变。

当前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矛盾之一正是在于各国政治上的（原则上）平等与各国人民实际上经济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对立。

毫无疑问，目前西方的经济衰退是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危机的结果，甚至只要对该地区一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以及紧张局势稍加分析就会得出这一看法。

由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经营方式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

受当前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的危机的打击比较小。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当今世界力量对比的形势中，它们的作用更加加强了。但必须指出，它们也日益面临着许许多多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首先来自于本身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

挣脱了殖民枷锁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事实，也有利于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尽管资本主义大国在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中还仍然有明显的决定性作用。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前不久的衰退在深度方面与三十年代危机有历史的相似之处<sup>①</sup>。尽管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新的变化周期，许多衰退的现象还仍然没有克服（失业、通货膨胀等）。

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近来日益趋于衰退状态。譬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工业生产资料说明，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繁荣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进入了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的衰退阶段，在经过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短期的繁荣以后，又进入了衰退期。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的最近一次衰退的表现是，需求明显减少、生产下降、生产设备能力利用低、大量失业，同时通货膨胀率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九七五年上半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国家的工业生产的平均水平与一九七二年一样，而与一九七四年同期相比，则要低百分之十四点八。失业人数占这些国家就业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左右。通货膨胀率非常

<sup>①</sup> 斯·布兰科维奇博士：《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关键问题和西方持续衰退的原因》，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编（未发表的专著）。

明显，一九七四年为百分之十三点六（上限达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一九七五年为百分之十左右（上限达到百分之二十一）。对外贸易的规模明显缩小，而在国际交换中的干预和保护贸易政策则加强了。

就持续时间之长和各种表现来看，最近这次经济衰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同样必须看到，一九七六年开始的这次衰退过后回升和复苏的时间将更长，如果衰退得到克服，形势将是脆弱的和短暂的，只要不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只要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不采用新的干预办法，经济衰退就将再次出现。

然而，在许多领域，如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七十年代的衰退状态或危机状态都不同于三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危机影响就象自然灾害一样，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未能抵御它。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变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和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野蛮的办法。

在这方面，现在的关系大大不同了。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许多有组织的力量无论在消除衰退所造成的最严重的经济后果方面，还是在防止它的社会影响方面，都在抵制经济衰退的恶果。因此，无论危机多么深，它不会象三十年代那样引起政治和社会影响。今天在许多最发达的国家（法国、意大利），左翼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有了加强，从政治上提出了改革和摆脱这种局面的纲领。因此，将会出现适当的妥协，这将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进步，意味着工人阶级地位的加强。

总之，经济衰退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破产，但正



是这样，必须看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病态”，因此还必须看到衰退的经常性和周期的缩短。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度发达的国家所采用的集中于发展内部的方针已经放弃了，这样，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及其拥护者就受到了新的历史性的挫折。资本主义世界肯定将为其存在和发展寻找新的办法，但寻找新办法必将日益受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基础的限制，何况工人阶级的作用将明显得到加强。所有这些关系和预兆是资本主义世界在不安宁的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从它对整个事态的影响来说，这也是整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sup>①</sup>。

经济衰退加剧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其次是加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是大小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还必须指出的是，最近这次衰退的加深并未影响到使工业发达国家所持的总立场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之间的距离有所扩大。这是自然的，因为发达国家还要依赖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而是也有相反的情形。发展中国家拥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金属和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能源（石油甚至更多）。因此，原料价格的问题同样也是向发达国家供应原料的问题。工业发达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真正承认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以及这些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拥有充分主权的同时，才能够解决长期利用原料的全部问题。否则，就会由于上述原因而有使经济停滞和衰退期变得日益

<sup>①</sup> 里·施塔伊奈尔博士：《论当代世界的危机问题》，贝尔格莱德，现代行政出版社1976年版。

频繁和拉长的危险。因此，世界收入重新分配的过程——它在有限的范围内以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形式开始，随之常常通过变化无常的新的经济渗透形式——将通过解决原料价格和对原料生产长期投资的问题得到加强，这是可能的。必须看到发达国家也将在国内外竭力寻求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形势也不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并将把他们引向危机的边缘（如果他们还未进入危机的话）。历史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危机形势下也要寻求新的解决办法，应该相信现在也要这样做。

诚然，目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不利于这一设想。尽管总的接受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但它们的活动还是集中在坚持它们国家目前的经济立场，使目前的国际经济关系重新出现。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研究经济问题的最高代表的两次会议（朗布伊埃会议和波多黎各会议）的目的就在于，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密切合作，目前的倾向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有组织地维持现状或者最多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适当援助，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一个平等的经济基础。不久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通过了经济发展方案，提出使今后一个时期增长放慢和失业率更高的政策，这是为了维护这些国家目前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防止爆发通货膨胀。无论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四次（在内罗毕举行）会议上，还是在巴黎会议上，都在明显地拖延关于具体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谈判。因此，有关建立新的和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议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实际上去解决。然而，历史事件的过程可能将证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所关心的也是通过改革来维护自己的繁荣，因为用恢复和保持旧关系的办法显然不能维护自己的繁荣，而只会

因此而处于困境和经常的衰退。

“新政策”尽管已经萌芽，不过还只是开始。但是，与原料和成品之间在经济上保持合理的价格水平的目标相比，与对经济政策进行普遍协调的要求相比，与对世界收入进行彻底的再分配的目标相比，还相差很远。所以，在迄今的改革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展是很微小的。为“新政策”而斗争的规律要求共同作出特殊努力，以便在国际关系中发展和大力推行现行的“新政策”。前不久，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所处的深刻衰退要求加紧一切活动来保持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在另外的方面推广“新政策”。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来看，至少它们希望在稳定原料价格方面进一步改革，以便使价格水平符合它们经济发展政策的需要，这无论如何不是偶然的事情。稳定原料价格的问题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达喀尔宣言），也是在目前严重的国际冲突所造成的危险的条件下，至少在稳定原料价格方面可以取得某种程度的国际团结和合作的问题。

### 三、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克服目前状况中的作用

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曾受到国际市场上一系列不利因素和倾向的直接影响。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巨大动荡，随之而来的是石油、原料和食品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刻衰退，这是前一个时期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使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加深了鸿沟又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的逐步加快。然而，

还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三年内还是达到了（联合国）中期发展规划所确定的一些主要发展目标。社会总产品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量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产值实际增长不超过百分之三点五。同时，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的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八，原计划是增长百分之七。

在实现中期发展规划中除了取得这些成绩以外，在这头三年中也有许多不成功之处。例如，一九七一——一九七三年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并未能达到使新的劳动力都得到就业的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在不断增加。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还很不平衡。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石油价格的巨大变化（从一九七三年一月到一九七四年一月石油价格增长了四点五倍），使“贸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必须指出的是，石油涨价只是对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有积极影响，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非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即非石油生产者和出口者）首先感到的是，这种趋势使他们的支付平衡更困难了，而不是他们的地位有了改善。因此，各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重大差别。一九七一——一九七四年，发展中国家社会总产品的增长率总的达到百分之五点九。其中亚洲近东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一；亚洲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率是百分之四点九；南美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率高于百分之六；而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则低于百分之六。

甚至在某些地区内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社会总产品的

增长率也有很大差别。出口石油、金属矿（不固定）、行情变化很大的原料（磷酸盐等）和加工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上述时期保持很高的增长率，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在这以前国民收入就很低，现在就更落后了。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没有达到预定的规模。在这个期间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平均占提供援助国家的社会总产品的百分之零点七，而原计划援助应占社会总产品的百分之一。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平均援助方面，各国也有很大差别。一九七四年某些国家提供的援助达到了占其社会总产品百分之十强的水平（伊朗），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成员国平均提供了占其社会产品不到百分之零点七八的援助。前一时期，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国对援助水平的影响最大。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期间，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三亿六千万美元增加到九十六亿美元，这还不算给世界银行十八亿美元的借款和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十四亿美元的石油基金，这些也是用来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国际市场上石油、某些原料和工业品价格的猛涨，导致了前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和收支逆差的不断增加，这就引起了它们债务的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千二百亿美元。这不是一九七五年最后的债务额，因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一九七五年这一年就出现了约三百八十亿美元的逆差，如果不包括官方转移项目，那么，收支逆差是二百七十亿美元<sup>①</sup>。

① 据《经济展望》杂志，1975年第18期。发展中国家的收支平衡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外的所有国家——除了石油生产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北朝鲜、北越、南非、以色列、南斯拉夫、塞浦路斯和马耳他。

现在，从政治力量和组织上来看，发展中国家有条件（大部分国家奉行不结盟路线）逐步保证新的世界分工，而且也能在此基础上逐步保证重新分配收入。在这个意义上，石油出口国组织国家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

应该认识到，当今世界上现实的社会经济矛盾引起了如此深刻的动荡，以至使世界上的政治活动家将要或者已经面临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必须为新的世界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收入的重新分配创造条件。但是事情变化得是非常之快的，事态发展得是非常之迅速的，这些都说明不能指望在衰退时期结束、通货膨胀得到克服以后，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建立的时候再去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了。只有通过逐步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才能克服世界上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等等问题。

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坚持导致衰退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从而对石油和原料的价格施加压力，这将等于使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发达国家（指没有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的国家）出现危机，而且这种压力也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一九七五年原料价格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智的。新的强烈的世界行情说明，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条件下，对原料和能源确实有限制，这也是对最发达国家发展的限制因素。况且，近几个月这种限制的迹象已经出现。

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进行有组织的抵制，它们必将逐步地去迎合发展中国家，并和他们一道去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即新的世界分工和重新分配收入，这肯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才有可能克服目前沉重打击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而又经常的周期性衰退。为此，需要发展中国家协同努力，以便通过自己的力量克服国际市场和货币

体系的危机，以及削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深刻衰退的消极影响。为此目的而作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果。某些原料和初级产品的生产者联合成立了许多联盟（如，铁和铁矿石生产者联盟、咖啡生产者联盟、铁矾土生产者联盟等），还成立或者恢复了许多国际性共同体的工作，以便于相互交流（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共同市场<sup>①</sup>、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sup>②</sup>，还有拉丁美洲共同体）。

此外，发展中国家同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国合作成立了一些开发银行，其投资用于发展最不发达国家（首先是非洲国家），而资本的筹集是来自石油出口国组织成员国的石油收入<sup>③</sup>。

在国际原料市场上出现有利变化，一九七四年年初就使原料出口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有了相对的改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内，原料价格又出现了不断下跌的趋势<sup>④</sup>。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所有几种产品的价格处在一九七

① 共同市场的成员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它的计划是要加强和协调相互的合作。

② 成员国是：印度、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斯里兰卡和泰国。它们签订了关于相互减少关税的协定，对大约一百六十种产品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的关税。

③ 阿拉伯发展银行（资本为二亿三千一百万美元），阿拉伯非洲特别基金会（资本为二亿美元），阿拉伯非洲银行（资本为五千万美元），伊斯兰发展银行（资本为九亿至二十四亿美元，贷款为无息贷款），阿拉伯非洲技术援助基金会（资本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④ 根据伦敦《经济学家》周刊文章“世界物价”的材料，世界原料价格的指数，如果一九七〇年为100，一九七四年四月达到最高点（指数为204），一九七五年一月降到121，而一九七五年十月为125。

四年的水平或稍高于一九七四年的水平（如石油、镍、橡胶、茶叶、胡椒、咖啡等），而一九七五年所有其它产品的价格都下跌了，最多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但是，现在有迹象表明，情况又要有所变化（尤其是有色金属和钢），而且目前的行情可能将使原料价格有新的提高，尽管不会象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那样大幅度增长。

通货膨胀同时导致了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品价格每年平均提高百分之十五，这种情况大大恶化了一九七五年的价格条件，并使发展中国家的收支逆差猛增。一九七五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逆差为三百八十亿美元（不包括官方转移项目）或者是二百七十亿美元（包括官方转移项目）。这样的形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其困难的。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一九七六年的预测，预料一九七六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石油生产国）的收支逆差将是三百四十亿美元左右（包括官方转移项目）。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这样巨额的收支逆差，不仅对它们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都有不良影响。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关系问题以外，作为前一个五年的最后一年（一九七五年）已经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其它重大问题，如：粮食问题；能源问题；与不发达和负债过多有关的积累不够的问题；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条件下的销售商品的问题；以及货币和政策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当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增长率是积极的、本国总需求在增长、生产设备的利用率提高、就业率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进一步降低等），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条件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正



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九七五年的价格水平几乎比一九七四年的价格水平低百分之三十，这样的价格水平不能保证国际市场上的有利变化。同时，工业品出口价格的提高（一九七六年可能平均提高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肯定更加扩大了“价格剪刀差”和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

因此必须估计到，一九七六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总产值将继续维持现在这样的缓慢增长率（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其中某些行情变化大的商品出口国比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要高两倍或三倍，而其它国家的增长率则（大部分国家）要低得多。

还可以估计到，发展中国家将为保障平等的发展条件和它们进一步相互联合而继续作出努力。一九七六年应该是为援助发展中国家，为开发原料筹集更多基金而工作的一年。然而，建立这些认真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基金可能受到限制，因为问题将象一九七五年那样，仍然是解决发展的资金和外债问题。

现实的希望是，为加强合作和为世界经济形势寻求解决办法而开辟道路。也就是说，发展的情况表明，世界在其发展中正接近于这样的阶段，即在建立新的国际分工和新的经济平衡中，社会因素（进步力量）应该起着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自觉因素的活动不仅可以加速这样的进程，而且可以积极地避免政治紧张的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有着无穷的不良后果。在承认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平起平坐的伙伴这方面，世界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具体而明确的行动中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大，这些行动将加速旨在建立在世界上平等的经济关系的改革。可以预料，所有发达

国家将从各方面抵制这样的进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抵制最强烈的将是那些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势力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结盟国家行动的统一和协调，同时加强工业发达国家的民主力量，成了世界经济高度平衡所必需的社会组成部分。

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一般的纲领和宣言转向具体的行动。为此目的，必须：

- 从技术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
- 保证行动的连续性和合作，尽管它们相互之间还有矛盾和分歧。

#### 四、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影响

在南斯拉夫迄今的发展中，工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除去迅速发展以外，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整个经济中，前一时期同时存在着内部发展结构的不稳定性。劳动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不成比例地快于原料和半成品的生产。这种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能源和原料的价格太低所造成的。只要工业生产的增长率高于百分之八，要求进口的呼声就大大超过生产和出口的可能性，对外贸易逆差的问题就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整个工业成了进口原料和半成品的巨大消费者。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劳动资料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不成比例地快于能源和半成品的生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加工工业对进口的依赖开始日益显示出来，其增长率也大大低于六十年代。设备能力的分散，它与国内外市场相比的不平衡和设备能力利用不足，这些是生产成本比较昂贵和生产困难的原因。因此，正

在进行中的进一步改革工业结构的过程是极其需要的，在进行改革期间，将暂时使工业生产的增长放慢下来。

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战后农业生产增长了两倍多。尽管在发展中还一直有很大波动，但长期来农业生产的增长率还是高的。虽然如此，但我们并没有摆脱主要食品的进口，这就大大加重了我们国家平衡（尤其是收支平衡）的负担。谈到出口，国内为出口肉和肉制品创造了最稳定的条件，但正是在这方面，国外市场情况却大大恶化了。

我们很早就对世界经济开放了。今天出口的商品和劳务约占社会产品的百分之二十四，而进口约占百分之二十八。如果注意到我国的发展水平，就可以看出，我们参加国际分工的水平是比较高的，鉴于国家的幅员和自然条件，也就是考虑到市场可能受到的限制以及某些商品可能自给自足，我们当然希望更多地参加国际分工。但是，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参加国际分工的趋势并不有利。商品和进出口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当时出口只能抵补商品进口的一半多一点，这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从这一点来看，一九七六年的形势是改善得多了。

另一个问题是地区分布问题。我们从西方国家的进口约占全部商品进口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加上劳务和资本的输入，则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七五年，西方国家在我国商品出口中占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六左右，如果加上非贸易外汇收入则约占百分之六十。向西方国家的出口下降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一九六九和一九七三年除外）长期的特点，只是在目前西方国家的衰退时期才出现兴旺景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出口的兴旺是在这些国家的情况有很大变化

的条件下出现的，而且我们只是通过加强刺激、货币大幅度贬值以及其它手段来支持出口，同时几乎完全是我国经济向进口开放，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进口限制或外汇限制，关税也特别低。因此，暂时的繁荣首先是建立在增加出口原料、粮食和船只基础上的，这种情况正好也是当时世界形势的反映。

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近几年来在增加同发展中国家的交换中取得了特别大的成绩。一九七五年双方的贸易额增加到十七亿多美元，其中有同这些国家的很重要的财政协定和我国企业所进行的巨大的投资工程。虽然进展很大，但是这种进展也正说明，在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保持地区平衡方面，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潜力还没有被利用起来。

还应该指出的是，南斯拉夫一向执行一定的外债政策（规定借债的数额、结构和条件），同时它关心国家任何时候都保持足够的对外清偿能力。例如，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南斯拉夫经济所欠的外债相对减少了。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国外某些人士曾造谣说南斯拉夫经济可能欠债过多。然而事实是，无论是按照我国社会总产值偿还的债务来衡量，还是按照增加了的外汇收入（特别是按可兑换货币总额）来衡量，近五年里，南斯拉夫经济的债务是大大减少了。

一九七〇——一九七五年期间，来自出口的商品和劳务的外汇收入增加了约二点六倍，其中来自可兑换外汇地区的收入增加了约二点八倍；这一时期的外汇收入总额增加了约二点八倍，其中来自可兑换外汇地区的收入增加了近三倍。但与此同时，负债额也增加了约二倍。这样，外汇收入

的增加比负债额的增加就快多了。全部外汇收入中用于偿还外国贷款的部分甚至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多。这样，近年来南斯拉夫经济债务的相应数额就大大减少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国外某些人士中有关南斯拉夫经济债务的各种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这也是国外某些人对我国施加压力所惯用的一种形式。

● 南斯拉夫经济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行动必须是有组织的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在吸收额外的进口积累时，也可以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这里谈不到什么负债过多，当然，也不是意味着用增加债务的办法来进一步吸收外国积累没有限制。五年计划正是要在可能增加外债的数量问题上达成协议，因此在计划的第一部分也商定了必须保证南斯拉夫经济的相对债务不增加。

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观点来评价我国以往参加国际分工的发展情况，那么可以说：

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南斯拉夫已由一个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中等偏下的中等发达国家。南斯拉夫之所以能获得这样快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比较早地为向世界开放和广泛地参加国际分工创造了条件，这就使它能广泛利用最现代化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按照参加国际交流的水平来说，南斯拉夫占有很高地位。鉴于她的幅员和现有的经济力量，这是正常的，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使参加国际交换的程度更高些，这也是正常的。正因为如此高度地参加国际分工，南斯拉夫对国际经济形势中的各种变化就特别敏感。

今天，南斯拉夫经济拥有新的和大部分的现代化生产手段。例如，工业中有百分之七十二以上的设备不超过十年。

南斯拉夫经济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是令人满意的（在全部工业设备中，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设备占百分之六十七）。然而，当技术干部的人数和劳动的技术装备在增加时，资金的利用效率却在降低。设备利用率也不能令人满意（这是由于考虑到本国市场和出口的可能性而重新调整生产能力，由于地区和行业在发展中自给自足，由于严重依赖进口原料和能源，而在支付平衡逆差很大的情况下，原料和能源的进口量是受到限制的，由于经营方式而造成的生产成本低，还由于某些设备能力在经济上低于最好水平等等）。

南斯拉夫工业发展的很重要部分是建立在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利用各种工业专利权上的，这就能使现代化的工艺技术成就转移到我国经济中来。这是促使经济和技术飞速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所取得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会把自己引向不利的境地，这在世界经济关系变化的情况下尖锐地显示出来了。首先是搞来了许多不需要的许可证。虽然南斯拉夫在这一方面是各个外国公司大量竞争的市场，但我们没有适当地利用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合理保障新工艺、许可证和其它工业专利权中，我们承担了许多使利用这些专利受到限制的义务，而把更多的好处让给了专利提供者即发达国家。引进的许多许可证给外国伙伴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却限制了南斯拉夫经济。通常，南斯拉夫伙伴必须从许可证提供者那里购买有关的商品和设备，只有当购买了所规定数量的商品后许可证的权利才有效，在利用许可证的整个期间必须从许可证提供者那里购买原料，而我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只能在南斯拉夫市场或者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上出售等等。

由于不存在共同商定的发展政策，购买工业专利权和同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伙伴密切联系是不符合基本发展方向的，这个方向是要保证对南斯拉夫经济的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及保证它处于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我们没有统计资料来进行有效分析，但我们可以拿出一些材料来评价这些情况。例如，自一九七三年二月到一九七五年年底共登记购买工业专利的合同有三百五十四项，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同西方签订的。同一时期共登记出售我国工艺的合同有九项，这主要是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通过进口新技术而得到的益处是不容怀疑的，同时考虑到获取技术的方式和价格（当时原料和能源的价格也很低），这在国际经济条件变动的情况下必然带来困难。我们的困难还由于多年来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经济，于是忽视了国内有组织的发展和研究工作，尽管专业和科研干部在日益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购买工业专利权正是由于对南斯拉夫的国际经济地位所产生的后果抱着无所谓态度造成的，对待自己的发展和其它研究工作也是抱这样的态度。实际上我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高昂的代价进口设备和技术而看不起自己的劳动、技术、原料和能源，这在变化着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必然导致困难和问题。一向的出路是，把大量开支转嫁给本国消费者，大幅度提高物价和通货膨胀，也就是不断增加收支逆差。

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即使国际经济形势毫无变化，南斯拉夫必须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这是继续成功地向新的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迈进的前提。国际形势的尖锐化需要这样做，而且显得更加紧迫。显然，我们的方针不仅必须继续而且要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然而在今后的年代里，我

们必须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这一合作。所以，与开始工业发展时相比，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发展水平更高了，而且干部的能力及其数量也是令人满意的。有利于我们的是，我们是西方国家重要的经济伙伴，我们从这些国家进口的规模以及其它的合作形式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取得了许多成绩，而这一合作的可能性无论是在贸易方面还是在长期合作方面，特别是在工艺技术的转让方面都没有利用起来。因此，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应该是为更平等地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创造条件的重要经济前提。今天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必须利用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水平和多样化，以便为进一步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并为同它们的平等关系创造条件。显然，正因为现在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所以自发地推动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是危险的和有害的。

在平等关系的情况下，大大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是今后重大而复杂的任务，因为将来这些国家必然将经受经济动荡。

这将加强西方发达国家的闭关自守、干涉主义和歧视的倾向，加强它们对南斯拉夫的扩张性出口以及加强同我们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竞争。要求平等的关系和平衡的贸易不仅是经济上合理的要求，而且也是发展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的经济需要和前提，我们对此是特别关心的。

但是必须指出，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仅仅通过货币比价、关税、调整和限制外汇和进口的传统手段和刺激出口



措施等，是再也不能保障更平衡的贸易关系的。尽管所有这些手段仍然是这种平衡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但这些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在南斯拉夫经济在工艺技术上高度依赖进口设备、原料、再生产资料和半加工产品的条件下，这些措施的效果将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商品交换中出现巨额逆差，必须大量偿还贷款和许多居民持有外汇的情况，通过改变货币比价来改善出口的地位，实际上意味着大大加重了经济的额外负担，并把部分收入转到了居民手中。这些措施在过去没有收到长期效果，这是因为这些措施必须是非常合理的。同时，即使在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关系不仅仅是在这些国际贸易手段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而且是通过双边或多边的直接贸易协议建立起来的，但是平等伙伴之间直接的贸易协议却保障着高度的贸易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是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或大公司的长期媒介作用来实现的。因此，各国进出口的关系日益通过有关相互供货的直接协议来调整。这样，以现有的出口能力即用挣得的外汇来平衡进口是正常的经济原则，有组织的发达国家已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保证进口同扩大出口平衡的原则必须贯穿到我们的制度中去，而平衡的体现者必然是自治经济，因为这就是自治的经济利益所在。收支平衡的破坏必然导致行政机关的干预，这就要造成劳动组织业务活动的不稳定，并导致发生严重的问题和困难。

因此，必须使进口相互联系，必须协调关系，并保证商品交换能有相应的协调平衡。南斯拉夫经济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组织起来。由于发展了分地区的方法和其它形式，使得经济部门对向一些国家进出口感兴趣，这就必须制定进出口的

具体规划。必须通过协商保证进出口的平衡（进口者要提供相应的出口商品），在国内，将那些最有竞争力的商品提供者挑选出来，组织好国内经济，以便进入国际市场。我们不能等到颁布了一系列新法令以后再开始组织这样的活动。这样，就为通过正常的协商来保证进出口更好地平衡创造了条件，这样做有足够的灵活性，如果实行行政机关制定的统一措施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在全国统一安排进出口的范围内，还必须事先登记有关大批购买原料或设备的事宜，签订有关南斯拉夫商品在某些国家的供求协议。例如，现在一致同意进口一大批设备。经济部门要求适当的出口而不仅是购买设备，这是正常的。新法令应该为购买许可证增加新的条件，也一定要制止为同一种类的生产购买多种许可证的现象，就是要根据有关的发展政策来决定购买许可证，防止引进那种使南斯拉夫经济更加依赖进口而限制出口的许可证，等等。应该更加坚持要求和外国出售者一起分担好处和风险，也就是说，不仅在南斯拉夫国内，而且还要在国外市场上更多地实现共同的经济行动。

在南斯拉夫，共同投资目前还很少，尤其是外国伙伴的投资额更少。外国伙伴大部分是在出售工艺技术方面。在全部共同投资中，外国资金占百分之十五左右，而在某些活动中则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许多情况下，外国伙伴的投资是为了转让技术（往往是落后的技术），是为了保证出口设备和半成品，并且也是为了以很少的投资获取大量好处。从这个意义说，必须加强立法的调节作用：在保证能更加平等、共同分担风险和好处，因而在保障扩大我国对西方出口的情况

下，应该鼓励同外国伙伴共同投资。

通过更好地组织在国外的巨大投资工程，我们就可以有许多事情可作，并通过这一点来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以便向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及使用我们国内已有而又未恰当使用的技术干部。这样做以后，就能保证南斯拉夫商品长期出口。因此，必须详细地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需要和可能性，也要从双方的和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出南斯拉夫经济在这些国家活动的具体规划。

因此，今天的中心问题是更好地组织我国在国外的经济活动，因为，在与外国伙伴打交道中，我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外国伙伴也在重新组织，即使在西方也经常碰到国家的干预或者碰到在组织和相互联系方面都很好的公司。还必须改善国际动态的情报工作，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需要在将来有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保证迅速而很有效地实现协议的条件，对世界的经济动态能及时地反映而不致迟误。改革国内的经济结构是争取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更有利地位的重要前提，这对整个经济更加稳定也是有利的。如果不能保证出口真正增长，那么就不能在更加依赖进口的基础上计划将来的发展。国内更加稳定和物价上升缓慢是保证南斯拉夫经济有相应竞争力的重要前提。

不管应该解决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和复杂，它不是不能实现的。对我国经济来说，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严重，但是国际经济前景还是如此广阔，以致使商品交换能更加平衡并使商品交换的地区分布更加有利，这可能是而且必将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这就要求订出与某些国家进行贸易和合作的经济计划，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中改变对待进出口的

态度。一切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应该在其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内改变目前的状况。但是，过去这些计划规定对这方面是有影响的，当然这种情况既取决于国际形势，也取决于彻底解决南斯拉夫下一个五年的社会发展计划所包含的一切国内问题，特别取决于改革生产结构、合理利用设备能力、组织性和计划性、加强竞争能力和更大的出口能力（这在过去常常是很差的）。

必须恰当地组织南斯拉夫经济并更多地利用现有发展水平所具有的优越性（这是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所能允许的），还必须比以前更有效地避免承担风险或避免将风险转嫁到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南斯拉夫身上。同样如此，在当前非常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该成立一个以科学的态度持久地注意研究国际经济形势的机构。根据这个机构所提供的资料（经过必要的政治检验）就可以迅速地而不是在半年或一年以后作出反应。我认为，由于我们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别人的看法而丧失了许多东西，因为那时没有自己的系统看法。因此必须成立系统的机构。在业务上说，这些机构是有成效的，如果在执行现行经济政策时出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它们也能及时地作出决定。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资金，要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首先需要从南斯拉夫的收入中拿出资金。这是对我国未来的投资。当我们开始为争取新的国际分工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遇到这种情况。由于我们不能忽视改善南斯拉夫国际地位的任务，必须拿出相应的部分收入。这笔资金将回收得很快，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为了使南斯拉夫经济在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下能保证更长远的前途和更有利的地位，必须创造出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那种认为出口是取得发展效率，甚至是采取攻势的一个最重要经济前提的看法要占上风。

十分清楚，南斯拉夫经济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工艺技术水平前面已经谈到，如果再加上国内更好地进行组织并克服一些（确实不是少量问题）结构问题，就可以使南斯拉夫经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保持更有利的和更平等的地位。既不要夸大一九七六年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意义，也不能缩小这些成绩。出口显著增加，尤其是向可兑换外汇地区的出口更是如此，进口和出口能力协调了，出口抵补进口的水平大大提高，对外清偿能力也就增强了。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具体讨论过。所有这些成绩只是通过更好地组织、改变国内发展条件，以便通过制定出使每个经济主体都对出口感兴趣的制度所取得的。这一切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贯彻和实现的。在这方面显然还必须更加努力。这里，还必须通过外贸和外汇制度，使联合劳动本身，也使共和国和自治省在对国家的支付平衡状况的关心和责任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理由乐观地认为南斯拉夫有能力获得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

### 第三节 不稳定和通货膨胀

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迅速而又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在经济过程

中引起了并正在引起不稳定。必须对经济不稳定的问题，即对需要实行某些经济稳定政策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不仅涉及到目前的和长远的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有关自治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如何发展的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们的经济不稳定首先是自治生产关系不发达的表现，因而也是多年来物质和社会发展不够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不稳定的长期表现是通货膨胀的倾向日益加强。近些年来，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使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所取得的成果化为乌有的严重程度。经济不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突出和最复杂的问题。它尤其表现在：高度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无止境增长（它不久前还在不断增长）。这就使积累贬值，分配受到破坏，难以进行合理的投资，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贸易和收支中的长期不平衡，同时还经常出现国家对外清偿的潜力问题；财政支出有赤字和经济对内缺乏清偿能力，这是长期来或多或少存在的问题；市场的供求之间经常出现不平衡，尤其是从结构上看更是如此；在经济活动的协调中有显著的波动；发展的质量降低，经营粗放，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很缓慢，经济积累率恶化；最后，作为这种状况的后果，出现了一些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在经济活动遭到削弱，国际经济形势不利，失业问题尖锐和个人实际收入停滞的时期更是如此。经济过程中的这种情况不仅使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也使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发生困难。

就是说，尽管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自治制度，但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没有首先为发展整个制度，即没有为掌

握全部收入特别是剩余价值，也没有在此基础上为进而掌握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创造经济前提，即使在不久前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国家高度地集中了用于提高国家的生产力的剩余价值。这种剥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决定权的做法，无时不在加深着社会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国家的渠道来集中发展资金就同自治制度的发展发生矛盾，甚至集中制度本身也开始自相矛盾，因为它不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而是成为消费不合理和生产力发展得没有成效的主要根源。在后来的发展中，银行和流通领域通过市场的媒介作用变成了集中发展资金的因素。由于这种决定剩余劳动的方式而产生的实际矛盾（也就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社会分配问题），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前一个时期的特点是工人对剩余劳动的决定权被剥夺了。

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是仍然不让工人去决定发展目标以及政策措施的基本原因。因此，发展计划往往超过现实的可能性。这样做的后果使工人落后了，他们首先起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收入，因为所有发展计划实际上都由个人收入来负担。为了现代化的需要和充分利用设备能力，经济必然从依靠自己那点可怜的积累转而依靠流动资金，而有时甚至依靠个人收入。经济部门仍然依赖银行制度，依靠通过这一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贷款，也就是说经济部门仍然负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以提高物价来获取收入的争吵和缺乏清偿能力只不过是这种生产关系状况和工人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所处地位的一种表现而已。因此，作为我们所面临的长期问题，通货膨胀和缺乏清偿能力首先有其社会根源，其中对必要劳动

和剩余劳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事实是，剩余劳动使用的主要决定权不受工人生产者自己的影响，于是不断滋长各种欲望：既想发展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也想发展社会上层建筑，特别是要发展社会服务部门。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这样的倾向，认为剩余劳动的增加是依靠必要劳动实现的，这种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投资超过了实际可能。这样一来，经济就处在不断贫困的危险之中，经常存在这种倾向：重新分配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重必要劳动的负担，工人对剩余劳动的支配影响很小。这是物价上涨的主要社会原因。在不久前的支付制度中，没有钱——即缺乏清偿能力又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并通过利息在联合劳动之外继续集中和重新分配积累创造了条件。通货膨胀和缺乏清偿能力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基础就是保持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财政和流通领域的独立，特别是银行和贸易的独立，使经济领域脱离了工人。从社会的意义上说，这些事实对于前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社会上层建筑是重要的，但它们也是产生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趋势的社会条件。改变这些社会条件的进程已经开始，但是这些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基本问题和矛盾还没有解决。

### 一、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和原因

如前所述，我国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是由来已久的，它从多方面影响和引起我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实质上，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自治的生产关系发展中的落后状态和没有按自治的原则建立经济制度，物质关系方面所有通货膨胀的因素都是从这个基本原因产生的。甚至在我国社会实行自治以后，



也还长期保留着使联合劳动不能掌握剩余劳动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那种关系。在经济制度的各个部分中，尤其是在分配制度和扩大再生产的拨款制度中，还继续存在使剩余价值脱离直接生产者的某些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真正的联合劳动关系（或多或少是通过自发的市场关系来实现的）往往受到国家行政机关的不小影响；也受到官僚主义专家治国论的很大影响，它们以代表联合劳动及其利益的虚假面貌出现。这完全是事实，并且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因为以前既没有充分地自觉地掌握相互之间的联合劳动关系，也没有在长期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关系。因此，目前的状况表明，一切生产者（即联合劳动作为商品生产者）都处在自发形成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驱使一部分联合劳动组织去同另一部分联合劳动组织竞争，不管竞争的双方是属于同一个劳动集团或属于不同的劳动集团，情况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市场关系，而这就意味着它们是由收入和再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自发地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当前的联合劳动或它的某些部分，客观上处在为自己的收入和积累而激烈竞争的状态。不久前还很少有计划，甚至在联合劳动组织内部也很少有计划，至于协调联合劳动与其它再生产自治单位的利益的现实计划，实际上是没有的。因此，在这样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生产力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发展是自发的。当然，从事物的实质来说，相互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矛盾。

对建立和使用大部分社会积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国家、银行和其它非经济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联合劳动当然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因此，在社会所需要的一些优先项目

范围内，社会积累并没有充分有效地和合理地用来在结构上更平衡地和稳定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要。自治计划制度的严重缺点、市场本身调节得不够和市场不够发达，使这方面的缺点错误有增无已，从而造成了物质发展中的某些不协调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决定和其它经济决定更多的是在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和往往是对市场行情判断错误的影响下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发展的需要和联合劳动的实际利益去制定。

经济部门结构的失调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

(1) 经济的某些部类之间的失调，它表现在第一部类和第三部类落后于第二部类；

(2) 某些经济部门内部的失调，表现突出的是工业内部；

(3) 由于一些设备能力利用不足而反映出来的失调，这种失调在许多工业部门都存在，它还表现为一些工段的不协调。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多年来首先遭到破坏的是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关系。第一部类应该为扩大再生产和迅速发展保障物质前提。但从其物质基础来看，第一部类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收入分配处于矛盾状态，这一种矛盾本身必然影响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其它不良因素。在第一部类内部，特别落后的是动力和原料的生产。劳动资料生产的特点是机器制造业和电力工业非常分散，发展无计划，并因此而没有掌握或很少掌握自己的技术。这些行业是外国技术的大量引进者和模仿者，它们往往为同一种生产过程引进多种技术。在第二部类中，人们需要

的食品还一直缺乏，而工业品生产明显过剩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特别是大量过剩的商品，如，白色工业（一般指家用电器——译者注）、汽车和其它耐用消费品。多年来正是从这些商品中能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并且按照应得的利润（即按照投入货币资本增值的逻辑）把集中在银行业范围内的、脱离生产者的积累用来扩大这些行业的设备能力。因此，所有的工业设备能力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一般都低于最好水平，而且，由于经济结构总的失调，特别是第二部类许多工业部门的设备能力没有充分利用，其后果是生产成本不断提高。鉴于投资战线拉得很长，因此投资既没有同财政积累，也没有同物质积累协调一致。这样大量的投资费用都算进了生产价格。这一切的最终后果是使经济的积累和再生产能力越来越小，这迫使通过提高价格来弥补它。

加工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进口，而且没有充分合理的分工。生产的批量特别小而且不经济。南斯拉夫某些成品的总产量对一个工厂来说是经济上最好的批量，这也是节约的最低限度。然而，这个产量往往是四个、五个或更多的工厂完成的。因此，每个工厂一般都依靠别人的许可证和技术，本身的技术发展因此而落后了。许多设备能力按其规模来说，它不可能在国内外市场销售其产品。由于市场的限制、能源和原料的缺乏以及其它许多原因，设备能力没有得到合理使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设备能力客观上只能有限地被利用。这样，生产成本就提高，这就使产品销售，特别是在国外市场销售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因此，生产率水平就不能令人满意。一九七五年在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经济中每小时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是二十六第纳尔左右。显而

易见，这新创造的二十六第纳尔价值对满足工人实际的和必需的生活需要是多么的少，对满足共同的需要是多么的少，对积累和满足所有其它的共同需要又是多么的少。然而，在这样的发展条件和生产力结构的情况下，这样少的价值还不可能大量增加。由于分工不合理，某些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关系首先以竞争的形式出现，它们在国外往往竞争得更为激烈，而相互合作、协作和协商的精神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在这样的生产力情况下，在这种制度的条件下，协作和协商的精神根本不可能出现。

在再生产能力这样低下而且又不断下降以及剥夺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生产者自己很少的一点积累对投资只起到起码的作用，他们把对自己工程的财政拨款作为积累的主要来源。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部门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会影响整个再生产过程。因此，以往十五年的特点是积累建立得不合理，积累的使用也不够合理，这些问题现在也还没有克服。不但如此，近些年来这些问题还有增无已。这表现在通货膨胀在加强，生产停顿的周期性还有加快的迹象，个人实际收入停滞，经营的质量降低了，经营中的粗放成分一直是最突出的问题。

物质生产结构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比较低，商品货币关系的结构长期不平衡和一系列亏空（收支逆差、亏损、投资不能保证、某些种类商品短缺），这些因素通过物价上涨波及到整个经济和居民。

现行的经济结构是近十年来无计划发展和经济制度存在严重缺点的结果。对这种不利经济结构影响特别大的是基础产品的价格被置于直接的社会监督之下，其价格水平也很

低，但是加工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大部分都是自由确定的，同时加工工业部门既得到不受进口侵害的高度保护，又能高度自由地进口半成品。

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五年的社会计划确认了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并计划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在这方面没有出现什么重大变化。加工工业部门的投资的增加仍然大大快于动力和原料部门的投资。因此，依靠进口原料和部件的加工工业设备能力的发展大大超过落后的原料生产和整个基础部门，基础部门开始成为整个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目前的工业结构适合于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和更高的消费水平，而不适应于南斯拉夫现有的水平。从其整个的生产可能性来说，加工部门的设备能力大大超过了南斯拉夫市场的吸收能力，但是由于外国的剧烈竞争，更难通过出口来保证扩大市场。

改革不利的经济结构的工作进展很缓慢，其原因为：

(1) 缺少合适的方法，以便在自治的基础上通过这些方法把社会积累联合起来，并把它用在必须有助于改进经济结构的项目上；(2) 某些结构反对改变现状和改变其所处的地位。仅仅依靠工人集体的某些行动是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革的。这必须最大限度地依靠经济政策的措施和整个社会的努力。在这方面近来有令人鼓舞的变化，无论是态度上还是在改变投资结构中都有很大变化。

由于分配制度和支付相互债务的方式中存在一些缺点，由于超过物质可能性的过高的发展计划，前一时期就出现了国民收入分配过分紧张和某些消费形式的财政亏空。近年来总消费和集体消费资金的增加以及用于抚养老人费用的规模（这些消费有不断增加的趋势）都超过了经济能力，并且对

再生产能力产生不良影响。这减少了经济积累并限制着再生产过程正常发展的活动范围。

多年来物价制度一直是被置于国家行政机关决定的高度影响之下，现在也仍然是这样。这些决定就其性质来说是要通过物价来弥补经营的不合理性和发展政策中不现实的计划。如果说多年来所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根据发货单而不是根据产品销售所实得的钱款，那么，获得收入的方式和收入分配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能够，而且实际上还能促使某些联合劳动组织通过物价这个基本因素去解决自己的经济地位问题。物价制度中未解决的问题引起了经营条件的经常变化，往往是一些价格差别消除了，但又出现了另一些价格差别。尽管近些年来初次分配的关系变得有利于原料生产和基础生产部门以及食品生产，但由于实行改革的方式不当，由于接受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这些改革使得整个价格水平不断提高，使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进行不适当地再分配，并且使经济主体处于希望和要求通过提高物价来解决其经济地位问题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和实行的货币信贷政策有了很大的扩大，实际上是用货币量掩盖了名义收入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的背后又没有实际的物质作保证。这实际上是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自己增加自己的收入，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必将使通货膨胀达到不能再高的程度，使发展中所取得的其它成就发生问题。就是说，收入分配领域的这种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了通货膨胀，它自发地使收入重新分配，并且客观上妨碍着联合劳动去自觉地掌握全部收入和消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自觉掌握再生产过程的斗争就没有推动力，所以，

对经营质量的任何刺激手段都遭到十分明显的削弱。

国内发展的这种状况对参加国际分工的方式也有影响。国家对进口的依赖增加了，而它的出口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出口能力之所以没有能同样发展，是因为与投入的资金、干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相比，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使生产能力也相应增长。不仅如此，效率不高、生产成本提高的因素增加了，它再次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条件。我国的通货膨胀一直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通货膨胀。因此，出口只能部分地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这里还需补充一点，即我们在国外市场上活动的组织工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只是我国内部发展的同一个突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再则，与市场的变化相比，许多经济部门却消极不变，出口和进口方面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发展方式带来的自然结果就是收支逆差。出口总是不能以满意的百分比弥补进口。在好的年景里，进口是由非贸易外汇收入来弥补的，而当西方世界非常景气的时期，进口首先是靠旅游业和工人的外汇汇款所得的大量收入来弥补，甚至还能有一定的收支盈余。然而，这个盈余并不是什么国内情况有了转变和南斯拉夫在国际分工中的现实地位有了改变的稳定标志，而是一种暂时的有利情况。一旦世界上而首先是西欧出现重大变化时，国际商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就更加不利于南斯拉夫，我国的出口也要遇到很大障碍，保持收支平衡的幻想必将再次变成收支逆差的现实。因此必须指出，为了发展的需要，南斯拉夫经济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还需要外国的补充资金。但近些年来逆差不仅很高，而且有迅速增加的迹象，这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不是南斯拉夫经济实际需要的反映。

当谈到通货膨胀时,应该说,近两年来世界的经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以我国目前参加国际分工的规模和结构所处的状况而论,世界上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原料、粮食和能源以及后来的成品价格上涨的结果,使不稳定的国际因素成了我们整个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实际上成了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严重的外来根源。例如,一九七四年物价上涨的大约一半和一九七五年物价上涨的部分是由于进出口价格的变化引起的。

发展不平衡既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同样也表现为社会上层建筑发展不平衡。教育、卫生和其它社会部门的发展只追求数量而没有充分的计划性。当然,整个发展和经济发展以及自治制度本身都要求这些部门迅速发展。但是它们发展非常自流。这样的发展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收入用来满足这些部门的需要。这个有发展潜力的非生产性消费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的能力不协调。前个时期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建立在十分健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上的,通过发展也没有令人满意地减少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客观矛盾。因此,良好的经营结果,即生产的增长、就业的增加、生产率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增加、实际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首先是社会消费方面的实际水平的提高,是在通货膨胀、收支逆差和其它困难增加的不利情况下取得的,这就使发展中取得的成果大为逊色。

在这种生产关系状况和这样的物质和社会发展的条件下,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在不断地受到要暂时去缓和客观矛盾的压力,这些矛盾是由于这种生产关系状况和生



产力发展的方式而产生的。现行的经济政策从来没有能消除不稳定的重要据源，而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消除其后果。因此，经济政策无论是对生产关系的发展还是对生产力发展中的重大变革都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发展有周期性，它本身实际上掩盖着巨大的损失。然而，消除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现行政策的职能范围。弥补这些错误的第一个药方是协调社会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活动，当然还要建立新的现实的发展单位。但是，这要求对经济和社会部门进行自治的改组并把剩余劳动逐步地从经济方面掌握过来。这是艰巨的革命任务，但这是开始健康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唯一现实的道路。无疑，这样做并不是意味着什么反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而是相反，它使发展适应这些规律并由联合劳动来掌握这些规律。让自发势力和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放任自流，任何时候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美德。这是多年来我们所存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它也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相应的物质反应，也是今天的不平衡、动荡、通货膨胀、逆差和缺乏清偿能力的根源。

这些年来采取了制止不良倾向的措施。稳定化纲领和为实现这个纲领所作的努力，可能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再出现大的动荡，但是这些效果是短暂的。这些努力仍然属于现行经济政策的范围，因此它只是集中去克服不稳定的后果，而不是清除其根本原因。在某些时候，用这个办法使不稳定从尖锐的状态变成隐蔽的状态，但未能保证经济长期稳定的基础，这是发达的自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

## 二、克服不稳定的战略和主要措施

在准备南斯拉夫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的社会计划，根据新宪法以及南斯拉夫一九七六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共同政策决议的精神拟定一系列决定时，开始着手制定有关经济稳定政策的专门文件，其方针是把该文件的原则纳入根据五年计划采取的社会计划、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度和措施中去。

这个任务是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来的，关于经济稳定的决议说：“实现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前提是确立并实现这样的社会计划和经济政策，这个计划和政策将为生产力的协调和迅速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在此基础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创造条件，这将从物质上和创造性地推动实现经济稳定。”

换言之，经济稳定政策文件的任务是提供一些设想和实际措施，以便使政策决议变为一切社会因素为争取经济的稳定而斗争的具体活动的基础<sup>①</sup>。

在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直接有关的专业单位和政治单位充分参加的条件下，一九七六年年初制定并通过了经济稳定政策文件。文件详细地分析了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并试图解释通货膨胀重新产生的原因。分析了生产力及其机构，分析了导致再生产过程结构失调的原因，对目前的状况和趋势进行评价，还对使我国发展不稳定和出现通货膨胀的其

<sup>①</sup> 经济稳定政策的文件是联邦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委员会的特别小组制定的。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的会议上通过了这个文件。

它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对通货膨胀原因的评价出发，提出了下阶段经济稳定政策的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成为经济决定的体现者，以便根据这些标准的要求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经济决定并使之具体化。

在提出经济稳定政策的目标和任务的时候，要根据过去的经济稳定纲领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只靠短期的个别经济政策措施是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我国一切因素进行长期的艰巨的共同努力，以克服通货膨胀产生的主要原因。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保障经济长期稳定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稳定问题不能用经济停滞、增加失业人数和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解决。就是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今天也尽可能避免用这种办法来反通货膨胀。在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稳定政策必须以保障经济的迅速而稳定的发展为基础，因为经济的发展能够成功地克服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并满意地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实现这个经济稳定政策的战略目标的前提是：

1) 在新宪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自治关系，并且为实现稳定而采取措施等条件；

2) 在改革经济结构、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经济潜力和社会生产潜力以及改善南斯拉夫在世界分工地位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迅速和稳定的发展；

3) 加强发展的质量因素；

4) 协调分配领域和对社会再生产投资领域的关系；

5) 市场和价格的稳定；

6) 加强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能力。

这种经济稳定政策含义指的是要把长期目标、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基础的发展同现行的经济政策完整地联系起来，通过旨在克服不稳定原因的有关的经济政策措施，这样的现行稳定政策是能够逐渐使通货膨胀缓和下来的。

这里包括一系列任务，而预定的经济稳定政策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系列任务的完成，这些任务是：充分地参加和最有效地利用目前拥有的全部经济潜力；利用科学、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成果即利用我国和其它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积极发展科学并彻底地利用和采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改善联合劳动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整个劳动和生活条件；更加重视社会物质与道德，并且尊重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劳动和成果；鼓励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收入；自始至终贯彻这样的原则，即在生产力和收入社会化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取得的全部成果必须根据参加创造共同成果中的全体工人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所作的贡献来进行分配；开展社会活动，使它比现在更能行使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的职能。

在贯彻和实行经济稳定政策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中，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下列基本前提：

**在宪法和建立新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自治生产关系是使经济长期稳定的重要前提** 这里所指的仅是建立这样严密的经济制度问题：应该把将来能防止变化和通货膨胀的冲击的方法和行动准则贯穿到经济制度中去。而且也是指把它们联合成在收入上有联系的更广泛的再生产联合体，这种联合

体将真正能使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对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起到决定性影响。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让所有自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把努力的重点放在：①在收入关系的基础上，在根据自治协议进行劳动和资金的联合的基础上，加快并扩大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相互联系；②建立社会部门的自治利益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中联合劳动将是平等伙伴；③不断地促进代表团制度的效能；④根据宪法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委员会。

为了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制定严密的自治计划制度并使之广泛地渗透到一切计划部门的思想之中，使自治计划成为他们自觉地推动生产力和自治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成为使它们完整地结合起来的行动准则和基本方法。在提出经济制度的一整套方法时，应考虑的经济稳定的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适当地组织市场以及保证市场对经济主体的活动和生产力的布局起积极作用。

**经济发展的动态和基本方向** 实现经济迅速与健康发展是反通货膨胀的出发点。这种增长形式应能保证经济结构的改革、社会问题的满意解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对经营方式进行重大的质的改革之上，即放弃粗放性发展转向集约化发展，更显著地提高生产率，节约劳动和资金。

在决定下一阶段发展的速度和基本方向的时候，必须特别遵循的依据是：联合劳动的宪法立场、现有经济资源及其结构（物质的和能源的状况、收支状况）、就业率的增长（通过它来解决存在的人口增长的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通过迅速发展能源和粮食生产而使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发展方针，使我国经济在经济上合理地参加国际分工，

把国民收入用于积累和消费方面的关系协调起来。社会部门的发展情况既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要适应经济的物质可能性。

在决定发展政策中的优先项目时必须从下列原则出发：

- 1) 发展那些在合理范围内代替进口的生产设备；
- 2) 发展那些有利于获得净外汇收入的出口活动；
- 3) 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经济部门（动力和基本交通）；
- 4) 迅速消除我国某些地区发展水平上的差别；
- 5) 发展那些吸引本国购买力、对国内市场有积极影响，而把基础建立在本国原料资源和本国劳动之上的部门。

如前所述，经济过程已经告诉我们，与加工部门的发展相比，原料生产和半成品生产已经大大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国家收支平衡的负担并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在一九七五年进口总额中，百分之七十用于进口原料和半成品。国家的收支状况再也不能维持加工部门在不断增加进口基础上的发展。所以，迅速发展在经济上合算的原料生产就成为为工业稳定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应该把重点放在迅速发展主要金属、非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料的生产上以及木材的合理利用上。

对于那些能大量增加外汇净收入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应予以特别注意，因为这些部门生产的发展有利于支付平衡。其中，应该用外国贷款和其它资金、外汇收入方面的优惠和其它措施来推动旅游设施更快地建设，以便在增加外国游客的基础上增加外汇收入。所有净外汇输入部门都应这样做。

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对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

自治省实现发展政策有不良影响，并且大大地削弱了为使它们迅速发展而共同努力的效果。因此，经济的稳定对这些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经济发展特别重要。全国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对这些地区的迅速发展特别有利，因为对动力和原料生产部门进行投资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然而，为达此目的，还需作出一定的努力，以便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已拨出来的用于这些地区迅速发展的那部分资金，以便吸收经济发达地区（该地区的促进作用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的其它资金。应该研究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成立专门机构的可能性，这些机构将定出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来拟定计划，选择投资使用者，并且使经济发达共和国的那些准备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投资的组织，参加使用联邦拨出来用于加快这些地区发展的基金会的资金。

增加住房建设对经济的稳定和整个通货膨胀的缓和有良好的作用。住房建设对于推动生产、增加主要用本国原材料进行生产的经济部门的就业都是很重要的因素，这对国家的支付平衡有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建筑业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建设的住房不足，住宅价格太贵，建筑成本高，施工组织差，住房建筑拨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房租低等。因此，为了增加住宅建筑的规模，下阶段应该：①通过集中建筑，保证更节约的、大批的和连续的建筑，以及通过改善组织和其它措施来加强住宅建筑的工业化和合理化过程；②通过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措施，通过维护为住宅而储蓄的实际好处来鼓励用个人资金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③到一九八〇年以前，逐步把房租提高到能保证住宅基金的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水平，同时对收入低的家庭的房租有区别地给予补贴。

所谓小经济的迅速发展能够对经济的稳定和克服经济结构的失调作出重大贡献。由于小经济在成批量生产中的特殊作用和补充作用，因而它能够更好地供应市场的商品和劳务，更均衡地发展以及可以增加就业和更好地利用现有基础与某些领域的生产潜力。因此，应该通过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措施以及提供其它方便条件（培养手工艺学徒等）来促使手工艺和其它服务部门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力充足的不发达地区和农村更应如此。

应该按照下阶段的这种发展方针来决定投资政策。下阶段投资政策的准则应该：

1) 根据新投资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有助于克服社会生产中的失调现象和减少国家的收支逆差；

2) 根据新投资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有利于更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潜力；

3) 保证建设的投资资金和未来（原料和动力）生产与销售的物质前提，解决基础部门的共同问题及其它问题（同时还应规定和增添有关投资者的义务和行动的一整套措施）；

4) 对生产设备利用率低于规定水平的生产部门不给予新的投资，需要恢复和使陈旧设备现代化的部门例外（这条原则要由共和国与自治省协商决定）。

联合劳动应该通过业务银行的业务政策保证始终如一地尊重协商一致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准则。

由于改革经济结构需要大量资本投资，今后在对新项目进行投资的基础上增加就业的可能性将受到相对限制，这就



要求提高轮班制的效率和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生产潜力，要求迅速发展“小经济”，发展服务性手工业和服务行业，尤其是发展旅游业。应该用提供贷款、减税和其它方便条件的方法来推动这些部门的迅速发展。但是，从就业的观点来看，为减慢居民成分的非农业化进程创造条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目前个体农业成分中青年人大量外流在经济上是承担不了的。此外，在这方面还应该：1) 为个体农户增加收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与合作社联合、改革教育制度等）；2) 重新研究实行适当的社会保险形式和工人在劳动中所享有的某些其它权利；3) 加速改变农业的所有制关系，以扩大社会主义成分，通过联合过程来增加个体农户的生产。

**发展质量因素** 实现经济稳定政策的一个基本杠杆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社会再生产一切因素的利用效率。因而需要在社会的各方面广泛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再生产消费合理化、节约生产和非生产部门的劳动和资金、降低成本的运动。

为了使经营的质量因素更充分地发挥作用，特别重要的是：

1) 改进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分配制度，改善对生产和创造性劳动的物质刺激；

2) 改善劳动的社会组织；

3) 加强经营和生产活动的市场原则，逐渐地越来越多地把生产置于本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经济压力之下，并以此来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同时，应加强业务活动中的物质责任和财经纪律，对于因业务疏忽所引起的经济

后果和其它后果要严加处置；

4) 为劳动与资金的迅速联合和在此基础上更广泛地使联合劳动一体化创造全面条件；

5) 建立相应的情报系统，通过情况和情报的交流保证使决策者在宏观和微观的水平上不断获得国内外经济动态以及我国的经济形势的全部重要情报。为了让我国的许多决策者能作出高质量的决定，极需建立这样一种情报系统；

6) 鼓励革新和创造发明，尽管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这方面是落后的，而革新创造是提高质量因素的一个重要前提。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对待发明家和技术进步。因而要用法律条款来调整行动和条件，以便实行和应用发明和技术进步，调整奖励发明家的方法和标准。

为了成功地实行经济稳定政策，特别重要的是，各级联合劳动组织要制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专门措施计划，这些措施计划将确定联合劳动组织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详细拟定使内部潜力发挥作用的措施。因此，要特别致力于，完善劳动组织并在社会生产中推广采用科技进步成果；使生产计划合理化、专业化和协作；克服生产过程的障碍和更好地利用固定资金，此外在可能的地方实行两班和三班轮换制或连续的工作制度；更好地节约原材料；建立起按劳动成果奖励的鼓励制度；促进销售；改善就业者的技术熟练结构等。与此同时，还应建立测定劳动生产率的统一方法，以便使联合劳动组织能够注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动向并实现已经通过的计划。

**协调收入分配关系** 经济稳定政策的成功实现要求坚决地把一切消费形式都纳入现有资金的范围内，停止亏本的投资活动，进行有利于经济的收入再分配，以便加强经济的积累

能力和再生产能力。为了实现经济稳定的这个目的，需要：

1) 对收入的形成和分配制度与办法进行某些改革。首先把联合劳动组织的收入分成切实可行的等级，其次，停止在社会再生产各部门进行亏本投资(法律规定情况例外)。因而，下阶段应该实现从按发货单位结算收入的制度过渡到按实际付款结算收入，实行支付有价证券的流通。同样，也应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来弥补上述亏损，使之不致成为通货膨胀和缺乏清偿能力的原因；

2) 克服通货膨胀对联合劳动组织的积累和储蓄的消极影响，以便保证联合劳动的社会资金和物质基础的实际价值。这涉及到目前不断恢复固定资金平价的制度，同时还应研究把这个制度部分地推广应用到流动资金以及负债和资产问题上。同时也应研究把长期信贷关系建立在指数法的基础上。特别重要的是在投资计划中——这种实现需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增加“通货膨胀条款”，这一条款将责成投资者保证超过的那部分贷款，但也要让投资的执行者严格地承担义务，以便把得到的好处同实现自己的义务结合起来。

3) 特别是在下一个中期计划的头几年，为了加强经济的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要对收入进行一定的再分配，使之有利于经济，其做法是使总消费与共同消费的开支和个人收入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克服通货膨胀要付出代价，这副担子应该由社会的各方面来承担。这种再分配能够使经济结构得到改变并使上阶段的各种亏空得到改善。

经济的稳定应该要求下一阶段社会部门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比经济的增长缓慢一些。因此，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些部门更集约化地发展，克服过去这些部门的粗放发展中产

生的大量缺点。

为了在社会部门的发展中贯彻这样的方针，为了保证下一阶段经济稳定要求相对减少总消费和共同体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的愿望得以实现，需要在以下两个基本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要在宪法基础上对社会部门进行彻底改革并保证联合劳动对这些部门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对社会共同需求的拨款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前提。对社会需求进行拨款应该在直接交换劳动和协调计划的基础上进行，此外，在经济可能的范围内，这个计划将规定资金使用者承担的权限和这些部门的服务标准，另外，只要这种对社会部门的拨款方式不改变，总消费和共同消费开支的减少就必须用其它资金来保证。这里首先指的是：1) 每年协商确定总消费和共同消费的平衡和这些消费的总增长率在这些消费内部，某些社会政治共同体预算收入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增减，也可以在自治利益共同体范围内交换；2) 把满足社会共同需要和对社会部门进行拨款方面的等级表和先后次序确定下来并得到社会的承认；3) 重新研究我国战后各个时期用不同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共同消费的权限，并且使整个消费领域同宪法条款协调起来，同时，从经济收入和就业者个人收入提取抚养费的权利不增加；4) 社会政治共同体和自治利益共同体降低用于总消费和共同消费拨款的税收和上缴的比率，并且把它同有关从收入中拨出资金用于这方面需要的数额的总方针协调起来；5) 甚至比迄今还要更合适地向居民和私营经济收税，这就不能不刺激依靠个人资金进行活动的私营经济的发展。

在下阶段，税收政策应该成为经济稳定的手段。为此目的，有必要对税收制度和上缴制度进行某些改革，其方向

是：取消税收和上缴的消费项目并逐步实行按照效果征税，对垄断性利润和利息加重征税，更充分地利用流通税这个市场的调节器，对财产和生活奢侈品增收附加税。

社会成分的就业者也应承担一部分稳定经济的担子。个人收入的增长应该比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增长缓慢，以便为增加积累创造条件。下阶段养老金和其它个人收益的增加应该比个人收入的增加缓慢，因为前五年的养老金和残废金的实际平均增长率比实际个人收入的增长快二倍。

尽管个人收入并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然而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一些必须予以克服的问题，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有两个。第一个是个人收入中的平均主义倾向，这减少了工人对物质利益的关心。平均主义现象是在我国经济中经营质量下降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减慢的时候出现的。平均主义现象主要是由于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保证个人收入较低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而引起的。这些措施的实行是为了增加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但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谈到保护低收入就片面地把同类就业者——例如大学毕业就业者——的个人收入拉平而不管他们的劳动成果如何。问题还在于存在着如下一种实际情况，即还有一些行业和部门的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它部门的个人收入，这些部门的收入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们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比劳动地位更优越。

解决个人收入分配中的这种那种问题的基本前提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收入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为此目的应该：1) 更好地阐明有关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和条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并尽最大可能使看法与立场

协调一致；2) 根据个体的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建立起尊重社会收入的准则，并把这一准则贯穿到收入和个人收入分配的制度和政策中去。在收入分配方面有两个基本问题：①个人收入和共同消费与为了扩大联合劳动物质基础而进行的积累两者之间的关系；②检验这些关系的标准。

决定收入分配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人的自治权利，他们独立地决定收入分配。应该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决定分配的适当标准，这个标准包括协商同意的从收入中拨发来用作某些用途的最低资金。

然而，为了有效地发挥分配制度的作用，必须克服某些联合劳动集团在获得收入条件方面存在不平等地位的现状。因此，重要的是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初次分配、自由交换劳动等）保证对每个人的劳动贡献给予同等的社会尊重，鼓励为不断地提高个体和社会劳动的生产率作出努力。在这方面，应该把依靠利息、依靠垄断市场的地位或用其它方法而不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得到的那部分收入用到能够收到最大效果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去。

工人在每个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贡献大小可以用专门方法来确定。劳动贡献的价值如何应该取决于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得到收入的多少。这样就能保证工人去关心取得更好的经营效率。

为了使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从相互矛盾的境地，也就是从迅速提高较低的个人收入与反对平均主义这两种要求相矛盾的境地摆脱出来，应该少用直接提高个人收入的方法而更多地用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和共同消费的方法来保证收入较低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特别重要的是控制生活消费领域方面的发

展。为达此目的，应该更广泛地利用给那些对生活费用特别重要的产品（首先是食品）和服务（首先是公共服务）价格以补贴的办法。

**市场和价格** 经济稳定政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市场和价格的稳定。通货膨胀率必须一年低于一年，但同时应在这个范围内逐渐消除差价，在更合理的基础上从收入的角度改善并稳定初次分配关系。

为了使市场能积极地影响经济稳定过程，应当适当地造成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以便使市场能够有效地组织并积极地调节供求关系。新经济制度和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相应的经济政策的建立，在组织和调节供求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建立起一整套经济手段，以便把市场组织起来，使整个供求结构关系得到事先平衡。同时，应该建立起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平衡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自动发生作用，并且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措施或者从供求方面、或者从需求方面来推动商品货币协调关系的建立。

为了使市场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和建立起市场的协调关系，改善商品交换的组织工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应该：1) 促进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之间劳动和资金的联合过程；2) 建立起市场的平等关系，而且把我国的规章和商业惯例也应用到外国生产者身上；3) 抛弃买卖关系的范畴，而把贸易组织和生产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

要特别注意向城市和工业中心供应农产品和食品，因为这是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是由于食品费用在生活费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还存在着造成供应的不稳定和昂贵的长期困难。为了更好地向市民供应农副产品，应该：

1) 赋予从事农产品和食品流通的联合劳动组织以特殊需要的社会地位，并通过贷款、税收和其它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2) 放宽流通中容易变质的食品差价，取消把提存金用于投资发展这种贸易形式的义务；3) 讨论使个体农户的农副产品买卖合法化和发展的可能性。

稳定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是有效地发挥商品的物资储备的作用。应该加速建立各级商品的物资储备并解决其拨款问题。

可以说，通过前一时期所进行的改革，改变了价格的相对关系，使其符合所规定的政策。原料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得到了改善。不应通过一些单项决定或其它形式来提高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的物价，也不能用这种方法起缓冲作用。但这不是意味着不改变价格关系。然而，这些改革必须这样进行：

1) 必须在新的计划制度范围内进行，因为在这个范围内能准确地知道再分配的效果和补偿的形式；2) 必须通过经济政策措施自觉地影响市场；3) 必须通过积累的再分配制度来进行。因此，必须放弃擅自采用某些标准和用行政手段提高价格的作法，从收入的观点来看，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无必要继续提高价格，生产者也不能提出这个要求。

**参加国际分工** 使我国经济更多地和更均衡地参加国际分工是经济稳定政策的中心问题。由于收支状况和本国市场对设备能力不断增长的加工部门的全部产品的吸收能力有限，对这个目标的任何忽视都必然会导致放慢经济增长的进程并因此而带来各种后果。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必需建立和制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有关战略。对外经济关系的



战略应该建立在一贯执行同其它国家平等的经济合作的原则上，并尽可能地提高本国劳务、我国自然资源和其它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

在制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时，首先应该从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经济独立的需要出发。这方面最低的战略标准是：

1) 发展战略产品的生产（基本原料、能源和粮食）和主要交通设施，同时保证必需的物质和外汇储备；

2) 从结构和地区方面研究制定贸易战略；

3) 从平等和长期合作的观点出发保证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的灵活性；

4) 把资金用于发展，这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劳动和本国资源，并将支持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

5) 在保证本国劳务的优惠地位和坚决实施本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情况下，保证合作的平等；

6) 提出和实施整顿我国银行外汇业务的计划，其办法是使银行的净外汇保持平衡状态；

7)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交流并确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原则；

8) 为了发展本国生产以代替进口，要制定出行动计划和准则。

在经济衰退和价格关系变化的影响下，一九七四和一九七五年全世界商品交换的地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转化成漫长的过程，这就要求重新研究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结构。这些变化在上述两年内使我国的出口恶化，并促使我们开辟了在商品的结构和质量方面都有不同要求的

新市场（例如，石油生产国市场的扩大）。

前一时期的经验和迄今对外贸易结构的改革说明，对我国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结构的选择应该集中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执行“绿色计划”的行动，其方针是更多地生产一些主要的农副产品并争取长期作到有剩余出口；2)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旅游业和运输；3)更快和更全面地发展在国外的投资工作，同时使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和本国技术的转让占更大比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4)在进口条件和分工的基础上，特别加强对不结盟国家出口加工工业产品的方针；5)根据我国出口的可能性和在别国准备购买我国商品的基础上按地区安排进口。

外债的数量应该控制在由联邦、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社会计划所全面确定的范围内。因此，作为借外债的主要代表即联合劳动应该承担偿还外国借款和贷款的一切义务。

在制定新的对外经济关系制度时，应该从把进出口有效地协调起来的需要出发。因此，联合劳动、共和国和自治省应该得到更大的权利，但同时也要对对外贸易的平衡和国家的收支平衡负责。

谈到加强共和国和自治省对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家的收支平衡的责任时，应该把一些义务和权利以及执行有关政策的机构和机制交给它们，这应该是外汇制度和外贸制度改革的重要目的。尽管作为刺激出口的外汇比价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过去曾经有过的普遍意义，但也不能低估它在引导对外贸易进程中的作用。执行和实现切实可行的比价政策能够确立刺激出口的适当措施，保护本国的工业和调整进口。

为了使我国经济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需要对我国对

外贸易网的组织和业务方针以及对我国驻外代表机构的工作进行重大改革。争取增加出口和扩大销售我国商品的国外市场应该是它们的主要工作，而不只是进口，在它们迄今的业务活动中进口工作基本上占了主要地位。因此，加强外贸联合劳动组织和与它有业务联系的生产领域的联合劳动组织之间劳动和资金的联合过程具有重大意义。还应该大大提高我国驻外代表机构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改进干部结构。

为了成功地稳定经济，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地找出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并确定能有效地消除它的基本方向和措施。通过制定稳定政策及其在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五年计划的贯彻实现，这些问题就可以基本上解决了。所以，下一步就是使这些措施更加确切和有效。从这个观点出发，经济稳定政策的战略应该是准备制定一系列法令的重要因素，也是应贯穿到这些文件中去的适当决定。在从数量上分析和适当地考虑物质平衡的基础上作计划时，应该确定执行某些措施的进度和时间上的渐进过程，当然这要在各级计划上进行协调。

显然，在宪法的基础上对经济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革和在此基础上对发展政策的重大改革，是唯一能达到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形势的道路。宪法为此打下了社会政治基础，而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为实现这些基础指出了方向。然而，这里所说的改革显然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一纸空文的措施。这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改革经济和社会制度，并且是在这个范围内确立共同的发展政策，它将逐步而又牢固地限制乃至消除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实际上，根据宪法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新的中期计划应该是能保证从不稳定的困境中摆脱出

来的改革形式。因此，无论是在改革经济制度中，还是在协商发展政策中，都必须让一切社会因素特别是南共联盟参与解决这些问题。

### **三、争取质量的斗争是南斯拉夫经济稳定的重要前提**

为优质产品而斗争，在创立自治生产关系和实现经济稳定政策的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经济的稳定程度以及联合劳动关系的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换言之，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以特殊的方式反映出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效率和业务作风，反映出经济主体的工作效果。实现产品的优质水平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条件，因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者说实现联合劳动的长期目标——不断地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仅是一个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问题，社会经济关系的状况如何决定着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好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职能本身不能自动保证良好的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因此，为了不断地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质量方面首先需要设立专门的社会组织。

为保证商品和劳务的相应质量，在社会组织的参加下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众所周知，绝大部分商品都规定了标准。不久前，联邦议会还就质量年通过了关于质量的决议。但是大家也知道，工人和劳动者常常不满意自己所买的商品的质量和他们享用的服务质量。这里所说的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质量的降低，劳动者把这

种降低看成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劳动成果即个人收入的降低，这就影响到生产者的思想作风并影响他们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质量，而且还把这种方式看成是一种对他买来用以满足个人需要的质量不好的商品的回答。这些现象必然会在生产者的关系中为相互包庇低劣产品创造条件。

还有一种对待产品质量的思想表现，例如，生产者对于国内购买者和国外购买者持不同的态度。为什么不能保证相同的产品质量，而不管谁是可能的购买者，是本国购买者还是外国购买者呢？

不保证自己的产品以令人满意的质量，除了说明它的行为不符合商品经济所具有的业务活动标准外，实质上说明生产者在侵占他人的收入，也就是说他侵占超过他劳动所得的收入。实际上，这也是在对价格施加压力。从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通货膨胀，因为这种行动使得保持标准质量的其它经济单位要求用提高自己产品价格的方法补偿产品低劣和生产成本高昂。这就偏离了按劳分配制度并且使各个不同行业的联合劳动组织和经济集团所获得的收入产生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差别。生产和流通之间的不相适应的业务联系（因此而常常影响商品和服务质量，这不能归咎于生产者）只是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影响的潜在性问题，但也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发挥职能的重要问题之一。很明显，获得收入方面的垄断作法、供求方面的垄断现象、地区或地方上封闭市场现象的存在，以及一切其它使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的职能发生问题的因素的存在，使得生产和流通问题更加复杂了。

由此可见，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不单是一个社会的工艺技术标准和关系问题，而且也是生产过程中整个经营情况和

经营关系问题，这种经营情况和经营关系决定着产品的质量，决定着工人和劳动集体以及联合劳动组织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决定着整个经济过程的稳定性。

为使我国社会在商品和劳务质量方面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应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如何组织呢？

首先在联合劳动中可以而且必须成功地为产品质量进行斗争。各个部门和集团中在收入上有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在再生产整体和不同的共同体范围内，例如，在行将为计划工作和业务合作而建立起来的联合劳动组织内，必须通过劳动与资金的适当联合，保证劳动者所具有的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双重担子。在这些共同体或牢固的经营整体中，工人应该就取得和支配收入的标准、商品交换的条件达成协议，在这里质量是共同获得和支配收入的标准的一个重要前提。生产商品的时候，生产者不能不看到它本身也是某些商品的消费者。如果生产者的收入是在收入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中取得的，而不是通过提高物价或者降低自己的产品和劳务质量的途径来取得的话，那么，作为消费者的生产者同样也会越来越合理地对待商品质量。因而，如果按照联合劳动法草案所确定的方式来固定联合劳动的经济关系，通常将不需要外来干预来“保护消费者”。那时，组织社会生产的整个体制都将与最大限度地和适当地满足劳动者对物质财富和服务的要求相适应。

上述保证商品和劳务质量的方法是联合劳动发展到满意程度时的一个前景，然而，目前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需要“保护消费者”。这种保护今天应该在内部进行，就是说自治机关，自治的工人监督、工会甚至共盟基层

组织应该更多地注意到质量问题，注意到与其它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经营关系问题，注意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例如，关于绝大多数的要求或有关价格的决定问题，这些社会机构和组织并未去过问，认为这是办事机构去做出决定的问题。很少就社会对待产品和劳务质量的关系问题进行集体讨论。

谈到自治地组织联合劳动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让所有再生产过程参加者都参加一个完整的过程，也就是参加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重要的问题是，自治组织过程的目的在于使最终消费者参加重要问题的协商和协议过程，其中也包括参加对满足需要比较重要的问题的协商过程。当然，产品的质量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应该说，在个人消费商品的质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这意味着减少了用以满足市民需求的必要的物资。例如，由于食品加工品质量的低劣或不合要求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把面包倒掉的例子最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却不是食品方面的唯一例子。由于商品质量而造成巨额损失的原因是由于生产不适合市场要求，这导致了屯积大量库存物资，这些库存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由于垄断地位的存在，质量低劣的商品和劳务，按高价出售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客观上需要把地方共同体的消费者组织起来，通过消费者会议和其它具有很高社会威望的形式来影响生产和流通中个人消费品的质量。这样一种消费者组织既是改变生产和商业之间关系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们对产品和劳务质量负责的态度。

此外，社会政治共同体也要通过代表议会的途径，通过执

行机关的职能来“保护消费者”，即为质量而斗争。同时，必须强化检查机关的工作，必须使这些机关在争取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斗争中工作得更有成效，而且比目前更多地参加反对一切违背南斯拉夫市场统一的经营活动和行为的斗争。应该让公众迅速而又真实地了解那些破坏商品和劳务质量基本标准的联合劳动组织的活动情况，在这方面所有的情报工具都有重要作用，而不只是消费者组织的通报。

因此，所有经济主体、社会部门的组织、社会政治共同体以及社会政治组织都必须为质量而斗争。所有这些组织在社会中都有自己的地位，这种地位应该直接用来为改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为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要求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道主义化而斗争。

#### **四、节约是稳定的因素**

大约在一年前，联邦各社会因素通过了有关节约的社会行动纲领。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它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长期任务。制定节约纲领的根据是，节约就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以便使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得到更好地发展。决定采用节约这一概念并不是意味着要勒紧裤带并放弃必需的和有益的要求，而是说要合理使用现有物质以满足需要。这是有关资金分配决议所有执行者的经济上合理的唯一正确的社会行为。

当然，人们的行为和某些决议执行者的行为也是受到社会关系、社会立场、习惯和其它许多因素制约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得了的。因此，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期望人们对待节约的态度能很快转变过来。但必须指出，改变旧习



惯并努力使自己的行动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工作还必须进行得快一些。这是今天客观经济形势的要求，这种形势要求更好地利用资源和潜力。同样，这也是今天特别复杂的——我不说是特别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的要求，这种形势对我国国内的发展也有相应的影响。

在我国社会的很多基层单位、在很多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它联合劳动组织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在节约方面的成就也很大。这类例子可以列举很多。然而总的来说，经济的合理活动没有达到社会上感到满意的水平，因而在节约方面作出的某些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果不甚突出。此外，在过了若干年以后，不考虑合理消费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动，使得那些积极参加节约工作的人又逐渐回到随便活动即随意支配资金的境地。合理地节约还没有成为我们行动的准则。可以列举出这方面的很多例子。例如，一九七五年，消费者在自觉参加的基础上节约了大量电力，也不必要对电力供应进行限制。但到一九七六年，这种形势就再也没有了。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一九七五年我们能够采用自己节约的办法来减少电力的消费，而在一九七六年年初就办不到了呢？是不是社会的干预不够，或者气候恶化（这里的气候恶劣主要指的是，水位降低不利电力生产——译者注），难道消费状况、电力生产是这种使发电更不经济的恶劣气候的简单反映吗？合理性与满足需求并不矛盾，而是更完全更好地满足需求的条件。

其次，在价格方面可举的例子就更多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我们的活动是如何的不合理和不节约。首先，很少同意消费者组织提出的争取供应更好、流通费用更低廉、价格更合理

的要求、需要和特殊的好处。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象南斯拉夫这样，物价的上涨在市场上得到如此迅速的承认。我们拒绝发给证书十天或二十天，但此后事情的进展还是老样子。对物价上涨适应得很快，可能大家指望，涨价之后个人收入也会随之增加，正因为如此，事情就将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

任何一种经济逻辑也不能证明生产者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是摆脱库存增加、设备利用率低的经济状况的出路。如果商品滞销，那么涨价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行为？问题在于，消费者如何组织起来反对物价上涨。制止物价上涨又损害了生产者的心理。所以我国消费者的上述活动一点也不影响生产者提高物价的欲望。

还有，执行支付法不是什么技术性活动，而实质上是非常经济的和系统的行动。经济制度中的其它许多解决办法都依赖着这种行动。在某些地方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认为社会最终必将取消有关支付问题的规定。这无疑是要要求消费超过个人收入，滥用他人收入。

这也再一次说明，在某些地方消费和取得收入的状况还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在进出口方面，也可以列举出大量不合理不经济的例子。过去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很高的呼声，要求为了收支平衡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种措施指的是如果无力支付就不能进口，然而，有关进口与购买的规定不能得到保护，但是，如果无力支付，就可能导致国家陷入缺乏清偿能力的境地。在对这种形势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发现我国有很多便利条件。最便利的条件是可以在银行取得贷款，并用这些贷款在银行换外汇，进口商品，从中取得好处。

这是多年来的作风。当触犯到这种作风的特权时，就要遭到反对，认为这样做是侵犯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自治权利。每个单位和整个国家能支付多少就可以在国内外市场上买多少。而支付能力如何取决于商品出口多少。这不是我国社会臆造出的真理。但却常常被人遗忘，我国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我们看到，在海关里存在着多少找不到买主的商品，他们只好用各种方法减价拍卖，甚至成为废品。这些商品是用外汇买来的，有时也很难说是谁定购的。

既然某个人的作风不负责和不节约，那么，他当然也会用不节约的措施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而这些措施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

在调节自治利益共同体的收入关系上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能够满足共同需求方面有一条客观界限。应该客观地确定这条界限，而利益共同体中的社会气氛还不适于确定这种界限。因此还需要外部经常进行干预，因为客观的基础不断遭到破坏。

没有根据联合劳动服务标准、确定价格的因素等来制定出公认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对于以自由交换劳动的原则为基础的收人关系是重要的。同整个收人的增长相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一九七五年这类浪费虽然增长缓慢些，但仍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所有这一切都与节约有关，与全社会的合理经济活动、合理消费有关，节约的实质就是为质量而斗争。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达到决定性的转折。因而，某些基层组织的大规模节约活动得不到推动，某些地方取得的成果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更多地去改变整个经营作风，并且使某些

地方取得的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的经济潜力目前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如果我们多注意节约就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无可怀疑的。必须指出，由于我们不够节约，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在提高个人实际收入方面没能取得更加重要的成果。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益问题也与此有关系。

新的五年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向更好地节约方向作重大转变的时机。目前一系列法令正在完善中，这些法令要取消过去那些经济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经济上不合理的刺激办法。应该说，没有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没有自觉的活动，就连法令也不能保证迅速满意地改变不合理经济活动、改变对待消费的态度，就更谈不上理想地解决节约问题。这就是说，改变对浪费的态度，从经济角度理解就是消费合理和节约合理。

厉行节约，我们就能在发展中取得更好的成果。只要我们每日作出很小的努力和牺牲，我们就不但会取得现在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取得的成果还会好得多。这是我们发展的目标和我国制度的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的事实根据是，世界形势在发生变化，节约在世界上变得日益尖锐。因而，我国的节约水平也必须进一步提高。这不但是我们在这个如此迅速变化着的世界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我们大大改善这种经济地位的重要条件。我们具备这方面的条件，但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好国内的问题。

凡是把节约同经营效果、同联合劳动中工人的地位即同收入直接联系起来的地方，其所得的成果就要大得多。所以，必须把社会的节约活动与取得收入的条件结合起来。通过更多的实际收入——这是更好地实行节约的结果，工人们

应该取得更多的资金。

这主要是因为，必须进行合理消费在人们的思想中还不够迫切，就更谈不上在发展中实际去做了。特别是在战略性的问题上，合理消费的要求在投资部门、总消费与共同消费部门以及其它许多部门都不够迫切。

社会活动必须明确地去改变对待节约的习惯和态度。新的制度是新型关系的开始。目前实行的很多优惠条件不好，新制度将予以取消。对此很多地方都有反对。要进行解释工作，说明这些暂时的个别优惠是难以实行的，这最终是指大家都分红（全部利润）。

当然，在节约活动中不应忽视任何一种节约形式。例如，不应忽视再生原料，也不能忽视支付个人收入方式上的储蓄。但是，如果在基本的经济活动中不建立另一种关系，不首先在投资方面、在总收入的取得和分配方面、在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的联系方面建立另一种关系，如果我们不更多地参与解决这些战略性问题，那么，一个坏的投资活动的价值将超过我们在一年时间内在再生原料中得到的全部节约。

## 五、经济稳定政策的体现者

经济稳定政策必须依靠联合劳动中的工人这个为争取更稳定的经营关系而广泛活动的基层代表，因为他们最关心为自身发展保证日益稳定的条件。已经在新宪法基础上进行改革了的经济制度中，他们的地位能保证他们起到这样的作用。联合劳动的工人有义务和权利通过各种横的和纵的联系形式，通过代表制度行使自己在我国社会各级经济组织中的决定权利。

实现经济政策方面的这些任务也是在加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一系列法令中提出的基本而系统的解决办法也是从上述情况出发的，而通过这些法令可以完全建立起基于宪法基础之上的我国社会经济制度。

因此，应该让所有决策者，特别是自治的联合劳动通过挖掘内部潜力，以各种形式参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活动（即更好地利用和调整生产的设备能力；节省原材料、动力、减少废品等）；加快流动资金的周转并使资金储备达到最好水平；让工人更多参加劳动交换；现代化与改革，合理而有效的投资；监督产品质量和生产过程；制止无故缺勤的现象；更合理地利用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纪律；通过不断教育来改善工人熟练结构；不断地完善并促进个人的劳动标准和个人收入分配的鼓励形式，根据劳动者的专业和其它能力来安排他们的工作；完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情报系统并使它适应直接决定整个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需要。

当然，把稳定经济政策纳入实现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五年计划的年度政策之中尤其重要。而代表议会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执行机构又有着特殊的作用。这些作用在促进联合劳动的内部组织，以便更成功地协调他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方面尤为突出。这要求执行机构能更好地注意经济动向，并在实现经济稳定政策方面提出建议，这也就是加强自治的生产关系的方式。

#### 第四节 经济的发达程度与社会需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状况也在变化，而社会目

标——就其本质是长期性的——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结构也在变化。在解决社会问题和使社会的战略目标具体化的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对改变社会发展和社会状况的性质有重大影响的首先是经济领域内的变革，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因为，随着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在整个政策的实践中，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中出现了糊涂认识，出现了很多实际问题，首先是如何从彻底实现社会目标的观点来致力于发展问题。

南共联盟早在建设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开始阶段就制定了自己的有关南斯拉夫社会发展性质的纲领性原则。南共联盟纲领认为，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因而，我们决定采用一体化发展的计划，承认发展是一体化过程，在这个发展中经济发展是基础，而在再生产整个过程中的社会上层建筑必须为实现相应的社会目标服务<sup>①</sup>。这种对发展性质的保证，对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正是在于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在于承认经营和自治的商品形式（这种形式目前是唯一能够反对损坏社会的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斗争形式）。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们决定进行自觉的斗争，改革经济和社会，进

① 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革的体系。这是发现新事物的过程。也是建立新的价值标准，为人们的生活和劳动创造条件的过程。根据这样的发展观点，我们确定了关于发展一体化的定义。况且，发展一体化今天已为各个发达社会所承认。

行深刻的社会改革。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但是经济发展本身不能通过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自动地实现进步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也为进步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前提，但是在社会经济关系体制和政治制度能通过经济发展使大多数人（而且越来越多）、而不是少数人得到好处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变革就会实现，而变革的中心是不断地全面地改善工人和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因为物质的进步是他们劳动的成果，而根据他们对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来利用自己劳动的成果是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第一部分我们谈过七十年代中期的发展矛盾，首先我们指出，七十年代初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和平衡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且已成为长期以来尖锐矛盾的根源。七十年代中期的社会状况十分复杂，而经济发展与社会需要（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同样的复杂。因此，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平衡和一体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必定成为整个发展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一体化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其关键取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效果如何，取决于整个再生产过程中这两个领域在自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一体化。七十年代的十年是自治的第三个十年。无论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还是在物质和技术方面，社会都在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对发展政策中的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对自治制度的职能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如果这十年的发展只是发现新的问题和矛盾，而不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么目前的这十年只能成为整个发展的障碍。这些矛盾、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矛盾以及



社会领域的内部矛盾的数量和质量今天已经到了要求卓有成效解决问题的程度。

因而有关政策必须确切地阐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目标中优先的目标是什么？在个人和家庭生活水平方面的目标发生问题的时候，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目标发生问题的时候，经济资源对于实现社会目标的每一种形式来讲都是必需的。经济资源（在存在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它保证着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合理的分配）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前提。

经济资源（经济发展）和经济目标（社会需求）之间的这种关系成为现阶段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成为七十年代政策的最迫切问题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关系明显地遭到破坏。我们仍然还在进行把消费压缩到实际范围内的斗争，这就是说我们同时也在对用于一定社会目标的资金加以限制。从现行经济政策的观点来看，这肯定是必要的措施，但从长期政策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保留的，实践表明，这种政策的范围也在不断地被打破。这就是说，在宣布的社会目标与社会的发展目标之间有出现（越来越大）失调的趋势，存在着经济发展缺乏效率的趋势。以国民收入增长来衡量，经济资源的开发比经济中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投资要缓慢得多，比干部的增加以及其它有利于经济有效发展的社会基础部门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另一方面，尽管社会目标在这种状况下是正常的和完全合理的，但在短时间内往往是实现不了的。不必想得太远，而是应该根据现阶段经营效率的水平来确定下列发展目标（这是短期的，至多也是中期性的）：根据实际收入的增加保证就业者实际个人收入；根据经济部门的收入

来确定非经济部门的收入；为更多青年享受教育创造条件；改善卫生保健；增加住房建设；根据迅速增长的需要发展市政设施建设；这是很昂贵的。保持收入带刺激性的差别，但要大大地改善公民、特别是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地位；保持就业率的增长每年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三点五（这就是说继续进行较快的社会改革）。很明显，收入的增加是不能弥补这一切的，最近几年收入的增加是令人满意的，但却不是令人鼓舞的，特别是与全面的社会目标相比更是如此。这样的目标本身成了一种力量并对决策者的行为产生影响，而它成了检验政策效果的尺度。但这些虽然已经公布、宣传并已反复强调，但将来未必能实现。这样也会使公布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扩大。当时由于某种逻辑往往看不清现实，因而就不去检查目标本身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如何。决策者更多的是零星地解决有关实现社会目标的宗旨和措施，这不仅能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有满意的现实关系，而且相互一致的社会发展政策也得不到保证。对比现阶段的经济的发展，在目标和实际情况之间的不协调中出现了很大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减轻非经济开支的经济负担更多的是宣传口号，而实际中则很少做到。社会发展本身的战线拉得很长，也没有成效，因为社会发展既无财力也无人力来合理地建立起相应的工作组织。这样一来，我们既有着发达的教育制度，而同时又有着很大的人力物力上的浪费。我们还有比较发达的卫生保健制度，但组织不合理并且在保健制度内部也造成了很大损失。社会发展方面的类似事例可以列举很多。对于这种明显的现象，社会通常用限制社会消费的方法来对付，但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办法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

之间的以及社会领域部门内部出现的重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气氛仍然有利于国家调解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的矛盾，非国家主义化的过程进展缓慢，整个再生产的发展在经济部门是按照一种逻辑和轨道进行着，而在受到国家干预保护的非经济部门又是按照另一种逻辑和轨道进行着。

因而，再生产过程中的力量和本身具有的社会规律表明，社会发展方面消费的扩大往往不能用粗暴的行政措施来制止。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已经被破坏了的平衡要求缓和下来，并能更加稳定，还要求进一步推动实现新的社会目标，这些目标在客观上是不能用增加经济潜力的办法来保证的。

众所周知，多年来政府制定政策是依据以下看法，即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各种形式的消费过高，其中既包括个人消费也包括社会消费。

我们消费的生活资料是不是太多并且超出了可能的范围内？这是否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

尽管这种看法在专门学科、特别在政界都似乎占上风，但是我们认为至今也未得到证明。

如果我们消费的东西确实超过我们实际所拥有的东西，用什么来证明呢？因为这是个严肃的观点，这种观点对目前的经济政策有实际影响。

如果我们消费太多，那么就是说与所拥有的收入相比，我们的消费率太高。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消费水平较之其它国家要高，而这是在我国现在的发展水平应该具有的。然而，任何国际经验和对比都不承认这一点。

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者在实际个人收入方

面的差距接近于收入水平的差距。总的来说，我国的薪资比欧洲发达国家要低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同时，欧洲国家的就业水平高于我国。

最近几年，对非经济投资和对有利于非经济的投资结构的改革进行了批评。值得指出的是非经济投资方面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合理进行非经济建设和正确进行优先投资等。要专门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无效率的经济投资是造成社会紧张的原因，也是导致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冲突的原因，而这一切都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相符合的。设备能力利用率低、生产成本低、投资建设昂贵等都是造成个人收入低，造成社会目标与经济可能性之间不协调的原因。

在讨论消费水平时，（一般）不考虑严重的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对个人收入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影响。

从评价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来看，政策往往是矛盾的。然而，政策的矛盾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是目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存在的实际矛盾的反映。因此，政策是以矛盾的实际情况为转移的。但不好的是对实际中存在的矛盾的评价往往不适当，政策也不合适。

我认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水平上，我们在社会的发展上是否花费得太多了，答案是否定的。用于社会发展的消费没有超过经济和社会的总的可能的范围。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消费内部就没有问题了。这只是说政策不应指望总消费中有继续用于经济发展和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潜力。政策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提高经营效率并为解决经济问题创造新的条件。在社会领域内，政策同样应该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可能性把重点放在消费的合理性、消费的条件

件、消费的形式上。在谈到社会发展的消费关系时，其中心问题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真正一体化，它们互为条件，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根据自治的生产关系建立起一整套社会再生产体系。那时，社会发展消费是否太多的问题就不会再提出来了，至少不用这种普遍方式提出，因为根据自治的生产关系性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问题分开来讨论，把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只是表明我国的自治生产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在经济领域还保留着国家的重要作用，还保留着其它因素（银行、外贸等）的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实际上不可能完整结合起来，而且还由于社会原因和发展原因而导致它们之间的对立。

最近几年，生产增长缓慢，尤其是一九七五年底和一九七六年初，经营的效率降低，劳动生产率下降。在这种条件下，现行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加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任务，因为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在减弱。在这样的形势下，用以满足共同需求的资金的增长必须要比整个收入的增长缓慢，以便通过这种方法来加强经济的积累能力。这并不是说要减少或冻结共同需求方面的消费，而是要暂时减慢消费的增长。因此，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的发展政策文件规定，共同消费资金的增长要比收入的增长慢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大家知道，尽管采取了措施，就是在一九七五年也没有商定总消费和共同消费方面的比例。在税收和上缴的基础上支出款子的数量就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左右。尽管各共和国和自

治省的协议规定，总消费和共同消费资金的增长要比社会产品的增长慢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但实际上总消费的增长比社会产品的增长几乎快百分之五十。

因此，应该指出，除了总消费和共同消费的资金迅速增长以外，一九七五年非经济部门的消费拨款赤字，据估计达到八十亿第纳尔左右，占该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点六左右。政策在这个重要的社会再生产部门无法实现，这是经济的积累能力与再生产能力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老实说，生产增长的缓慢、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以及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也加重了消费的增加。

同样，与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的可能性相比，总消费和共同消费的经济负担的增加超过一九七六年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决议的规定。实际上，这种趋势早在几年前就存在了。但这和趋势是由客观状况造成的，首先是由于某些社会部门的发展程度超过经济的可能性，而在某些地方。超过经济的需要与这种发展相比，这些部门所支配的资金太少了。这也是由如下事实所造成的，即在整個社会部门的服务价格中，活劳动部分超过平均水平，因此，在生活费用增长很快的条件下，社会部门总收入的价值比物质部门要贬得快一些。这些部门的不合理消费对此也有影响。利益共同体中的这些部门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改革，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交换劳动原则也没有贯彻到底。认真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进行，通过改革将使这些部门适应经济的需要和可能。

这一切要求我们根据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达成的协议精神，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使经济拨出来的资金符合目前经济的可能，同时，还要采取具体措施保障这些部门实行重大改

革,以便它们正常地从事自己的活动。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部门进一步亏空,而且在目前情况下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想再一次指出,一九七六年通过的政策不反对增加这些部门的资金。政策只是作出规定,用于这些部门的经费的增长要比社会产品的增长缓慢,所以再生产能力暂时还薄弱的经济要相对地减轻负担,这样就能使经济健康地增长,使社会部门地位得到改善。

关于就业者的个人收入,情况不能令人满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五年多。这就是说,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实际的个人收入平均增长率很低(百分之一点六)。诚然,同一时期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很低(百分之二点五左右)。由于缺少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生产缓慢发展相比,就业却迅速增长,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下降,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的个人实际收入是停滞的,而在很多部门还下降了,甚至在给一些就业者发放个人收入时也产生了困难。但必须指出,(一九七六年)新的收入结算法和新的支付办法没有给这方面增加困难。大家知道,个人收入的单独分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个人的劳动贡献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这就不能激发起人们争取更好的经济效果和增加收入的兴趣。因此,重要的是使经营集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减慢生活费用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将更加有利,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的斗争是同大大发展在劳动贡献原则上的个人收入分配分不开的。同样,这一斗争也有利于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鸿沟。

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

在整个社会改革的影响下，在与发达国家非常积极交流的影响下，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发展得非常迅速。这些需求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能够最恰当地解决经济发展（这是基础）和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最恰当地利用经济资源，同时用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这意味着从劳动成果和团结的立场出发）解决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矛盾和社会领域内部的矛盾。整个政策的稳定性取决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目标（它们的实现）之间的实际平衡，而这种实际平衡对经济和社会领域又有反作用。因此，只有整个政策的统一——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才能够保证整个发展达到最好水平。

社会不能放弃已提出来的社会目标，但是社会能够而且必须把它纳入经济所允许的范围，这不仅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且也是具体需要。只有迅速的和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要求自治经济制度彻底地建立起来并保持高效率。这必将成为社会直接关心的问题，但要逐步地而又十分坚决地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为了今后的发展，为了能系统地实现社会的发展目标，尤其重要的是：

——为加速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目标而有效地挖掘经济潜力。

——利用经济资源来扩大经济基础和利用经济资源来实现社会目标，这两者之间的总关系保持合理化。

——现实地、经济上合理地和社会上能接受地选择优先的社会目标，同时考虑加强发展的一体化过程，使社会发展不仅仅成为经济财富的消费者，而且成为增加经济财富的积极因素。



在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平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实事求是地确定社会目标，从经济发展最优化的立场来正确地衡量社会目标以及从社会的观点来合理地确定优先发展的社会目标的次序。这些目标，作为发展的推动者和刺激因素要先行一步。但是，不能也不应该单独地把社会目标同经济基础和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割裂开来。必须把社会目标看作整个发展的一部分来加以确立和实现，它是发展的最终目标，它的实现取决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但是它的实现对于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有积极的影响。

实现完整的和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七十年代有效的经济发展、稳定（不仅仅是经济的稳定）、圆满地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前提，归根结蒂，这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进步问题。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这里经历着新的复杂的考验。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及确立取决于它将如何经受这种考验。然而很明显，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就其发展内容和决策者来说已经在原则上有可能克服发展过程中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并且正是通过发展的一体化来保证发展的相对平衡。实际上，平衡被破坏到什么程度，那么整个发展就要增加同样程度的推动力。但是，平衡决不可能自动实现，甚至就是用一般完整的经济制度和计划制度的手段也不可能实现，而只有通过社会对整个发展的间接影响才能达到。这是自觉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不是唯一的，正象对我国的一定发展时期所经常幻想的那样。社会主义自治制度需要具体的发展纲领和计划，这种发展纲领和计划是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建立在工人

阶级和劳动者的共同的长远利益以及民主协商和民主决定的基础上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和它们之间的平衡是由制定发展政策的过程所决定的，这些政策是建立在具体发展计划以及民主协商和自治决定的基础上的。

### 第五节 现行经济政策同长期发展和整个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发展的联系

前面我们谈到了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重要特征，谈到了随着这种发展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产生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基本原因以及在下一阶段为了达到经济和社会的迅速而稳定的发展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一节里，我们将简单地谈一谈现行经济政策的地位和作用，借助于这一政策来指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制定严密的现行经济政策及其在我国自治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进行有效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时，有两个重要的出发点。第一，现行经济政策必须根据并履行发展政策的职能，在长期基础上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方向以保证生产的物质结构与价值结构的协调，合理地利用生产力并正常地发展整个社会再生产。然而，这同时意味着，正如正确执行现行经济政策是实现发展政策的必要前提那样，在长期的基础上确定严密的发展政策同样是制定合理的有效经济决定的重要前提。

然而在这方面，过去的实践和目前的状况都不令人满意。作为在认识客观实际和经济与社会规律基础上自觉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计划，在我国没有享有它在社会主义

自治社会中应该享有的那种地位和作用。确实，在我国战后的整个建设时期，我们都有长期计划或年度发展计划，但是实际上往往不执行它。实际发展情况总是程度不同地与计划规定不同。这种脱节现象的存在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计划存在一定的缺点和制定计划的方法上的缺点造成的结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计划的前提不现实，或者出乎意料地出现各种不同的经济因素或非经济因素使得资金分配和经济过程都不同于事先考虑的那样，而这样的计划不能及时地注意到这些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来修改计划任务。过去，主要是国家制定发展计划，这种计划不依靠经济组织的发展计划和纲领，也不能充分地反映经济组织的实际利益和要求。因此，还要看到，经济组织内的计划也不够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指导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全部重要任务主要落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上，而只靠现行经济政策措施也不能成功地解决复杂的长期发展问题。通过现行经济政策的短期的和带有片面性与暂时性的措施往往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而另一部分问题却解决不了。因此，正如前面阐述中谈到的，在我国的发展中，在社会再生产的许多部门内还存在着大量严重矛盾。然而，计划目标的不现实性与制定计划方法中的缺点不是计划没有实现的唯一原因，也不是现行经济政策未作修改的唯一原因，这些修改将能实现下列要求，这就是加强直接生产者对指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以及对支配剩余劳动的影响，而这些要求是最近十五年期间我国所有发展计划不同程度地提出来的。继续执行现行经济政策主要是在国家机关和其它非经济因素的范围内，而在经济制度的各部分都存在着使剩余劳动从经济中倒流出去的渠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现行经

济政策措施也不能奏效，而在利用整个社会资金的范围内，特别是在社会积累的范围内，曾出现大量不合理现象，这些现象导致出现了我们前面谈到的发展矛盾和问题。但同时也应指出，限制现行经济政策非国家主义化的重要因素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因为没有组织联合劳动，以及它没有能力在履行自己权利的同时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承担责任。

因此，加强计划性，加强计划在指导我国自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使一切经济决策者和整个社会都能履行这方面的职能，这些是下阶段社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因而，需要在自治的基础上，在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共同的中期发展政策，以此为国家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社会各部门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只有根据这样的发展政策才能有效地实行目前的经济政策，也才能够通过联合劳动和社会各级组织制定的决议来保证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会出现动荡，尽管这并非意味着那时就没有困难了。通过自治协议、社会契约和在此基础上作出经济决定的途径来制定和确立共同发展政策，这是使物质和社会矛盾不会转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最好保证，也是用进步的方法来克服和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革命变革的最好保证。如果任何经济主体的每个社会契约、自治协议和每个具体决定符合整个的共同发展政策，那么，这些契约、协议和决定就将具有实际价值和卓有成效。

随着新的自治计划制度的建立，为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创造了条件。新的自治计划制度是以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这个基层的、基本的经济主体为依

据的，而各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一整套自治制度也是建立在联合劳动这个基本单位及其劳动与资金的联合以及参加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个制度中，联合劳动内发展政策的建立，在社会上也为一切扩大再生产的主体所普遍接受。然而，问题仍然是使联合劳动从组织上承担这种计划职能，这也就是按照收入关系的原则把联合劳动纳入到完整的再生产整体的范围中去。在为下阶段加速这种进程的发展创造必要前提时应该作出积极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现行经济政策必须引为依据的第二个重要之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治生产关系。任何一种其它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任务都是由本身的生产关系体制所决定的；同样，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任务也是由自治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换言之，现行经济政策必须从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出发，并促使自治生产关系进一步发挥作用。

前一阶段这方面出现了很多严重的缺点。除了我们宣布过自治是基本生产关系而且采取了关于需要加强直接生产者对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影响的原则性政治立场以外，我们根据这些立场来发展和协调经济制度的工作开展得极其缓慢。在经济制度的各方面都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始终使社会政治共同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经济政策——由于各方面存在着缺点——无疑也没有在建立和发展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预期的成果。

随着新经济制度和自治计划制度的建立，为更有效地实现我国自治制度中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创造了初步基础。其中重要的是：1) 尽早把联合劳动组织建成经济政策的根本体现者；2) 一些经济政策的体现者在各级联合劳动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实施的一切措施和行动，都要从现存的和正在建设中的我国自治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

### 第三章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宪法的基础上制定 整个经济制度

#### 第一节 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条件、 思想政治基础和实质

尽管自治使工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变化，但仍不能保证彻底克服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严重矛盾。在宪法修改前，在管理和支配资金（特别是扩大再生产资金）中的技术官僚主义、集团占有收入以及生产转入流通的周期过长等现象，越来越成为自治经济制度发展的一种倾向，从而为经济及财政势力中心的产生与加强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却使直接生产者丧失权利，使他们的自治职权流于形式，他们的社会地位沦为雇佣劳动力的地位。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通货膨胀以及政治畸形。

显然，对社会主义自治社会发展的基本倾向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现象，工人阶级自己是能够有意识和有组织地制止的，但是，这只有建立能够制止上述一切现象，并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的组织形式，才能做到。

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的进步力量在劳动的联合过程（即联合劳动）中找到了摆脱上述困境的出路。联合劳动

是按劳动原则建立的，它保证工人只能按照自己劳动的原则来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和过程。

只有通过加强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和经济作用，通过联合劳动使这些作用发挥同样的效果，我们才能克服生产中的资本关系和垄断残余以及不通过自治而建立和使用社会积累的一切形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意识到，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经济权力，即没有充分掌握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所有条件和成果，那就既不能有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不可能有有效的经济发展制度。

因此，必须使工人阶级和所有的劳动者都组织起来，根据宪法和有关法令把经济关系或组织社会生产过程的基础明确起来，比如，联合劳动的目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机构，各生产共同体或业务共同体之间的劳动联系，管理协作的机构和形式，以及协调各种经济利益的方式等，以此形成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既定形式具有向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者自由联合体”发展的明确目标。

宪法修正案指出了建立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制度的上述一些基础，后来又由一九七四年的新宪法加以肯定、补充并使之完整起来。

同时，还提出了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性质问题。

基本生产关系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中据以建立联合劳动和主导地位的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实质上，这指的是生产资料非占有的性质。它已经在宪法的序言部分得到明确：“任何人都不享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任何人



（无论是社会政治共同体、联合劳动组织、或公民集团和个人）都不能在任何所有权的基础上占有社会劳动产品，也不能管理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与劳动或任意决定分配条件。”从社会所有制的上述性质出发，生产资料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它联合劳动组织的物质条件，也是自治利益共同体或其它自治组织、自治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行使职能的物质基础。

因此，联合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是作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协作者出现。这种关系的社会经济内容就是消除任何人按资金原则进行任何形式的垄断，以及按资金原则建立经济权力。这种生产关系的真正实质就是人和生产资料的融合。它的基本意义就在于以下的事实，即这种生产关系肯定了生产共同体劳动集体中联合起来的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联合劳动，它是（1）管理联合劳动组织的劳动和业务的基础，管理整个社会再生产关系中业务和资金的基础；（2）建立劳动中的相互关系的基础；（3）在劳动与资金联合的各种形式中决定收入的基础；（4）取得个人收入的基础。由此可见，直接生产者的真正经济权力确实是建立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的<sup>①</sup>。

联合劳动提出要直接决定自己的再生产问题以及掌握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条件和成果问题。根据这两个要求产生对整个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两个重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一个劳动整体，在这个整

① 出发点就是：生产资料非占有性质是联合劳动普遍的最重要的条件，而联合劳动关系则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

体中,直接生产者共同劳动的成果独立地表现为价值,工人能够用这种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经济权力和其它自治权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联合劳动最初的和基本的环节。基层组织工人联合劳动的方式和性质是一种模式,它表明应该怎样以及在什么基础上,怎样通过再生产整体或发展整体,把基层组织的劳动直到社会共同体一级的联合劳动联系为更广泛的联合组织形式或全社会劳动的一体化形式。这同时也是一条发展道路,通过它应当有效地、并在民主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再生产的所有问题。因此,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是劳动与资金的联合和联系的基础,即所有业务合作形式的基础。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也是社会计划的基本细胞。实际上也可以说,对发展不进行有意识的管理,联合劳动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或者说,没有发展计划,联合劳动就不可能完成自治发展的这个阶段对它提出的历史使命。

同联合劳动直接有关的是,确定基层组织之间以及基层组织内部工人之间相互利益的结构和建立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关系。这指的是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工人们可以通过它们,并按照我国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认识,有意识地解

- ① 因此,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中,专门强调指出了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它组织的工人以及其它劳动者,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而尽量充分利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可能性,或者为了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和克服市场的自发作用,“……依靠科学知识和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对发展可能性的估计,通过自己劳动和发展计划来协调社会再生产中的关系和以确定的共同利益和目的来指导社会生产和其它社会部门的发展。”(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前言部分)

决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能相应地和有效地代替国家的中介作用而作为经济主体之间的协作形式，并通过市场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之间自发地建立关系。因此，在联合劳动中表现出来的是自觉组织起来的和有目标的合作与协作，它们同按企业方式组织起来的、不恰当的业务合作、为取得对自己成果的承认而进入市场的那些经济主体之间的弱肉强食的斗争与竞争正相反。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能促使联合劳动有意识地掌握整个社会再生产，在再生产发展的所有问题上建立平等关系和相互负责的关系。

第二个因素是代表团和代表制。没有代表制，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人的决定就不能实现。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因素，就不能想象，按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并对联合劳动负责的国家机关能够履行联合劳动的代表职能。有了这个因素以后，它就能代表和考虑联合劳动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代表制是整个制度起作用的重要前提。这个制度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其目的是清除可能的对抗性冲突以及促进有效地克服社会矛盾。

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进行联合劳动的基础上，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取得收入，这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范畴。收入——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业务的基本目标——是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同整个社会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相互负责和联系劳动的成果。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全部收入属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而不论它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应当看到，为实现一定的发展计划而联合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对于通过劳动和资金联合取得的收入

的分配，是按照每个组织对所取得收入作出的贡献大小来进行的，而且这种贡献的标准要在自治协议中明确规定。

收入和收入关系是联合劳动中唯一可能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因此也可以说，在企业式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中，收入大部分不是按劳动原则，而是按资本原则来实现的，也就是根据资本关系占有收入。十分明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企业的劳动集体不能支配整个收入，收入的大部分不是通过工人真正的自治权限而用于共同的社会消费需要和发展社会部门。

在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概念中，基层组织的收入是实现个人、共同体和公共社会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表现和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工人的自治权利和社会职责，以保证对自己的劳动和条件进行管理，对整个社会再生产关系中的资金和劳动成果进行管理；保证对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进程以及社会主义自治生产关系发展进行监督；保证所有劳动者的、公共的、社会的、教育文化及其它生活方面的创造性利益的实现。

与此相联系的是，必须强调劳动的自由交换，这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直接生产者和社会部门的劳动者的劳动联系形式，通过这种联系，社会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直接或经过自治利益共同体按照贡献取得收入，而这些贡献是它们用自己的劳动实现了共同利益和劳动者利益的一定规划<sup>①</sup>。

<sup>①</sup> 社会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实现收入的具体办法，就是从工人的个人收入中以及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中向共同体缴款（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第51条，第8节）。

通过自由交换劳动可以克服对社会部门的劳动和业务活动的极权主义拨款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形式，在这种分配中，在劳务提供者和劳务使用者之间出现的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的这个阶段是真正根据共同商定的社会部门发展规划或物质生产的必要职能进行的。对于物质生产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来说，这个阶段表现为专门（职能）分配，通过这种分配来保证社会劳动和发展的共同条件和一般条件。

通过在取得收入阶段和专门分配收入方面建立收入关系来创造扩大生产的物质前提。也就是为社会积累的循环创造依据，而这种循环应当是使积累用于经济所必需的那些发展部门。

正如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经济再生产能力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经济拥有的公共积累也很少。为了更有效地更充分地利用社会资金，一九六六年已经出现所谓共同投资和在此基础上共同占有收入的想法。之后，在一九六八年这种想法在收入分配的基本法和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及联邦宪法第二十六条中成为社会决定，并且有了新的解释。最新的决定提供了可能使支配资金的组织根据资金（即过去劳动的形式）取得参与共同实现收入的权利。而且，联邦宪法也保证使这种关系摆脱可能产生的唯利是图的消极倾向，即按资金原则长期占有收入的倾向，并且明确规定，参与共同实现收入不能影响接受资金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人的个人收入和共同消费所必需的资金（按照联合劳动的共同原则和标准来决定）。同样，通过资金折旧或联合资金的偿回来限制按资金原则占有收入，也应当有助于达到上述目的。

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资金联合（以及按此原则取得收入）的基础上将能解决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一切问题。

由于收入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而基层组织又是“社会收入循环的开始和结束”，从而也是扩大社会再生产资金循环的开始和结束，因此，社会积累的这种形成和循环也应在联合劳动中找到最基本的、经济上的创造性推动力量，也就是按照基层组织工人的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收入中用于扩大其生产的物质基础的资金用来发展自己的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这些资金作为劳动和资金的联合用于共同发展计划，根据共同发展计划同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以及财政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建立再生产联系。也就是在再生产过程中同所有的环节建立纵的和横的联系及相互依赖关系。

基层组织本身闭关自守和无政府状态的发展，不是联合劳动的特征。相反，一个联合劳动基础组织的工人在客观上必须按照自身的经济利益对其它基层组织的工人负责，在利益共同体中，在劳动与资金的联合和联系中来观察解决自己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的可能性。在这个基础上，在各种联合劳动组织机构的范围内（联合劳动的劳动组织和复合组织范围）以及在经济职能的组织形式中（建立各种再生产整体和发展整体、生产流通综合体、计划发展和业务合作共同体等等）来达到劳动和资金的联合（现在已经达到）。

由于联合劳动中扩大再生产的基本推动因素是在劳动联合的基础上取得收入，因此，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将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利益，以便为实现共同的业务发展计划而进行自

治积累循环。这种自治积累循环将推动劳动和资金进一步联合，并促进在社会再生产的整体中，从而也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一级，使劳动真正地联合起来，即在劳动的基础上占有收入将成为形成和推动社会积累和资金的长期的最有力的基础和标准。

在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劳动与资金的联合阶段，联邦宪法中的决定对于加强联合劳动的自治收入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联邦宪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前提是，在生产和流通之间建立关系，通过这些关系根据联合劳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共同的发展计划）对业务政策和发展政策相互施加影响，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对扩大物质基础和解决再生产过程的所有问题负责，并在获得共同收入中按照它们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贡献来分配收入。就是说，联邦宪法解决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关系的原则基础，也就是在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的一个劳动组织内部通过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自治协议处理联合劳动中的关系的原则基础。同时应当看到，宪法允许按照联邦法令责成某些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在制定的上述业务合作和取得收入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的业务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还可以按照法令决定劳动与资金的联合方法和形式、共同业务决定的方式、实现共同承担风险的条款的方式以及分配共同创造的收入的原则。

联邦宪法也确定了银行和整个货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银行成了联合劳动组织为进行信贷和其它银行业务需要而建立的联合劳动组织。首先它把为联合劳动正常进行所必需的闲置资金加以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现一定的发展计划。因此，银行已从一个与资金增殖（通

过高利息等等)密切相关的财政机构变为联合劳动的财政机构。银行只有以联合劳动的名义并考虑联合劳动的利益而履行自己的职能,才能证明它本身存在的价值。调整经济关系,使银行同联合劳动密切联系,使社会政治共同体既不能建立银行也不管理银行业务,这就能创造一个前提,使我们在将来不会再去纠缠那些有关银行无名资本和类似问题。

从调整联合劳动及收入关系问题的所有宪法条款的精神出发,必须使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在掌握社会再生产的整个关系和过程的职能中,也对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问题进行调节。也就是说,按照掌握社会再生产的其它一切条件和资金情况来承担最初分配(即取得收入)的职能,从而在这个重要的经济部门,为自治地掌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性以及为收入关系的再生产创造条件。换句话说,就是由工人自己,而不是国家,也不是各个企业和经济集团的官僚技术至上主义机构,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在取得收入方面创造平等关系以及体现这种平等关系所必需的条件。因此这种转变的标准和检验,就是在总的社会再生产中建立联系和关系的性质及转变,并首先表现在处于再生产的紧密联系和制约中的所有主体的劳动联合与联系,表现在自治的计划方面。

自从联邦宪法和南共联盟十大的立场确定以后,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联合劳动和资金的基层组织开始得到宪法修正案的肯定,以后又经联邦宪法强调而使之完善起来。这方面的基本成果是:在绝大多数的集体中,基层组织工人成了真正的主人。而且应当看到,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内部联合劳动关系的建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基层组织在社会上的行为。在这方面,劳动



和资金向更广泛的自治联合劳动形式联合的过程是极其重要的，这个过程在包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在决定生产关系的内容上开始或多或少地打上以自治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烙印。显然，这种新形式的实践过程为时还短，但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由于自治组织和联合劳动关系的调整，工人在社会再生产和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的作用和责任加强了，从而缓和了经济中物资比例失调情况；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代表制原则的议会制度，即代表制度。这是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 and 地方共同体直到联邦对人们生存的所有问题进行民主管理和作出决定的形式。它已经取得了初步效果，显示了劳动的整个的社会内容以及进行协商和作决定的效率。同时，社会部门建立自治利益共同体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它们将使物质生产部门工人的利益同这些社会部门发展的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关系和联系；

——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制度是协调生产关系和解决联合劳动工人的共同问题的不可取代的方法。共和国和自治者

义和集团所有制关系的残余，这本身也证明了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会议的历史意义。

但是，这些过程的进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是不存在问题。可以说，进展的速度和产生的效果都不象我们要求的那样快。许多旧的倾向伴随着积极的成果同时出现，在新的外衣下保持旧的关系，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利于我们社会按照宪法进行变革的活动的。

此外，对基于宪法和十大决议的自治社会关系制度研究得不够，甚至对宪法改革的实质和应建立的新关系发生误解。社会主义主体力量不积极参加实现通过的决议的现象也还存在。

因此，联合劳动法及其它一切制度性法令的通过具有很大意义。这些基本的制度性法令指的是：社会计划法令（已经通过），价格制度的根据和价格的社会监督法令，信贷货币和银行制度法令，外贸和外汇制度法令，税收和缴款制度法令等等。在实现宪法条款和南共联盟十大决议的道路上，应当通过它们消除一切动摇和问题。

## 第二节 关于联合劳动法草案 基本决议的意义和性质

联合劳动法草案是改革经济制度的法令，因为它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调整，并且对其它一切有关经济制度的条例提供依据。草案研究和确定了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这些关系把整个生产关系（即我国自治经济制度的整个关系）建立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因此，也可以说，联合劳动法草

案是自治的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结构继续进行革命变革的表现；是我国社会作出以下决定的具体的正常表现，即在这个自治发展阶段，我们要在工人自由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不掌握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切条件和成果，就不可能在真正的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经济制度。与这个任务相适应，联合劳动法把一九七四年联邦宪法的条款成功地使之具体化并作了进一步的划分。这些条款在一九七一年自治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一九七一年稍后修改宪法草案时，已成为我国政治思想的方针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而且在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为南斯拉夫社会进步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得到肯定。联合劳动法同我国过去通过的最重要的社会法令并列，因为与过去的经济制度方面的法令不同，它协调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并且在加强和实现工人阶级掌握再生产的总过程和全部成果利益的基础上直接制定制度。

这个法令完整地研究了联合劳动中的生产关系。它的前提是由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独立地、并在相互依赖和负责的条件下，而不是由外来的、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某个人，来确定自己的和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全体劳动人民很关心参加法令的制订，而且感到自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这样关心一个法令和如此主张使它完善起来的气氛，甚至在法令草案公开讨论阶段就已经根据它提出的关系来力求解决和完善自己的自治实践问题，说明了法令的实际意义，也说明我国的社会力量是要寻找适当的民主形式，以保证全体劳动人民发挥创造性的力量和主动精神，以及参加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

与过去的经济法令不同，这个法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机构形式（即联合劳动组织形式），劳动的联系和计划，作决定的方式，相互关系中的准则、尺度和指标等，都是根据基本经济关系形成的。换句话说，是从生产资料非占有性质（即坚持和实行联合劳动特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是从人对劳动的关系，从取得收入、支配收入、分配个人收入方面的生产关系出发的。法令规定了保证工人直接决定自己的生产条件和成果的愿望得以实现的那种关系。同这种愿望的性质以及决定收入的客观关系特点直接有关的是，找到了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这些基本生产关系的活动形式。从这个角度和条件来看，必须专门研究联合劳动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诸如自治协议、社会契约以及它们在法令中的地位等。但其中基本的东西是，机构形式将按联合劳动的基本利益和关系的情况来建立。这就保证了，同工人不关心争取高效率的那种制度相比，这种制度将更富有成效。

除了其它决定以外，法令专门研究了收入关系。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类似的文件这样详细地把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的社会经济内容，阐述为业务目标或实现自治和社会计划的物质基础，以它为根据来建立工人的权利和社会责任，以保证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关系中管理自己的劳动和管理整个社会再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的统一性；保证社会再生产的物质进程和社会主义自治关系的权力和监督，以实现自己的全部社会利益和全部切身利益。

收入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这个观点是明确的。因此，在法令草案的第二部分给予极大注意的问题，正是如何建立有关取得和分配收入的经济关系，以便消除在取得和分

配收入方面出现集团占有或垄断的行径，或使这种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就可以使收入的各个方面都同劳动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使作为社会主义自治社会所特有的按劳分配的历史形式肯定下来。自然，这样建立的收入关系会造成各个基层组织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某些差别。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差别是由劳动产生的，而不是由占有制、某种社会特权形式或垄断所产生的，所以它们具有特殊意义和社会价值，因为它们能推动整个社会进步。在这方面，必须提出和专门强调的是，联合劳动法草案对自治实践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它调节有关取得收入和分配收入条件的所有问题，促进联合劳动工人作出自治决定，工人将在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基础上寻找取得和分配收入的相应的原则和尺度，并把一切经济关系都归结为给不断增加收入创造条件。

联合劳动法草案是从以下情况出发的，即取得、支配和分配收入的关系以及社会再生产中的所有其它关系都是通过计划工作加以协调的。计划工作是工人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提出基层组织的计划和签订自治协议，以及通过提出劳动组织和其它自治组织及共同体的共同计划所赋予的权利和责任，工人成为对自己的和整个社会再生产作出决定的真正主体。应当看到，据以协调再生产过程中所有关系的基础、标准和尺度是由中期计划规定的，这也应当是对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因素。上述的所有立场，在保证工人在社会再生产中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较之宪法规定的立场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些都已反映在已经通过的南斯拉夫社会计划制度基础和社会计划法令中。

由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参与共同创造收入，所以在取得

收入中产生的经济关系范畴是完全新的范畴。在这些关系中,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为了共同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为了对业务政策和发展政策施加影响,参与共同的联合劳动与资金的发展政策,同时也对劳动的物质基础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负担共同的风险和承担责任。收入是按照对创造收入所作的贡献取得的,而原则和标准则由自治协议调节。

法令解决了按资金联合的原则取得收入这个复杂问题。法令除引用联邦宪法规定的因素,即制止赢利关系,制止按所有制长期占有收入外,还提出两点新东西,它们使取得收入的这种形式完全接近于根据劳动和资金联合来取得收入的形式。这就是共同承担风险以及确定联合资金的偿还和补偿原则(即由联合得到的收入增加款中偿还,或由联合资金的那些基层组织放弃偿还或补偿的权利)。

共同承担风险,从劳动和资金的联合得到的收入增加款中偿还资金以及放弃偿还或补偿联合资金的权利,都使得这种经济关系直接成为联合劳动中的生产关系。从而保证基层组织能在长期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积累令人满意地发展,这种经济利益则表现为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而它们是由社会分工在一定深化阶段上的联合劳动性质产生的。

在这种意义上,法令规定的以下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强调主体的平等地位,指出那些不能接受的业务合作形式,因为这些形式使某些联合劳动组织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为了实现基层组织在业务合作上以及按照参与共同总收入或共同收入原则取得收入方面的平等地位,法令原则是很

重要的。通过它保证对用上述方式和条件取得基层组织的收入进行专门的统计并予以公布，以便工人对实行劳动和资金联合的基层组织的全部成果进行检查。对平衡联合劳动关系来说，重要的是根据自治协议或法令的标准尺度来确定在特别有利的自然条件或特别有利的市场情况下产生的劳动成果的那一部分收入。联合劳动法草案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规定基层组织的工人可以通过以计划为基础的自治协议或其它协议，同联合劳动的劳动组织或复合组织的工人一起，决定把一部分收入作为特殊有利条件的成果列入共同储备基金，或以其它方式用于这些组织的发展。这种解决的办法要比对这部分收入实行某种纳税形式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而纳税同联合劳动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上述取得收入和支配收入的所有立场，特别是关于取得和支配收入的基本社会契约、关于取得收入的尺度或标准的自治协议，根据联合劳动取得收入的比例计划，共同收入的范畴以及在收入取得和支配上表现出来的一切关系，消除了收入表现为集团所有制内容的可能，肯定了收入的社会性即收入关系及其阶级实质。从而肯定了收入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收入规律是社会主义商品的基本规律。

收入的关系和收入的社会性，通过宣布基层组织工人有满足共同的公共需要以及公共社会需要的义务的形式而肯定了下来。这个决定已实行了一年。工人看到了自己集体的能力和发展需要，并按照自由交换劳动的概念，同社会部门的工人在分配收入方面建立起能全面克服工人同自己生产的成果被割裂开来的关系。

收入的社会性这个特点，在调整分配工人个人的资金方

面是按以下立场确定的。这个立场就是分配的原则和尺度必须由工人来决定，如果不规定这种原则和尺度，就不能完成资金的分配。

在收入的社会化方面或相应地建立收入关系和合理地支配社会所有制资金方面，必须监督和公布基层组织的劳动和业务的全部成果。工人在这个基础上分析成果，就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进业务。这种情况将促进更合理和更有效的经营，而且首先能促进实现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掌握整个再生产关系以及按自己的贡献取得收入的愿望。

### 第三节 社会计划制度的基础

改变计划工作的想法和实践碰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限制，这就是整个二十年来计划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原因。计划工作实践的开展也受到国家或技术官僚机构的严重影响，因此计划工作的社会内容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实践也是没有效果的。

多年来，认为计划是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社会主义中占统治地位，而计划工作作为社会自觉组织的形式则专门是给国家和国家机关保留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市场和计划关系问题的观点，这种观点使计划作为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成了疑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性质以及计划工作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地位的讨论。这种关系在计划工作理论和实践中表现为两个显著的互不相容的形式：（1）市场计划经济形式（发生论观点），（2）计划市场经济形式（目的论观点）。



计划市场经济概念是从理论上总结集中管理经济实践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无疑，国家通过它所拥有的各种手段和措施来组织经济的方法，是同商品经济及其规律相对立的。显然，在自治社会中，社会现实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理由表现为另一种方式，即市场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使受客观制约的自发因素处于优越地位。但主张计划市场经济的观点却错误地提出在自治的商品条件下的市场问题。他们把市场和计划对立起来，因此认为，自治条件下的计划工作问题不能在市场计划经济概念的范围内解决。

当提到工人承担一切再生产职能的问题时，很清楚，过去符合自治社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很少，而计划工作也是基于这样的组织概念之上建立的。这种认识符合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自治商品生产社会性质认识的发展，即符合自治商品生产和收入制度观点的产生，而我们关于计划工作的社会决定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在这些社会决定中产生了自治计划制度概念的基础，它们在联邦宪法和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体现。这种认识是对我国一部分理论思想的科学认识的结果，这种思想看到自治商品经济起作用的客观趋势，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在长期过程中提出建立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制度以及有关的自治计划制度的建议。

这种概念的出发点就是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以及有意识的自治组织。这样的组织是由联合劳动组织的实际经济利益所推动的。各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整个自治计划制度，是建立在联合劳动组织工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劳动和资金的联合和联系或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一体化中的经济利益的根本

前提上的。

只有看到自治计划的这个根本前提，才能知道，在这个新的制度中不能按过去的方式在对立的经济范畴的含义上把市场和计划因素“混淆”起来；才能知道，强调联合劳动组织（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体）作决定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偏重市场，因为很清楚，它的存在取决于紧密相联的社会再生产过程链子上的其它环节。同样也不能把高一级的自治组织和南斯拉夫共同体一级的自治计划工作看成是为了纠正联合劳动组织的市场活动的需要，而是要看作为有关条件和关系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这些关系和条件将促进联合劳动组织经济利益的实现，促使社会再生产过程正常地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高一级的自治指导是从自治基础本身有机地产生的。任何一级计划工作都不能影响联合劳动组织工人对再生产过程以及发展事业的一切问题作出独立和直接决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联合劳动的理论概念是明确的，而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治计划概念也有了相当发展。应当看到理论建设是我国经济制度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sup>②</sup>。也

① 在这样形成的基本立场上，马克思的计划思想正在实现。这种思想指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论它作为盲目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② 因此，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有根据地指出，“共产党人有责任建立这样的计划制度，它将以有效的自治方式保证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到联邦使社会生产进程、物质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起来。”

就是说，在尝试实现自治计划概念时，劳动还没有相应联合起来，这样就使问题复杂化了。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式的组织结构没有被彻底打碎。工人和劳动人民还不能明确规定自己的经济利益，还不能按照收入形成过程的标准来联合和指导自己的劳动和资金。这种情况意味着，尽管工人在形式上已经联合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之中，但我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还保持着遗留下来的业务联系方式和对发展事业作决定的方式。因此，保证直接生产者对联合劳动和发展事业独立作决定的立场，是自治计划制度的首要前提。

为了使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以及联合劳动的一切自治组织形式能适当地计划自己的发展事业，必须全面了解整个经济、所有经济部门和集团的经济地位的各个方面。这首先要注意设备能力的利用情况，资金周转速度，生产因素的有机组成，收入率，工人的个人收入量等等。它们也应当了解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技术工艺上和经济上（收入上的）依赖关系的性质和强度，或它们的收入的形成过程的性质。因而很清楚，成功的自治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取得关于技术进步过程（即生产力发展）方面变革趋势的情报。

当所有这些情报和分析都清楚时，联合在一个再生产整体范围内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就可着手进行作为它们共同发展计划基础的自治协议，并在这个范围内研究解决自己的再生产问题的可能性。

考虑到计划工作是以联合劳动的利益和进程为根据的（联合劳动过程本身也是这样），所以计划工作就不仅是工人在自治工作中的权利，而且是义务，并且必须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进行。

自治计划的制订，对所有的计划制定者来说必须同时进行。这样就可以将契约的目标同实际发展可能性不断地进行对照；可以把联合劳动条件下的整个社会再生产同科学和技术中的变化协调起来。这也意味着，与以往的制度不同，所有计划制定者的计划是同时制定的，彼此协调。在分析这些计划完成情况的同时，劳动者必须看到下一个计划期，以便使保证计划实现的措施为下一计划期的社会经济顺利发展创造可能。

正如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在统一的劳动组织中通过自治协议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那样，它们同时还努力完成本劳动组织的共同发展计划，解决整个再生产范围内的发展计划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再生产过程中相互紧密依赖的各个经济部门和集团的联合劳动组织集中起来的。在这里，通过自治协议产生共同发展计划，再生产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是通过发展计划来解决的。通过再生产整体的发展计划形成协调和协作整个南斯拉夫共同体发展事业的总的社会契约，这种契约的条款应当保证顺利实现整个再生产发展计划所必需的共同条件。应当制止垄断倾向，即制止一个整体靠损害另一个整体来发展自己的倾向；应当促使已通过的发展目标得到实现，根据共同接受的自治程序原则，这些目标被确定为大家通过的共同目标，并且为南斯拉夫共同体所采纳。有关发展计划的社会契约应当明确规定这个社会计划的数量、总的动向和实现条件。

因此在事先，在社会政治共同体方面并不存在预先的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政策（根据这些目标的政策再提出社会计划和保证实现计划的措施），而是在联合劳动内部实

现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在社会一级则表现为社会扩大再生产所有主体都接受的政策。

应当看到，计划的协作和协调过程是很复杂的，出现许多应当解决的有关自治计划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这指的是协商和协调不同计划承担者经常发生矛盾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作为协调和确定再生产整体的发展计划或南斯拉夫共同体社会计划的结果，必须通过自觉的活动对现有的状况和关系进行进步的变革。变革首先是制止特权地位，以便为社会再生产正常发挥作用创造条件，这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是指在生产和流通的共同发展计划中所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形成异化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中心的某些其它问题。关心再生产整体的思想、意义和含义正在于此，即在这个整体范围内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使经营条件均等起来，使经济地位的差别得到调整以及对发展计划进行协调的需要，以达到整个再生产过程发挥正常作用的目的。在这方面，联合劳动过程应当提供最大的效果。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各种联合劳动形式（各级劳动组织、再生产整体、经济部门等等）对待自治计划工作的立场都是相同的和统一的。因此，从组织水平的各方面看，各级组织的自治计划内容也是相同的。同选择劳动组织范围内的优先发展方案相比，这种情况对于选择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一级的发展目标和意图是同样的。因此才能提到自治计划的统一制度，而其基本特征就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及其各级组织对再生产过程的一切问题的决定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自治计划制度特有的这个重要特征在过去的制度中是没有的。因为过去是企业提出计划，而由国家对扩大生产整体

的发展计划加以协调。这种情况造成了联合劳动组织的计划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计划互不联系，计划不现实以及计划任务和由它们规定的比例没有约束力。

根据联合劳动组织集团之间依赖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制定自治计划，或制定和实现生产流通整体的发展计划，有助于克服集团内部的闭关自守和垄断化、地方和地区的利益范围以及利益冲突。在自治制度的条件下，只要各地区（区和共和国）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劳力和资金的自由周转，这些整体的发展计划就可以完成，这种情况有助于南斯拉夫经济部门的统一和加快缩小我国某些地区发展程度上的差别。

从上述对待自治计划的立场中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一定的再生产整体中，必须通过联合劳动组织的联系条例来解决计划问题的思想，就意味着“卡特化”的某种新形式或建立一种在联合劳动之外形成和存在的新的组织形式。应当指出，这里所谈的是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帮助，这种帮助是以科学地认识联合劳动组织的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性质为依据的，这种帮助给联合劳动创造恰当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的条件，办法是同那些在再生产链条中最接近的单位进行劳动的联合和联系，这种表现就是联合劳动自治计划的基本前提。

再生产整体不能臆造出来，它们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客观上还有某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参加。通过协调那些参加某些再生产整体的基层组织的发展计划组织联合劳动，通过制定这个再生产整体的共同发展计划，并根据收入形成过程的逻辑来建立联合劳动基层

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社会再生产发挥正常作用创造条件。其出发点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对这样的劳动联合和联系要有切实的经济利益，由于这一点，这些组织必然同其它经济主体相联系，这是完全预料到的，而且也是联合劳动工人的长远利益。目前还没有见到协调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利益的其它方式，也没有见到为实现联合劳动在调整社会整个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其它办法。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围绕着谁同谁应当签订关于发展计划的协议和契约这件事，不存在任何的仲裁和主观主义。根据每个基层组织在购买成品、取得原料和劳动资金的业务统计，可以准确地规定谁跟谁在再生产过程中互相紧密联系（即在业务上紧密联系）。它们在协调关于发展计划和共同发展计划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上的权利和义务，不是根据这个再生产整体的某个组织形式，而是根据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它们的权利和义务，即在劳动的联合和联系中在收入和收入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其相互的关系。

某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活动属于一定的再生产整体，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该基层组织必须调整自己的发展计划和参加再生产整体的共同发展计划。在充分了解自己技术工艺联系和经济联系的性质，了解各个联合劳动组织的经济地位的各方面以后，应当由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人自己自由地表达这种利益并对它作出决定。但是，如果有一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不参加再生产整体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或者不关心协调自己的发展计划，不关心为实现计划而采取必要措施，而它们又是在再生产过程中互相紧密依赖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再生产过程发挥正常作用的联合劳动组织，那么，

可以在联邦宪法第四十三条的基础上，通过联邦法令使这些联合劳动组织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确定自己发展计划的共同基础，以此来促进社会再生产发挥正常作用。显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既不能剥夺直接生产者的资金，也不能把决定再生产的权利交给在工人直接影响以外的某个人。这种对自身发展事业制定计划的义务，一般不触及而是确认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人的经济利益。

再生产过程整体制定计划的内容或对象，特别是确定整个收入的创造和支配、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收入关系以及确定这些关系的全部条件），是自治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基本方面。因此，物质生产部门的计划收入（即整个社会劳动的可能成果），是一切生产部门和非生产性社会部门的劳动计划及发展计划的物质基础和范围。社会部门的所有联合劳动组织、利益共同体、地方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计划，都应当同物质生产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计划或计划收入相协调。作为共同的自治发展计划基础的自治协议，要在再生产整体的联合劳动组织共同发展计划的自治协议之前制定。关于联邦社会计划的社会契约也是这样。在这个计划中，规定联合劳动组织在协调其自治计划方面的相互义务。在自治计划或社会计划的基础的自治协议或社会契约中规定了“计划期间实现收入的条件和可能的因素以及指标”，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劳动人民不断改善他们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及其物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目标和利益，同时并规定实现这些利益、目标和任务的资金，即规定所有参加者在参加劳动和资金联合方面为实现计划和任务而承担的相互义务。



因此，自治计划是有意识地对基于科学地认识经济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之上的经济运动和社会运动施加有组织影响的方法。从这一点看来，自治计划是表现为组织劳动联合过程(即发展和完善劳动联合过程)的形式，换句话说，自治计划是联合劳动发挥有效职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中间，开始和终结的最重要环节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意地组织和参加指导经济发展才表现为管理劳动的过程。基层组织工人的经济利益和他们在联合劳动中作决定的方式是统一和协调基层组织的计划、基层组织各种联合和联系形式的计划以及社会政治共同体计划的最重要前提。

如果将来联合劳动过程在自治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那么，自治计划就是这种经营形式的决定性东西。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规律同计划或计划工作对立起来。因为，既不能把自治的商品经济等同于无政府状态，也不能把计划等同于组织经济的合理方法；同样也不能把计划工作等同于社会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特有的计划工作的行政管理形式(这是指自治商品经济有意识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的特殊联合)，因而计划工作不能消灭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和价值规律，而是应当建立在认识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因此，正如巴卡里奇同志所说的那样，计划工作是价值规律的一个因素，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计划工作不是纠正自发势力，而是组织社会和有意识地指导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一种崭新形式。

正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我们的制度中，在自治计划的立场和目标，自觉调整计划的利益，计划工作本身的内容，

计划协调的方法等方面，同迄今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所有其它众所周知的计划制度相比，有很多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此，无论是计划工作实践需要的指标和指示，还是计划工作的目标和具体任务，都不可能表现为社会的中立表示和范畴。例如增长率、资金系数、劳动率生产水平、积累率等等，首先必须根据自治经济制度的性质、联合劳动或自治商品经济的作用等来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发展的能力以及计划执行的结果，就应当根据统一指标来考察。在这些指标中起主导作用的首先是这样的一些指标：它们表现出收入的关系和联合劳动组织在劳动的联合和联系过程中的社会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性质；它们使联合劳动组织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专门分配中得到完全的适当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关于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方向和可能性的全部情报，而这些也促使自治计划制度得以建立和实现。

#### 第四节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下的价格

毫无疑问，支配生产资料的非占有性质和收入的社会性质，为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了条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决定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方式和具体关系，还在于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消除那些造成取得和分配收入中所不容许的差别的条件和原因。这样就消除了我国经济部门的物质结构的变形现象，并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发挥正常作用创造了条件。

在迄今为止的实际工作中，在形成收入的专门分配概念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而且在实现收入的专门分配政策中也

积累了很多经验。宪法决定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之间建立关系，这就使在“自由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制定收入再分配政策有了可能，这种政策是符合按劳分配制度的，并且能保证一切社会部门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有平等地位。但是，自治的收入政策的基本问题（可能是南斯拉夫经济政策的最复杂问题之一），就是收入的取得问题，也就是收入的最初分配问题。在这方面，除了搞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以外，迄今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事。比如，最重要的社会再生产领域还不受工人的影响和由工人来决定<sup>①</sup>。联合劳动和自治计划制度提供了使这个再生产过程领域彻底成为我国自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因此，联邦宪法和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严肃要求在这方面进行重大变革。

① 因此，还是卡德尔同志的批判性评价中所说的：“如果我们问：自治在哪些方面经受住了考验，而在哪些方面又没有经受住考验，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什么地方得到成功的肯定，而在什么地方又没有得到成功的肯定呢？我想，如果说最大的失败正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那将是毫不夸张的。这些失败是在市场和社会资金流通领域通过最初分配而形成收入的自治取得和分配的基础上产生的。坦白地说，这些失败更多地是以下情况的后果，即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过于长期地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和国家干涉为基础，而不是把扩大再生产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上。长期存在管理社会再生产资金的‘两种制度’，为自发势力泛滥成灾打开了缺口，使自治制度发生变形和降低了作用。这种情况往往表现在市场和经济的不稳定上。而基于自治支配收入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的紊乱，又对经济的稳定起消极的反作用。”（卡德尔，《现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所有制矛盾》，贝尔格莱德，工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72、73页。）

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张在协调收入政策或取得收入政策，特别是与此相关的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方面应当采取完整的行动规划。对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有深远意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点涉及到宪法的要求，即基层组织和其它组织的工人与劳动者将成为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的真正制定者。或者说，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的这一部分也应建立在工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上，即直接地或用民主方式决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及按怎样的价格销售商品或劳务。但是，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权利或独立性，那就意味着价格制度是完全自治的和独特的制度，就是说基层组织和其它经济主体可以任意对待价格，当然这会在确定价格水平和价格关系中造成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归根到底会造成垄断收入的状况以及与自治生产关系性质不相符合的其它变形。非自治干预收入关系就是这种不能接受的情况的反应，这种状况至今仍未改变。由于上述原因，以下这种立场有着特殊的意义，即通过联合劳动组织工人的自治协议以及共和国和自治者的社会契约来制定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而这也是以劳动的联合和联系的自治协议为基础的，是同实现它们的共同发展计划相吻合的。通过这些计划或按照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共同政策来考察对这种联合和联系劳动有意义的一切问题。

换句话说，在联合劳动和自治计划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保证按劳动原则取得收入的收入关系。同时对市场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使市场真正的越来越多地消除自发性，使之自觉地协调解决和自觉指导社会发展。

因此，正如自治计划不能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而必须坚持科学地认识它们那样，同样也应当想到，价格和

价格关系作为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一种人为的表现，具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特有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性（首先是价值规律）。对它们应当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在制定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时，肯定这些客观规律，并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制度表现出来的消极作用（无政府状态等）的程度，对这些规律作用加以引导和纠正。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市场发展计划关系问题、收入和收入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价格问题的解决，并使市场关系（首先是供求关系）在联合劳动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下建立起来，而在联合劳动生产关系中基本社会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收入关系，这种关系决定计划工作的必要性（收入的社会性），从而也决定有意识地控制市场的需要。在这样的关系概念中，市场表现的职能是收入关系的职能，同时也表现社会经济基础产生的那些现象、过程和关系。

显然，在联合劳动组织得不够好的条件下，就应当对自治组织同所有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作用加以协调，以保持市场价格的相对协调关系并消除那些造成市场垄断化或利用产品和劳务搞形形色色投机活动的条件。这样做的理由，是要推动在联合劳动基础上建立收入关系，也就是在劳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有制、在某种特殊的自然条件或市场条件的基础上来建立一切经济关系。而且这种参与应当在认识客观规定的关系和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价格制度及价格政策的重要问题。

因此，自治价格制度的出发点必须是：生产的基本社会经济关系和自治商品经济规律，或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劳动与资金的联合和联系，收入和收入的关系，按劳分配关系

的基本内容的性质。

制定自治价格制度的另一组关系和范畴涉及价格结构、标准和指标。它们都为构成价格水平和执行价格政策服务，也就是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在最初分配中形成经济地位的政策、保持现有地位、使其地位向好的或向坏的方面转变政策以完成有关收入政策方面的一定任务服务。

最后，在制定自治价格制度方面还有一组问题是方法问题，即建立一定价格水平和价格关系的结构，也就是建立商品交换关系的结构。这是指自由形成价格以及根据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形成价格和商品交换的条件。

自治价格政策作为实现自治价格制度的形式，是各级自治组织和基层组织的工人及劳动者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和任务而自觉组织起来的行动。

过去执行政策的方式显然不能解决摆在政策面前的基本问题。就是说，执行价格政策的方式造成了一系列不能容许的结果。

第一，过去的价格政策在选择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优先权方面，不是从自治商品经济特有的客观趋势和规律出发，而是利用仲裁标准（国际价格、发展标准、经济发展程度和结构等等）。把这些标准运用到各个部门和经济集团，就意味着任意对待价格政策制定者的劳动成果。这种作法首先是因为不存在自治计划制度的结果。

第二，个别集团在最初分配中拥有不合理的有利地位这个事实，造成个别部门和经济集团在取得收入的过程中占有垄断地位或长期享有特权地位。分析表明，这个问题不能通过价格或通过关于价格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解决。而实

钱也表明，凡是试图通过价格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解决再生产问题的地方，价格就变成维护垄断地位的制度，把买卖关系当作业务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唯一实际形式。这个问题只能作为整个收入政策问题即自治计划的一个问题来解决，用我们以上阐述自治计划制度时强调过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很显然，价格制度是自治计划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个制度不是由上而下建立的，而是根据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工人及他们对联合和联系劳动的经济利益建立的；他们同所有主体联系的原则是技术工艺的依赖关系以及收入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依赖关系。这个论点是建立整个自治计划制度和自治价格政策制度的最重要的条款。为了能在参加一定的再生产整体（即整体经济）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一级解决计划、取得收入和价格政策问题，应该对经济集团在收入的最初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专门分配中的经济地位有个全面的了解。首先是要了解：①所有经济主体设备能力的利用情况；②生产要素的有机构成；③物质要素的周转速度；④标准熟练工人的收入；⑤资金的收入；⑥实现法定和条约规定的收入比重；⑦收入率；⑧每个工人的个人收入；⑨个人收入和积累基金的关系以及分配收入结构等等。基层组织必须向经济、再生产整体、经济部门和经济集团说明这一切指标。到那时才能谈到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也就是说，才能实际进行计划协调过程以及制定实际可行的共同发展计划。

至于价格，那就必须考虑从再生产整体的立场来解决取得收入和形成价格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取得收入的方面垄断现象。过去和现在，这些现象的产生都是由于在一个部门和部门内部进行组织和联系的结果，也就是无政府状

态和不起作用地解决发展问题的结果。要达到就取得收入的条件进行协议和签订契约的程度，一个经济部门的基层组织就不能不关心在再生产过程中彼此密切依赖的、决定其取得收入的可能性及存在前途的那些组织。因此，应当从劳动的联合和联系的逻辑出发来实现共同的和本单位的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保证再生产链子上的每个环节都按照每个基层组织的经济利益、按照组成一定的再生产整体的所有基层组织的正常再生产的利益来进行发展。

联合劳动组织只要参加商品和劳务交换以及价格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在客观上就必然具有在自治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联合劳动生产关系的性质，而且它是在了解商品出售价格结构的条件下参加协议的。物质消耗决定商品生产和劳务中劳动资金及劳动对象的实际费用。作为契约基础的收入可以这样来计算：即生产费用（转移劳动和新补充劳动的货币表现）乘前个时期的收入率或乘同上期相比增加还是减少的收入率，这决定于自治协议的签订者认为什么样的地位在收入关系中是在经济和社会上是为最理想的地位。因此，重要的是要看到，在再生产整体范围内始终存在收入率的差别，这些差别是再生产过程中现实关系的表现，即全体契约签订者的经济利益的表现，而不是什么特权的垄断的地位的表现。

因此，在这个制度中，重要的新东西是：

1. 制度的基本制定者，制度的主体；
2. 它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方式以及价格水平和价格关系的决定方式；
3. 利用一定的标准和指标以确定相应的价格水平和价格关系。



自治制度和价格的社会监督中所有重要的新东西都是从制度、联合劳动关系以及自治计划和社会计划特有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这是因为价格和价格关系就是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范畴，这些规律掌握自治生产关系的发展，即指导和调整劳动的联合和联系，确定收入关系和自治的发展计划。因此，建立价格关系或建立取得收入关系，以及规定联合劳动、收入关系、发展计划和价格计划（掌握市场问题之间的联系）是新价格制度的重要前提。

如果适当解决上述问题，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就不会通过提高价格来解决本单位再生产过程的所有问题。价格将成为提出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共同发展规划所必需的其它因素中的一个平等因素，成为在分配共同实现的收入中或者在取得收入中建立一定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其次，只有在以上情况下建立价格制度，价格制度才不会成为以自治方式和极权主义方式确定价格关系的结合，而这样的关系容忍某种自由主义概念和实践或使它占优势，或者使包罗万象的国家行政的概念和实践占优势。再次，在以上情况下，还能形成协调的自治价格制度，社会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制度中可以保持那些按照宪法来促进这个制度的确立并使之在实践中得到贯彻的职能。

根据新的价格制度，价格决定的主要体现者将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可以期望，随着联合劳动在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社会计划，价格关系将由联合劳动各个基层组织工人的自治协议来确定。也就是说，正如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不把自己的劳动同其它基层组织

的劳动在共同发展的自治协议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就不能发展一样，如果通过协议还不能把评价劳动成果的尺度和共同基础的问题加以解决，那么，它也不可能得到市场对其劳动成果的适当承认。这就是产生以下情况的唯一原因，即价格，还有在价格基础上实现的收入，只能是基层组织全部业务合作的最后活动，而这样合作是由计划决定的，并且在共同的发展规划中有明确规定。

在这里，应当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产品的价格关系或价格形成的共同基础，是由共和国及自治省按照与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政策一致的社会契约来决定。

必须强调指出，基层组织工人在决定价格上绝对独立地起决定作用，但如果不依靠来自联合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相互制约性，尤其是在今天如果劳动不是令人满意地联合起来，那就意味着市场自由主义起决定作用，而市场自由主义不可能消除社会再生产范围的消极现象，而且还会在客观上造成取得收入的垄断作法。这就是说，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要永远独立决定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具体价格，但这是在既定尺度的范围内。这种尺度决定收入最初分配中得到的经济地位，而价格的共同基础和标准则由在发展规划中所明确的自治协议或社会契约决定。而在发展规划中，除了其它方面以外，还包括使彼此合作的各个经济部门和集团取得收入的条件均等起来的契约动向。

除了价格制度的基本体现者以及按照自治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定价格的方式有了变化以外，规定执行价格的标准也很重要。这种标准不能是仲裁式的东西。决定一种或几种标准的社会契约，是由客观上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那些部门进行

的，而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则在这些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内对价格进行协议和协商。因此，契约和标准的利用是基层组织工人掌握整个再生产的前提。通过利用标准可以控制出售价格的现有结构，并根据联合劳动的生产关系或收入关系形成价格结构的要素。因此，应当在业务成果指标中寻找一种或几种标准的社会决定，也只有根据业务成果才能看到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在最初分配收入中的经济地位的变化。显然，选择标准不能完全由基层组织独立作出决定。必须按下列方式进行，即由联合劳动法责成基层组织通过一定的指标说明自己的劳动成果，然后就可以责成它们利用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价格水平和价格关系。制定价格制度和价格政策的其它社会主体也有这样的义务。

只要不断地对联合劳动组织在收入的最初分配、第二次分配和专门分配中的经济地位（按照它们拥有的指标以及与确定价格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利用标准来解决对价格有意义的问题，就可以理想地改变取得收入的关系。价格制度的标准以及标准的利用或运用方式问题，可以通过专门的社会契约或价格制度法令解决。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价格制度的标准，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价格水平或价格关系的改变，的确是以仲裁方式完成的。如果在向新的价格制度过渡期间能通过价格制度的标准的利用以及在综合分析经济地位的基础上对价格实行社会监督，那么，情况就要好得多。这里有决定意义的是，根据对经济地位的分析即根据所采取的标准，使那些垄断取得收入的社会再生产部门均等起来，并按照价格政策的社会契约来制止垄断取得收入的情况。在这种社会契约中要规定：对什么样的价格水

平以及什么样的价格关系，才可以真正说成是垄断状况；什么样的经济单位和其它主体怎样以及用什么方式来引导社会活动才能消除造成上述那种状况的原因。同时应当区分价格关系中的差别：即作为在收入上密切联系的部门和集团（它们在共同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对一定的优先权作出决定）的基层组织实现共同发展规划中产生的价格关系，还是作为收入从一个再生产整体向另一个再生产整体流动的结果而产生的价格关系。

### 第五节 根据宪法规定改革货币、信贷和 银行制度的某些问题

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制度中，货币、信贷和银行都是属于经济范畴的，这个范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这主要是指货币流通范畴和货币流通关系；指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可分割的这样一部分范畴和关系，这些范畴和关系对实现宪法关于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支配社会资金的要求，即实现关于劳动成果的相等价值或者不太相等的社会（货币）价值的要求起着决定性作用。总之，这指的是联合资金的结构。在这方面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掌握和按照什么基础去掌握整个的社会扩大再生产，而且从资金集聚和集中的一定形式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众所周知，这一关系的范围几乎完全是和直接生产者以自治的方式参加劳动格格不入的。过去，曾有过这样的看法，认为工人阶级的直接政权是不能在这个领域内建立起来

的。也还出现过这样的理论，认为既然货币（商品）的流通机构（经济主体）处于再生产循环的极点上（即再生产过程中圆周运动的极点上），那么，这些货币流通机构也不应置于以自治的方式作决定的总原则之下。但实际上，我国经济制度的发展实践得出这样的一种结果，就是在信贷货币制度领域内出现了一些十分象财政资本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按照资金分散化和决定权分散化的原则，资金没有转到联合劳动中去，即没有转到生产单位的劳动集体中去，而是用行政决定的办法，把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存在银行里，并且在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影响下，把这些资金用于实现发展规划的需要。为了能使范围较广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城市的或者共和国的）解决实现某些投资规划中的问题，拥有从以前的联邦银行转来的资金的那些银行正在联合起来。过去，在经济生活的现实中保留了以行政方式使资金集中为特点的信贷制度，这样的资金集中的动机是资金的私人增殖，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以取得一定的购买力和解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生产者对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虽然继续保持影响，但实际上，其影响比纯粹以行政手段作决定的时期还要小。因此，很清楚，在货币职能，即货币的发行同直接生产者没有联系、而成为其他什么人的储备的条件下，就会出现无名资本，就会导致货币流通领域对再生产过程的生产阶段的统治，这也是在我国所发生过的情况。

基于上述原因，通过了一项银行、信贷和银行业务法。制订这个法令是想消灭无名银行资本，使管理银行的民主化并消除社会政治共同体对银行的工作和管理的影响。但是，这种改革对涉及到生产关系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没有作出回

答，即怎样建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 and 银行之间的关系，才不会在今后出现货币领域对生产领域占优势的情况，或者说，如何才能使整个银行制度置于联合劳动的职能之内。因此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中提出了原则性的基础，从而为解决有关制定同联合劳动关系有联系的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的一切问题创造了条件。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改革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的各方面的基本立场就是宪法原则。宪法强调说：

“货币和信贷制度是社会再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这个关系是建立在联合劳动工人自己管理社会资金的基础上的，在这个关系中取得的全部收入都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收入的不可剥夺的一部分。”

“从联合劳动的生产、流通和财政部门（作为社会再生产统一体的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性出发，联合劳动组织中的工人确定自己在社会再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合作，以保证生产工人对其在这些关系的整体中的现在劳动和过去劳动的成果作出决定。”

根据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的上述基本立场，宪法的正文部分为阐明以及为从法律上调节对银行制度和信贷货币制度有意义的一切问题，提供了最广泛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根据我国自治社会的基本关系原则，即根据资金的社会所有制、联合劳动、自治的发展计划和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作决定，进行管理的原则，对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因此，货币信贷制度机构本身，如银行，便失去了某种特殊的、具有特权的和神秘的含义。为了认识经济主体在这个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业务活动的真实

目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明确指出，谁可以成立银行，如何、为什么、用什么样的资金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立银行，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对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具有意义的一切业务。

如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其它方面一样，应该使改革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的宪法条款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尽早付诸实现。目前，正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讨论通过的法令有：（1）货币制度法草案；（2）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基础法草案；（3）经过公开讨论后，还将通过南斯拉夫人民银行法和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人民银行统一的货币业务法。

下面我们仅指出几个重要问题，看看上述法令草案是如何阐述这些问题的。

首先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是关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在货币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迄今的制度中，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因为货币信贷制度只包括已建立起来的而主要是独立于联合劳动之外的某些机构的权利、权限和业务，因此，在货币制度中便产生不协调现象。换言之，就是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信贷关系不能“货币化”，即不能恰如其分地参加到与业务银行相关的货币信贷关系中去，并通过业务银行和人民银行的发行纸币的职能发生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调节货币和信贷也不能靠原来的商品货币流通和联合劳动组织的业务。把货币信贷制度归结为调节货币量和信贷规模的职能，不依赖基于以自治方式作决定的劳动组织之间的原有的商品货币流通，那么，货币信贷制度便失去依靠和客观形成的标准。所以，货币信贷制度在联合劳

动方面表现出来的职能是不适应的和过时的。例如，发行货币的一大部分是旨在弥补预算单位的赤字，弥补由于收入等方面的积累资金不足而造成的投资赤字。这样，业务银行一般可以保证某些使用资金受限制的单位的资金（长期或临时性货币贷款等）以代替向经济过程和业务进行贷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要在联合劳动组织之间建立关系，而是把这种关系归到业务银行和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双边关系上，也就是归结到表现仲裁性质和主观主义的信贷关系上。所有这一切都会延缓把货币信贷业务置于联合经济控制下的要求的实现，同时由于破坏了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程，也会促使和刺激分支银行和地区性银行的关闭。

由此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是，持久性的货币和信贷制度必须这样来建立，即必须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出发，从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之间建立起来的商品货币流通关系出发，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建立人民银行和业务银行之间相适应的关系；才能建立业务银行和联合劳动组织之间的相适应的关系，即建立一个完整的货币和信贷制度。

由于联合劳动组织变成了货币和信贷制度中的一个基本单位，从而也就为联合劳动组织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它是作为货币发行政策的重要体现者出现的，即作为影响大量货币流通的经济主体出现的。由于商品货币相互成交，联合劳动组织通过有价证券的发行而实现了这种社会地位。

在基层组织的这些货币职能的基础上，同时又考虑到有价证券变成硬货币（货币化，即办理贴现）的可能性，也就是考虑到在这些有价证券的基础上从业务银行提取贷款的可能性，较大的经济清偿能力可以得到保证，还能创造客观条件



使联合经济能执行银行的信贷政策，也就是使联合经济建立在现实的商品货币的流通和有价证券的基础上，那些基于这种关系上的联合劳动组织在其背后承担着实际责任和风险。很清楚，联合劳动组织的这种职能可以减轻对南斯拉夫人民银行发行纸币的压力。按照联合劳动组织在业务银行的有价证券的总存量，由人民银行向业务银行提供贷款，这就有可能使得南斯拉夫人民银行发行的大部分纸币在客观上得到了可靠的支柱，并且直接由联合经济的商品货币进程所制约。迄今为止，这还是从未有过的情况。换言之，由于联合劳动在货币制度中的新地位和新职能，也就是由于联合劳动组织加入了有价证券制度和这些有价证券的循环，便形成了自治经营经济制度特有的货币市场。这种货币市场能使有利于联合劳动的业务银行的共同信贷政策成为最需要的，从而使人民银行有选择的发行纸币的政策也成为最需要的。由于上述基层组织在货币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为把信贷制度建立在联合劳动组织切身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在其它正常的商品货币进程需要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扩大再生产需要的基础上，创造了条件。因此，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的工人有能力掌握和管理货币职能的产生，联合和使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种社会改革只有加强社会经济中的劳动的联合和联系过程时，即在收入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加强共同的发展计划时，才有可能，而这种收入联系是成立某些财政联合（各种不同的银行）的条件，同时，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作为新的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基本支柱）通过这些财政联合体来实现决定自己的劳动（即决定劳动和全部业务）的所有货币条件和其它条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迄今关于货币和信贷制度的讨论中强调，经济中的财政状况将取决于较严格的纪律和较好地完成相互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明显地暴露出联合劳动组织合理经营和非合理经营以及清偿能力和非清偿能力之间的差别，这一切都应促使在联合劳动组织作出自治决定、对联合劳动组织的业务联系和业务银行的这些组织作出自治决定的时候，去建立相适应的标准。因此，货币和信贷制度将作为一个协调和使其利益一体化的因素，作为加强自治社会中团结的因素出现，这种因素肯定货币的基本职能，导致经济进程稳定，并使劳动成果取得社会相应的承认，从而阻止了收入的异化，并阻止了迄今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的一切消极现象。

如果联合资金以贷款的形式（通过银行组织的途径）在劳动的联合和联系以及发展有计划的自治协议的职能中进行的话，那么，在货币流通方面（货币、信贷和银行）经济制度的这些部分就是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目标的重要杠杆和推动因素。因此，很清楚，银行组织的计划必须依靠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计划，依靠自治利益共同体和其它在这些共同体中把劳动和资金联合起来的社会法人的计划。银行组织还要注意这些主体的共同发展计划使货币信贷过程的活动，真正服从于实现这种概念上的计划的发展。所以发行纸币的政策、货币和外汇政策以及信贷政策的共同基础都是以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为基础的。这些政策都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决定的，同时联邦执行委员会根据所通过的政策实现发行纸币、货币、外汇和信贷政策的共同基础的目的及任务所必需的行动措施及方向作决定。

按照在货币和信贷业务方面的收入上有联系的生产和流

通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联合劳动和联合资金过程的利益和需要，内部银行或类似的专门独立机构，是独立的组织。

内部银行是为进行货币流通需要而联合劳动和联合资金的极其重要的阶段，这是从联合劳动组织的经济利益出发的。收入上有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和其它社会法人通过联合自治协议建立内部银行。联合劳动组织的这种财政联合体具有一切银行业务方面的特点。就是说，这种财政联合体不准许提存，也不能向其它社会法人、市民法人和公民提供贷款，这就使这种联合体在财政方面牢固地同联合劳动联系起来。成立这种联合体不在于资金增殖，而在于解决内部银行成员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不成立内部银行，就不能确保任何一个再生产整体的共同发展计划的实现，也不能为社会再生产资金在联合劳动基础上的周转创造条件。

把联合劳动组织、自治利益共同体、内部银行和其它社会法人都联合到基层银行中，是对银行组织联合的高级阶段。在实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计划和实行超出基层银行范围的其它业务计划时，基层银行的成员可以决定把基层银行同其它基层银行联合为联合银行。此外，还可以成立银行团及其它的财政机构，以便更广泛地联合劳动和实行发展计划，包括同外国银行进行业务合作的可能。

由此可见，对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进行必要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这一方向将保证货币流通领域同自治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应地一体化。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要使劳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每一个基本方面都联合起来，那么，劳动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因此，我们要建立从联合劳动的过程中产生，而又为这一过程服务的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而不是建立孤立的经济制度部门和机关。这样建立货币、信贷和银行制度，联合劳动的工人们就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法令掌握货币，并使社会再生产正常发展，而社会再生产又促使工人们的生活在自己劳动成果的基础上越来越好。

## 第六节 宪法修改中关于外贸和外汇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

如同在经济制度的其它领域一样，在外贸和外汇制度方面，也应当根据宪法规定的联合劳动和联合资金的概念，对外贸、外汇制度进行修改。因为过去的（现在也是这样）外贸、外汇制度，一直是处于国家机关强有力的影响之下。由于各种原因，国家机关长期以来未能保证必要条件，使经济主体负责安排这一领域的社会再生产关系。

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基本决议指出，对外经济关系的这一部分和整个制度都应当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相协调。决议特别强调，我国经济参加国际分工的基本体现者应当是联合劳动组织。因为我国参加对外经济关系制度的方针是有助于我国的总发展（包括使自治的生产关系得到完善）以及保证避免与我国社会关系格格不入的消极影响渗入。从我国社会的开放性原则和我国经济面向世界的这一原则出发，在平等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既有利于我国经济，也有利于我们贸易伙伴的经济基础上，不断扩大同世界的经济合作，是有广泛可能的，同样这也是一种客观需要。

之所以要完善外贸和外汇制度，是因为整个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的各个部分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只有对外贸和外汇制度进行改革，才能期望克服我国过去的对外关系制度对我国物质发展和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

现有的外贸和外汇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的有关发展的概念上的；建立在适合于当时国内和国际经济情况的一九六五年的经济改革概念之上的。虽然这一制度同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一年的宪法修正条款相一致，但是，它并未经受过某些严重的社会变化。现有的，实际上也就是经过改革的外汇制度的基本要求，就是鼓励我国经济更广泛地和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使世界市场及其竞争性对我国的技术工艺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生产费用、商品生产水平和价格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政策施加影响。从而在这一基础上使第纳尔的可兑换性实现，使外汇储备增加，使我国的外债减少。在我国实行经济改革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首先，我国更多地参与了国际经济计划；我国的工农业产品对外国伙伴有了竞争性；出口额已经占到社会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一。但是，在这方面也产生一些缺点。首先和最大的缺点是，这一领域脱离了联合劳动的直接影响，联合劳动组织相当多的利益不存在了，它们对支付和外汇平衡情况及发展的责任也没有了。

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外汇制度中的作用，特别是与制定和贯彻外汇政策有关的问题也没有加以明确。因此，在对国家支付和外汇平衡应负的责任方面出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

在现有制度中，在外汇和外贸制度同整个经济制度（特别是经济发展计划制度）之间没有相应的联系。它不是从自治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因此，在使用所拥有外汇资金同使用本国资源的机构之间便出现了一种不协调。这种情况本身又刺激了我国经济结构上和物质上的不协调。

这样，当出现困难条件时候，特别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世界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就产生了没有控制的进口自由化。所以，从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便采取了限制进口的重要措施，要求采取相应的方式保证用适当的外汇收入来弥补进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七六年的形势，由于支付平衡情况的改善也大大好转了。但是，制度方面的主要缺点，首先是社会缺点并未得到克服。

长期以来外贸和外汇制度都是按行政方式建立起来的。在这方面，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但这些办法没有适应整个经济制度，也就是说，没有为联合劳动组织同外国伙伴进行交易提供足够的保证，不是鼓励联合劳动组织去扩大国际合作，更不是使这些组织对国内支付平衡情况担负责任。

按照宪法规定，要对整个外贸和外汇制度进行比较全面和适当的改革。这些改革打破了外汇的神秘化，使其变成一种从联合劳动关系和收入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而不论这一范畴是最直接、还是完全间接地作为有组织地促进外贸经济合作而取得外汇的经济主体出现的。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基层组织可兑现外汇、取得外汇和支配外汇，然后建立对外的信贷关系。为此，基层组织可以在自治协议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外汇关系方面的发展计划，直接地或者通过

一定的自治组织形式(如通过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协调其利益,建立外汇市场并按照在组织上及职能上进行联合的形式,同各共和国、自治省及联邦一起为南斯拉夫的收支平衡和外汇平衡承担责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外汇政策的概念,并且使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它联合劳动组织的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以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社会契约成为制定和执行外汇政策的基础。

在这种改革中,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在外汇制度中是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体现者出现的。这种改革能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中,通过以外汇形式取得收入来消除造成集团所有制占有收入的条件;以及消除这样的情况,即一部分拥有特权的联合劳动组织从事对外贸易,从而使它们有可能成为异化的财政势力中心。

换言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其它组织在联合自己的劳动和资金、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时,必须提出一个对外经济关系的计划。也就是说,要制定一个一定计划时期的外汇收入和支出计划。这样,通过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以及二者之间自治利益共同体,就有可能使我国的经济组织更加合理地参加国际分工,就有可能按照国内的发展政策来计划收支平衡和外汇平衡。

在迄今的实践中,产生矛盾的主要问题,是利用外汇的问题,即联合劳动组织支配外汇的标准问题。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是靠行政式的仲裁来解决的,这就引起了有些单位的不满,甚至在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产生矛盾。外汇制度中新办的办法,就是把兑现外汇、取得外汇和支配外汇都置于长期的发展规划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计划之中,也就是把外汇的

兑现同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劳动、同整个社会的劳动直接联系起来。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取得外汇的比重，是根据工人们以自己的过去劳动和活劳动对实现外汇所作的贡献来决定的。因此，如果在社会再生产中相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不就劳动和资金的联合问题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不把对实现共同业务成果所作的贡献，通过长期生产协作合同，长期业务技术的合作确定下来），不把不同的联合劳动组织形式和其它自治共同体之间相互合作的法令确认下来，那么，外汇支配权利就不能实现。这样就能刺激出口，并使所有联合劳动组织都关心商品和劳务出口的增加，也就是关心外汇收入的增加。

外汇收入还刺激联合劳动组织有可能为实现技术合作，也就是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规划和取得更多的共同收入而把外汇联合起来。当然，这个过程必须在共同的基础和计划比例的标准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在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收支平衡的范围内进行。

在上述概念中，从社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外汇资金和第纳尔资金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无论是外汇，还是第纳尔，都是通过国内或国外市场，在推销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取得的。以第纳尔或者外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收入，就是社会资金的形式，它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货币形式是根据联合劳动组织对其创造性劳动所作的过去劳动和活劳动的贡献来取得和使用的，也就是说，是按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发展需要来取得和使用的，这些需要又是在总收入和收入的创造过程中，根据社会参加者签订的自治协议以及根据法令条例来确定的。所以，外汇并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联合劳动基层组



织参与其实现的总收入和收入的货币表现。

因此，对新的外贸和外汇制度来说，重要的是，按照建立的对外经济关系原则而实现的全部外汇收入，必需集中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支配外汇的一切形式，如果是直接来自这些组织所作出的决议或者联合劳动的关系，直接来自联合劳动组织的资金或者是来自自治利益共同体和社会政治共同体代表制基础上作出的决定，那时支配外汇的一切形式才能为社会接受。

制度中最根本的新东西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成立了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从事协调工作，即协调联合劳动组织和其它社会法人制定的关于对外经济关系计划的共同基础要素，协调外汇收入和支出计划、对外信贷关系计划以及某一年或者某一个时期的具体计划。联合劳动通过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取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在制定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联合劳动从组织上确定并指导外贸和外汇政策。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对南斯拉夫的外汇平衡和收支平衡也负有责任。也就是说，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对实现符合社会计划的本共和国和本自治省的收支平衡情况负有责任。社会政治共同体不必联合到对外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中去，因为整个的社会政治共同体都具有自治的特点。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不及时地就外汇制度的重要问题达成自治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政治共同体就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

除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以外，还规定要成立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关系利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

体的代表组成的，其目的是，使各共和国和自治省都能在为实现政策采取必要措施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制定和执行南斯拉夫共同的外汇政策、收支平衡和外汇平衡政策。在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关系利益共同体的范围内，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利益共同体要对南斯拉夫的收支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统一的南斯拉夫市场负责，要就对外经济关系计划的共同目标和基础进行协商。

由于有组织的联合劳动担负了建立外贸制度关系的绝大部分职能，那是不是说，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社会政治共同体及其机关的职能和责任就不存在了呢？恰恰相反，社会政治共同体及其机关的责任和作用更加重要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对南斯拉夫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对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情况负有责任的新特点。因此，在我国社会的现实中，在南斯拉夫统一的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中，第一次实行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的方案，其内容包括按来源和用途编制的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易的年度计划和多年计划。根据经济主体在联合劳动中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可以相互协调这些计划。

当谈到各共和国及自治省的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方案时，应当注意，在这个方案中，要确定共和国在实现规定的商品和劳动出口方面的义务，也就是说，要在财政交易和其它类似交易的基础上，确定某共和国取得一定的外汇收入和支出的义务（这些交易都是根据统一的标准来确定的）。总之，这涉及到同外国进行一般财政交易的协调方式和明确规定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为实现南斯拉夫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

的计划比例所承担的义务。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这种地位，有助于联合劳动组织的适当联系的加速实现，有助于促进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有助于通过南斯拉夫一级的联合劳动组织的积极而有目的的联系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来代替进口。换言之，这对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联合劳动组织工人共同解决社会再生产的问题是一个新的推动力。同时，也有助于为他们在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创造条件。

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外汇制度中的这种社会经济地位，促使南斯拉夫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情况得到改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支付平衡状况计划数的实现，是从标准的统一性中产生出来的，规划是根据这些统一的标准制定的，而这些标准又是联邦执委会在预先收集了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的意见以后确定的。为实现契约规定的收支平衡，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将要从信贷货币政策、从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等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所有这一切都要按照这一政策的某些观点所达成的契约进行。在制定的南斯拉夫支付规划和外汇平衡规划方面，如果出现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拒绝执行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规划的情况，那么，联邦执委会在征得联邦对外经济关系利益共同体的意见后，也可以确定一些标准使共和国和自治省采取措施克服这种局面。

前面已经提到，联邦对南斯拉夫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负有责任，特别是对国家的支付和外汇平衡情况负有责任。

法令规定，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根据外贸和外汇制度提出共同的外汇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制定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的规划。在共同的外汇政策中，应包括促进

商品和劳务出口的政策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其它形式，第纳尔流通政策，对外信贷关系政策，外汇储备政策以及支付平衡的限制政策。在确定共同外汇政策的目标和任务及对外信贷关系政策任务的同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还确定在国外借债的范围和作为南斯拉夫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组成部分的外国贷款的范围。这个范围是根据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相互协调好的信贷业务计划、联邦及其机构所需要的计划以及外国贷款数额计划等确定的。其中外国贷款的数额则是由加速发展经济不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所需要的贷款数确定的。

以上情况表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制定第纳尔流通政策，但联合劳动对制定和执行第纳尔流通政策也起作用。因为联邦执委会是通过同对外经济关系利益共同体签订的社会契约来确定政策的标准、指标和条款的。同时，应当注意到，为执行第纳尔的流通政策和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确认第纳尔是一种支付手段，目前对此已经通过了决定。因此，一切国家社会机关，一切组织都有义务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按照外汇制度和已制定的外汇政策，为保持第纳尔的流通提出建议和采取措施。

根据法令草案，联邦执委会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的一个机构，参与有关南斯拉夫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规划的一切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参与同南斯拉夫对外经济关系自治利益共同体的合作，并规定用来制定共和国和自治省支付平衡和外汇平衡规划的标准。联邦执委会还为执行共同的外汇政策制定采取措施的规划，以及确定标准以消除共和国和自治省不能达到支付平衡的原因。此外，联邦执

委会还要确定第纳尔的中心牌价并进行其它许多工作。

集中建立在我国新经济制度的上述和其它重要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包含着这样的必要成分，这就是，通过自治组织，劳动和资金的联合，通过相互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制定的发展计划，同时利用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法定权限，使其有可能建立和实现南斯拉夫外汇和支付平衡中的比例。这种比例的实现相应地表明，联合劳动有可能，并且有能力解决社会再生产关系过程中的许多复杂问题，比如，国内对外财政的清偿能力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当期望的是，要把外汇和支付平衡中的混乱现象减少到迄今要低得多的程度上。

## 第四章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 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也就是最近五年的社会发展计划。制定五年计划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因为五年计划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文件，就是说，它是五年期间的发展政策、发展目标、任务和手段的具体化。

制定五年计划是对今后的发展目标、任务和共同决议从政治上进行全面讨论和协商的时机，以便使今后的发展更加有成效，同样也是对走过的道路、取得的成就和所遇到的困难作出估价。因此，制定五年计划也是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进行政治干预和政治动员。现在就对这个五年期间要实行的政策、共同目标和共同任务进行全面的讨论和协商。

这个计划是在复杂的情况下制定的。首先，由于发展矛盾和社会矛盾重重，因而使国内经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而这些矛盾基本上是从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长期的极其动荡的发展中产生的。国际经济形势也非常复杂。全世界刚刚从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但对未来依然不知所措。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过去任何一个五年计划都不象这个五年计划那样，预见到社会关系在一九七四年宪法的基础上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就使协商过程更加复杂，因为人们对未来经济制度的某些因素还不够了解，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

新经济制度的全部因素及它们对今后发展的影响作出评价。

由于这是第一次在代表团制的条件下制定计划，因此，计划的预先协调工作进行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在各共和国、自治省议会及其执行机构参加下，计划的最后协调工作也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从而使计划协议这个极其复杂、敏感的经济政治问题，得以在民主的气氛中，在代表团制全体成员公开讨论的情况下，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成功地制定出了五年计划文件。实际上，这是南斯拉夫代表大会两年工作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文件。

### 第一节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 南斯拉夫社会计划的意义

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计划是战后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五个五年计划。这些计划是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制定的，它表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特征。这些计划对于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制定这个计划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同以前的情况不一样，这种环境使五年计划对于改变和促进以宪法为基础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对于发展国内生产力以满足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社会物质需要和其它需要具有特殊意义。对此要特别注意下列情况：

通过修改宪法，确定了联合劳动工人的权利，他们对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有决定性的影响。联合劳动工人整个地占有收入，并在收入的取得和分配方面享有自主权利。根据这一点，宪法规定了同联合劳动组织发展计划相关联的联合劳

工人的权利和义务（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基础和社会计划法对此也有详细规定）。他们的基本权利是：独立地制定本组织的发展计划和规划；根据自己的发展政策即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和履行自治协议所规定的义务，制定生产计划；决定收入的取得和分配。这些自治计划和规划应该成为联合劳动工人长期协商管理的结果和使收入与收入分配最合理的手段，以满足工人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发展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和更广泛的一体化组织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的社会计划制度中，南斯拉夫社会计划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斯拉夫社会计划不再是联邦计划机构用以全面地独立地计划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也不是共和国、自治省和联合劳动的计划的机械总和。南斯拉夫社会计划是发展事业的新的计划工具，它是在协调某些利益的过程中，在共和国、自治省和联合劳动在经济部门和其它社会部门就发展事业的共同利益和目标，就某些主体承担与此有关的权利和义务而进行协商和商定契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南斯拉夫社会计划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来自各级联合劳动组织协调的计划和规划，来自自治共同体及其它利益共同体的计划以及共和国自治省的计划。它还应该包括计划的各个承担者根据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所接受的义务，为实现共同的契约利益和发展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从制定这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就坚持了要尽量符合新的社会计划制度精神。关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间南斯拉夫社会计划基础契约草案是一个基本文件，计划的协调过程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始的。一九七五年，南斯拉夫议会和有关机构审核了这个文件。而且这个文件的依据既包括一九八五年



以前的共同发展政策以及关于发展可能的大量论文和分析，也包括当时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实行的计划草案、大批联合在大型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的计划和规划以及对改善我国经济结构有重要意义的某些部门的发展协议草案。在计划制定阶段，五年计划很现实地反映和尊重其它计划承担者的发展政策，而在计划制定的基础上，各共和国则通过契约和协议使联合劳动更加完善。

然而，在对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南斯拉夫社会计划契约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认识到制定五年计划的时间应该再延长六个月，以便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完善这个文件，使计划在其内容、贯彻的方式方法和决定的体现者等方面都尽可能接近宪法的决议和新的社会计划制度的社会计划和目标。实际上，协调计划和对计划作出决定的过程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需要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以下工作：

——使南斯拉夫的计划以及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计划主要依靠经济部门和其它社会部门的联合劳动的协调计划和规划，依靠与发展政策有联系的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并且使联合劳动在其组织的措施和形式方面，在现有的和实际可能的范围内更直接地参与研究发展的可能，并确定共同的利益和发展目标；

——制定并通过有助于改善经济部门结构的发展契约；

——五年计划将采用的手段、制度和措施，依靠新经济制度以便使计划得以实现，并使大家都了解其基本内容；

——在计划中说明经济稳定政策的标准，这项工作几乎开展了整整一年。

基于以上这些缘故，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下，南斯

拉夫联邦议会把计划最后通过的时间延长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底。

实际情况表明，计划延期通过是正确的。由于在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广泛动员了一切社会因素，并经过紧张工作和协商，克服了很多缺点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就质量和内容而言以及就社会意义和物质意义来看，计划同六个月前的文件相比，有了很大改进。尽管如此，但计划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与社会计划法完全符合，因为还没有象新的社会计划制度要求的那样，把联合劳动组织起来。不过可以肯定，这个文件具有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至于宪法和社会计划法通过以后的第一个计划，我国社会全体代表都参加了它的筹备和制定工作。在我国计划工作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象这次那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成员参加制定一个发展政策的文件。联合劳动直接参加计划的筹备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当然这是就我国的发展阶段和联合劳动组织所处的现实可能的程度和形式而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象这个发展计划那样，有这样适宜的联合劳动，也没有在这样的程度上依靠过联合劳动的计划和规划，并且反映出联合劳动的利益和需要。这正是这个计划比以前制定的发展计划优越的地方。这是使计划在实际中得到真正贯彻执行的保障，是在计划的影响下使经济和社会蓬勃稳定发展的保障，也是克服这方面存在的一定问题和矛盾的保障。联合劳动参加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使这个计划具有新的社会性质，这种新的社会性质要采用新的一体化的社会计划制度。在这个新制度中，联合劳动将成为计划决定的基本的直接承担者，而这一切都是从联合劳动的利益和可能以及一切社会政治共同体的需

要、利益和可能出发的。

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计划的产生是共和国和自治省在新宪法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的结果。计划尽量以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计划为基础，而共和国和自治省的计划则依靠联合劳动组织的计划和规划。因而，五年计划既反映自治计划的实质，同时又是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可能、从社会政治共同体和联合劳动的利益出发的。南斯拉夫议会协调计划的过程非常形象地说明，对利益、需要和可能是如何从基本上进行讨论和协调的。

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的还有其它社会成员：共盟、社盟、工会和经济协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发展中的复杂问题，只有在我国社会一切因素都被充分地调动和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加以解决。因此，可以肯定，这些因素将继续不断地致力于经济发展问题（包括今后出现的问题）。

因此，南斯拉夫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的社会计划是我国社会所有机构进行民主协商的结果。这个计划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意义乃是因为，它是在自治代表团制的复杂的民主程序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相互冲突中，通过协调和协商的途径，寻求把计划的所有承担者联系和联合起来的利益和发展目标。同时，完全尊重共和国、自治省和联合劳动的宪法地位。这增强了计划的全体承担者对实现共同决定的南斯拉夫中期发展计划的责任感。同时，这也是我国代表团制的正确性、重要性和有效性的证明，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正是在发展问题上表现自己的稳定性、社会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利用延长六个月的期间，又在五年计划中增添了稳定政策的原则和解决制度问题的成分，尽管解决某些制度的重要问题的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但这些问题基本上已或多或少地为大家所了解。与部门发展有关系的大部分契约的立场已经得到协调，这些部门的发展应该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完善，并在南斯拉夫的发展计划中进行讨论。

制定五年计划的工作对于为发展基于宪法之上的自治社会经济关系和改变经济不稳定的某些活动创造有利的前提，也是一种新贡献。这就是说，在寻找共同发展目标的道路上，对计划的立场和相互之间不同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中，通过国家来进行积累再分配的很多幻想被打破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自己周转，发展问题必须并且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联合劳动组织的劳动和资金联合的基础上才能解决。

因此，下一个五年计划是对我国发展的可能进行充分准备和全面考察的结果。把社会计划和计划的作用作为有意识地指导我国自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工具，对这种需要的一定认识也促进了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国的计划未曾有过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那种作用和意义，而这在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中，就事物的本质而言，是必须具有的。这种情况存在的结果，使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比例失调，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缺点，并且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于是负担就落在现行经济政策的措施上，通过这些措施来解决复杂的长期发展问题。当然仅仅用这种方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最近几年，在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经常发生混乱现象，由于我

们与世界保持着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这些混乱现象也必然会影响我国的经济，而这一切又进一步增加了发展的困难、矛盾和局限性。

从这种认识出发，首先要进行根本的准备工作，以保证制定我国的连贯的发展计划。此外，首先要制定中期计划：

1. 制定一九八五年以前我国长期发展计划草案。一九七六年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把它当作一九八五年以前的共同发展政策的基础，在此以前还在各级社会机构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讨论程序也与中期计划的筹备和制定情形相似。制定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在估计世界发展的可能性和展望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下一个十年发展的总方向，从而使计划的承担者便于更加有效地计划自己的发展事业。同时，这也有利于制定连续的中期计划。

2. 制定经济稳定的规划。近几年来，我国的发展在不同的程度上伴有通货膨胀。因此，决定性的问题是制定经济稳定的规划，这个规划要从根本上正视造成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原因，确定克服这些困难应当采取的措施，并从中取得有益的经验，以便制定中期发展计划。在进行了一年的紧张工作以后，这个文件得到有关社会机构的承认。

3. 大量科学论文、专著、研究和阐明了一些问题的分析文章和建议，对于制定中期计划是有意义的。中期计划是在这样丰富的分析文件的基础上制定的。

然而，这一切并不等于随着计划的通过，下个五年的工作就结束了。正如社会计划法正确规定的那样，计划是一个要求积极对待和不断检查计划方针的连续过程，以便根据实际产生的变化对计划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因此，在实行

计划的时候，应该不断地注意和检查计划的现实性，并根据市场、技术发明、现代科学知识、自治生产关系的发展给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中期计划将以自己的内容和决定有力地促进社会经济关系在宪法基础上的变革过程。计划不但提供了范围、而且还要求根据具体发展规划使经济和社会以及整个再生产过程在宪法的基础上迅速变革，并且在劳动和资金联合的基础上，在联合劳动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决发展问题。

尽管从社会意义上讲，这个计划是朝着基于宪法的计划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应该说，社会计划制度的建立刚刚开始。因此，目前联邦、共和国、自治省、区和联合劳动组织的中期计划仍然没有充分反映新的社会实质，即计划要由实现它的人来制定。我们必须顽强坚决地为这个实质而斗争。如果劳动者不支持计划，也不准备在实际生活中执行，而计划也不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这样的计划就没有多大的价值。所有这些计划的基本内容必须成为工人阶级在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上应具有的新立场。这就必须开展进一步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使计划规定的义务真正成为联合劳动与社会政治共同体直接关心的并对自己和整个社会劳动成果负有责任的劳动群众的事情。

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在七十年代中期进入成熟阶段。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家的物质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更好更全面更人道地满足人民需要、社会进步、发展自治社会主义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在物质发展及社会发展方面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过去和现在都要求在下一个发展阶段采取与上一个发展阶段

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来解决物质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新旧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为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所证明，是唯一可靠的和可能的，也是有效的，并且在最近几年为物质和社会进步，为国家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而进行斗争中的一切不协调情况所证明。我们在物质和社会方面取得的发展和进步，要求寻找新的发展道路，要求对整个社会、对物质发展与生产发展的方式作进一步的改革。

一九七四年新宪法使我们看到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宪法提出了对整个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产力进行重大的、长期改革的设想，这是我国过去三十年对物质和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继续。新的五年计划和制度法令具体说明了下一阶段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改革的目的、任务和方法，而这也是社会和经济进一步蓬勃发展的继续。这就是新的五年计划以及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重大意义。实际上我国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是为了经济的稳定和蓬勃发展，是为了加强自治生产关系，为了实现当今时代以及我国经济和社会达到的成熟程度提出的要求相适应的那些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我国革命道路的力量始终在于，物质改革和社会改革是根据发展本身的要求来进行的。我们从来不主张保守那些为发展所淘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成为发展和进步、经济和社会稳定的障碍的那些东西。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巨大力量之所在。这是我们通过那些指导物质和社会前进的经营的重大改革来发展社会及其物质基础的力量。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与当今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特殊区别。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在制度内部进行相应调整，而不是进行重大改革，在社会

关系和政治关系上消除已经成为阻碍物质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障碍的那些东西。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无能进行重大改革，这也是形成当代世界特征的严重危机状况的一个根源。

因此，五年计划必定会为我们已经进入的这个五年的物质和社会方面的重大改革和进步继续开辟道路。

## 第二节 过去五年的发展以及当前这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就象整个自治发展时期的情形一样，过去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蓬勃而活跃。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社会实际产品的年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六点三，高于上一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的增长率百分之六点一。在这段时间内，经互会国家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六点六；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蓬勃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也接近这个增长率。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增长率也达到百分之二点五。从国际的观点来看，我国过去五年期间达到的增长率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如果看到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为特征的，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的世界经济形势就更加清楚了。

我国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产品的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八点一和百分之四点一，这对经济的蓬勃增长有决定性的影响。

上一个五年期间，我国社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是百分之四点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四。就业人数的增长与社会产品的增长要高得多，因而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很慢。经济结构的改革在继续进行，其方向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这个比重已由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八减少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三。

在生活水平的发展方面，同样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用以满足个人和集体需要的资金总增长率是百分之五点七，比社会产品的增长率(百分之六点三)略低。而个人消费的增长又比社会消费的增长略低一点(百分之五点三)。在提高个人消费方面，提高就业率来增加消费以及大量增加外汇汇兑资金的方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就业人员实际收入提高却很缓慢，然而这只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方面。

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社会产品的名义增加率平均超过百分之五，工业生产的实物量增长率是百分之六左右，固定资金的投资率为百分之七，就业率为百分之二十五。尽管这些地区还没有取得计划预定的那种迅速发展，但取得的成果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在过去五年中人们制止了这些地区发展中的不利倾向，缩小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与发达共和国之间的差别。

但是，这些积极成果同时也给经济活动的其它许多方面带来了不良倾向，同时也影响了这个五年计划。首先，上一个五年期间的迅速增长是靠某些年度的大幅度波动实现的。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和一九七五年，经济增长缓慢曾对投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生产的基本结构方面，也没有改变上一个五年期间不正常的比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比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的生产要快。这样，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结构比例失调现象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更加尖锐了。与加工能力的工业

相比，电力和原料严重不足，劳动工具和消费品也是如此。只有在协调食品生产方面有一些进展，尽管这些问题也还没有在稳定的基础上得到完全解决。

这种情况与不能充分利用我国社会资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密切关系。这指的是不能合理使用社会积累。在上一个五年期间，投资部门无论在提高投资效率方面，还是在根据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来改进投资结构方面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措施的影响下，上一个五年计划经济投资总额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六，其中经济投资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二。但实际上，投资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对维持正常的连续投资、建设期限和投资效率都有不良影响。这一时期经济投资的总效率甚至比上一时期的情况还恶化了。同时，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资本边际系数由二点八增加到二点九。在我国，水力发电站的建设期限平均为五至六年，火力发电站大约为四年，开发一个新的露天煤矿为五至六年，修建一个高炉为四年，水泥厂为三年，旅游设施为一年半到二年，住宅为二年半到三年等。建设投入使用的平均时间为三年半左右。建设时间这样长首先是投资过分紧张、范围太广、资金分散以及在自治基础上调节和集中投资资金有效制度存在缺点的结果。

在投资结构中没有任何重大变化。投资结构中工业和农业的比重增加了，第三部门的比重减少了。但是工业范围的投资结构最不协调。而且工业加工部门的投资继续比动力、原料和再加工材料生产的投资增长快。只是在最近二年，在结构方面才有明显地好转。

上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方面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主要原

因首先在于，在自治基础上对扩大再生产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进展缓慢，因此也就没有很好地动员积累和有选择地把长期资金投入那些改进经济结构的部门的发展。

这个问题存在的本身，也就是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可能之间，社会部门达到的水平和结构之间的不协调性。教育制度、卫生和其它社会部门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物质可能及需要不够协调。由于联合劳动对使用拨给这些部门的剩余劳动的影响不大，而国家在这方面的影响却仍然很大，因此这些部门的发展经常要超过经济的可能性。从经济收入中拿出越来越多的拨款用于维持这些部门的压力不断加大。使这些部门进行物质生产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在下一个阶段应该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同时，特别重要的是，要保证联合劳动对这些部门的发展和拨款产生影响，使这些活动在联合劳动工人与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而这一切又要求根据需要对这些部门的发展作出现实的规划和计划。

然而，上个五年期间出现的最大问题是与外国的经济关系，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大量地扩大进口，但是却没有随之出现令人满意的出口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南斯拉夫经济的竞争性不强，生产率和效率在发展程度上都比工业发达国家低。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这种发展情况，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这也是早就出现的长期发展的问题。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方式是，国内生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原料、半成品甚至设备的进口。国内生产能力的建设方式（建设费用大、生效的时间太长等）削弱了我国经济与外国伙伴、特别

是发达国家伙伴的竞争能力。南斯拉夫经济参加国际分工的过程本身确定带有自发性和片面性因素。特别不利的情况是，在我国经济与外国合作的地区定向方面，我们过多地面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这些国家进口的问题上，出口大大落后。这个问题在过去五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尽管在过去的五年中已经有很大增长，但与我们同这些国家保持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可能性和发展程度相比，仍然明显落后。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落后和发展本国工业作了很大努力，这为扩大我国工艺技术出口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原料，这些原料能够在有利的条件下满足我国工业的需要。

在这种与上个五年计划的估计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尽管商品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六，进口增长百分之五点八，但是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同外国的总换货额仍然比计划要低。就是在商品进出口增长明显降低的情况下，贸易赤字还是大大增加了，一九七五年达到三十六亿美元。造成赤字的原因主要是上一个五年中（一九七四年）石油、原料和食品价格明显上涨，造成了不利于我国的价格剪刀差，以及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下降的影响，这一切也是西方市场对南斯拉夫商品限制和封锁的结果。

上一个五年中，与外国的非商品贸易收入增长很快，其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二；而支出的增长却很慢（只有百分之五），这样发展的结果，一九七五年商品贸易的顺差达到十六亿美元。

商品交换的地区结构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个五年

计划期间，同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交换比计划要高（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进口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点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换也比计划高（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三点二，进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九。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却大大低于计划（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二，进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三），这是我国与外国整个合作形式不利趋势的基本原因，也是我国商品交换和支付平衡方面赤字增加的基本原因。

国家的支付平衡状况和进出口程度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限制我国发展的因素。因此，更加有力地、适宜地把我国经济纳入国际分工，并克服这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出口不能弥补进口，进口大量国内能够生产的高质量的和有竞争能力的商品，不利的进出口地区结构，我国经济参加外国市场的组织工作不够好等），是保障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战略设想。由于采取了相应措施，一九七六年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出口大量增加，进口是经过选择的，这样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在支付平衡方面甚至出现了顺差。当然，这不是而且也不应该是一种长期现象，但这却表明了南斯拉夫经济的适应能力和在世界经济关系中选择更好地位的能力。

上一个五年的发展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其表现是通货膨胀发展很快。从社会产品紧缩的情况来衡量，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的物价上涨平均每年达到百分之十九点五，上一个五年期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失调；商品货币关系结构极大的不协调；消费超过拥有的收入和实际的物质能力；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并且在利用所拥有的生产潜

力方面不够有效；尤其是在加工部门和第三部门发展粗放；与外国进行商品交换的不利结构；经济积累和再生产能力不能令人满意等等。

在一九七五年，特别是在一九七六年，由于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物价上涨明显下降，这就为下一阶段物价平稳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物价上涨速度减慢的基础不够稳定，因为生产结构并没有得到改善，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也没有提高。争取经济稳定斗争的成功开展取决于我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克服物质生产范围内通货膨胀的各种长期原因。

在评价上阶段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和寻找生产力发展不够协调和有效的原因，也就是寻找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矛盾和变化的时候，必须把这些同生产关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尽管自治的社会经济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了，但是在上一阶段并没有创造经济条件，而且直到不久前也没有创造一切必要的机构条件，以保证这个制度全面和协调地发展，保证联合劳动工人支配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剩余劳动的全部收入，并且在此基础上保证他们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决定性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剩余价值高度集中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决定剩余劳动和决定必要劳动时间的这种脱节现象开始日益加深社会冲突。通过国家渠道来集中和分配发展资金逐渐同自治制度的发展发生了冲突，并且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提高国家生产力的手段，而且日益成为生产发展过程中出现某些失调现象，不合理消费和无效利用社会资金的基本原因。以后通过市场，这个积聚和集中发展资金的因素代替国家，出现了银行和流通领域。从这

种决定剩余劳动的运动逻辑所产生出来的现实矛盾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因而整个过去阶段的特征是工人不能决定剩余价值。在工人不能决定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政策以及为实现这个政策而采取的方法也不能有很大影响。因此，发展的雄心往往超过经济的现实物质可能，从而削弱了经济的积累再生产能力，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并日益依赖银行系统，通过这种系统，剩余劳动越来越多地从经济中外流出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在经济本身的活动中出现一定的不合理状况。由于资金不足，联合劳动组织不得不靠流动资金、甚至个人收入来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投资方面没有补偿，建筑的时间太长，费用太高。为扩大物质基础而提高收入的斗争，也常常通过提高物价的方式开展。积累少、分散在很多联合劳动组织中，往往对维持日常需要都不够，因而复杂的发展问题，例如改革经济结构问题，自然也得不到有效地解决。我国发展中碰到的长期问题，例如通货膨胀、缺乏清偿能力、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生产费用大、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等等，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首先表现为联合劳动在扩大再生产中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对使用剩余劳动的影响不大。

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的上层建筑方面，剩余劳动的创造者——直接生产者不能对剩余劳动作出决定这一事实，不断地推动了超过现实物质可能的发展雄心。由于联合劳动对资金的使用和利用影响极小，从经济中拨出用于上述需要的一部分资金不断增加。这些活动大部分具有的特征是投资不合理、费用高过现实可能，而发展超出经济的可能和需要。这就使剩余劳动再分配有利于这些部门的趋势加强，而

使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受到削弱，这是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以上谈到的问题（通货膨胀、缺乏清偿能力，经济结构不好，生产率低等）的原因。

独立的金融和流通领域，特别是银行和商业也是一个重要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把直接生产中的大部分剩余劳动重新分配给新的、至今仍未同生产建立起令人满意的联系的领域。

上一个五年期间在发展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方面还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经济和社会在宪法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改组。建立了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实行了代表团制，这种制度正日益成功地促使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解决。然而，所有这些过程都在进行中。没有及时地把联合劳动同相互依赖的生产流通整体自治地联系起来。在这种条件下，联合劳动从国家手中取得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职权便非常缓慢。

联系到中期计划的制定和下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目标和任务的确定，在评价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时，应把我国发展的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起来。自治生产关系发展中的某些缺点和争议，造成经济中出现物质生产力存在一定的比例失调和问题。相反，由于没有为自治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也造成自治生产关系发展缓慢。国家及其它非经济因素对剩余劳动的使用保持过去的影响，经常妨碍和拖延生产和物质关系领域中某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利于保持现状和拖延自治的发展。这样的态度不仅对正确估价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程度、研究上一阶段出现的问题，而且对确定下一个五年的发展目标和任务都有特殊意义。就是说，社会经济关系在自治基础上的变化和克服这条



道路上存在的一定问题是物质生产迅速和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反之，解决一定的问题，也是发展自治的重要前提。因此，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计划中对这两个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方面的极其注意和重视。

### 第三节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五年计划 的目标、任务和发展的可能性

#### 一、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任务

根据对社会经济发展达到的程度及其对伴随这个发展产生的问题和矛盾的估价，以及对下一个发展阶段可能的估计，计划确定了五年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如下：

1) 进一步发展基于宪法原则之上的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这是更加协调和迅速发展生产力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

2) 通过蓬勃发展，提高经营管理的质量，在生产和消费结构中建立比较协调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来稳定经济发展；

3) 在平等的基础上、在国际分工中改善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经济地位，加强我国经济的出口能力，保证国家的外贸清偿能力，特别要加强同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

4) 更快地发展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尤其要加速发展科索沃自治省，以便缩小它们与整个国家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

5) 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社会自卫程度，这是整个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确定下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些发展目标时，基本上以下面三个战略宗旨为依据：

首先，在下一个五年期间应该完成基于自治之上的生产关系的重大改革，同时保证联合劳动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这样的地位，以便从根本上消除造成积累同直接生产者异化的根源；

第二，下一个五年计划应该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性任务，它指的是生产结构的重大变革，把消费纳入支配收入的部门并对使用收入的专门结构进行改革，更好地利用设备能力，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以及保证经济蓬勃发展；

第三，应该保证我国经济更有力地加入国际分工。这是一个极其宏伟而又复杂的问题，但也不是无法实现的。在全体社会力量的参加下，迄今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为这些问题的更快解决，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前提。

## 二、经济发展的动向

计划规定，社会产品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左右，工业生产为百分之八左右，农业生产为百分之四左右。考虑到上一阶段遗留下来的一定困难和问题，即头几年的增长率低，而最后几年高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经营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计划后几年的发展动向。

在决定经济增长率时依据的看法是：保持经济发展的高

增长率是稳定经济过程、合理解决社会问题、使生产力持久地迅速和协调发展、更有力地加入国际分工以及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必要前提。分析表明，经济的蓬勃增长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迄今的生产力发展已为此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战后，除了大量内部的、特别是外部的限制以外，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七以上，但最近十年的增长速度减慢了。今天，国家拥有强大的生产潜力。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技术水平，特别在某些工业部门，并不比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落后多少。工业上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劳动工具落后了十年，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劳动工具已经自动化或半自动化了。然而，由于结构失调和其它比例失调的现象，我国设备能力的利用率不高，因而在这方面还有很大潜力。据估计，工业生产能力的潜力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之间，尽管也有个别地方大大高于这个标准。由于对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我国的干部结构非常好，到一九七五年底，受过高等学校、大专和中等学校训练的干部，以及高度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占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就是在干部中也蕴藏着很大的潜力。

这一切表明，在现有的生产力中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尽快调动和合理使用这些潜力能够保证我国经济继续长期蓬勃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缩小我国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的鸿沟。

社会经济制度在自治基础上的改革也为此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前提。

计划认为，为了实现蓬勃与稳定的经济发展，下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政策中的活动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进行重大改革。这些改革能够消除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更加合理地利用总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加工工业部门的能力；加强国家的经济独立性，更有力地加入国际分工；使整个经济更活跃、更协调和更稳定地发展。进行这些变革的方法是：①更集约地发展动力、原料和食品生产；②发展主要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③更集约地开展出口经营活动，以便提供更多的外汇的净值效果，更集约地发展能更合理地代替进口的商品生产；④开展活动以便吸引国内购买力，并使之对国内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但这一切必须以国内资源为基础。

生产上的这种变革丝毫不等于强行发展动力、原料和粮食，而忽视加工工业，因为这样做，就等于解决了一种比例失调，又制造了另一种比例失调。这种变革意味着，通过发展动力、原料和粮食生产来克服由于动力、原料和粮食生产的落后面貌，而又在工业原料，居民日用品的供应以及国家支付平衡方面造成一定困难。动力、原料部门和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是工业加工部门和其它具有竞争能力的以及在经济上具有正常发展条件的经济部门迅速蓬勃发展的条件，也有利于加强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据估计，有现实的可能性来保证国内、国际所必需的投资资金，在生产方面实行改革，并在不增加外债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蓬勃发展。今后几年将取得更多的收入，这就能为投资提供相应的活动余地和更多的拨款。因为经济的积累能力将增加。因此，估计经济投资的增长要快于收入（即社会产品）的增加（每年约百分之八点五）。为此目的，特别重要的是：①通过制度性的决议和经济政策措施，保证实现计

划中关于加强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和积累能力的目标，加强联合劳动支配剩余劳动的过程；②加速劳动与资金的联合过程，并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把资金集中用于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的生部门。应该把最大部分的外国资金和集聚的居民闲置资金（储蓄）用于这个目的。

2) 提高质量，进一步节约劳动和资金。这是能够办到的，办法是：更好地利用生产能力、特别是工业加工部门的现有潜力；加强在收入关系上有相互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在再生产范围内的一体化过程和联系；对劳动和创造给以更大的物质鼓励；更合理地使用技术干部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更有成效地经营应该是增加收入和社会产品的主要因素。人们认为，劳动生产率为百分之四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一个低限度，低于这个限度就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强度和在国际交换中的地位，就会缩小生活水平迅速增长的范围。

3) 把社会部门的发展同经济的可能和需要协调起来。为了实现经济稳定政策、消除社会部门的联合劳动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表现是社会部门的发展超过现有的物质可能，必须通过自治利益共同体制定的计划，使这些部门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同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需要协调起来。这指的是，对这些部门进行彻底改革，使它们有效地发挥作用、克服不合理的业务活动，使劳动高度专业化，满足一定需要的选择等。这里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交换劳动的基础上，保证对这些部门进行重大改革，以便使它们成为在统一的社会再生产制度中为增加收入创造条件的工具。用这种方式逐渐克服侵占联合劳动工人的那部分剩余劳动的现象，这部分剩余劳动是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

4) 使我国的经济大力加入国际分工。这是实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基本前提。为了消除国家现有的支付平衡情况在经济发展方面造成的局限性，五年计划战略的基础是使出口的增长快于社会产品的增长，而进口的增长慢于社会产品的增长。

为了使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口能迅速增长，其基本前提是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从而加强我国经济的竞争能力。这方面发展的方向是逐步改革结构，使高级加工工业品、农产品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因为国际需求量肯定将不断增加。通过工业合作、联合投资等途径，经济合作的形式将更加丰富，而且在为增加出口创造稳定的条件。

应该对目前进口部门存在的不恰当的比例加以改进、减少我国经济对进口的极大依赖性，首先通过经济结构的改革，特别要迅速发展动力、原料和粮食，大量利用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和电力工业，其次与外国建立合理协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进口。

5) 在宪法规定的自治基础上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革是实现经济蓬勃和经济稳定政策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应该通过制度性决议和经济政策措施，为保证联合劳动工人在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享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创造制度和经济前提。这指的是加强联合劳动组织的一体化过程，而这些联合劳动组织在基于劳动和资金联合的再生产过程中是通过收入关系互相联系的。这是联合劳动工人支配他们创造的全部收入特别是支配用于维持社会部门的那部分剩余劳动及其组织形式的完整职能，成为自觉调整相互关系以及指导生产力和自治生产关系发展的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就 业

下一个五年计划发展政策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为成功地解决就业方面的问题创造物质条件和其它条件，同时进一步积极地改变居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

预定的经济增长率（百分之七）能使社会成分的就业率到一九八〇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这将使就业人数增加八十八万人左右，另外，自然外流的五十五万人，再加上在私人经济成分中增加就业十万人左右，这样，新就业的人数可达一百五十万人左右。这样，在社会经济成分中的就业人数就将从一九七五年的四百四十六万人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五百五十四万三千人。也就是说，在这个五年中，居民社会结构积极变化的趋势仍将继续，这种趋势也是战后我国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从根本上讲，就业的整个变化同社会部门相关，这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壮大，加强他们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因素的地位。

在就业政策中特别注意为技术干部的就业创造条件。据估计，在此期间内流的技术干部大约有八十万人，加上要求就业的和做临时工的人，共一百多万技术干部。这将进一步改善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在一个国家中，各地区就业的需要和可能是互不相同的。估计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就业人数的增加将比平均水平高。在那些地方劳动力的潜力最大。

工业仍然是就业最集中的部门。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在下一个五年期间，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将用于发展

资本集约的部门。为了在私营部门为就业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将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如税收、贷款等)来刺激所谓“小经济”和私人劳动的发展。同样，也将为更充分地利用土地和使个体农业劳动者得到更多的收入创造有利条件，并且为让农村居民更多地参加劳动而放慢非农业化过程。

就业率的这种增长情况为劳动生产率——这个实现经济稳定政策的必要前提——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留有相当的余地。估计下一个五年中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比上一个五年的增长率(百分之二点四)要高。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应该只是依靠联合劳动组织工人的努力，而是首先要依靠改革经济结构，更好地利用生产潜力和劳动时间以及改进劳动组织和经营活动。

#### 四、生活水平

预定的经济增长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稳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据估计，在这个五年内，生活水平的资金的年平均增长率是百分之六点五，这个增长率比社会产品的增长率要慢。自然，这是考虑到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也在迅速增加的这种情况，也考虑到积累增长的可能。社会生活水平将增长得快得多(百分之七)，而个人消费增长得慢些。这是在更高的水平上满足需求，即满足高的生活水平要求的一个自然过程，因为由于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教育、卫生、住宅及其它消费部门的需要也在迅速增加，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将根据合作原则给以最大程度的满足。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通过提高居民实际购买力来实现的，这只有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



要。这将导致工业品和农产品消费的相应增加，从而促使工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生活水平的这种增长情况意味着个人消费结构正朝着提高工业品和劳务的比重以及减少食品支出方面发生进一步的积极变化，而且消费的质量也有改进。实际上，个人消费结构将日益发展，这是需要得到越来越好、越来越全面地满足的反映。

就业的方针是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得到社会保险和经济保险的重要因素，同时，也造成额外购买力，它反过来对生产也有影响。它推动生产进一步发展，并使生产适应需求的规模和结构。总之，增加就业是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缩小人们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别的最重要因素。

估计，在这个五年中就业人员的个人实际收入将比上一个五年有更大的增加。年平均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三点五左右，接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百分之四）。个人实际收入的这种增长趋势可以说是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靠的物质基础。个人收入的迅速增加应该为更彻底地实行按劳动成果分配的原则，为实行按照每个人在创造收入中的贡献，特别是考虑生产率和创造性劳动付给相应的个人收入的这种政策创造条件。重要的是，要坚决克服平均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不但对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好的创造性劳动是最大的危险，而且也是占有他人收入、不劳而获的直接形式。这一切都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

在提高生活水平政策方面，应该在协议和契约的基础上优先满足共同需要。这就是说，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愿望和要求，应该根据经济的实际能力和物质基础，根据社会需求

的先后次序，来促进有选择地解决各个部门的发展问题。这里应该优先解决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有着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的那些部门（例如住宅建设、教育、社会防御、卫生保健等）。在下一个时期，社会部门的发展政策以及根据宪法原则对它们进行改革方面应该使这些部门日益成为社会再生产整体的一部分，并使它们的发展建立在与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相协调的计划和规划的基础上。这里要根据交换劳动的原则来确定联合劳动同这些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应该保证联合劳动工人对用作向这些部门拨款的那部分剩余劳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应该保证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者与在其它联合劳动组织就业的工人和劳动者享有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计划规定，在这个五年计划中要建设八十二万套住宅。这将迅速满足特别是工人对住房的需要，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一。建筑如此规模的住房，要求迅速改革这个部门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建筑业集约合理化和工业化。这就要克服在这个部门存在的大量弱点（生产率低，施工时间太长，价格高，施工者的垄断地位，投机取巧等），这些情况除了造成住宅建筑日益突出以外，还影响预期效果的取得。为了加快住宅建筑，要通过经济政策措施、特别是税收和贷款以及利用公民的资金等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

增加住宅建设不但是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促进一批经济部门的增加和增加就业的重要因素。住宅建筑对于促进整个经济增长率和增加就业的意义如此之大，是因为，为住宅建设需要而进行生产的所有部门主要是利用本国的原料和材料，这就对经济的稳定和保持支付平衡

起到了积极作用。

## 五、收入的取得、分配与利用政策

上阶段随同我国发展而在取得和分配收入方面存在的某种变形是经济不稳定和通货膨胀的根源之一。这些变形特别表现在消费超过收入和实际的物质可能上，尤其是在总的共同消费方面，还表现在不合理利用拥有的资金方面。在投资和总的共同消费中更是如此。因此，这个五年的发展政策特别注意解决这些问题。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既定目标和任务以及经济稳定政策，计划决定，在收入的分配和利用方面要特别致力于：

1) 加速联合劳动工人支配他们创造的全部收入、尤其是支配剩余劳动的过程，这是克服收入分配及其利用中出现的变形以及实现经济稳定政策的重要条件。在这方面尤其应该保证实现下列要求，即根据劳动交换原则，并按照实际需要和可能的发展计划对社会部门进行拨款，强化生产和流通部门在生产综合体中的一体化过程，而把银行和其它财政机构的业务置于联合劳动的直接控制和影响之下。

2) 应该把收入看成一种市场上得到明确承认的现实范畴，并保证各种消费都在已拥有的资金和实现的收入范围内进行。应该坚决制止迄今那种预支消费的实践。与此相关，应该彻底实行通过的制度性法令和措施，以此来协调这个问题，并对固定资金实行经常的、及时的补偿。

3) 为了实现发展任务和经济稳定政策，联合劳动组织和全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加强经济的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因此，计划规定，最终消费总资金的增长要慢于收入即社会产

品的增长，因为来自外国的补充资金的相对作用在减小。按先后次序满足需求的政策应该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协调一致。在最终消费结构中，投资的增加应该快于收入，即快于社会产品和一切其他最终消费形式。这种投资增加的条件是，实现经济结构中议定的改革和完成预定经济发展及就业人数的增加。同样，根据生产与消费的需要，实行保证必要的流动资金的政策。

估计个人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六，比收入要缓慢。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资金总额的增长应该慢于收入的增长，因为根据联合劳动的物质可能和需要情况，这种消费的某些部分可能发生各种变化。一般消费资金的增长将比其它消费形式的资金增长慢。

## 六、投资政策

经济蓬勃发展和经济稳定政策的实现要求有更大规模的投资资金。

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应该来自联合劳动组织、经济各部门、折旧和积累。在总投资资金中，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占的投资比重为百分之六十。估计在经济更加稳定和收入水平更高的条件下，居民的储蓄会有所增加，这样就可以拨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经济投资、特别是用于住宅建筑。因此，居民的储蓄及其直接投资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应该加上自治利益共同体在社会部门的和社会政治共同体的资金，以及来自国外的补充发展资金（贷款和共同投资）。

投资政策的中心是实现预定的投资结构。计划规定，整个经济固定资金的投资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五左右，而

非经济投资为百分之七点五左右，其中用于住宅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是百分之八左右。这样，在总投资中经济投资的比重就将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六十点五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左右。

在社会成分固定资金的总的经济投资的范围内，对于实现国家总发展的协定政策具有特殊意义的部门的投资应当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而在对其它经济部门发展的投资范围内，工业投资比重为百分之三十六左右，农工综合体为百分之十一左右，交通干线为百分之十四左右，旅游业为百分之四。

然而，工业投资结构中变化最大的动力、基本金属和基础化学工业的投资比重在工业的全部投资中应该占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而在动力和原料工业方面投资比重明显增加是为了弥补前一个发展阶段所造成的落后状况决定的，并且已经开始坚决克服这种落后对设备利用、特别是加工工业部门的设备利用能力和国家支付平衡方面造成的消极后果。但是，这并不等于忽视在这个五年的发展不占有优先地位的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些部门在积累方面也有广泛的自由发展余地，可以进一步现代化和发展，尤其是那些能够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外汇收入和促进就业的加工工业部门。

这样，出现了一个根据某些联合劳动集团之间达成协议的发展方向重新协调积累的复杂任务，尤其是考虑到应当对迄今的投资结构和积累的利用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然而，这种积累的重新协调只能在自治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劳动与资金联合的基础上、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实行。对于改善经济结构有特殊意义的部门的发展协议，目前已经在高级机构达成一致了。剩下的事情是，联合

劳动在自治的基础上，在劳动与资金联合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集中和协调用于发展这些部门的积累。计划规定，要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使这个发展过程集约化。这些措施主要是：

1) 促使联合劳动组织在投资政策中把资金首先用于：  
①发展那些对实现国家总发展的协议政策有特殊意义的部门；②发展那些通过充分利用和必要的现代化就能长期增加外汇收入和减少支付赤字的生产部门；③发展那些能增加就业（特别是在就业率低的地区增加就业）的生产部门。

2) 激发居民的兴趣，以便通过储蓄增加投资，把他们的资金更多地运用到解决自身的就业、住宅问题和其它共同需要，并且通过适当的形式（公债等）把居民的闲置资金收集起来对某些项目进行投资。

3) 促进劳动和资金的自治联合过程，以实现既定的发展政策，特别是实现占优先地位的生产部门的发展政策。积极加强在收入关系上有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的相互联系过程，以便把它们组织到业务共同体和其它联合形式中以保证完成投资契约规定的资金。

4) 外来资金要用在能改善经济结构的那些部门的发展上。同时，创造条件使联合劳动组织在有利的条件下向外国借贷。当然，在这方面，要考虑到向国外的借贷不能超过计划规定的范围，并且还要实现这个五年的一项任务——相对地降低我国的负债水平。

考虑到投资的这种相对困难的结构，下一阶段应该特别注意改进投资效果问题。超过物质和财政实际的可能而扩大投资范围，其结果就会拖延建设能力发挥作用的时间，对生

产、就业以及投资消费产生消极影响。同样也应该做出必要的努力，使未完工的项目尽快地发挥作用、更好地利用现代化的设备，以便使总投资的效果比上一个阶段有所改进。

## 七、对外经济关系

我国经济大力参与国际分工，是我国生产力进一步蓬勃发展的战略前提。逐渐缩小日益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出口商品销售市场扩大的限制性因素，是更充分地提高国家增长的生产潜力的基本前提。因此，在这个五年内，对发展政策的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对外经济关系政策中的基本方针是减少支付赤字，实现外贸交换方面的协调和均衡关系，以便增加社会产品的出口，减少进口。当然，这样的方针要依靠对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

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这种发展是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进行的，而国际经济形势的特点是经济关系巨大变化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其方向是开始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更合理地分配世界财富，作为不结盟国家的我国也在为这方面作出努力。世界经济的这种改革使某些国家的发展条件发生了变化。必须考虑到，这些变化将遇到有组织的抵抗，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把自己国家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转嫁给别人。因此，经济政策面临的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是：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保证我国经济积极而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这也是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必要前提。

下一阶段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据以建立的基础，首先是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更加协调和稳定地发展物质生产力，发展我们比较领先的生产

部门，与世界建立结构方面和地区方面的最优联系，加强国家的经济独立性，逐步消除我国单方面依赖同其它国家进行交换的状况，以及在平等、长期和均衡合作的基础上与一些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增加出口是下一阶段我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之一。计划规定，在这个五年内，商品和劳务实际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八，快于社会产品的增长（百分之七）。这样的出口增长率的基础是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生产潜力和对出口结构进行一定改革，这种改革也是对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进行相应改革的结果。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将在利用本国原料的基础上增加高级加工工业品，提高粮食和其它能大量增加外汇收入的产品的出口。出口粮食应该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政策中的长期方针，因为我国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条件非常有利，而且世界对粮食的需求量很大，今后还会日益增大。

粮食出口将在与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得到保障。将寻求共同投资增加粮食生产的可能性，以便使这种生产更加集约化。同样，还将大力发展世界市场需求量肯定将要增加的其它生产（特别是某些原料）。

出口方面的这种方针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来支持，这些措施既表现在对能增加出口和加强竞争能力的生产保证必要的财政资金，也表现为对那些能促进大量出口的各种经济合作形式的发展创造必要前提。

下一阶段的商品出口要在国家支付平衡范围内进行，而且进口的增加将比出口慢得多。在这五年中，规定商品和劳务的实际进口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五左右。



改变进口计划的依据是：在这个五年中将对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进行一定改革，这有利于减少我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在这方面，首先应该使粮食生产集约化，使粮食能充分保证国内需要并为其出口创造稳定的条件；在建立新的动力生产、基本材料以及再生产和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大力依靠国内的原料；在与外国建立合理的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适当保证半成品和配件的供应；大量利用国内机器制造业这个进一步建设我们国家的因素。这样的生产方针将大大减少我们对进口的需求，并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支付平衡状况。

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合理的、有经济根据的进口政策。首先进口那些国内不生产的或国内生产不足的商品，并进口那些对国内市场进行干预所必需的商品。

在对外经济关系的政策上，在这个五年中将特别注意促进和扩大与外国的非商品贸易，取得尽可能多的外汇以便较之迄今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抵偿贸易平衡的赤字。在这方面将大力发展对外旅游业，为外国提供一切形式的交通和建筑劳务，并且向外国转让我们的技术知识和工艺技术成就。估计在此基础上的外汇收入将比预计的社会产品的增加要慢，而外汇支出则比预计的社会产品的增加要快。

在下一个五年中，对外国经济关系更稳定和更均衡的发展，要求某些地区在商品交换的规模和结构上保持更大的平衡。尤其要努力在共同规划劳动分工和利用生产、财政、科学和其它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加强并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除了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外，增加与这些国家进行交易的可能性还没有充分利用，因为除了政治关系

以外，还存在极其有利的与这些国家加强双边经济关系的可能。就是说，这些国家正在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是大大增加我国工农业产品出口以及转让我国技术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原料和石油，这是我国进口中的一个很大项目。

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集中在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易上。这是我国支付平衡方面的赤字的主要部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大大落后于进口。因此下一个时期应该坚决努力通过大力增加商品和劳务的出口来争取与这些国家在商品和劳务方面达到比较平衡的交换。从这些国家进口设备、再生产材料、消费品要同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相协调，也就是要同由此而产生的实际的支付能力协调起来。

这个计划也要考虑到外国的补充发展资金。完成预定的经济发展，要求利用外国借款和联合投资作为补充积累。但是，实际向外国借款政策要使这个五年中国家的相对债务不比上一个五年重，并且要在有利的条件下，根据支付的可能来取得借款。首先要把外国资金用于发展那些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的部门，用于发展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

应当指出，目前南斯拉夫向外国借款的程度是在正常的范围内。甚至借款的相对程度最近几年已明显下降。可以肯定地说，南斯拉夫经济借款太多的说法是某些外国人士进行政治宣传的又一个方面。由于有组织地进入外国市场，南斯拉夫经济目前已能够获得外国的补充资金，并且条件也比过去大为有利。

为了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建立新

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重要，通过这种关系的建立能使联合劳动、共和国和自治省对争取南斯拉夫在国际经济交换中的地位，争取国家支付平衡的权利和责任感大大提高。然而，为了使联合劳动真正成为对外经济关系政策的基本体现者，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必须加快生产部门和外贸部门的有关联合劳动组织的联合过程，其方向是建立再生产综合体和利益综合体的大型组织，这样的大型组织有利于保持进出口平衡、加强生产、财政和流通组织的一体化，以及在长期的基础上成为参加国际交流过程的体现者。

#### **八、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迅速发展**

为了进一步缩小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与国内发达水平的相对差别，这个五年把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迅速发展列为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计划规定，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社会产品的增长率将比全国的增长率快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而科索沃自治省则快百分之六十左右。

经济上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这样一种发展是依靠这些地区拥有的自然潜力，依靠建立起来的干部队伍与生产基金，依靠新建生产设备的投产，新的生产设备的扩大与建设以及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蓬勃发展同时伴有这些地区经济结构的一定变化。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会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就业人口的增加而发生重大的社会变化。这将有助于这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

此外，更多的投资能够使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发展更快。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比重也将随着全国对固定资金的总经济投资而增加。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固定投资资金的数额首先从这些地区本身的积累中取得，其次从联邦基金中取得。联邦基金是按照社会经济成分中社会产品的百分之一点九七的比率，通过联合劳动组织劳动与资金的自治联合以及接受外国借款、贷款等形式建立起来的。国际银行贷款的主要部分都将用于这些地区的发展。

同样，在团结互助原则的基础上还将保证把补充资金用于迅速发展经济不够发达的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的社会部门，以便进一步缩小这些地区与经济发达共和国和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以及全国之间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方面的差别。这种补充资金通过联邦预算得到保证，占整个经济中社会产品的百分之零点九三。

整个经济和社会在这个五年期间将通过联邦基金和补充资金拨出约八百八十亿第纳尔或者全国社会产品的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用于这些地区的发展。这是一项重要投资和拨款，也反映了这些地区和全国要求尽快发展的共同利益。不发达共和国和科索沃自治省所达到的发展水平，越来越能够使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自治组织在这个五年中，在兼顾它们的利益和需要的基础上建立有力的联系以及进行新形式的合作。

联邦为此目的采取的专门措施将推动科索沃自治省迅速发展。

#### 第四节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期间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

##### 一、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

在宪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社会经济关系是计划规定的这个五年中的首要发展目标，因为这不但对根据宪法建立联合劳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新的地位，而且对于保证国家生产力的蓬勃发展都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说，在这个五年期间，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改革的特征是给联合劳动工人确定这样的地位，即他们将逐渐取代国家及国家机构的一切重要的调节职能，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工人阶级在逐步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的同时，还将大大地加强自己作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体现者的职能。

在自治基础上争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斗争是在三个基本方面进行：

第一，应该尽早建立严密的经济制度并创造一切必要的制度前提，以保证联合劳动在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必须尽早地使还未制定出的那部分经济制度同宪法协调起来，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新经济制度来保障：

①联合劳动工人在生产和其它经济部门中决定收入的取得及其支配的一切因素，特别是在扩大再生产领域和在同社会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工人自由交换劳动方面，决定收入的取得及其支配的一切因素。这样，就把全部收入都置于它的

创造者的直接控制之下，就能克服由于联合劳动不能满意地影响剩余劳动，以及由于这部分收入有靠必要劳动不断增长的趋势而产生的矛盾。

②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是民主地指导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和方式。

③自治计划将深入各级联合劳动组织和整个社会的所有计划主体的思想之中，而成为他们活动的组成部分以及自觉指导自治发展的工具。自治计划的迅速发展以及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使自治计划结合成一个整体，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发展起到有效的作用，并为每个主体和全社会最优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来有效地克服市场的自发性，克服我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并且保障我国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④在宪法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有效方法，以保障和刺激劳动与资金的迅速联合，资金迅速周转，在共同计划、规划和收入利益的基础上使资金用于这样的一些发展方面，即为我国生产力蓬勃而稳定的发展、为在这个范围中的所有主体的最优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在宪法基础上制定经济制度只是在建立新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加困难的一步，是组织和促进联合劳动完全地真正有效地承担起自己在指导社会再生产进程中的职责。事实是，就其组织水平来说，联合劳动还没有这种能力。因此，在下一个时期建立新的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点，首先应该是创造必要的前提使联合劳动在新经济制度的机构的基础上自治、自我组织成这样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够使联合劳动成为发展政

策的基本实践者和体现者。在这种意义上尤其应该：

1) 建立并广泛发展那些在再生产过程中在收入关系上相互有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联合工人能够直接决定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决定收入，能够更完全地发挥社会计划的作用，并且有效地指导生产力的发展。对此尤其重要的是，在生产、交换和财政部门的联合劳动组织联系和联合起来的时候，要把它们的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建立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收入关系以及劳动和资金联合的基础上，这样来制止资金的倒流和剩余劳动与其直接创造者的异化现象。

建立收入联系的联合劳动组织的高级组织形式，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怀疑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这个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及其基础的法律主权。联合在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的工人应该决定由他们创造的全部收入。

2) 加速发展社会部门的自治利益共同体，其目的在于保证彻底实现这样的原则，也就是使社会部门的发展建立在经济部门联合劳动组织的工人和劳动者与社会部门工作的劳动者自由平等地交换劳动的原则上。这种情况要求，使这些部门的发展建立在得到社会广泛承认，即得到劳务使用者，也得到劳务提供者承认的计划和规划的基础上。这样，在社会和物质方面将得到：①联合劳动完全控制用来对这些部门拨款的那部分剩余劳动；②在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者享有与其它部门联合劳动工人一样的社会经济地位；③社会部门的发展要与经济及整个社会的物质可能和需要协调一致。

3) 由于相应的经济机制和各种刺激形式的发展，促进了各联合劳动组织之间按照共同的利益、发展计划和规划实

行劳动和资金的联合过程以及积累的迅速周转。本国银行的发展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新的银行制度和贷款制度发挥有效的作用，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有效地发挥新的扩大再生产拨款制度的作用，是迅速地改变基于自治之上的生产关系的重要前提。因为，问题是不仅使工人直接决定收入的取得、支配和利用，而且还涉及我们将如何迅速地组织并找出相应机制，以便在新的扩大再生产拨款制度的基础上开始有效地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

4) 进一步发展和促进代表团制，这样，工人、劳动者和公民就可以决定对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有关系的问题，还可决定与整个社会有关的问题。

第三，成功地实行经济稳定政策和克服生产力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在宪法基础上迅速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前提。因为，这样就能克服造成剩余劳动与联合劳动工人异化的基本原因和矛盾，并为大力发展自治生产关系创造物质前提。

## 二、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改革

在这个五年内，经济蓬勃发展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①对经济结构实行重大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克服结构的不协调性，并为经济的稳定与蓬勃发展创造条件；②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

改革经济结构的目的是迅速发展那些落后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混乱的经济部门。特别要把重点放在迅速增加动力、原料和粮食生产方面。继续坚持国家工业化，力求使社会产品中工业占的比重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四十点四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左右，使农业比重从百分之十



六点二降低到百分之十四左右。同时工业范围内的结构改革将要大力进行，要迅速增加电力、主要金属、化工产品、设备、非金属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这些部门生产的比重将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而其它工业生产的比重将从百分之五十左右下降到百分之四十四左右。同样，在交通基本设施、建筑和旅游业，尤其是对外旅游业方面都将有一定改革，使它们加速发展。

这种生产方针建立在国家支付平衡比较优先、战略起因和积极活动的基础上。这些改革也是有效地利用目前的生产能力和最合理地增加整个经济收入的宪法前提。所以，要重视这样的原则：发展经济合理的生产部门，并使经济制度的整套工具都对此发挥作用。

为了保障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实现预定的结构改革，必须保证经济的现代化和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能力，特别是劳动紧张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这是加强经济的竞争力、使经济更有力地加入国际分工的重要前提。为此，尤其要注意新增设备能力的合理建设，使它们最优化，劳动的更大专业化和分工，发展国内联合劳动组织和外国伙伴的生产协作等等。

至于现代化，必须使现代化与经济结构和分工变化的需要结合起来。因此，现代化的实现不是使某一个独立生产设备能力现代化的机械过程，而是在对经济结构实行有计划的改革过程中实现的。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在确定这个五年中优先发展的部门时，首先要从下列原则出发：保证基本条件并消除限制整个经济发展的因素；保证国内生产和消费的稳定供应；改善国

家的支付平衡，保障更广泛地加入国际分工，合理代替进口并刺激合理的出口。在这些基础上达成协议，采取共同措施保证下列部门的迅速发展：①动力（电力的生产和输送，煤、石油、天然气和工业用气的生产和加工）；②农工综合体；③其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或大力代替进口的原料部门，如黑色冶金、有色冶金、主要化学产品和非金属产品等部门；④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⑤交通干线；⑥对外旅游业。

这些部门的迅速发展将有助于克服由南斯拉夫经济结构不平衡所造成的物质不稳定原因，有助于今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利用整个生产潜力，加强我国经济的独立性并改善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迄今，特别是上一个五年中，动力生产发生了一些问题，它们开始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是：电力生产和输送能力落后，过去由于全部由国内能源保证，而最近几年由于事业的发展，在满足需要上开始受到限制；其次使煤炭增长的生产能力不足，用于勘探和开发国内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增长得非常缓慢而且不足。由于国内炼焦煤矿不够，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也有限，因而国家的能源基础越来越依赖进口。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个五年中的动力发展政策决定继续建设本国需要的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内的能源。必要的动力燃料的进口应该建立在合理使用和消费的基础上。

预定在这个五年内，电力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这样，电力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就会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十二点四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九。

动力发展政策的重点是：1)利用本国资源建设电力生产

能力；2)建设和配套的输变电力为三十八万伏、二十二万伏和十一万伏的电力网，建立管理这个电网和整个电力系统的调度中心和相应的分中心；3)建设生产合理的煤炭能力；4)研究和建立用于开发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原料的能力；5)建设协调一致的石油再加工系统，在这系统范围内石油利用方面、黑色和有色金属产品的比例是27:75；6)建设南斯拉夫的石油管道和天然气干线；7)通过研究，促进从本国煤炭中获取天然气的技术；研究盐能和地热能。

预定在新的五年期间，电力生产每年将增长百分之十点二至百分之十一点八，这样，电力生产就将从一九七五年的三百九十亿度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六百五十亿度至七百亿度。这样，不但可以完全满足本国消费的需要，而且还有一定的能力储备。

电力生产的这种发展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火力发电站、水力发电站以及大力建设新的电力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的。到一九八〇年，新建的水电站和火电站的总能力将达到七百九十万千瓦。与此同时，还将建设起总长度为一万零二百公里、三十八万、二十二万和十一万伏特的输电线路网系统和调节中心。这样，就将创造一个既能满足消费要求，又能适应与临近的东方和西方国家电力系统联结要求的强大统一的电力系统。

煤炭生产也将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长。估计，煤炭生产将从一九七五年的三千六百六十六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六千五百到六千八百万吨。国内的煤炭生产将占整个能源生产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到一九八〇年将建成具有二千七百万吨煤炭生产的新能力。这样到一九八〇年年底总的的能力就将

达到六千五百万吨左右的水平。

下一阶段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基础是：合理经营本国资源，进口必要的原料，石油和天然气，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以利于优质燃料的生产和保证基础化学的原料。

在这个五年内原油产量将从一九七五年的三百七十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四百六十万吨（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五）。在这个时间内，还要建设和扩大石油加工能力，加工能力将从一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二千三百五十万吨左右。建成统一的南斯拉夫输油管道总长度为七百四十公里，这样，就可以连续输送原油。

到一九八〇年，天然气的总消费量将增加二点五倍。即天然气的消费量将从一九七五年的十六亿标准立方米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六十亿标准立方米左右。而生产量则将从十六亿立方米增加到三十亿立方米左右。其它部分将由进口保证。为了满足如此大量的天然气消费量，将建成总长度为二千四百公里的天然气输送管干道和分干道。

上一个时期和再生产材料生产的落后造成生产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特别是加工工业部门的能力，增加了国家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增加了支付平衡赤字，而且引起经济过程中的其它障碍。世界上原料和能源方面矛盾的深化，还没有得到克服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混乱现象使原料生产具有战略性质。因而，迅速发展经济合理的原料生产，是使经济得到更加稳定的发展，更有效地利用生产潜力和改善国家的支付平衡状况的条件。而重点放在迅速发展基本金属、主要化学产品和非金属产品的生产上。

预计黑色冶金工业也将得到迅速发展，用本国资源保证

钢铁需求量的百分之八十，估计到一九八〇年将生产六百三十万吨到七百万吨粗钢和四百七十万吨到五百二十万吨钢产品。

黑色冶金业的发展应该按现有能力最优化要求进行，特别是对生铁和转炉钢的生产，并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按其生产阶段协调发展。这里生产能力的活动首先应该建立在利用本国矿石和废钢的基础上。

在利用一九八〇年达到的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之间的生产能力时，可能而且也必须使生产能力有如下的提高：焦炭生产从现有的二百万吨增加到三百五十万吨，铁矿从六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一百万吨，铁从二百九十七万吨增加到四百三十万吨到四百七十万吨，钢从四百六十万吨增加到六百三十万吨到七百二十万吨，而钢材从四百六十万吨增加到四百七十万吨。估计新建能力的生产不但能满足钢铁消费的增长，而且还可用一部分代替进口。

发展有色金属生产的基本方针是克服提炼和加工能力之间结构上的不协调，积极利用本国原料，使它长期保证有色金属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在这个五年内有实际可能使有色金属按照百分之十一的年平均增长率发展。因而，某些产品的产量要增加：铁矾土将从一九七五年的二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五百一十万吨，粘土从一九七五年的二十九万二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五十五万吨，铝从一九七五年的十六万八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三十五万吨，铜从一九七五年的十三万七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十八万五千吨，铅从一九七五年的十二万六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二十二万五千吨，锌从一九

七五年的十万一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十五万五千吨。这些产品的生产可以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代替进口并长期增加出口。

有色冶金工业发展的重点要放在有色金属矿的勘探、开采和提炼上，其次是放在熔炼、电解和精炼上，以及副产品金属的利用上。新的冶炼能力主要利用本国原料进行建设。

化学工业在这个五年中大规模发展的目的，是保证对国内市场的良好供应，减少结构上的不协调程度，使加工能力得到更好利用，增加出口，认真调整化学产品的进出口比例，使之对国家的支付平衡产生积极作用。

化学工业部门变化最大的是它的基础部分——石油化工。潘切沃石油化工联合体的建成、克尔克大型企业的建设以及加工和再加工石油初级产品的一整套生产能力的建设，保证人造毛料有新的增长，这就从根本上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并将一定数量用于出口。

合成橡胶和化学纤维新增能力的建设也保证了国内加工工业的需要，因此实际上不再需要进口了。

采用石油化工原料的各种有机化学产品的生产将极大地推动制药工业和化学加工工业的发展。

进一步建设农业化学化的生产能力（化肥、植物保护药物、饲料、兽医药品等），以充分保证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

化学工业的这种发展是要改进迄今不利的进口与出口比例（从一九七五年的 3 : 1 到一九八〇年的 2 : 1），从而改进化学产品的外贸平衡。

在这个五年中，非金属产品的生产将按照百分之十三左右的增长率增长。重点是，大力而协调地发展非金属矿产，

以增加国内市场稀缺产品的生产，保证对消费者的稳定供应。估计，到一九八〇年主要非金属产品的生产将达到：耐火材料，一百三十八万吨；盐，一百零五万五千吨；石棉纤维和精矿十四万吨；磷矿三十万吨；菱镁烧结矿四十一万吨。

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在这个阶段的发展是为整个经济发展的协议政策所确定的。它们将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本国的动力和原料生产价格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用本国设备进行装备，这样有助于代替这些设备的进口。因此，整个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这样一些部门，它们将大大促进那些对实现国家总发展的协议政策有特殊意义的部门迅速发展。

预定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可选择生产的年增长率约为百分之十点五到百分之十一，这样的增长率可以保证合理代替进口设备和船只，增加本国设备在国内设备总需要量中的比重，从迄今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提高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有选择生产的合理的计划增长率是建立在这样一些预见的基础上，即在这段时期内国家资金的总投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一，经济投资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五左右，而设备进口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一，保证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有选择生产迅速发展的是：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合理的分工，专业化，协作，原料生产者和所有产品消费者建立联系，机器制造业本身的生产改革，在成品和零件生产、装配方面规定协调的技术平衡等，这些同时也会减少我国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过于依靠进口装配零件的情况。

机器制造业和造船工业发展的重点是迅速地、平等地参加国际分工，增加成套设备的出口，迅速摆脱进口技术和工艺，寻找我国自己的技术和工艺解决办法，使产品更加多样化和革新，在更好地解决销售设备和船舶贷款问题的同时，必须使国内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

粮食生产对经济的稳定和国内支付平衡具有战略意义以及更好地支配拥有的自然潜力、要求采取社会措施以进一步保证在下一个阶段迅速发展农工综合体创造有利条件，其目标是满足国内对粮食的需要，保证工业需要的原料，建立必要的储备和大大增加出口，只进口国内不生产的粮食品种。

预定，在这个五年内，农业生产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四左右，其中社会成分每年为百分之八左右，个体农业为百分之三左右。这样，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社会成分的农业比重就将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在农业生产方面，种植业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五左右，而畜牧业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四左右。在种植业生产方面要努力大幅度提高经济作物、玉米和蔬菜的生产，而在畜牧业方面要增加牛肉、猪肉和牛奶的生产。

预计，到一九八〇年主要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将要增加：小麦和黑麦的生产将从一九七五年的四百五十一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六百二十万吨；玉米从一九七五年的九百三十二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一千一百万吨，稻谷将从一九七五年的三万七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五万吨，食糖从一九七五年的五十二万六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九十二万五千吨，油料从一九七五年十七万五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三



十一万五千吨，大豆从一九七五年的二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十万吨，烟叶从一九七五年的六万三千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九万吨，土豆从一九七五年的二百三十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三百六十万吨，水果从一九七五年的一百七十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二百万吨，葡萄从一九七五年的一百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一百五十万吨，肉类从一九七五年的九十九万吨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二十五万吨，牛奶从一九七五年的二十六亿五千公升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四十三亿五千公升。

小麦和玉米生产可以满足国内需要和保证适量的出口。同样，食糖和油料生产的增加将能满足本国需要和使国家不再进口这些产品。蔬菜水果的大幅度增加和品种的改进将能满足目前的食品需要，满足工业加工和出口的需要。肉类生产的增加也将满足本国需要和一定数量的出口。

食品工业发展的重点是食糖、油料和牛奶加工，食品的成品和半成品生产，肉类和蔬菜水果加工工业的仓库和冷冻空间的建设。

通过加强社会成分的农业生产发展与个体农业生产者的协作，在现有土地上通过调整土地面积使现有土地面积的生产集约化，广泛采用现代技术和工艺，改进劳动组织使生产、加工和流通在收入关系的原则上联系起来，对生产方针和生产结构的改革和大量投资等将保证农工综合体在这个五年内得到预期的发展。

在交通方面积累了大量问题，结果造成交通运输的极大困难，这对整个经济业务起了不好影响。主要反映是各种交通形式不够协调，技术、工艺和组织因素非常零碎和繁杂，

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低，运输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不高，交通安全不够，交通基础设施不均衡、不够发达和相互联系不够紧密等等。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交通是这个五年中应当加以特别注意的一类部门。

在这个五年中，交通发展的重点是基本交通设施、特别是主要交通干线的迅速协调的发展，以利于交通的迅速和合理发展，以便更好地利用我国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来扩大国际的路过的交通运输和改善我国的支付平衡状况。这方面的发展方针是：

——在铁路交通方面，使正在建设中的铁路完工和交付使用，使一千二百公里左右的铁路干线网电气化，建立安全信号和通讯设备、迅速实现一体化运输；

——在公路干线网方面，改建和建设一千三百公里长的现代化公路干线，其中绝大部分资金要投入“团结友爱”公路的建设；

——在邮电通讯方面，改建和建设国际邮电通讯干线；

——发展国际海上航道，特别是直线的海上运输和主要干道的港口的大型基础设施。

在发展旅游事业方面，优先发展对外旅游业以便改善国家的支付平衡状况和大量增加就业。通过大力发展对外旅游业来创造条件，使对外旅游业的流通量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七左右，或者说为一千二百五十万名外国旅游者的住宿创造条件。这样，就能使旅游业的外汇收入增加四亿美元左右，到一九八〇年旅游业的外汇总收入将达到十二亿美元。

对外旅游业这样蓬勃发展的基础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能力和建设新的能力。到一九八〇年将有大约十二万五千

张床位配齐设备，新建八万张左右床位，并且建设有助于增加服务项目和增加外国旅游者消费需要的基础设施。

这些部门（即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在这个五年内优先发展的部门）以外的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和出口的可能进行。这里有重要意义的是，要把力量用在更有效更合理地利用拥有的生产潜力，以保证整个经济的蓬勃发展、就业人数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三、结 论

关于五年计划，实际上应该论述的要比前面已谈到的要多得多。正如前言中所谈到的，五年计划是一个分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现状，以及研究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抉择和道路的机会。因此，需要论述的有关五年计划的题目很多，而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是无法进行的。

然而，与不久前通过的五年计划有关的一切雄辩地说明，这是一个应该在当前这个五年中实现的极其伟大的社会创举和物质创举。作为上一个五年期间实行协议政策的结果的、巨大的社会改革和物质改革的本身，表明了这一切。计划是朝着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自治关系和克服其他关系的残余方面改变生产关系的手段，也是国家生产力量蓬勃发展、使之结构平衡、在经济上更加有效，而在社会上更加合理的手段。实际上，计划是宪法和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的具体化，计划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改革纲领，它在这个五年中应保证克服遗留的矛盾，进一步彻底地确立劳动和团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以便为不断地稳定地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福利创造物质基础。这个五年计划即其

中的协议政策对于极大的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有特殊的意义，这在当今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的世界上意义尤其重大。在直接加强国家的防御力量方面将采取措施，国家内部的繁荣昌盛和稳定、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的加强对国家的防御力量有特殊的意义。

计划的目标和任务是我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反映，是联合劳动利益的反映。因此，毫无疑问，将充分动员社会的一切因素来实现这个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现在才面临着为实现计划为把计划变成现实生活的真正的斗争。当然，这是摆在社会共同体面前的，比计划的制定还要复杂的任务。生活肯定将表明某些评价并不是实际的，而计划也将根据计划工作连贯性的原则，在实行的过程中加以修改，使之符合实际。只有这样，计划才能成为真正实践的东西并不断得到人们的接受，而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和宣言。这样，计划就成为争取更美好的明天的斗争中的必要武器。

## 附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南斯拉夫的 经济状况和趋势

### (一)

一九七八年将举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还将召开共和国和自治省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将对最近四年来我国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作出估价，并将确定我国物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是，必须指出，在发展社会经济关系方面，不应该指望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一些新的重大的决定。因此，在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质性问题，在确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面，上次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一个转折点。第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在自治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作出了十分具体的政策规定，十分明确地确定了物质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方案，这些规定和方案不仅考虑到了当时的情况，而且还考虑到了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情况。通过四年来的实践，看来，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所规定的问题有些仍然没有解决，因此，这次大会的基本决定在目前也还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实际上，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为社会主义的自治社会经济关系、为协调物质和社会发展而斗争的革命行动的方

针。第十次代表大会对那些反对我国这一发展方针的所有势力发动了并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行动。

正因为如此，在为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准备的提纲也一再明确指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继续并进一步完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保证继续这方面的发展，并且不仅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为所有公民和劳动人民具体规定了任务：在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为实现未来的任务而斗争，为实现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在社会物质和社会发展方面所提出的巨大改革而斗争。鉴于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满怀信心地坚决克服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中以及物质和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许多错误和缺点。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南共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实质就是全国共产主义者进行工作协商，以便把活动的方针放在发动所有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加强联合劳动和自治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制度中的作用，来实现未来的社会变革。

一九七八年是使根据一九七四年宪法所通过的整个经济制度得到加强，五年计划已经执行到第三个年头的一年。预料执行的结果是很好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估计将有必要在继续进行的计划过程中作一些实质性的修改。今年需要开始为新的中期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作准备工作。这种长期规划包括的期限长到一九九〇年，有的甚至长到二〇〇〇年。

## (二)

从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过去四年中，无论在

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还是在物质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加强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在极不稳定的、以世界经济的深刻萧条为特点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取得的。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经济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化而能取得迅速的发展，再一次地说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再一次说明，必须卓有成效地解决和克服我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以便加强我国经济能力，免受国际经济关系不断遭到破坏而带来损失。

在过去的四年中，社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会产值的增长水平，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水平也不相上下。

这样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靠工业生产取得的。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五。农业生产也以百分之三点二的年增长率的在发展，其它部门的增长速度也很快；特别是那些增长率大大超过整个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部门，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投资活动，对过去四年内如此迅速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南斯拉夫是属于长期把很大一部分社会产值用于自己物质发展需要的国家。固定基金和流动资金投资的增长大大快于社会产值的增长。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七年期间，投资额占社会产值的百分之三十四到百分之四十一，或者说，在全部占有的资金中占百分之三十三到百分之三十八。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快的发展，还由于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以及职工就业构成和熟练构成不断改进的结果。年平均就

业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四点六。在过去四年内，有八十二万工人就业。这里不仅吸收了自然增长的有劳动能力的自立人口，而且大量在国外临时工作回国的工人在联合劳动中也获得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四年内，我国在国外临时工作的工人数减少了大约四十万人。

同样，生产的物质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工业所占的比重增加了，在工业内部，特别是电力生产、机器制造业、非金属生产及化学工业部门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在这个期间，由于经济政策上的措施，由于对市场情况进行了调整以及协调了商品基金和购买基金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率明显地缩小了。虽然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但是它已经大大接近于世界价格的变动。不过，通货膨胀产生的实质性原因尚未克服。

社会部门特别是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那些部门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从而对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贡献，并为提高劳动人民社会福利水平创造了条件。

在过去这段时期内，由于物质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结果，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生活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五点六，而社会福利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六点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完全是靠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增加所取得的，而且还由于在这个时期内考虑到了使劳动人民得到社会稳定的一切重要因素，从而大大限制了造成不良社会后果的许多经济上的偏激现象。

在物质和社会发展中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在社会主义



的自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中也取得了重要成就。这些成就意味着工人在联合劳动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了，意味着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确立了工人的决定性的作用。自治的生产制度从来没有象过去四年内那样有这么大的决定作用和有这么广泛的发展。

我国内部的局势使自治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取得了进一步的决定性的发展。在新宪法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已基本完善。已经按照新的法律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一决定，通过相应的自治方式，主要是通过协议和契约，是能够把矛盾克服掉的。根据这一思想，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和行动准则。通过新的法律，在联合劳动中，工人获得了这样的一种经济地位：不仅真的有可能，而且有条件进行劳动和资金的联合，无论在物质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来说，工人已成为整个发展和社会再生产的主要体现者。

这是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结构改革的主要目的。但是，建立这样一种完整的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体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目前，保证它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仍然是相当困难和复杂的，因为这意味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的自治关系。一切主观力量的任务就在于争取在自治的实践中互相结合在统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经济制度已经向着这个方向迈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因此，现在必须在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以便于在协议和契约的基础上，使经济决定能够很容易地自治通过，这样，就保证了迅速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所有问题。

只是还有两个重要的法令没有通过，即物价法令和抵偿法令。物价法令正在由联邦审议中，抵偿法令仍在制定阶段，因为抵偿法令是根据物价法令制定的。

因此，立法的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问题就在于贯彻执行。这是一件很困难而且很复杂的工作。现在必须为建立以收入为基础的新的自治关系而进行巨大的战斗。同时，重要的是，不能把这个任务理解为从形式上用已经确立的新的有法律根据的调节来代替现有的结构，这样，事实上就是在新形式的幌子下，保存旧的关系，并形成新的行政结构和中间结构，这意味着联合劳动工人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将重新被剥夺。必须严防这些危险，可是我们的实践表明，这样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在直接指导经济发展方面，联邦已放弃了自己的绝大部分职能。按照新的法律，共和国和自治省在这方面的作用加强了。但是，这里最重要的是联合劳动已经成为制度的基础。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劳动不仅必须对自己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发展负责，而且还必须承担下放给它的所有职能，从广义上来说，这些职能都是关系到整个经济状况和全国经济形势的。这就是说，在各种形式的联合劳动中，现在必须实现所有这些已有的职能。国家指导经济发展职能的下放，并不意味着这些指导工作已经没有必要了。它们还是继续必需的。只不过是这种指导工作的承担者有所改变罢了。新的法律规定，联合劳动是这种指导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已经成立了各种新的自治形式，它们必须指导发展，它们中的各种利益必须得到解决（利益共同体同国外的经济关系、计划利益共同体、经济设施方面的共同体、社会部门方面的共

同体等等)。

代表团制在许多方面必须按照这种新的不同的自治结构安排自己工作，从这一点出发，必须进行实践，以便通过新的自治形式和在自治的方式上具体地解决各种不同的利益。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这不是轻易地能够做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为这将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

但这并不是说，由于这种种原因就应当在实践中否定建立新的关系。事实是，原则性的法令决议在实际运用中本身还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不应幻想通过签署一般性的法规就能够制定出实际决议。实际决议只有在一种生动的自治实践中才能发现。但在寻找这些具体决议时，进展却很缓慢，甚至徘徊不前，很不相适应。无疑，这无论对社会经济关系还是对解决许多发展的问题，都会起不好的影响。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在旧的经济制度和尚未在实践中充分运用的新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的衔接之处，出现了以各个联合劳动之间的中间人自居的行政结构，这种情况无论对自治的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物质发展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每个地方的代表大会在会前都必须检查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实践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以便消除这方面所存在的障碍。特别是必须反对在新的社会关系下形成的表现为不必要的行政机关的重叠和会议过多的倾向。

在这个时期内，成为整个制度基石的代表团制已经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它已进入到需要把某些重大问题的政治制度同社会经济制度协调一致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处的情况同第十次代表会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

比之较发达的政治制度要落后得多。社会经济制度还在不断地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上），并且是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需要调整和改进政治制度，以便使经济制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事实上，由于代表团制的行之有效，由于代表团制尊重多数的利益，政治制度应当能更有成效地进行活动，例如，通过契约和协议顺利地克服我国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前以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于在物质发展以及在实现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这些巨大成就都必须进行分析和估计，以便通过政治决定和作出相应的决议，保证在未来的时期内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更加迅速和稳定。同时，还要指出，这些成就是在复杂的和矛盾的（这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过去四年内我国发展的特点）条件下，特别是在困难的国际经济情况下取得的。

### （三）

对迄今在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应该是现实的和客观的。因为，所有成就都不是为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起来的，但也不能说，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是缓慢的。除去我国自治赖以发展的明显的条件外，还必须注意到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代表大会是必须解决的。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赖以进行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发展了。目前，按国际标准计算，南斯拉夫经济按人口平均的收入水平在一千五百到二千元之间。毫无疑问，这表明我国的发展已达到新的水平；特别是要注意到，在物质发展达到如此程度的过程中，社会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作为整体来说，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方面，南斯拉夫都还完全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显然，发展达到如此程度，不仅对于社会关系，而且对于发展本身来说，都需要改变未来的发展方式。过去这段时期的特点是粗放发展，发展得快，这首先是在人口构成的社会变化的基础上和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取得的。在我国的发展中，部分劳动生产率、劳动效果以及经营管理的其它质量指标是相当低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国的经济结构虽然已经达到一个高的发展程度，但是，在过去，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上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形势下，它本身就暴露出许多严重的问题，而且在近期内还不能摆脱这种衰退和危机，必须考虑到国际形势仍有长期恶化的趋势。

我国经济的基本弱点之一是效果不好。按目前的标准，许多产品不易在国内外市场上销售，这是事实。由于产品昂贵、不合理和生产费用高，其结果就是在经济中出现很高的亏损。

我国经济的第二个弱点是早就已经存在的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里，不仅仅是指大的经济部门之间（即动力、原料和食品工业部门同加工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而且加工工业部门各阶段的产品和半制品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结构。因此，尽管有些地方作了巨大的努力，这些问题并未轻易解决，从而使现有设备能力没有充分利用。

此外，我国经济是以大量进口为指针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主要是进口技术，与此相联系的是大量进口设备、原料、零件、半制品等等，但是没有进口世界上所公认的、能够创新并不断提高本国技术的真正知识。我们国家在这方

面做得还很不够。我们现在拥有大量的受过教育的干部。在经济和社会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中，约有六十万人受过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这是一支有创新能力的干部队伍，但是他们的知识并没有充分用来创建和提高本国技术。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停止外国技术的进口，进口最先进的技术即使在将来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进口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自觉地进行，必须能发展自己的技术，并因此而加强我国的经济独立性，摆脱由于盲目的和大量的进口外国技术而给自己带来的某些不良后果。例如，有时甚至进口已经过时的技术；由于生产设备结构，由于以进口技术为基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往往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因为发达国家有现代化设备和优良传统。事实是，我国的通过进口技术的经济，就其结构而言，很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这种经济虽然也有竞争能力，但是有其经济上的弱点和不平衡性。这种经济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经济相比是很脆弱的。

这种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后果是，在贸易和支付平衡中出现相当大的赤字，这是一个严重的和长期的问题。

在谈到我国未来时期内必须克服的缺点时，我还必须指出效率问题和生产率问题。这方面的状况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考虑到我们有非常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和极现代化的设备，这种情况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在南斯拉夫的工业中，约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设备是在最近十年内添置的，约有百分之四十的设备是在最近五年内添置的。这就肯定了这一事实，即目前的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投入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是极不相适应的。设备能力没有充分利用。许多设备能力的发展超过了它的产品销售的可能，这就是设备不能

充分利用的原因。投资建设期限过长，并且是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就使经济的负担过重，使建筑费用庞大。劳动时间也未得到合理的利用。这些情况部分是由于联合劳动的劳动组织本身缺点所造成的后果，部分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结果。

虽然通货膨胀大大缓和了，但是同国际贸易交换价格相比，价格仍然是相对高的，同时还有向更高发展的趋势。因此，首先必须找出劳动生产率相对低、经营效果低以及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利用不足的原因。这些情况，再加上收入的分配和使用在经济上始终不够理想以及迄今的投资方式中所存在的弱点，就成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当然，还不应忘记国际通货膨胀对我国价格变动的影响。

在收入的分配和利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南共联盟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采取了极其明确的立场，即消费必须限制在其所占有的收入范围之内，共同的和一般的消费增长应该慢于收入的增长。但是，事实是，整个消费都高于现有条件下经济收入的可能。由于债务过重，经济部门已商定的义务仍然是很大的，但是在内部分配方面，利用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的做法却在扩大。在许多部门、集团和联合劳动组织中，个人收入大于这些单位中联合劳动所能创造出来的收入的可能。业务亏损的联合劳动组织尽管是亏损的，但个人收入却往往很高（有时甚至高于其它一些经济单位）。联合劳动组织用于扩大物质基础的积累很低，而且还出现粗暴地破坏按劳分配原则的现象，平均化的现象扩大了，同其它劳动相比，生产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所实现的价值不能令人满意。在经济和社会上都不能容忍的分配方式在许多情况下

同按劳分配交错在一起了。在极其昂贵的信贷条件下，还在进一步对战线很长而且在经济上和市场上都不合算的项目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这些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收入的分配不合理和利用不合理。不是把收入标准作为决定投资的出发点，在许多设计中，仍然把地区利益和地方利益作为出发点，仍然不考虑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考虑国家的总的经济情况。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很低的基本原因。还必须找出出口情况不佳以及在经济上必须依靠向国外大量举债的原因，还有，进口也常常不合理。所有这些现象说明，尽管收入有了相应的增加，但问题仍然不少。为在经济上合理地获得、分配和利用收入而进行斗争，这是社会再生产的中心问题。不能由于在联合劳动法基础上通过了新的收入分配细则就停步不前了。这些细则由于各地是在时间多少有些仓促的情况下通过的，因此，其中有一定的妥协性，例如，对劳动和闲散的差别，区分得还不够明显，因此，在收入的获得、分配和利用方面，探索按劳分配的根本措施是联合劳动长期努力的目标。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占很重要地位，而且在将来必须设法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经济效率同迅速发展和迅速变化的社会基础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社会部门的设备，安排得不合理，其结果是社会部门的费用高于它应有的水平。此外，教育、保健和其它社会部门的决定权利是联合劳动以外的事情，也不是根据经济部门的物质可能性来决定。由于社会部门是按照迄今的方式继续发展和拨款，所以，目前的情况很快地就变得更加复杂。我国需要抚养的人员数（小孩、学生、领养老金者等等）增长很快，目前，这些人员数



同已经取得的收入水平和自立人口相比是不相适应的。要求迅速发展社会部门的愿望和经济部门的物质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正是产生于社会发展是在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通过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以及社会部门同物质可能的平衡发展，这种矛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这些部门才能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为了最合理地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必须集中力量使社会部门的劳动和经济部门的劳动一体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必须保证社会部门的发展规划要更多地规定最合理地增加收入，也就是说要能反映出具体的收入可能和经济的需要，而不是仅仅反映一般的社会目标。

还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非生产性开支，经济部门的负担很重。这里还不仅仅是指社会政治共同体和社会部门的巨额行政费用，而且还指联合劳动方面的巨额行政费用和社会管理费用。最近以来，由于各种服务工作广泛地发展起来，据我估计，经济部门的非生产性机构有了增加。

上述问题和矛盾使自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困难。这些问题和矛盾是过去许多发展阶段所遗留下来的后果，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质和社会发展中积累起来的，而在当前发展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只有通过彻底的发展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克服这些后遗症，才能消除造成再生产费用超出可能范围之外以及造成低效率等等的根本原因。只有在自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迅速、稳定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解决的办法显然必须通过联合劳动的直接活动去寻找，而不是重新通过各个联合劳动单位之间不同的中间人去

寻找。

随着自治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出现大量问题和矛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应忘记，人们的认识也需要进一步改变。仍然存在着这种现象，就是当出现某些问题和困难时，有些人往往从社会政治关系以外，从他们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处所以外的因素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些地方。还在大量谈论所谓经营条件是发生困难的原因，但是对于必须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内采取措施来克服这些困难，却很少谈论。

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同扩大再生产制度相联系的问题。联合劳动还没有成为再生产的体现者。银行资金还继续是再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还继续存在着使经济部门负债过重的现象有增无已的这种关系，从而使经济部门的积累能力和再生产能力恶化。不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劳动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真正体现者。因此，就延长信贷的期限和改善信贷利用的条件这个意义来说，中期信贷和长期信贷必须具有新的特点，但是要同经济的实际可能性协调一致。不能容忍的是，通过银行渠道，收入从物质生产中流入财政领域，从而导致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发展。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曾规定了明确的政治任务，但是这些任务没有很好地实现。第十次代表大会采取的立场是：短期信贷必须改变成为经常性的流动资金，而中期信贷和长期信贷必须向延长期限的方向改变，并同经济的实际可能性协调一致。但是，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未能取得好的成效，从而使扩大再生产方面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了。这方面的原因还必须从投资战线太长这方面去找。目前，投资超过了

实际可能。南斯拉夫正在兴建的项目大约有二万九千个，这显然已超过了限度；同时，按照五年计划协商的情况来看，项目构成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兴建一些无论从国内市场还是从国际市场来看都没有前途的设备。从上述种种原因可以看出，扩大再生产问题是当前社会经济中的中心问题。

#### (四)

在过去一段期间内，国际经济形势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还必须谈一谈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影响。

从七十年代以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危机，这种局面基本上没有中断过，一直延续到现在。即使中断，时间也非常短暂。现在，行情周期短了，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寄托的新的投资周期基础上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没有很大的兴趣去进行新投资了，因此，行情周期基本上是因存货充塞而形成的。行情由于存货充塞而下降，于是又重新加强了衰退的趋势。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机制明显地失灵了，它们再也不能解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当前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因此，衰退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矛盾是如此之多，衰退的趋势是如此的强烈，以致目前看不出有克服这种状况的苗头。这些内部困难转嫁到了国际方面。但是如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结构失灵的原因一样，在经济关系方面的国际结构也失灵了。

个别最发达的国家为了恢复社会关系的原状而施加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压力，在国际方面也有表现。在这里，

最大的资本顽强地坚决保持自己在第二次大战后非殖民主义时期所取得的地位，因为在非殖民时期只完成民族的政治独立阶段，最强有力的经济权力根本没有触动。当然，在这一篇文章内不可能把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各种问题都说清楚，但是可以清楚地指出，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几乎所有措施都失灵了。

有些因素，例如货币等，可以说，各国的作法是混乱的。在国际上，技术知识和工艺被用作强有力的剥削武器。我国的发展政策，特别是经济发展政策，规定了必须以使之对我国经济带来最低限度恶果为准则，这是可以做到的。尽管由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只能部分地做到这点，但是，也必须利用这种形势以便在世界上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

当前的世界衰退情况与三十年代的危机有许多近似之处。通过表面现象和本质因素的对比可以看出这一点，如衰退现象都表现为：生产下降、生产复苏缓慢、大量的失业人口、通货膨胀率高、巨额赤字、实行保护主义、货币混乱等等。但是，同三十年代不同的是，这些状况遭到强大的有组织的反抗，因此，衰退的情况基本上始终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它没有象三十年代的危机那样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石油组织的成员国也遇到了困难。它们是在石油价格变化的基础上实行巨大投资的，但在实现这些计划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很高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目前通过销售石油所取得的收入比前几年的收入要少得多。最不发达的国家无疑处境更糟。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鸿沟毫无缩小，甚至是扩大

了。官方的和私人的资金经由国际渠道投入发展中国家的，每年只有二百亿到二百五十亿美元左右，可是，每年用于军备竞赛的却约有三千五百亿美元。这就是说，用于提高人类生活的钱还不到用于屠杀人民的钱的十分之一。这一材料概括地说明了当前世界的巨大矛盾。世界既要逐步摆脱这些矛盾，也要逐步提高它自己的信心。

与国家的政治独立相反，目前在世界经济中，统治的关系加强了。当然，这种情况暂时有利于最发达的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不利于许多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成立了各种经济阵线。有按南北关系成立的经济阵线，有按东西关系成立的经济阵线。实践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没有发展中的国家参加，今天不可能解决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可以说，无论是哪一个集团都越来越清楚，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只有在尊重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而这样做就是意味着逐步地改变乃至取消这些把世界划分为经济势力范围的集团。

国际经济关系的这种危机对南斯拉夫经济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对进口的依赖性和出口的相对薄弱、没有很发达的可以依靠的出口部门、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同国际市场上的巨大垄断组织进行斗争，以及考虑到我国没有参加在某种形式上表现为阻碍自由经济合作的经济集团的这些事实，那么，通过这种情况就可以再一次证明了自治制度的可靠性。即使在国际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我国经济还是能取得蓬勃的发展，能够进行深刻的社会结构改革，经济也在胜利地稳步前进。但是，事实是，从进出口关系来看，我国同国外的经济关系中经常还出现逆差。这

种逆差由于采取特别措施在一九七六年曾经暂时有所缓和，可是一九七七年这种逆差事实上又出现了，并且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八年初。

在这样由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状况所造成的困难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南斯拉夫经济却遇到了好的机会。战后形成的并且延续了三十年的国际经济制度，保证了最强大的国家的垄断地位，并使他们能够操纵分工，占有世界范围内的收入。但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逐渐地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处于比较好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必须使我国经济在地区性方面进行多种的国际经济合作。首先，我们必须更多地转向发展中国家，要比迄今为止取得更多的成效。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在南斯拉夫的贸易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约占百分之二十，而在不久前，这一贸易额是不大的），但是，现有的能力还远远没有利用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经济对石油生产国能够动用的能力仍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

现在，南斯拉夫有发达的生产设备和大量的生产能力，有发达的造船工业、运输工具制造业和一系列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的部门。通过更进一步利用各种因素，首先是很好地组织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将获得更大的突破，从而将为南斯拉夫经济在世界贸易中取得更好的地位而创造条件。但是从现在起，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能象过去那样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而是要根据商定的规划，建立在连续、稳定和长期性的基础上，要以平等的关系为基础。另一方面，现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我国经济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

而在将来还将拥有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品。

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指广泛的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南斯拉夫经济中已经掌握的经验必须进一步发展，通过生产合作，能够提高相应的出口效果。必须更多地发展共同投资，这样也能提高出口效果，通过共同投资以及通过同世界上经济和技术发达集团签订协定而在利益上联系起来，就能够使我国经济容易在世界上扩大。当然，所有这些都要求进行很好的内部组织，通过自治利益共同体同国外的经济关系使进出口者很好地互相联系和合作，并为存在着的各种不同利益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总之，就是要使国内经济稳定。完全可以相信，根据现有的发展水平，按照已经掌握的科学和技术，在世界分工中，我们是处于有利地位的。

这就是说，要使进口更加合理，要把一切力量集中在加强进出口的潜力上。同时，还必须提高对出口的认识，即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中，出口是迅速发展并且是我国未来的最重大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我国的整个发展和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成就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出口。

### (五)

过去的四年内，在发展自治社会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是由于在经济领域内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在为争取这些利益得到迅速而具体的解决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取代的。

上面已经指出，即使是生活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在过去四年内，我们还是明显地取得了许多成就。同世界其

它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感受到的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带来的困难要小得多。过去四年内的特点是能源、粮食和原料的危机，而且在这期间并没有任何消除。这些事实说明，我国的制度即使在复杂的情况下也是完全能够岿然不动。但是，从这里不能得出行动的规则，也不是说通过同样的行动在未来的时期内按照老办法也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成果和可能性应该是可以认识到的，但是，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与这种成果和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会产生种种限制，甚至有出现失策、缺点等其它潜在的危险。只有通过继续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的变革过程才能在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得到稳定。在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必须做到统一性，必须进行有效地协商，因为（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利益）有效地进行共同协商也是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发展是困难而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是困难的，在将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我们有一切条件能够胜利向前发展和进一步确立我国的自治制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以自己的决定作出贡献，即彻底地实现自治的社会经济关系，实现社会和物质的发展，而这些将保证新的前进，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发展中的受到限制的局面将得到克服，潜力将能得到更好地利用。

（摘译自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杂志，1978年第1期）